

目 录

CONTENTS

- 一 风暴来临之前 (1)
- 二 直言激怒当权领导 (6)
- 三 我成了肃反的审查重点 (13)
- 四 半年的隔离生活 (27)
- 五 一句话的小组会 (33)
- 六 回国后埋头写小说 (49)
- 七 反右的利剑悬到头上 (57)
- 八 不得不“低头认罪” (69)
- 九 祸不单行，亲人连遭不幸 (77)
- 十 进入劳教农场 (91)
- 十一 文艺组的生活 (101)
- 十二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中 (108)

- 十三 右派分子当了人民教师 (119)
- 十四 慈母的眼泪 (128)
- 十五 女儿相见不相识 (137)
- 十六 工作问题受挫，写出小说不能出版 (154)
- 十七 无权参加“文化大革命” (162)
- 十八 劳改盐场 (183)
- 十九 阔别三十三年之后重返家乡 (191)
- 二十 托钵上访 (217)
- 二十一 沉痛悼念人民的好总理 (242)
- 二十二 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工作问题困难重重 (252)
- 二十三 重操旧业、离休和发挥余热 (261)
- 二十四 暮年的反思 (268)

一、风暴来临之前

1955年7月中旬，我从朝鲜回国休假。

这是朝鲜停战后，我第二次回国休假。

第一次是1953年10月，朝鲜停战不久，我的工作有所变动。战争期间，我是志愿军二十兵团（朝鲜东线）新华社记者组的前线记者。我这个记者是双重身份：业务上由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领导，编制却属于二十兵团。停战后，兵团领导认为报道的任务少了，决定让我改做编辑工作。兵团政治部办了个机关刊物《工作通讯》，需要加强编辑力量。接手新工作之前，允许我回国看看，假期很短，只有半个月。我连东北老家也没回，从朝鲜直接回到北京，住在联大艺术学院文学系老同学黎白的家里。我想利用短暂的假期和老同学商量一下写作计划。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很多人和事，一想起来就激动不已，无法忘怀，我很想写一部长篇小说。黎白给我腾出一间房，我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拟了一个写作大纲，又向黎白和另外一个同学——在作家协会工作的李兴华谈了我准备写的几个大的战役、主要矛盾发展脉络和主要人物。他们认为大体可以，反正一部长篇小说，很难按原计划写到底，随着矛盾的发展，人物和情节都会有新的变化，先动笔再说。

这个假期，我主要是住在黎白的家里考虑写作的事，只会过几个联大的老同学和军队的老朋友。当时，我父母在北京我妹妹家里，也只见过两次，假期就完了。

回到朝鲜不久，主编兵团机关刊物《工作通讯》的编辑科长秦江调回国内，到总政治部八一杂志社工作，我接任《工作通讯》主编。手下只有一个编辑、一个见习编辑，编辑部下边有一个小型印刷厂，我从组稿、编稿、审稿到印刷，事事都要亲自抓，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无暇顾及写作，很想换一个工作，能有一点自己支配的业余时间。可好，1955年春，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调令，调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徐逸人和我到刚创办的《解放军报》工作。我非常高兴，到了那种大单位，不论做编辑、做记者，都可以有一点自己支配的时间。可是兵团政治部不放我，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找我谈话，说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我的工作，所以便不能放我走。他说，这是工作需要，虽然前线的工作、生活条件不如国内，但考虑到我年轻、身体好，组织上让我在前方多工作一段时间，相信我不会不同意。那时候，我思想非常单纯，无条件服从党的安排，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于是，宣传部副部长徐逸人回国去了，我继续留在兵团编机关刊物《工作通讯》。

1955年，志愿军已大部分撤离朝鲜。6月，《工作通讯》停刊，下属的印刷厂人员回国，宣传部编辑科和宣传科合并，我的工作又一次发生了变动，在接手新工作之前，我又一次提出回国休假的申请。政治部丁莱夫副主任很痛快地答应了，并在我临走的时候对我说：“在兵团的干部里，你在朝鲜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这次回去可以多休息一段时间。前两天政治部有人回国我已向他交代，回军区替你安排一下，愿意住哪个招待所都可以，如果想

结婚，不必给兵团写报告，通过回国的兵团的孙部长，就地在军区办个手续就行了。”



1952年秋在朝鲜前线的战友合影。左起，前排作者、王宇，后排李黎、徐光耀、秦江。

回国以后，我没有住军区招待所，因为我在军区机关没有什么熟人。1948年，我和徐光耀一起从联大文艺学院创作组调出来，就到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杨成武兵团做新华分社的随军记者。1950年由兵团调到北京军区，做新华社驻军区报道组的记者。不久，兵团赴朝，我又回到兵团。在军区时间只有几个月，而且我的任务主要是下部队采访，和军区机关各单位接触不多，熟人很少。我熟悉的主要是兵团和联大文艺学院在京工作的一些人。这些熟人对我这个从朝鲜前线回来的人非常热情。在作

家协会工作的文学系同学李兴华在作协招待所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那里很安静，写作或找一些老同学商量写作的事情都比较方便。

因为这次领导对假期没有限定，时间比较宽松。所以我自己日程的安排也就比较宽松。安顿好住处以后，首先处理了些个人的事情。当时我爱人徐宝珍正住在北京她朋友的家里。她是兵团文工队戏剧队的演员。经兵团政治部批准，两个月前她和政治部的两个年轻人一起回国考大学。现在考试已经完毕，正等候考试结果的通知。她提出，利用等候通知的这个时间，回福建看看母亲和弟弟。1949年，她13岁就参了军，到四野南下的54军文工团当了一名小团员，随部队南下两广，以后又随军赴朝作战，其间一直没有回过家。家里很困难，她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姐姐已经出嫁，哥哥在解放后参了军，家里只有母亲和弟弟，全靠母亲打工维持生活。她想回去尽可能地安排一下母亲和弟弟的生活。结婚的事等大学考试结果公布以后再决定。我觉得这是做女儿应尽的孝道，帮她筹措了一些路费。送走她以后，我开始看望先我回国的兵团的一些老朋友：在解放军报社工作的原宣传部副部长徐逸人、在八一杂志社工作的原编辑科长秦江以及王宇、曹振峰、高焰和宣传部两个年轻同志何乃庄、何秀敏等，还有联大的几个老同学：黎白、陈森、周普文等。战争年代结下的友谊是纯真的、深厚的，彼此相见，都是真情的交流，要说的事情很多很多。这一走动又是十几天过去了。我在招待所里坐下来开始写作以后，仍然不时有熟人来看望，一聊就是几个小时。那年夏天酷暑难当，那时的条件不比现在，房间里不但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没有，写不了一会儿，就大汗淋漓，进度很慢。刚写了两章，就接到军区转来的兵团的来信，大意是：兵团的肃

一、风暴来临之前

反运动已经开始，如果你已办理结婚手续，可以再休息一段时间；如果尚未办理，望立即返回参加肃反运动。

我那时政治热情非常高，对党的号召绝对是勇往直前的。我爱人探亲尚未归来，我怎么能住在北京等着结婚而置身于这场敌我斗争之外？我毫不犹豫地给爱人留下一封信，说明情况，立即动身回朝鲜。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满怀激情地回去参加肃反斗争，自己却成了肃反对象。

二、直言激怒当权领导

当时，朝鲜停战已经两年，后方的交通条件好多了。从北京经丹东到朝鲜西部新安州都是坐火车。从新安州到兵团部驻地龙烟浦里（村）有兵团部的班车，整个旅程只用了两天的时间。

龙烟浦里是朝鲜西部的浅山区。兵团部驻地在龙烟浦里以南、矮山梁西坡的两道沟岔里，司令部和直政处在南边沟岔，政治部在北边的沟岔。当时部队还没有修建永久性的营房，各单位居住和办公都是在坡脚处修建的半掘开式掩蔽部或用树枝篱笆两面抹泥做墙，茅草盖顶的简易房。我的住所是两开间的半掘开式掩蔽部，里边小间是我的宿舍，外边大间是原《工作通讯》编辑部办公室。

我回到住所，最先见到的是原编辑部的郭游和杨平。郭游很瘦弱，个子不高，可是火气很大，直筒子脾气，说话不管不顾。我向他们两个了解运动的进展情况。郭游说：“志愿军里哪来的反革命？大嚷大叫的火力倒挺猛，全是没有目标乱开枪。”我深知这老兄的脾气，他在三反运动中受过一些委屈，可能对政治运动有些抵触情绪。杨平这个年轻的见习编辑和郭游正相反，高大魁伟，赤红脸，浓眉大眼，从外形看是个标准年轻军人，可是他的性格却老实到有点窝囊的地步，上眼皮总是下垂着，一说话就

脸红，是宣传部有名的老蔫。他只是红着脸笑，并不说话。

正在郭游高声大调地申明他的见地的时候，宣传科的助理员张山跑来了，一进门就紧紧握住我的手，不停地摇着说：“刚听说你回来了，怎么不多休息一些时间！”我说：“接到兵团的信，叫我尽快回来参加运动。”他说：“是啊，是啊，运动一开始，工作更忙不过来了，你再不回来我真有些吃不消了。”论关系，我和张山是前后同学。他是1944年从敌战区北平出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华北联大学习的，我是1945年入华北联大的。他从联大政治班毕业以后就到部队搞宣传工作，有经验，笔头子也快。宣传科另两个助理员丁海和何秀敏都是年轻人，经验少，文字功底也差一些。宣传科长刘鸿飞原是县大队政委，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宣传科起草文件、编写教材等重要的文字工作主要靠张山。运动一来工作时间少了，一个人更忙不过来了，我回来可以分担一些他的工作。张山又热情地问我爱人考学的情况和几个熟人的情况，但没有提到原副部长徐逸人。这两个人性格作风截然不同，工作关系也不融洽。张山走后，我马上到宣传部长韩福贤那里销假。

韩福贤原来是政治部民运部长，在徐逸人回国以前就调到宣传部来了。徐逸人和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的关系一直不好，下边议论：丁主任是为了“改善”宣传部的领导，把不懂宣传业务但听话的民运部长调到宣传部来做徐逸人的顶头上司。在当时的部长里边，韩福贤的年纪较大，四十四五岁了，又高又胖，据说有“寒腿”的毛病，大热的夏天腿上也包着护膝。

我向韩福贤简单汇报回国休假的情况以后，韩福贤没有问我一句私事，就像在部务会上讲话一样，郑重地对我说肃清反革命分子是纯洁我们的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的必需的重大的战略任

务，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全心全意地积极地参加运动。又把兵团党委对运动的部署、要求和运动期间的纪律等作了一番交代，最后说现在是运动第一，日常的工作由张山向你交代。

当时，我的情绪很高。参加革命以后，历次运动——土改、三查、三反，我都是积极分子。我觉得，正像韩部长传达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外的敌人千方百计地想颠覆年轻的革命政权，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革命分子，对纯洁革命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确实是十分必要的。我决心全身心地投入肃反运动。

可是我第一次参加宣传部的小组会，就发生了使我感到十分不正常的现象，导致了我和韩部长的正面冲突。

那一次小组会是在宣传部的办公室召开的。参加小组会的有宣传科、文化科和电影放映队的全部人员。主持小组会的是张山，韩部长也参加了。

小组会主要是要大家揭发问题，发言并不踊跃，揭出来的也都是些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有根有据的重要问题，会场的情绪并不热烈。不料，小组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爆炸式的场面。

“爆炸”是由电影队一个年轻队员小马的发言引起的。小马揭发张山背地里讲丁主任的坏话，说听丁主任作报告是活受罪，尽说车轱辘话，反反复复、啰哩啰唆，简直是对听报告的人的一种精神折磨。

其实，政治部一些年轻干部背地里议论领导——包括丁莱夫副主任工作、生活上缺点的人，并非稀有现象，而且小马揭发张山的问题，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不料，坐在张山旁边的韩部长突然站起，把手上的记录本往桌子上一摔，红头涨脸地冲小马说，这都是“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挑唆的，徐逸人成心

破坏领导和干部的关系。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揭发张山问题却没来由的给原来的副部长徐逸人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使大家一时都怔住了。过了一会儿，就有几个曾对徐逸人有意见的人，纷纷揭发“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罪行”。诸如：徐逸人态度粗暴，给他汇报工作的时候，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几次找文工团女团员打麻将，影响恶劣等等，虽然都是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但都提高到反革命活动的高度。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虽然师出无名，但引导效果是明显的，我越想越觉得情况不正常。小马在会上揭发张山的不过是背地里议论领导的“怪话”，韩部长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而且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是为了保护张山免受群众的冲击？不是没有可能，张山一直是韩部长跟前的“红人”。张山这人我了解，他并非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人。他对韩部长的领导也有很多意见，而且语言尖刻，在下边讲韩部长的怪话比别人还“精彩”。但在韩部长面前绝对是谦恭的，韩部长向他布置工作时，尽管有些地方他不同意，但从不提出异议，总是严肃虔诚地点着头，好像他已完全领会，并将坚决执行。所以韩部长一直把张山看成听话的、得力的干部。为了保护张山及时转移群众的“火力”，不是没有可能。问题是，为什么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而且戴了那么大的帽子？

徐逸人这个人，在副部长当中比较年轻，恃才傲物，对上对下的关系都不大好，尤其是对上，比如与丁莱夫副主任时常发生碰撞。但像韩部长那样的老同志总应该知道，“反革命分子”是敌人，这顶帽子是不能随便扣的。特别是作为运动的领导人，更不能无根据地给人乱扣帽子，否则，就容易形成对运动的误导。

韩部长那一声吼以后，不少人跟着“反革命分子”徐逸人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短地乱喊叫，明显地是走火了。

当时我是政治部党支部的宣传委员，觉得应该向韩部长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我一想到给韩部长提意见，心里就有些发憊。虽然韩部长来到宣传部的时间不长，但不多的几次接触和过去在韩部长身边工作的人所说的情况，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韩部长这个人对上、对下是两副面孔。我这人说话做事一向直来直去，最怕和这种人打交道，可按组织程序，反映对宣传部运动情况的意见又不能绕过韩部长。

不管能不能接受我的意见，还是要说。

晚饭以后，酷暑难消。韩部长拿着一把蒲扇，坐在宣传部办公室旁边一棵大树下乘凉。宣传部办公室在我住所的对面。我来到韩部长身边，说：“部长，我想对今天的小组会提点意见。”

韩部长冷冷地看着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运动刚刚开始，如果没有什么证据就说徐逸人是‘反革命分子’恐怕不妥当，特别是你作为运动的领导人，首先给徐逸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更不合适，容易对运动产生误导。”

韩部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厉声问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我也火了，反问：“你是部长，你说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他又问我为什么替徐逸人讲话。

我说：“我不是替徐逸人讲话，我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必要。我是对你和几个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提意见。这次运动是肃清反革命，不能把同志关系和工作、作风问题混淆成敌我问题。”

韩部长说现在还没有给徐逸人做结论，还没有定性他是反革命分子。

我说：“韩部长，你和几个人喊出来的可是清清楚楚‘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既然没做结论，为什么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韩部长反问我，徐逸人的言行是革命的吗？

我说：“是否是反革命分子是个组织问题，必须有证据，单凭今天大家揭发的那些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能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吗？”

韩部长语塞，狠狠地一挥蒲扇，让我不用管运动中的事，还让我好好想想，准备交代自己的问题。和我预感的一样，这次说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的小组会，韩部长一反以往的惯例，不是先听大家发言，而是自己第一个发言，拖长声调说，有的人刚一回来，就对开展运动的情况横加指责，指责宣传部揭发徐逸人的问题是混淆矛盾。小组会并没有给徐逸人定性，是揭发徐逸人有害于革命的言行。有的人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低估群众的觉悟，自己跳出来表演，那么就给他充分的条件让他表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韩部长的话刚说完，就有人喊着要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当保镖的人站起来。

我心里非常火，韩部长这明明又是在引导，不过是把枪口转向了我。徐逸人在国内，在朝鲜无法整徐逸人，就找我当替身。可能以为我和徐逸人关系较密切，整我就可以抓到徐逸人的某些东西。我和徐逸人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于是我就坦然地说：“是我向韩部长提过意见。”我当然没有站起来，只是如实地

把我参加小组会后的想法和向韩部长提过的意见详细地说了一遍。

我说明情况以后，多数人没有说话，但有一个人猛地站起来，怒冲冲地质问我为什么对领导的号召打横枪，还要我老实交代和徐逸人的关系。

这一来，进攻的焦点就点明了。接下来，就有几个人要我交代和徐逸人的关系，揭发徐逸人的反革命言行。第二天的小组会也是如此。

当然都没有什么“战果”，以后改换内容，要我交代历史问题，包括我的家庭情况、从伪满到北平读书的情况、日本投降以后从北平到解放区的情况等等。提的问题不少，但这一次的小组会火力并不猛烈，我如实回答以后，几乎没有再追问什么。因为我写的自传和各个时期的历史情况包括证明人，档案里都有，入党以前组织已做审查，没有可质疑的地方。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整我的目的不在这里。

三、我成了肃反的审查重点

专题揭批我的小组会大约开了七八次，然后宣布我停职写交代材料，并说明为了使我能专心地想问题、写材料，给我换个住处，不许我随便走动，有事情和郭游说，需要办的事情由郭游去办。

杨平帮助我和郭游把行李搬到文化科最东边的一间简易房。利用搬家的机会，他们把我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收去了，包括采访和工作的记录本、国内来的一些信、报道的底稿等等。还叫我交出日记，可停战以后我就不记日记了，当然交不出来，他们也没有深问。

搬到新的住处，我和郭游铺好床以后，各自坐在自己的床头。郭游显得很尴尬，闷了好一会儿，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粗话：“扯淡，宣传部的人谁不了解徐逸人！”这句话的含义很明白。但由于当时我们两人的特殊关系——他是受命监视我的，我是被监视的，他不能明确地说出对部里处理问题的不满，只能用一句没头没尾、含含糊糊的话向我表示他的态度。

对郭游这种矛盾的心态我能够理解。郭游人朝较晚，是1954年春由北京军区轮换到二十兵团的，然后再分配到《工作通讯》。这个人心直口快，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两个在

一起工作，又性格相近，关系一直很好，彼此无话不说。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韩部长为什么派郭游监视我。

当时，我心里更窝火。找韩部长谈话之前我预料到可能产生不愉快的后果，但没想到他会采取如此反常的手段。谁都知道，徐逸人在抗战初期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自学成才，是晋察冀有名的记者。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为了革命出生入死，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即使历史上的确有可疑之点，他已调回国内，应按正常的组织程序，把疑点的有关材料转到国内他的工作单位，怎么能在朝鲜整国内的“反革命分子”，甚至找个替身来整他？

我和徐逸人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关系也比较好，但都是正常同志关系。1948年，我调到兵团新华社分社当记者，是徐逸人牵的线。1948年初，华北野战军政治部向联大提出，前方需要新闻报道人才，希望联大调给两个熟悉新闻业务的党员干部。联大把这个任务落实到文艺学院，文艺学院确定的是徐光耀和我。我们到六纵队不久，华北野战军刚刚组成的三兵团（后改称二十兵团）政治部工作组到六纵队检查工作，徐逸人是检查组成员，他了解我和徐光耀的情况以后，回兵团后向司令员杨成武和政委李天焕作了汇报。兵团马上下命令把我和徐光耀调到兵团。徐光耀被分配到兵团机关报《战场报》，我被分配到新华社分社。这两单位同属宣传部，和徐逸人接触的机会很多。当时，徐逸人是宣传部的部员，团级，我是分社记者，连级，级别相差很大。但徐逸人可能因为长期做新闻工作，等级观念不重，行军道上，或在老乡家的院子里吃饭，我们常常凑到一起聊天，谈到高兴处，纵声大笑；有时也意见相左，争得面红耳赤。但他从不摆上级的架子，争过也就完了，1949年解放太原以后，他调到河北军区当宣传部长。抗美援朝以后，他又回到兵团到宣传部当

副部长。部长魏泽南轮换回国后，就由他主持宣传部工作。1953年我由记者组调到编辑科主编《工作通讯》，他是我的顶头上司，负责刊物的终审。不过他在工作上很放手，除了言论，其余的稿件都由我定，他签字付印，上下之间合作得比较顺利，其间也有过几次争论。有一回，为一篇重点稿，我觉得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就是不同意，气得我把稿件摔到桌子上。他没有发作，晚饭后在山下散步的时候遇见我说：“老朋友了，意见不一致，慢慢谈，发那么大的脾气干什么！”最终还是按我的意见签发了稿件。在工作上我们之间碰撞不多，在生活情趣上却相差甚远。他的兴趣很广泛，喜欢跳舞，也时常打麻将。而我的生活很古板，从来不跳交际舞，也不打麻将。所以，我和徐逸人的关系主要是工作上的，上下之间配合顺利也好，分歧、争论也好，都属于工作范围，沾不上反革命的边。

我写的交代材料送上去以后，遭到严厉训斥，说我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我心里明白要我交代的是什么，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见风使舵，胡编乱造。所以第二次、第三次交代材料，都没有交代出什么新问题。奇怪的是，韩部长批评虽一次比一次严厉，却一直没有再对我进行小组批斗。后来，我从郭游嘴里知道，小组正在批斗刘鸿飞。显然，郭游对部里的做法是有意见的，嘟嘟囔囔地说：“这叫什么事儿，刘鸿飞那个老实疙瘩，说话就脸红，整他干什么？”“从1938年就打日本鬼子，到现在倒要把他打成反革命了！不就是和他（指韩部长）顶过几句嘴吗，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就往死里整人，这肃的哪路子反！”

我和刘鸿飞接触不多，不甚了解，只知道他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年岁较大，做宣传工作时间不长，所以和宣传部的一些年轻人共同语言不多，平素里不大讲话，脾气有点倔，

曾几次在工作中当众顶撞了韩部长。韩部长一直不喜欢这个人。

不能说革命历史长，人老实，就一定没有问题，就不应该在运动中进行审查。令人不解的是，部里有的人，譬如张山，历史上明明有疑点。他自己曾说过，在北平读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因为年龄小，敌人又没有任何证据，不久就把他放了。这件事组织上没有结论，不能不算历史上一个疑点。当然，对疑点要作具体分析，不一定都在运动中拿出来交由群众批斗，也可以通过组织调查取证。问题在于，有疑点的可以不批斗，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调查取证；而没有疑点的却成了重点，无休止地批斗，在批斗中寻找疑点。这就不正常了，不能不使人怀疑领导者是用运动中掌握的权力诛伐异己，整人。

大约过了两周，终于通知我参加小组会。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经过两周“休战”，这一回肯定会加温，火力更加猛烈。我并不害怕揭发问题，自己最了解自己，我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揭发不出什么。即使编造一些问题，没有证据，也定不了性。但怎样批斗，我心里却没底，群众运动中“走火”的事情太多了，反正硬着头皮挨就是了。

果然，这一次小组会气势很不一般。

一开始，叫我自己交代。我按着写过的交代材料说完以后，韩部长气得脖子都红了，愤怒地说我在充足的时间里不但不交代新的问题，反而写的材料一次比一次少，说我是在猖狂地向肃反运动进攻。

接着就专门地“端正”我的态度。“端正”态度，当然需要加强火力，拍桌子吼叫的，挖苦讽刺的，切齿怒骂的，攻势越来越猛烈。那时候的群众——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党的决定就是自

己的意志。组织上确定这个人重点是，这个人一定是坏人，一定有问题，领导上要求端正他的态度，打掉猖狂气焰，那就必须穷追猛打，一直打到他的精神崩溃、低头认罪为止。

对这种情况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不论人们怎样吼，怎样骂，我一句话不说。

这一次小组会一无所获。

第二天的小组会温度降了很多，没有大喊大叫。但问题却升级了。“反革命分子徐逸人”变成了“徐逸人反革命集团”，我成了“徐逸人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明确地叫我交代这个反革命集团成员都有谁，成员之间、特别是和徐逸人之间进行了哪些不可告人的活动？我一听脑袋就炸了。对于大吼大叫、侮辱、谩骂，我是有思想准备的，能够忍受，可是没有想到在运动中采取如此恶劣的手段，凭空捏造、栽赃陷害！我知道运动的老规矩，只要把你确定为重点，你就只有挨批的份儿。叫你交代什么问题，你不讲话不行，解释反驳更会招来更猛烈的批斗。可是我心里没鬼，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批斗的火力越来越猛，我心底的火也不住地往上撞。

几个人轮番吼叫，叫我交代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我也大声地回答：“我根本不知道宣传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无法交代你们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有人厉声问，你说宣传部没有反革命集团，那么你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我说：“这你去问韩部长，他是宣传部长，你问他，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韩部长喝令我老实交代问题。马上就有人喊：“打掉他的反革命气焰！”“砸烂他的花岗岩脑袋！”“叫他站起来！”呼吼声中，

电影放映队的一个换机员冲过来，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座位上提起来。此人个头不高，黑红脸，多年摇发电马达练就一把好臂力，特别是两只手，硬如铁爪，他抓着我的衣领，两手关节狠狠抵住我脖子下的骨头上，疼得钻心。后边又有一人怒吼一声：“站直了！”向我后膝窝猛踢一脚，我站不稳，身子向前一仆，那个换机员给我当胸一拳。我的情绪也失去了控制，大声喊道：“凭什么打人！没有证据，你们就逼供信，谁给你们的权力！”

可能韩部长觉得做得有点过火了，连连摆手，下令放开我。换机员松开手，站在对面，两手叉腰，怒气冲冲地瞪着我。其余的十几个人也站在我的周围，怒目而视，在我周围形成了怒目金刚组成的包围圈。

这一次的小组会温度确实很高。揭批者怒火填胸，厉声逼我交代罪行。而我毫无低头认罪的“老实”态度，针锋相对地逐条辩驳，形成了短兵相接的交手战。

在这场搏斗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张山的态度很特殊，我早已注意到，从揭发徐逸人的“反革命罪行”开始，他一直没有发言，既没有揭发一条徐逸人的“罪行”，也没有追问过有关徐逸人的一个问题，只是低着头在笔记本上记录别人的话；在大家“端正”我的态度、又吼又骂、动手动脚采取激烈行动的时候，作为小组长，他没有参加，也不制止，脸色冷冷地坐在一边，真可谓是“冷眼旁观”。也许这就是张山为人的特点。他并不是分不清是非，不会看不出宣传部这种无凭无据地揭批“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闹剧后边隐藏着某些人的不正派的动机，所以他不参加批判者的行列。但他深谙运动的规律，当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如果你坚持实事求是，提出和大家相左的看法，就会引起群众特别是领导者的不满，影响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形象。在这场

不正常的运动中，张山这种不动声色的旁观态度，正是他的聪明之处，也是可悲之处。

这次小组会经过激烈的交锋，仍然没什么战果，批判者怒气难消，我的心里更是气愤。散会以后，我马上去找兵团肃反五人小组成员、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一进门，我就冲口问道：“丁主任，1948年兵团一组成你就是组织部长，你说说，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丁莱夫正在看文件，放下文件，用手指指椅子，叫我坐下，有些不解地问：“怎么回事？你怎么提出这么个问题？”

我说：“你是兵团分管组织工作的老领导，对我和徐逸人的情况都很熟悉，你说说，我和徐逸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丁莱夫说，你和徐逸人就是部长和助理员的关系。

我说：“那为什么宣传部多次开会，追查‘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说我是‘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逼我交代和‘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关系。难道宣传部这样搞你和五人小组不知道？”

丁莱夫说自己听到一些宣传部开会的情况，详细情况不了解。目前几个军的肃反运动都处于发动群众的阶段，很多情况需要了解、掌握，他的精力主要在各个军，兵团直属单位的肃反运动由直政处抓。他要我详细说说宣传部的情况。

我就把第一次小组会上，韩部长没头没脑地给徐逸人扣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会后我找韩部长提意见，以及后来小组会批斗我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越说心里越火，最后，我很不冷静地说：“丁主任，你是我的老领导，有些事想向你讨个明白，为什么对干部的评价变化这样快！当初，我几次有机会回国，你不放。可能那时候你觉得我这个干部还有点用处。可是

为什么运动一来，整个地翻了个过儿。是不是当初你就知道我是反革命，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所以才留下我，作为肃反运动批斗的典型！”

丁莱夫听了这些讽刺的话，态度仍然很平和，说理解我的心情。在革命队伍中，上下级之间应该以诚相待。他表示如果我说的情况属实，那么韩部长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徐逸人有缺点，但他和五人小组从来没把徐逸人看成反革命。最后，他要求我如果和徐逸人说过一些违反组织原则的话，应该向大家讲清楚，消除误解。

我仍然有些气不顺，反问说：“难道这些是肃反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吗？”

丁莱夫乐了，让我对这次运动的意义和目的，要想得深一些、广一些。肃反当然主要为了纯洁组织，但这不是唯一的，革命队伍里能有多少反革命？就广泛的意义说，能使大家的警觉性和认识水平提高一步，清除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对提高革命队伍的战斗力的同样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丁主任的话有道理，领导看问题的水平确实比我高。

在我临走的时候，丁主任又耐心地开导我，对待群众运动不能感情用事，要冷静，要有个正确的看法。开始的时候，群众对运动不理解，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障碍，态度不积极，要启发，要动员。群众起来以后，又往往出现过火的行为，这时候就要防“左”。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也不能放任不管，要引导，要掌握政策界限，最后还要对运动中定下来的问题进行甄别。尽可能做到不漏掉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所以他要求我对宣传部小组会上发生的情况冷静对待，让我思想上不要背什么包袱。

和丁主任谈话以后，没有接着开我的小组会。隔了好几天，又通知我参加小组会的时候，参加会议的又多了几个外单位的人，有丁莱夫的秘书史忠、政治部的秘书赵人杰、政治部协理员冀连波，后来又增加了保卫部助理员毛建平等，会上没有提“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事情，主要是要我交代从东北到北平读书的情况，到北平以后和哪些人交往，特别是在新民学院（华北行政学院）那一段接触过一些什么人及由北平到解放区的情况。这些，入党以前我的自传中都写过，这一次问得很详细，特别是证明人的情况，包括政治面目、认识的时间、工作单位、家庭和工作地址等都问得很详细，看样子是准备外调的。小组会的温度也不高，中间曾有人喊：“叫他站起来交代！”史忠摆摆手，笑嘻嘻地说：“算了，算了，坐着说也一样，别叫他站起来了。”可能因为史忠是主任的秘书，他一说，也就没人再喊了。

没想到，过两天，小组会又回到徐逸人的问题上来了。不过，“徐逸人反革命集团”降格为“你们那个小团团”。

小组会一开始，韩部长就老调重弹，说宣传部并没有给我和徐逸人定性，而是要我交代“你们那个小团团”说的危害革命的话，干的危害革命的勾当。基调一定，加上有以前揭批“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余威，群众情绪马上调动起来了，呼吼喊叫、拍桌子瞪眼。有人大吼：“叫他站起来交代！”

我没有站起来。

这一次没有史忠等外单位的人参加。

韩部长亲自发话了，说宣传部讲道理不搞逼供信，不要给我提供借口，叫我坐着讲。

这次小组会仍然没有收获。

会后回到住处的时候，郭游已经搬走，一个背着大枪的战士

站在门口，我被武装看管起来了。我非常愤怒，前几天丁主任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怎么这样对待我！不但隔离审查，而且派上了武装，这不是当真把我当成反革命了吗！我要找丁主任，请他说清楚，到底为什么这样搞！我放下记事本就往外走。

看管的战士慌忙拉住我，说：“你要出去，得宣传部首长批准。”

我说：“我去找政治部主任，也需要宣传部首长批准吗？”

战士很着急又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我不知道，连首长就是这么交代的。要不，你回屋等等，我去报告宣传部首长。”

看到战士无可奈何的样子，我有些冷静下来了。不能为难战士，他是在执行命令。

我回到屋子里，努力平静自己的心情。冷静地想一想，现在就是找到了主任，也没有多大用处。搞运动的一般规矩我知道一些。每次运动各单位都有完成的指标，首先由基层党组织研究，提出本单位的名单，报到上一级的党组织，在兵团就是报到直政处（机关党委）。机关党委根据各单位报上的名单，经研究后提出直属队的名单，报到兵团五人小组，在一般的情况下，兵团五人小组不会改动。运动中的一般情况，譬如揭批的方法、程序等等，只要不是严重违反政策的，五人小组也不会过问。从前几天的小组会的情况看：史忠（丁莱夫的秘书）参加过两次会，“徐逸人反革命集团”降格为“你们那个小团团”，韩部长声言“我们不搞逼供信”，制止罚站、动手动脚等情况看，丁主任已经了解了宣传部小组会的情况并做过交代。武装看管这类事情，可以用多种理由说明它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丁主任也不好干预。“三反”时，我曾参加过打虎队，参加过对重点人物的批斗，有三个重点人物也曾被武装看管，运动后期复查，不是“老虎”的，放

出来，向本人道个歉也就完了。反正，定性反革命，必须有事实根据，而事实是无法改变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我没有问题，韩部长就是费尽心机，也无法把我打成反革命。

道理是这样，但在实际生活中，那段日子对我真是难以想象的磨难。首先是周围群众的冷漠和自我心灵的孤独感。本来政治部的人都熟悉，不少人还是好朋友。可是自从给我派上武装“警卫”以后，好像全成了陌生人，有的还极力躲避我。每次到食堂吃饭的时候，不论我坐在哪个位置，人们都避开那张桌，即使别的桌坐满了，加个座，也不到我坐的那张桌。有一天午饭，我从山坡住处下来，快到食堂的时候，文工队长一路哼着小调从山下走上来，两人快走到一起了，他猛一抬头看见了我，扭头就往回走，直到我打完饭，开始吃的时候，他才来到食堂，坐到远离我的一张桌子上。这个人过去和我的关系很好，因为我懂一些文艺创作，他写的歌词常常找我帮他修改，节目彩排的时候也常常找我去看，我们很谈得来，可以说是知心朋友，可是现在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种情况使我精神上很受刺激，也感到一丝悲凉。从理智上说，我对大家的冷漠甚至躲避的现象能够理解。党组织确定我是运动的重点，而且是需要武装看管的重点，想必问题很严重。人们出于对党的信赖，对党组织确定的问题严重的重点人物，很自然地在思想上与我划清了界限，还有些人也可能为了避免“敌我不分”的嫌疑有意地躲避我，这些都可以理解的。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是一般的运动，是肃清反革命的运动啊！政治部这些人，特别是关系密切的一些人，大家一块出生入死多年，彼此对对方的情况——从日常言行到战斗的表现和历史情况都了解，这个人怎么可能突然变成了反革命，在没有任何

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怎么能用对待反革命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志！这本是正常的思维逻辑，可是当时我却看不到这种正常的思维逻辑的反映。相信党无疑是对的，但相信到失掉独立思考的程度就有点可悲了。

在人们对我冷漠甚至躲避的那些日子里，只有一个人——史忠，对我态度与众不同。我和史忠相处时间并不长，是在记者组的时候。他原是67军201师的通信干事，有一定的写作能力。记者组的李犁和他是好朋友。经李犁推荐，把他调到兵团的记者组。时间不长，记者组组长轮换回国，推荐他担任记者组长，而我则调到了《工作通讯》，我们在一起只有几个月，相处却是很融洽。史忠个头不高，很敦实，性格朴实、和善，见人总是笑嘻嘻的。他说话有些口吃，却很喜欢唱歌，特别是两首30年代的流行歌曲——《天涯海角》和《四季歌》。他唱时微合着眼，轻轻地摆着头，两手打着拍子，唱得十分投入，有韵有味，十分动听。宣传部的人，特别是几个女孩子，都喜欢听他唱这两首歌曲。

在宣传部批斗我之前，史忠已调任主任（丁莱夫）的秘书，批斗期间，他可能是受命，来宣传部参加过两次小组会。其余的时间，因我被隔离，没有接触的机会。

到食堂吃饭是政治部人员大聚会的时间。每当我独占一桌、孤单无邻的时候，他就端着碗笑嘻嘻地走过来，坐到我的对面或旁边，找一些我平素感兴趣的话题和我说话，或者说一些逗乐的事情，缓解尴尬的气氛。而我却感到有些不自在。在人们对我冷漠甚至躲避的时候，能有人和我说上几句话，我心里当然感到温暖，何况史忠这样主动地接近我，我很感激他。但却不愿他因为这些在众目睽睽之下与众不同的举动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

在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回答很少，有时就默然以对。

史忠这个人看似随和却很有个性。好像他根本没有考虑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在饭堂照样和我接触，有一回竟拿来一瓶白酒，撸起袖子要和我划拳，弄得我更为尴尬。

武装看管期间，第二个精神磨难是无事可做。

人活着，总要做事情，特别我们这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年轻人。在战争年代，工作是不分昼夜的，常常是一个战役或战斗打响以后，几天几夜不睡觉，随指挥员在指挥所了解情况，困极了，找个小凳或裹上大衣靠在掩蔽部一角打个盹。战斗结束以后，部队休息了，当记者的却不能睡，要根据指挥部提供的线索，及时深入参战部队采访、发报道。两个战役之间，部队一般都要进行一段时间休整。而记者却不能“休整”，要报道部队练兵和评选英模等方面的情况。随军记者的工作可以说是无间歇的满负荷的工作。那时候我常常想，如果能有一天什么任务也没有，放心地、舒舒服服地睡上一大觉，再轻轻松松地歇两天，真是人生一大快事。停战以后，到《工作通讯》工作，编辑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总共三个人，也是从早到晚地忙工作，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晚饭以后，有一点时间，几个人凑到一起摔几把扑克就是最愉快的休闲享受了。心里期盼的是一年一度的回国休假，休假期间，没有工作一身轻松，可以任意地玩，可以找老朋友聊天叙旧，也可以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没有工作压力，没有公务缠身，那种轻松自在、无牵无挂的生活可有多么惬意！

工作多、任务重的时候，希望能有一些宽松、休闲的时间。可是到了真正没有工作，“闲”得无事可做的时候，才体会到这种生活比重务压身要难受一百倍！

隔离审查期间责令我做的只有一件事：写交代材料。可是交代材料我已经写过多遍，实在没有可写的了。想看看书，隔离室没有一本书，想看报，不给报，“闲”得实在无聊，就看糊在墙上的旧报纸。这些旧报纸我都已看过的，但还是一条一条地看，连边边角角很短的简讯也一条一条地看。但糊在墙上的旧报纸就那么几张，不到一天就看完了，看过两遍，就再也没有兴趣重看了。这时我才体会到，无所事事的生活是多么空虚，多么可怕。

大约过了半个月，晚饭时间，去食堂的路上，政治部协理员冀连波从后边赶上来，小声地说：“我刚回来，放心，没事。”说完，就急步走到前边去了。

冀连波原是兵团的摄影记者，停战以后改做政治部协理员。我们俩专业不同，我搞文字，他搞摄影，但同是记者，共同语言就多些。饭后的空闲时间他常到《工作通讯》办公室打扑克，我们的关系很好。他透露这个“简讯”无非是想解除我的思想包袱，但他是党政干部，不能划不清界限，所以才采取不易引人注意的“短促突击”的方式。

这则“简讯”真的燃起了我的希望。倒不是“放心、没事”四个字，我知道自己“没事”，在这上头从来也没有不“放心”，而是“我刚回来”这个讯息，说明冀连波出去外调了。经过外调查清真相，事情总该做个了结吧。

果然，没过几天就通知我搬家。

但，不是搬回《工作通讯》我原来的住处，而是搬到直政处集中看管重点审查对象的地方。这就意味着，事情不是即将了结，而是要进行更长时间的审查。我心里燃起的那点希望破灭了。

四、半年的隔离生活

直政处看管重点审查对象的地方在政治部南边那道沟岔里，挨着司令部，是靠近坡脚修建的半掘开式的掩蔽部。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个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汪希梁住在那里。我和汪希梁是1949年认识的，那时他是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夏初，在兵团部移驻天津之前，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带着司、政两部的两个干部——政治部的是我，司令部的是汪希梁，提前到了天津，住在市委第一招待所。天津市市长黄敬到招待所看望杨司令员，领导们商量事情的时候，我们两个坐在一边做记录。汪希梁一表人才，聪明干练，写得一手好字，《工作通讯》的刊头就是他写的，一向深受兵团领导的赏识。他当处长的时候，是处长当中最年轻的，没有想到现在也成了审查的重点。

我一进掩蔽部，看到他，顿时怔住了。

他站起来和我握手。

我半开玩笑地说：“怎么你也享受了这种特殊待遇？”

他只笑笑，没有答话，帮助我安排好行李，就坐到自己床铺看书去了。

虽在武装看管之中，但汪希梁始终保持着军人的风度，军装穿得整整齐齐，床铺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生活也很有规律，

按时起床，午休，饭后略微休息一会儿，就坐在床上看书看报。使我惊讶的是，他正看的是马克思的经典巨著《资本论》，而且看得很认真，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用钢笔整整齐齐地画上曲线。可能长期在司令部工作养成的纪律，他出言谨慎，对周边的事情从不说长论短，尤其对运动中的事情。可是我这个人一向说话很随便，何况是老熟人！我问他为什么到这地方来了。他淡淡地说：“因为家庭的事情，我的家庭情况，参加革命后都向组织讲了，组织上也做过了解，可是这回又翻出来了。”只这么几句，就不讲了。他反过来问我：“你离开校门就到解放区，又是经过地下党的介绍，怎么成了审查重点？”我就把韩部长在小组会上揭批“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情况简要说了一遍。他皱起眉头，说：“党一向反对山头，反对宗派主义，在日常工作上，危害还不大；在政治运动中这样搞，真是害死人。”我并不同意他的分析，韩部长、徐逸人和我都是晋察冀的，应该属于一个山头，并非因为山头不同产生的矛盾。韩部长那么下力地整“徐逸人反革命集团”，必是另有原因。但我拿不出证据，两个人又同是重点审查对象，何必争论这个问题呢？

有一件事是闲聊当中汪希梁主动说出来的。他对执行看管的战士很生气，他说，前几天他爱人从国内来看他，夜间睡觉的时候，那个战士总在窗前走来走去，有好几回还长时间地贴近窗户听。他很气愤地说：“真是没教养！人家夫妻在一起，你贴着窗户听什么！”我说：“真正可气的是那个战士的上级领导。领导不给他下达看管的任务，他一个战士能在夜间到你这个作战处长的住处去吗？”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通过这次聊天我才知道，他的爱人原来是我在联大文艺学院学习时，文学系二班的一个女同学。有了这层关系，我们聊天就

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

搬到新的地方以后，应该说我的日子好过多了，有熟人可以说说话；有报纸看，主要是《志愿军报》和《人民日报》。我每天除了看报，主要时间是写回忆战争的片段。我让看管的战士给郭游带去一张条子，叫他给我带一些稿纸来，原想利用这个无事可做的的时间继续写那部反映朝鲜战争的小说，但是调动不起创作的激情，写不下去，就改为写战争回忆的片段，为以后创作积累一些材料。

过了几天，我们这里——姑且叫“看管所”吧，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自报姓名，叫吴安，是从军校毕业不久分配到司令部工作的见习参谋，二十刚出头，个儿不高，扁平脸，塌鼻梁，留的平头多时未剪，头发又直又长，显得稚气又有几分滑稽。他搬到“看管所”以后，每天仍要回去参加小组会。从小组会回来，总是愁眉苦脸，低着脑袋，很少说话。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苦着脸说：“一开会就让我交代反革命活动，还叫我说出参加过的反革命组织。我从军校一毕业就分配到兵团司令部，到哪儿去参加反革命组织，到哪儿去搞反革命活动？交代不出来，单助理员（直政处保卫助理员）就用劈材样子打。”他解开衣领，肩和背上确有血红的痕迹。对于这种情况，我和汪希梁都不好说什么。我们在生活上尽可能地照顾这位小老弟。

当时部队伙食已经不分大灶、中灶、小灶。司、政两部的食堂都从国内请来烹调技术较高的厨师掌勺，副食有高、中、低档十几样菜，主食也有米饭、馒头、花卷、烙饼等好几种，高档的菜像大盘卤蛋扣肉是7角，低档的素菜一盘只要几分钱。我和汪希梁津贴费高一些，我是营级，56元，汪希梁是团级，还要高一些，小吴是排级，低多了，高档菜吃不起。我和汪希梁商量，

干脆我们三个人“合伙”，我和汪希梁买高、中档的菜，小吴买低档素菜，三个人合在一起吃，这样，我们三个人是“各尽所能”，吃的是“荤素搭配，品种多样，营养合理”。

小吴当然很高兴。他不仅减轻了经济负担，还在困境中得到两个比他级别高的老兵的关怀。他感到温暖，脸上的阴云少多了，回到“看管所”就用心地看《志愿军报》。

有一天，小吴参加小组会回来，显得很高兴，说：“行了，这回我算摸着门道了。今天，单助理员说我交代得好，不但没有用劈材样子打我，还给我中华烟抽。”

我莫名其妙地问：“你不是说没有可以交代的吗？”

他皱皱塌鼻子做个怪脸，说：“学习提高啊！”

我仍然一头糨糊，这种事情却不便深问。

小吴抽中华烟，大约抽了七八天，以后再没找他参加小组会，也就抽不到了。看管所里，我们三个人开始平静地按各自的安排，打发自己的日子。

在这期间，政治部保卫部助理员毛建平找我谈过一次话。据说毛建平是长期做保卫工作的，身材高大，相貌也很威严，但说话时没有保卫干部审查人的那种霸气，态度和善，慢声细语。他主要是核实一个情况，问我：“你见过胡风吗？”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说：“我和胡风素不相识，怎么会见过胡风呢？而且，我在朝鲜也不可能去见胡风啊！”

他说：“是的，我们分析，也是不大可能。是你联大文学系的一位同学在交代自己的问题时讲的，说他曾带你见过一次胡风。”

文学系这位同学确实和胡风有过交往，据他自己说，他是抗战期间在重庆认识胡风的。他喜欢写诗，胡风是成名的诗人，又

是出版家，曾对他有过帮助。而我和胡风却是毫无瓜葛。我知道胡风是从学习文学史开始的，知道他远在左联时代就和鲁迅关系密切，是知名作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不知是何种原因，很少公开露面。听在作家协会工作的同学说，他写过一份30万字的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书，没有发表，我当然无从知道内容是什么。朝鲜停战以后，我曾两次回国休假，时间都很短，我连那位同学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带我去见胡风。

我讲过情况以后，毛建平说：“你讲的是事实，领导上都了解的。我去找你那位同学时，他还没有解放，头发很长，衣衫不整，精神很不好，我向他核实情况时，他说话含含糊糊，说在他的记忆里，好像带你去过一次。问他为什么要带你到胡风那里，在胡风那里都谈了些什么，他一概想不起来，记不清楚，而他说带你去的时间，你正在朝鲜前线，根本不可能去。看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可能是在激烈的批斗中被批糊涂了，对照你今天讲的情况，这件事可以定下来，你没有去过胡风那里。”

核实情况的谈话到此结束。我请毛建平向领导转达一个意见。我说：“肃反运动我完全拥护，真心实意地拥护。可是，不是‘反’硬要肃，混淆敌我，对运动不利；浪费大量时间和人力，对工作不利；对个人来讲，也是毫无价值地消耗生命！”

毛建平笑了笑，仍然慢声细语地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放心，你的事情不会再拖多久。你的工作和待遇也不会受影响。”

我又让他好好保管收上的采访记录本，我说：“那是战争期间我全部的采访记录，是写东西的重要素材，千万不要丢失了。”

毛建平说：“都在的，你的采访本我全部编了号，一本不少。事情结束后就还给你。”

保卫部是五人小组领导下具体管肃反运动的，毛建平当然了

解情况，他说不会拖很久，那就是不久就可以结束了。

可惜，这又是一次一相情愿的幻想，事情并没有很快结束。

1956年3月下旬的一天，突然通知我到政治部小礼堂（政治部已建成红砖玻璃窗的办公室、宿舍和礼堂）听传达，到会的全是营以上的党员干部，由丁莱夫副主任传达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听过传达，我的心情非常沉重，非常复杂。斯大林是我们这一代人崇拜的偶像，是真理的化身，正义的化身，是我们衷心信仰的革命领袖。1953年听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时我们很悲痛，有的女同志跑到山坡上放声地哭，好几个年轻人当天写了入党申请书，表示要继承斯大林同志革命遗志。可是秘密报告是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怎么会允许赫鲁晓夫捏造罪名呢？假如赫鲁晓夫是捏造，中央全会上有那么多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能通过他的报告吗？为什么享有崇高威望的苏联共产党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听传达的过程中，会场上的气氛非常沉重。大概每个人的心里都很压抑，很迷茫。

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自己的问题倒不甚考虑了。

五、一句话的小组会

大约是6月上旬，保卫部新来的杨部长找我谈话，告诉我，对我审查结束，因为没有问题，不作结论，也没有向我道歉。杨部长宽慰我：“不要背思想包袱，回部里以后好好工作。”我不知道他这句“不要背思想包袱”的含义是什么，听了这种话心里很不舒服。

回到部里以后，给我发了新军装和军衔肩章，还按新标准补发了工资。

佩戴军衔以后，我参加的第一项工作，是参加工作组到24军检查工作。组长是政治部总务处长胡生，包括我共4个人。检查的内容主要是肃反运动的总结工作和执行海防任务以后新形势下的政治思想工作。

从24军回来以后，小吴来向我告别。他那又直又长的头发剪短了，恢复了小平头，没戴军衔，穿着“看管所”时那身旧军装，情绪很低沉。他告诉我，领导上叫他复员，明天就要回国了。

我很奇怪，问他：“你在军校学习好几年，又很年轻，领导上为什么叫你复员？”

小吴苦着脸说组织认为他在运动中态度不老实。小吴根本没

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没进行过反革命活动，可是交代不出来就被人用劈材样子打。接连好几天，他实在受不住了，就按照志愿军报上公布的反革命组织的材料编造了一个交代材料。小吴起初心里很害怕，怕批斗他的人看过志愿军报，识破假交代。可是他“交代”以后，单助理员非常高兴，说他态度有进步，还给他中华烟抽，鼓励他继续深挖、彻底交代。经过七八天，小吴“交代”出6个反革命组织和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当时他想先混过这段日子，等运动过去再向组织上说清楚。哪成想，组织上真派人回国调查了，在他交代的几个反革命组织里没有一个反革命组织能查到他的名字，他交代的反革命活动没有一件能查到证人证物。调查人员回来以后，立马把小吴叫去，怒气冲天地申斥他，说他和组织上摆迷魂阵，浪费了部队许多资金和人力。小吴顿时吓傻了，后悔没有早点和组织上说实话，只好如实说明情况，并且拿出志愿军报承认自己交代的反革命组织都是报纸上公布的，反革命活动材料也是仿照报纸上的材料编造的。单助理员听后鼻子都气歪了，骂小吴反动，欺骗组织，制造混乱，给部队造成了巨大损失。小吴写了多次检查，总被认为企图蒙混过关，没有挖出思想根子，在肃反运动这场敌我斗争中，经不住考验，不配做个革命军人。

小吴很沮丧，态度却很恳切。他说：“我中学毕业以后就报考了军校，军校毕业以后就分到了兵团司令部。司令部的领导和老同志们对我很好，像长辈和兄长一样关心我，怪自己平素学习不好，意志不坚定，没有经受住考验。”他给我留下家庭的地址，请求我接到他的来信后，一定给他回信，谈谈我和部队的情况。

小吴怀着痛苦而失落的心情走了，我的心里很难过、很不平静。

小吴在运动中的遭遇，很值得深思。如果简单地只看他编造交代材料这件事，说他不老实、欺骗组织并非没有道理，可是他这种欺骗组织的行为是怎样造成的？他原来是老实的，没有问题就说没有问题，是劈材样子把他打得不老实了。对于一个参加部队工作不久的年轻的同志，要求他在任何粗暴的逼供下都面不改色、心不动，坚持挨打，不说假话，那就有点不合情理了。而现实是：被劈材样子打得“不老实”的人被复员处理，而用劈材样子制造“不老实”的人，干部照当，照样是积极分子，这于情于理说得过去吗？

小吴走后不久，汪希梁也离开看守所回到了作战处。兵团直属队各单位的肃反运动全部结束，转入正常工作。

一天，兵团政委王平找我谈话，在政治部的办公室。

兵团司令员杨勇提升志愿军司令员以后，兵团首长只剩下王平一个人，主持军、政、后的全面工作，他还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政治部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组织部长丁莱夫提升政治部副主任以后，政治部有了领导，他来政治部的次数少多了。不过我和王政委接触的机会还是比较多，因为兵团首长的报告和时事讲话材料，很多是由我起草的，我经常到王政委那里去。当时，我不知道中央军委已经下命令，调王政委到志愿军总部当政委，大概他是在离开兵团以前找下边的干部了解一些情况，听听下边的意见。

王政委自己不吸烟，把一盒大中华推到我跟前，说：“听说你对这次肃反运动有些意见，想找你谈谈。”

因为王政委是老领导，我和他说话比较随便。我说：“我对肃反运动没有意见。搞群众运动是共产党的老传统，通过群众运动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纯洁革命队伍是完全正确的。我

有意见的是宣传部的搞法。”

王政委笑了，说现在不是写文章，要我直截了当地把意见说出来。在徐逸人的问题上，王政委和丁莱夫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认识徐逸人，认为徐逸人年轻，有才气，有魄力，工作上一直表现不错，但有些骄傲自满，不虚心，和政治部的几个部长特别是和丁莱夫同志关系处理得不好，对丁莱夫同志的领导不够尊重。不过这些属于工作关系问题、组织纪律观念问题。在肃反中搞“徐逸人反革命集团”，还把我当成了骨干分子批来斗去是不妥当的。王政委介绍说，二十兵团转去了不少徐逸人的材料到国内，可解放军报社那边对于徐逸人连小组会都没有开过，说明人家领导运动政策水平比我们高。因为我在以前的几次运动中是批斗别人的，这一次却成了重点被别人批斗，批斗别人和被别人批斗，在运动中的不同身份会给人不同的感受，对运动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王政委让我就自己了解的情况，谈谈对兵团直属单位肃反运动的看法。

我觉得王政委不愧是高级领导，对问题看得既实际又深刻。我也就敞开心扉，直言不讳地说：“我觉得兵团直属单位在这次运动中掌握政策有偏向——‘左’。入朝以后我在兵团参加过两次运动——三反和肃反，这次肃反我是被批斗的重点，对此感触颇深，三反时我是批斗别人的，也有这种感觉。好像越‘左’越革命。若是被批斗的人说实话，就说你态度不老实，加强火力，逼你低头认罪。若是参加批斗的人说实话，就说你态度消极，提高你对运动的认识，调动你的积极性。在运动的高潮中，群众有过激情绪可以理解，但如果运动的领导人也持这种偏激的态度，就可能产生很不好的后果。我所知道的兵团直属队的肃反情况，除了徐逸人的问题以外，还有和我一起被隔离审查的司令部见习

参谋吴安，对他的审查更离奇。他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司令部工作，不久就赶上这次运动，叫他交代问题，他没有反革命活动当然交代不出来，批斗者就用劈材样子逼供，他为了不受皮肉之苦，仿照志愿军报上登的反革命案例，编造了自己参加过6个反革命组织的‘罪行’。调查人员跑了大半个中国，结果一件也没有证实。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肃反运动的骨干竟然不看每天刊登肃反案件的志愿军报，小吴交代的6个反革命组织都是报上的，如果看报，就会发现他的交代材料是假的。即使不看报，按常识推断，他一个军校学员怎么可能参加分布大半个中国的6个反革命组织的活动，时间和交通条件都没有可能。在小吴这件事情上，不但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是缺少理性思考，主观推断加上野蛮逼供，怎么能不出假案错案？”

我又说起我对“三反”运动的感受。“三反”时我是“打虎队”的成员，是批斗别人的，但也觉得斗争过火，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举了两个人的例子，一个是政治部摄影科长高粱，另一个是文工团员马可奇。这两个人王政委都知道。高粱是老资格，抗日战争时是晋察冀一分区一个战斗连队的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是华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警卫营的教导员，作战很勇敢，业余喜爱摄影，经名摄影家沙风的推荐，后来当了专职的摄影记者。“三反”时，有一句口号“山高林密必有老虎”，管钱的人就可能有贪污。高粱是摄影科长，购买器材时经手过一些经费，就成了审查的重点。我是批斗高粱“打虎队”成员。批斗的时候当然是斗志昂扬，勇猛攻击，但总是没有战果。为了摸清“敌情”，我找宣传部管经费的同志去了解情况，发现高粱从部里支的钱和买回器材的价格相差很小，不可能有多大贪污。我向“打虎队”的领导反映了自己的看法，当然没有被接受。领导叫我不要右

倾，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继续穷追猛打，还是打不出贪污问题。于是转移攻击方向，在高粱长相和衣着上寻找突破口，高粱体形肥胖，肚子较大，曾有一件当时算是比较讲究的短袖衬衫。批斗会上，叫他站在当地中央，指着他的肚子吼叫着说：“看看你长的那副德行，你的肚子为什么那样大，是喝人民的血喂肥的！兵团进驻天津以后，你挺着大肚皮，穿着漂亮的衬衫，带着老婆逛大街，活脱脱像个资本家。资本家全是黑心肝，你赶快把你贪污的黑心钱交代出来！”高粱到底是老同志，不论斗争怎样加温，怎样迂回地攻击，始终没胡说，没有给自己编造罪状。于是，认定高粱与人民为敌到底，死不悔改，把高粱关起来，给他带上手铐——那种旧式生铁的手铐，铐了好几个月，在两只手腕上留下很深的血红的伤痕。

对文工团员马可奇的斗争更为激烈，也更加离谱。文工团曾派他回国采购服装，经手过一些钱。“三反”中三斗两斗，把这个参军不久的年轻人斗懵了，也亏他脑筋灵活，他根据大家的追问，编造很多离奇的情节，最后贪污的钱竟比带走的钱多出好几倍。

当时我是积极分子，在运动中当然是响应领导号召。但我对那些十分过火的行为，心里很不以为然，只是不敢说出来。现在王政委问我的看法，我就在老领导的面前把我的想法如实地说了出来。我说：“当然！运动后期有个甄别阶段。像高粱和马可奇，经过甄别，把运动中那些不实之词推倒，恢复了工作和待遇，但却伤害了感情。”高粱在回国以前，买了一瓶酒，把我请到禁闭他的小屋里向我告别，给我斟了一杯酒，含着眼泪说：“我感谢你，你虽然是斗我的积极分子，可是在几次批斗会上你说了公道话，在别人把我当成‘老虎’不理我的时候，你见面的时候，还

和我打招呼，我心里感到很温暖。你没有把老朋友当成敌人啊。从抗日战争起，我出生入死十几年，敌人的子弹没有把我打死，可是这次……”他捋起袖子，叫我看腕子上深深的伤疤，“这次革命的手铐却在手腕上留下了难以平复的伤痕。我经手的那点经费几岁的孩子也能数得清楚，为什么偏要把我当成‘老虎’往死里整呢！”高粱和马可奇总还算幸运，甄别中都把问题澄清了。可这次肃反中的小吴，却被认为经不住考验，被迫复员，这很可能给这个青年造成终生的遗憾。我心情很激动：“值得注意的问题，不在伤害了几个干部，而是这种不讲实事求是的‘左’的做法对党风造成的伤害。每次运动以后，对运动中出现的偏差甚至严重的问题，都是由组织承担责任，而造成偏向或问题的积极分子，因为是响应号召，个人不承担责任甚至被提拔重用，官运亨通。所以有人讲怪话，说我们在运动中培养出一批‘运动健将’，穿着钉鞋蹬着别人的脑门往上爬。别人头上流血的时候，他却青云直上了。会看风头、会整人的人得甜头；不看风头、说实话的人吃苦头。”

王政委问我，这话是谁说的？

我说：“你不要问是谁说的，这话由我说出来就是我也有这种看法。你是老领导，在你面前我不能隐瞒什么，更不能欺骗你。即使我的意见是错的，可以供你作参考。”

王政委的脸色缓和了，点点头说：“说真话就好。我知道你，说话直来直去。找你就是想听听真话，你说说，你对政治部的工作还有什么意见？”

我说：“还有一个，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明白，这是不是和‘左’的思想有关。我有一种感觉，有些领导喜欢没有多少文化、甚至满嘴粗话的工农出身的干部，认为

这些人思想单纯，政治上可靠；对一些文化比较高的干部则认为思想复杂，立场不坚定，缺少信任感。同样一句错话，如果出自工农干部之口，领导往往不注意，或者认为是认识糊涂，批评几句就过去了。如果是知识分子说的，则往往要追查思想动机和目的，甚至进行严肃处理。在政治部的几个部里，宣传部的任务最重、工作最多，在历次运动中受批判的也最多。‘三反’和肃反这两次运动，宣传部被批斗的重点人物比另几个部合起来的人数还要多，而且对有问题的人处理也偏重。比如对文工团的鲁舍，部队多年培养的一个文化干部，为了日记上一句话就令他复员，是不是有些过头了！”

王政委问：“鲁舍是怎么回事？我好长时间没有见他了。”

我说：“我被隔离，刚刚放出来，详细情况不了解。听文工队的同志说，运动后期检查他的日记，发现里边有一句话：‘我恨一切。’鲁舍在交代中说，这句话是从郭沫若的一首诗中看到的，那段时间他情绪不好，就在日记上写上了这句话，写后就忘了，他并不真的恨一切。审查的领导认为他是找借口，郭沫若的诗里有那么多的话，为什么偏偏写上这一句？说明这句话符合他的思想，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一切他都恨，说明他的思想反动透顶。其实鲁舍的交代未必是‘找借口’。年轻人对某种现象不满，一时情绪冲动，引上那么一句话，发泄自己的情绪并不能代表他真实的思想，如果他真的‘恨一切’，他怎么能经受住残酷的战争考验，而且一直表现不错呢？”

王政委点点头说：“不能单凭一句话处理一个人。马上查一查，如果还没有办手续，就不要办了，如果已经办了手续，重新处理。”

我后来听说组织部门按王政委的指示做了。鲁舍还没办手

续，但不愿留在部队工作，改为转业到地方工作去了。

和王政委谈话以后不久，政治部召开了营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扩大部务会，部署政治部在肃反以后的工作安排，包括肃反的善后问题。丁主任讲完以后，我提出一个意见：运动中用武装看管我七八个月，这是为什么？组织上掌握了什么证据？哪怕一封诬告信也可以，诬告的事情一时查不清，为防止意外，用武装看管也说得过去。如果没有任何证据，就长期进行武装看管，这符合肃反运动的哪一条规定？我要向领导讨个说法。

丁主任说承认我在运动中找他谈过此事，说我的问题主要是由徐逸人同志的问题引起的。他承认始终没有说徐逸人同志是反革命，但有时他说话不够冷静，可能对下边有影响。作为政治部的领导，丁莱夫承认主要责任在他。

组织部孙部长说：“徐逸人同志工作上是有缺点，可是运动中那种搞法是不妥当的。”

丁主任说这件事主要由他承担责任，又说韩福贤同志在运动中是积极的，就是有些偏激。

我说：“我不同意丁主任的看法，什么叫积极？在运动中敌我不分，硬把自己的同志当成敌人打，这能叫积极吗？如果我和韩部长换个位置，我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硬说他是反革命分子，连续的狠批猛斗，然后再长时间地用武装看管起来，韩部长会作何感想？”

丁主任略沉默了一会儿，要求韩部长向我道歉。

韩部长执行领导的指示从来是及时的。政治部部务会议以后，就在宣传部办公室召开了党小组会议，韩部长坐在最前边，靠门那张办公桌后边。小组的党员到齐以后，韩部长满脸通红，脖子也显粗了，粗声粗气地说了一句：“我向徐孔同志道歉！”说

完起身就走了。几个参加小组会的人都感到茫然，怎么只说了一句小组会就结束了！我却能想象出韩部长说这句话时无奈而愤怒的心情。

我这个人思想简单，说话做事，过后就完，不记后账。运动中批斗我的时候，我确实对韩部长很不满，憋着一口气，一定要讨个说法。可是韩部长道过歉，尽管是被迫的，带着明显的情绪，但终归说了一句“我向徐孔同志道歉”，这事也就过去了。

当时，政治部的干部宿舍已经盖好，一色的红砖红瓦排房，干部们按照总务处的分配方案陆续搬进新居。第一排宿舍是团级干部，一人一间；第二排是营级干部，两人一间；第三、第四排是连级以下干部，四个人一间。宣传部只有两个营级助理员，我和张山住一间宿舍。

张山和我原来是联大前后班同学，抗美援朝以后又同在宣传部，关系一直不错。可是肃反开始以后，我成了批斗对象，他则是宣传部的肃反小组长，两个人成了对立面，除了开会，再没有单独接触。后来，我的问题查清“解放”了，回到宣传部，两个人见面时总有些不自然。我对张山并没有多大意见，运动是上边统一部署的，他在运动中不过是领导指定的一个小组长，在斗争我的时候从没有用不实之词捏造罪状，也没有拍桌子瞪眼“火力”逼供，他没有伤害过我。而张山思想可能有所不同。我和徐逸人的情况以至我和徐逸人的关系他都比较了解。肃反开始以后，因为我就徐逸人问题向韩部长提出意见，就把我当成“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连续批斗，甚至发展到拳打脚踢，体罚逼供。张山不会不明白，这种搞法是毫无事实依据的人为的闹剧，是违反政策的，他作为掌握会议的小组长，对多次批斗会的过火行为从未纠正、制止，对我造成很大伤害。在这一点上，

张山不能说一点责任也没有。事情澄清之后，我回到部里，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张山显得很尴尬，有好几回我发现他有意地躲避我，可能是想起运动中发生的那些事情，他有些愧疚，感到在老同学面前不大好讲话吧！可是，这次分配新宿舍，我们俩被分配在一间房子里，两个人住在一起，想躲避也无法躲避了。大概张山想改变两个人之间的不自然的情况，搬进新居的那一天显得特别热情。

张山这个人，不但不跳舞不打麻将，连部里人打扑克他也不参加。唯一的嗜好是喝点小酒，他和人沟通感情的方法就是和人一起喝酒。我们两个安排好行李和屋里家具以后，他拿出一瓶白酒和一些小点心摆在桌子上，拉着我在桌子旁边的床铺上坐下来，有些激动地说：“联大的老同学离校以后能够在一起工作的并不多，我们两个能在一个部里工作算是有缘分，可是运动开始以后我们有好几个月没在一起聚聚了，今天乔迁新居，喝几杯，好好聊一聊。”

他的酒量不如我，几杯下肚，脸红了，显得情绪更加激动。张山有个特点，酒劲一上来，说起话来又挤眼睛又挥臂。我见他出现了特色动作，怕他喝醉了，不让他再斟酒。他推开我的手，说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他说肃反开始以后，自己心里一直堵得慌。宣传部的领导心胸狭窄，把工作生活上对他有意见、对他不满意的，全拿到运动里来整。就说刘鸿飞，是全宣传部出了名的老实人，从抗战初期开始，经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说历史，三查的时候，连祖宗三代都查过了，能有什么问题？怎么能和肃反沾上边？可是就因为刘鸿飞在工作上顶撞过部长几回，就把刘鸿飞定为审查重点，批过来斗过去。说到我的问题，张山觉得更是没道理。部长原本很器重我，说宣传部很需要徐孔这样的笔杆

子，可是就因为徐逸人的问题我对他提出意见，触犯了他，就说我是“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连续批斗。其实是他对徐逸人不满，徐逸人回国了，整不到徐逸人，就把怒火泼到别人身上，想从我这里打开缺口，整徐逸人。部长让张山当宣传部小组长后，张山不是没有提出意见，但部长说审查徐逸人不是宣传部决定的，张山就不敢再提意见了。

我知道张山一定会谈到我的问题，这是他说话的重点，想向我表明心迹，消除运动中形成的隔阂和对他的误解。其实，我对张山并没有误解，他的一番话也是真诚的。我说：“在我的问题上你没有必要自责，你在运动当中并未伤害过我，始终还是比较理智的。”听到我的话，他心里这块病就算去掉了。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谢谢我能谅解他。张山说我在运动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他就不行，顾虑太多。文天祥的《正气歌》读了多少遍，可是一到紧要关头老是怕神怕鬼，不敢违背领导的意思，明知是错的也不敢违背，事后想起来，心里很羞愧，恨自己没有骨气。

酒后吐真言，张山说的可能是真心话，但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并不容易。我不想和他谈论这些事。我心里一直有一些迷惑，张山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我想听听他的意见，就说：“你说，韩部长原来很器重我，就因为对徐逸人的问题提出意见，触犯了他，把怒火泼到我身上来了，这有可能。韩部长来宣传部的时间不长，我和他在工作上没有多少接触，从未曾忤犯过他，不会引起他的恶感。徐逸人恃才傲物可能和他有过矛盾。但我不明白的是，徐逸人和他都是部长，各管一摊，互不干涉‘内政’，不可能有很深的矛盾。要说矛盾，主要是徐逸人和丁主任之间，丁主任是政治部的领导，徐逸人和丁主任在工作

上意见一直有分歧，对丁主任也不够尊重，所以丁主任对徐逸人很不满意。可是在这次运动中丁主任并不同意整所谓‘徐逸人反革命集团’，而韩部长的劲头却很大，好像不把徐逸人打成反革命誓不罢休，这是为什么？”张山说这正体现了韩部长为人的特点，他和徐逸人有矛盾，但不大。如果只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他不会或者说不敢那样搞，他这个人总是摸着上边的意思办事情。张山问我是否记得徐逸人回国之前那次政治部扩大部务会的情形。

我当然记得那次会。那是3月召开的一次解决丁主任和徐逸人关系的会议。据说当时丁、徐在工作上意见分歧很尖锐，政治部召开了好几次部长们参加的部务会，都没能消除分歧，所以决定扩大营以上党员干部参加，使更多的人参与解决双方的分歧。可是会议开始以后，我发现气氛不对劲，不像一般的解决同志之间分歧、增进团结的会议那样，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相互交流思想，统一认识。这次会议完全不是那样，没有一个人提出丁主任的缺点和失误，全都指责徐逸人，形成了一边倒的对徐逸人的批判会。徐逸人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做检查，会议形成了僵局。

我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觉得会议上大家的意见不够公平，就发表意见说：“矛盾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只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另一方面的问题，矛盾就不能消除。当然，矛盾有主要的方面，譬如丁主任和徐部长之间的矛盾，徐部长骄傲自满，对领导不够尊重，应负主要责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丁主任并不是一点责任也没有。譬如徐部长曾几次提出，兵团政治部作为高级政治机关，工作战线拉得过长，管的事情过多，一些应由下级政治机关做的事情，要放手让下边去做，兵团不要干预。应该缩短战线，突出重点，这样才能发挥高级政治机关的优

势。我到几个军检查工作，下边反映说，兵团什么事情都抓，什么事情也没有抓到点子上，可见徐部长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可是丁主任没有认真听取徐部长的意见，引起徐部长的不满，在这个问题上丁主任有一定的责任。丁主任虽然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如果丁主任的问题不解决，双方的分歧依然存在，双方的矛盾就不可能消除。所以，我觉得解决丁主任和徐部长的矛盾，不能光批评一个方面，而是两个方面——不管是主要方面还是次要方面的问题都应该解决，这样，才能达到真的团结。”

我说完以后，会场上沉默了一刻，丁主任说道：“徐孔同志的意见和大家不大一样，我看，徐孔同志的意见有一定道理。”几个部长和营团干部都没有讲话。只有韩部长满脸的不高兴，拉长声调说：“徐孔同志理论高，讲起道理来一套一套的。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开理论研讨会，是解决实际问题，那些大道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实际情况是丁主任的领导完全没有问题，兵团党委是肯定的。问题完全在徐逸人同志，完全应该由徐逸人同志负责。”我听了以后非常反感，觉得韩部长身为高级干部，而且一把年纪了，竟然不顾事实说话。

张山接着刚才的话说，从那天的会议可以看出，丁主任和徐逸人的矛盾很深，几个部长和大部分中层干部都站在丁主任一边，徐逸人在政治部很孤立。所以，在运动中韩毫无顾忌地采取各种办法要把徐逸人打成反革命，并说“这不是宣传部决定的”，可能他以为丁主任和几个部长一定会支持他，没想到丁主任不同意他那样搞法，连对徐逸人意见很大的组织部孙部长也认为：把工作中的分歧意见当成反革命问题批人整人的做法是不妥的。折腾好几个月，什么问题也没整出来，不但没有得到上边的赞赏，反而在部务会上丁主任公开要求他向你道歉。他这个人很重视维



1955年夏与北京军区和我轮换的干部刘仲三在朝鲜驻地合影。(右为作者)

护自己在下属面前的权威。他整你几个月，你始终没有向他认错，而现在他却要当众向你认错。可以想象，那天他在小组会说出那句“我向徐孔同志道歉”的时候，心里的怨气是多么强烈了。张山提醒我会后一段时间要格外小心一些，韩部长心胸过于狭窄，应避免发生新的不愉快的事情。反正过不了多久就要回国，回国以后各自东西，谁也碍不着谁了。

我默然。王平政委说得对，在运动中整人和被整的所处的地位不同，感受是不同的。过去几次运动我都是积极分子，参与整人的，也感到运动中有些不正常现象，但远没有这次挨整当中感

受深刻。

1957年4月，北京军区和前方轮换的干部来到兵团。和我轮换的是一个叫刘仲三的大尉（营级）助理员，这个人精明干练，直率坦诚，我们很谈得来。我特请摄影记者马佩文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分手的时候，他嘱我到北京后，去看看他的爱人和孩子，介绍些前方的情况。这是我义不容辞、应该做的事情，我记下了他爱人的姓名和他的家庭地址。

六、回国后埋头写小说

1957年5月上旬，我轮换回到北京军区宣传部，分配到宣传科。按当时的通例，回国以后有一段假期，假期长短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定。宣传科长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校，很和气。“你在朝鲜好几年，回来了，好好休息一下，查查身体，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也可以到北京几个著名景点玩玩。你到科里做什么工作，什么时候上班，等科里定下来以后通知你。”

安排好住处，遵照刘仲三的嘱咐去看望了他的爱人和孩子，然后去找黎白和李兴华。这两个人是我在联大文学系的同学当中关系最近的，特别是黎白，1945年我入文学系不久，黎白也入了文学系，和我分在一个小组里。当时他只有15岁，显得瘦弱，但两只明光闪亮的大眼睛透着聪慧和机灵。组里学员的年龄差别很大，多数在20岁左右，也有30多岁甚至40多岁的，黎白的年龄最小，在大哥大姐们当中，他童心未泯，有时竟在宿舍的榻榻米上翻跟头。

黎白在北平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是由北平市委城工部送到联大学习的。我和前民、王健、乔中是通过北平市委城工部的关系到解放区，由晋察冀中央局分配到联大的，几个人都是北平出来的学生，关系自然就近些。我和前民等几个人来到

解放区以后，身无分文，联大的学员没有津贴，伙食标准也低，生活很清苦。每到星期六，黎白就带我们几个到他家里解馋。黎白的父亲是一位温厚和善的长者，很少讲话；母亲则热情而富有爱心。我们每次去，她都给买一些好吃的东西，有时还领我们到饭馆吃上一顿。我和黎白是同学，也像兄弟。

李兴华到文学系的时间较晚。他是苦出身，初中没毕业就出去当了店员，但这个人聪颖好学，很有文学天赋，写的一些短篇，立意深刻，文字朴实而不失文采。文学系有一门课程，叫“作品选读”，在分析作品时，他常常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文学系刊《文学新兵》上登的稿件都是他用毛笔抄写的。记得他初到系里的时候，衣衫不整，穿着邋遢，但在任何人——不论老师或同学面前从不露窘相，坦然相对，谈笑自若，说到得意处纵声大笑，非常豪爽。文学系毕业以后，我们两个都留校，在新组建的文学戏剧创作组作研究生。1947年年底石家庄解放后，崔嵬带着创作组的几个人到石家庄体验生活，我们两个都被分配到工会。同学当中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较长，关系一直比较好。

我先到黎白那里，黎白在总政文化部创作室。

当时我心境很好。仗打完了，国内一派升平景象，经济建设蒸蒸日上，文艺创作也很繁荣。文学系的一些同学像徐光耀、鲁煤、陈森、黎白以及二班同学鲁芝都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我也应该尽力争取条件，把反映朝鲜战争的长篇小说写完。

黎白当然全力支持我的想法，他根据自己写作的经验，提议我想办法请几个月的创作假。写长篇的东西，没有较充裕的时间，不论构思或写作都比较困难。他还设想，请准创作假以后，他设法把我借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这里创作环境较好，徐光

耀也在创作室，几个老同学在一起，创作上的一些事情可以相互商量。

李兴华当时是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文艺学习》评论组的组长，兼作家协会机关党支部书记，可能作家协会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始了，他的工作很忙。我们谈话的时间不长，他同意黎白的意见，尽可能争取几个月的创作假，这样，可以没有干扰集中时间和精力写东西。

回到军区以后，我琢磨怎样去请创作假。按组织程序应该找宣传部长，可是原来的部长蓝茅调到河北军区当政治部主任去了，新任部长不认识，刚刚回国，一天班没上，就要求请几个月的假，这话不好讲。找政治部主任，当时政治部的主任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任我也不认识，想来想去，只有找军区司令员杨成武。

杨成武原来是二十兵团司令员，在兵团的历任领导里，我和杨成武的接触最多。1948年我和徐光耀从六纵队调到兵团政治部以后，我在兵团新华社分社当记者，战争期间，特别是兵团部移驻天津以后，经常随他下部队检查工作或参加会议。他的讲话和报告文稿，有不少是经他授意，由我起草的，有几篇我改成通讯在报上发表了。他的回忆文章，有几篇也是我帮他整理的。1949年秋，他调到军区任参谋长，安排我留在警备区，对我说：“把你留在这里做个种子，将来再打仗的时候，给你配上几个人，就可以组成一支报道队伍。”可是我不愿留在天津，愿意到北京工作，北京有我不少的同学和老师。1950年春，军区宣传部长蓝茅到天津警备区检查工作，我向蓝部长提出调动的申请，蓝同意了。不久我调到军区政治部，任新华社驻军区报道组的记者。同年秋天，杨成武到天津警备区检查部队农垦的情况，派人找

我。警备区报告说已经调到军区了。杨很生气，回军区后批评蓝茅（杨是军区党委书记），说蓝茅无组织、无纪律，他安排的干部，为什么不经他批准就调动？蓝茅把我叫到办公室，叫我赶紧回天津警备区，说杨参谋长为你调动的事发火了。我当然不愿回津，就到司令部找杨，申明我愿意在北京工作的理由，杨听后说：“你留在军区可以，但是定下一条，再打仗你还要跟我走。”所以，1951年春，为抗美援朝重建二十兵团，杨还是司令员，我马上回到兵团，随部队入朝作战。

杨当时是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对我比较了解，又一贯重视新闻报道和文艺创作，只要他说句话，事情就好办了。

第二天我到司令部去找杨司令员。我去他那里比较随意，不需要事先报告。我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和几个军的领导干部谈工作，秘书悄悄指给我靠边的一把椅子，我就坐在那里等。

工作很快谈完，几个军领导干部离开以后，杨司令员高兴地招呼我到他的对面坐下来，说：“听说你回来了。这几年你在朝鲜干得不错，写了不少好文章。回国以后你有什么打算？”我就把想请几个月创作假写长篇小说的想法简要地作了汇报。

杨很痛快地说：“写一部反映朝鲜战争的小说，意义很大。我先批准你4个月的假。写不完可以延长。”我没想到司令员的态度这么爽快，很兴奋，说：“如果1号（司令员代号）批准，我回去就给宣传部写报告。”杨说：“你不用给宣传部写报告，我给袁升平（政治部主任）打个电话，叫他安排一下就行了。你回来以后，个人和家里生活有什么困难，也可以和他讲。”

当天下午我就去找政治部主任袁升平。袁是杨成武的老部下，抗日战争期间，杨成武是晋察冀一分区司令员，袁是他属下一个主力团的政委，对杨一向很敬重，我见到袁以后，没等我说

话，袁主任先说了：“司令员讲过了，先批准你4个月的创作假，写不完，再给你安排时间。你要集中精力把这部小说写好，司令员很重视。”又问我，回国以后，个人和家里生活有什么困难。

我想了一下说：“主要是我爱人的工作问题。她前年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湖南省湘乡县教育部门，希望能把她调到北京工作，解决两地分居问题。”袁主任叫我写一份我爱人的简历。我回去后，很快写好送给了袁主任。

我这边请创作假的事很顺利，黎白那边借调的手续也很快办好了。黎白带我去见创作室主任虞棘。虞棘是创作室党支部书记，黎白是组织委员，他们之间很熟悉，关系也较好。我和虞棘则是初次见面，双方说话不多，在我不过是履行例行的报到手续。

以后黎白又带我去看徐光耀。徐光耀和胡可、杜烽三个人住在大耳胡同一个小院里。

徐光耀也是联大文学系同学，毕业后我俩都留在创作组，以后又一起调到部队，同在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既是老同学、又是老同事、老朋友。杜烽，抗美援朝期间也有过不少接触，1952年他从军区到68军604团代职体验生活。他是师级干部，却在团里代了个副政委的职务，我想这可能为了更实际地了解前沿部队的作战生活。604团守卫的渔隐山阵地是朝鲜东线紧扼文登公路的重要制高点，我多次到那里采访，一住就是十来天，和团里的干部很熟悉，和杜烽也逐渐熟悉了。我感到这个人没有作家的架子，很朴实，也很勇敢，常常深入前沿阵地，有时我们一起在最前沿阵地用望远镜观察敌方阵地的情况。胡可是知名剧作家，没有见过面，但早知其名。几个人原来都是北京军区搞写作的，其中一个人还是老同学，谈话的内容自然就多了。不过，不

是关系我切身的问题，过后也就淡忘了。

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创作室，但创作室没有空余房间。黎白正筹划组织一批作家到避暑胜地北戴河去写作，那边的房子还没联系好，我只好仍在北京军区的宿舍里写作。

当时我的宿舍在端王府夹道三号，是政治部黄副主任的住宅。院里的主建筑是一幢座北朝南的两层青砖小楼，黄副主任一家住小楼里。贴小楼西墙有两间青砖平房，是黄副主任司机一家的住处。小楼的对面是一排座南朝北的平房，我住在靠西的一间，其余的是黄副主任的警卫人员和两个单身青年军官住着。

平房的顶盖是水泥板，门前是水泥铺的人行道，6月的骄阳烤得屋里房前热气蒸人，特别是中午，写不了几行字，就满身大汗。好在我在军队里野战生活过惯了，对冷和热都有较强适应能力，汗只管流，我争分夺秒，从早到晚，坚持写作。

黄副主任的夫人非常热情，每当军区有文娱活动的时候，就来到窗前，招呼说：“大尉同志（可能她还不知道我的名字），休息一下吧，黄主任请你一起看节目去。有车。”有时黄副主任亲自踱过来，一边摇着蒲扇，和气地说：“注意劳逸结合嘛。大热的天，不要整天闷在屋子里，看看节目，散散心嘛。”

我谢绝了黄副主任夫妇的好意，一次节目也没去看过。

黎白真算是神通广大，没过多久，居然把去北戴河写作的房间安排好了，是通过北京军区干部部长在军区北戴河干部疗养院解决的。

于是，一行人——记得有徐光耀、周洁夫、黎白、杜烽夫妇等，加上我共十来个人，乘火车直奔北戴河。

北京军区干部疗养院临近海滨，环境幽雅，院内绿树浓荫，蝉声不绝，海上凉风袭来，暑意顿消。房间也十分整洁，每人一

间，有蚊帐，有办公桌和茶杯暖瓶。伙食也很好，精米精面，荤、素菜搭配，大都可口。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每天写作之余，中午下海游泳，晚饭后在海滨林荫小道散步。这种写作环境在北京是很难找到的。

我没有享受下海游泳的乐趣，并非我不识水性。我自小就喜欢玩水，上小学的时候，村后有一条水流很急的沙河，每年夏天，一到中午放学后，我就和几个好玩水的孩子到沙河打水仗。老师怕学生在急流中出事故，禁止学生午间下河玩水。下午上课以前，老师常常站在教室门口，叫爱玩水的孩子撸起裤腿，用指甲在大腿上划一下，如果出现白印，就是刚刚玩过水，就罚站。可是我们照样偷偷地跑去玩水。不过我们玩水并不讲究姿势，除去相互泼水打水仗，只会一种游泳姿势，农村的人叫“打狗趿”，身体平伏在水上，两手在身子下边划水，两脚在后边轮番地扑通扑通地打水。海滨浴场里人很多，有时就像煮饺子似的，几乎是一个挨一个，我那种具有农村特色的独特游泳姿势，在众人面前，实在观之不雅，而且两脚在后边扑通扑通打水，水花四溅，实在有碍于众人。所以，我只下海泡过两回，再也没下过海。但在房间里临窗而立，沐浴习习吹来的海风，耳听绿树中响亮的蝉鸣，也觉得消暑生凉，心情愉快。而且，我不下海还比别人多了一些写作时间。

这样的日子过了二十多天，创作室在编的正式成员都被召回北京参加反右斗争，来的十来个人只剩下我和杜烽的爱人。

这时，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已进入高潮。报纸上一篇篇社论和批判文章义正词严，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种种言行触目惊心。我有些写不下去了。那时候我的政治热情很高，虽然在刚过去的肃反运动中挨过整，而且被整得不轻，但政治热情仍然不

减。我希望利用现在的好的条件把小说写完，但总不该只埋头写作，对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反右运动的大事置身事外啊。我给黎白写信，问我该怎么办，是不是回去参加运动。黎白回信要我安心写小说，不接到通知不要回来。黎白当然比我更了解情况。我继续住在北戴河写小说，但心里总是不踏实。

七、反右的利剑悬到头上

过了20多天，接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通知，要我返京。

我和黎白一起去找虞棘，虞棘告诉我，军区通知，要我回军区参加运动。

我马上到宣传部报到，宣传部办公室告诉我，到文化部参加运动。

我很奇怪，我编制在宣传部，为什么到文化部参加运动？答复是：这是部长们商定的。我想可能因为我在文艺界熟人较多，自己又正在写作吧。

我只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到文化部文艺科办公室参加小组会。小组会正在揭发批判一个姓鲁的大尉助理员，看样子是重点对象，人们的发言挺激烈。我对这位助理员的情况一无所知，开头的两天只能坐在一边听。几天以后，一言不发总不好，对他自己交代的言论批判几句，基本上是旁听。

会议休息期间，文艺科的人常常谈论一些北京文艺界和作家协会反右斗争的情况。我最关心北京的一些同学和老师的情况，就给在作家协会工作的李兴华打个电话，问陈企霞和他的情况。李兴华说，前两年定的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已经复查纠正。可是反右运动一来，丁、陈又成了批判的重点。作协叫他揭

发陈企霞，陈企霞是老师，给学生们讲的都是正面的道理，他没有听到陈企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没有什么可以揭发的。他们的领导韦君宜对他比较了解，没有对他“穷追不舍”。他没想到的是，陈企霞自己交代了和周延姘居的问题。在冀中的时候陈企霞和周延就有不正当的关系。进北京以后，周延租了个独门小院，陈企霞有钥匙，两个人就在那里过姘居生活。

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惊讶。在我的印象里，陈企霞一向作风严肃、正派，对学生要求严格，甚至有些严厉，他怎么会和自己的学生做出这种事？周延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1945年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我们是同班，她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作风稳重，年岁较大，对我们这些年轻些的同学像大姐姐一样和善而关切。周延并不是轻浮的女人呀。我这个人对于男女关系问题有很重的传统观念，觉得师生之间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有伤风化。可是陈企霞是左联时期的老党员，生活腐化，政治上还是久经考验的。所以就对李兴华说：“陈企霞和周延的事实在不像话。不过，就像一个苹果，烂了一块，不等于整个苹果都烂了。”李兴华同意我的看法，说：“文艺界的名人有风流韵事的不止陈企霞一个。”他感到过意不去的是给徐光耀找了麻烦。1955年的丁、陈反党集团案经中央复查后，对陈企霞解除了监管，但陈企霞的生活很困难。李兴华是作协的党支部书记，看到陈企霞家里生活的窘态，想帮忙，自己收入不多，就想到刚刚出过书的徐光耀手里有稿费，于是就去找徐光耀。徐光耀一向生活很节俭，但听说老师有困难，马上就拿出400元（后来周延又为陈企霞拿去400元）。李兴华说：“徐光耀自己舍不得用的钱，我拿去给了陈企霞，原想帮老师解决困难。这下可好，陈企霞一挨批，徐光耀这些钱倒换了一条罪，这事都是我造成的。”

李兴华一向心宽，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怎么在意。他说：“我写过几篇小杂文，白纸黑字在那摆着，说过的话作协的人也都知道，是对是错，大家评论吧。”

李兴华在电话上提到徐光耀的事情，我从北戴河回来以后还没有见过徐光耀。

徐光耀也是陈企霞的学生，曾在丁玲任所长的文学研究所学习过，也是丁玲的学生。现在丁、陈是作家协会的批判重点，听说会开得很大，参加批判的人很多。徐光耀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就给徐光耀打电话，问他和黎白的情况。徐光耀的情绪不大好，在电话里说：“这些事情你就不要打听了。这段时间，我们几个人少联系为好。”

根据当时运动发展的情况和他的情绪、说话口气，我估计他和黎白被批斗了。我在肃反中挨过整，知道人们对批斗对象的心态，我们几个都是陈企霞的学生，在运动中当然不便联系。

我担心文艺界同学和老师的情况，一点也没有考虑自己的问题。因为，鸣放期间我埋头于写东西，一句话也没有鸣放。从朝鲜回国到军区宣传部报到，一天班没上，请准创作假就到了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到创作室以后，各写各的东西，我又大部分时间住在北戴河，和大家很少接触。可以说，从鸣放到反右，我是圈子以外的人，别人想反我，也没有什么可反的。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此时此刻，反右利剑已经悬在我的头上了。

10月上旬，我参加军区文化部反右会议大约两周后的一天，主持会议的文化科王科长对我说：“你准备一下，明天你在会上谈谈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在反右运动中都应该有所提高。另外，你在文艺界的老师、同学、熟人较多，谈谈和他们的关系。”

第二天参加会议的时候，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这里是文化

部的会议，可是今天文化部参加会议的只有两个人，除了原来主持会议的王科长，还有一个上尉助理员。其余的全部是肃反运动中批斗我的二十兵团宣传部的原班人马，只有回国后分配到外地的郭游、李浴珠、刘鸿飞不在，其余的全来了，而且仍是韩部长坐阵指挥。形式是文化科的王科长主持会议，实际和肃反时一样仍然是张山根据韩部长的授意在操作。

我心里明白，这是肃反运动的继续，可是现在形势和肃反运动中大不相同。肃反需要有组织、有行动，需要真凭实据，而反右根据几句话、甚至一句话不说，单凭思想也可以定性。思想是抽象的东西，说的话可塑性也很大，多增两个字减两个字，甚至加个顿号就可以改变原来的意思。掌握权力者是决定因素。肃反运动中整了我好几个月，没整出问题，韩部长被迫向我道歉，憋了一肚子火，这次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

我感到压力很大，但并不害怕。我自己最了解自己的思想。我对党是忠诚的，从未做过、也从未想过做对党不利的事情。

我准备迎接更残酷的风暴。

对我的批判持续的时间很长。我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总被认为不深刻，没有检查出思想本质，没有交代出重要问题。当时追问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和陈企霞的关系；二是攻击肃反；三是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和陈企霞的关系似乎是重中之重，追问的最多，认为我是陈企霞的得意门生，文学系一班那么多学生，为什么陈企霞只把你们7个人留在文学戏剧创作组？难道不能说明你和陈企霞的师生关系不同一般吗？你到朝鲜以后，陈企霞还按月给你寄《文艺报》，为什么他在北京还想着你这个远在千里之外朝鲜战场的学生，难道不能说明陈企霞对你的特殊关爱吗？在全国文艺界愤怒批判陈企霞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时的时候，

你竟说陈企霞“就像一个苹果，烂了一块，不等于整个苹果都烂了”，公然替他辩护。难道不能说明你们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相同吗？等等。追问的问题很多，不能说追问者都是捕风捉影，但多是逻辑推理，并没有揭发出具体的“罪行”。

批判我的人，对我和陈企霞的关系并不了解。文学系毕业以后把我留在创作组；抗美援朝期间《文艺报》聘我为通讯员，给我寄刊物，都是事实，但这两件事不一定是陈企霞决定的。我和陈企霞的关系，简单地说，我尊敬这位老师，但感情上并不亲近。当然，首先是尊敬，觉得他知识渊博，政策水平很高，佩服他。在以后的教学和文学系的领导工作中，陈企霞都显示出卓越才能，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我对他始终很敬重，为什么在感情上和他并不亲近呢？这可能和我的个性有关。我这个人，对合得来的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说；对合不来的人很少接触，尤其对上边的人，从不高攀，对老师也不例外。我总觉得陈企霞的面孔很冷，对人态度傲慢，和他说话受拘束。不像文学系另一位老师萧殷那样和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所以，学习上有疑难问题，我就找其他老师，很少去找陈企霞。

尊重不等于感情上亲近。我调到部队工作以后，没有给陈企霞写过一封信。1950年我调到北京军区以后，曾到《文艺报》编辑部去过一次，当时陈企霞和萧殷都在《文艺报》当主编，我不是去看陈企霞，是找萧殷。我写的一篇短篇小说，萧殷在他之前主编的《光明日报》文艺副刊上给发表了，给我写信说，这个短篇写得不错，尤其是语言，活泼、有特色，有可读性，但主题的发掘不够深刻，叫我有时间到他那里当面谈谈短篇的写作问题。我很高兴，接到信以后，马上就到位于东总布胡同的《文艺报》编辑部去找萧殷，萧殷很热情，从分析我那个短篇开始，谈

起短篇小说的立意、结构、人物塑造，特别是人物语言的性格化问题，谈了很多。陈企霞和萧殷在一起办公，我见到了陈企霞，但只握手问候一声，没有说什么话。

1955年我从朝鲜回国休假的时候，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经中央复查，对陈企霞已解除监管，他住在《文艺学习》的办公楼里。李兴华对我说：“陈企霞近来心情不好，你最好去看看他。”我敬重陈企霞，当然也关心他。但我们多年不通音信，见面时很不好讲话，就请李兴华陪我一起去。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较好，有他在场，可以使两个人见面时不致尴尬。见到陈企霞的时候，他果然情绪低沉，脸上阴云密布，很少讲话，不停地大口吸烟。我向他问好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脸上露出一丝灿烂的笑容，但很快又晴转阴。他只简单地问了几句我在朝鲜工作的情况，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大部分时间是吸烟。我对他的问题和文艺界上层的斗争，不便发问，只希望他保重身体，至多不过五分钟，我和李兴华就告辞了。

在批判我的过程中，我知道曾几次派人到作协和有关单位调查我和陈企霞的关系，大概都没有什么收获，所以才盯住这几个问题死追硬逼。当时批斗的人们引用最多的是我说的“就像一个苹果，烂了一块，不等于整个苹果都烂了”那句话，用尽讽刺、挖苦甚至侮辱的词汇，企图从这里寻求突破，其实那只是我根据自己的了解说出对陈企霞的看法，并没有什么“丰富”的内涵，批来斗去，除了我自己讲的，并没有找到新的“罪行”。

批斗的第二个重点是攻击肃反的问题，参加会议多数是肃反运动中参加批斗我的人，火力特别猛烈，但揭批的内容就是我在肃反当中对某些人某些做法提出的意见，加以“充实”、分析，扣上可怕的大帽子，揭不出新的罪行。军区文化部参加会议的两

个人始终没有发言。会议温度虽高，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倒是关于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的批斗和争论耗用了不少的时间。

1949年解放战争基本结束以后，好几次对我的鉴定里都有一条：不安心本职工作，要求从事文艺创作，有个人主义的成名成家思想。对于这一条我思想上始终搞不通。我是学文学的，毕业以后，希望从事我学习的专业——文学工作，可是1948年前方需要随军记者，我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分配，而且努力工作，兵团领导是满意的，杨成武曾对政治部的负责人说：“徐孔这个记者成绩不错，小有名气嘛。”1949年兵团部进驻天津以后，我曾向宣传部长沈图提出，希望把我调到文艺科。沈部长说：“新闻报道更需要人。”我又无条件地服从了。朝鲜战争期间，我作为东线记者组的记者，冒烟突火在枪林弹雨中深入第一线采访，因为成绩好，获得军功章。朝鲜停战以后，我又向兵团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提出，希望到文化科工作。丁主任说，《工作通讯》的主编秦江调走了，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决定由你到《工作通讯》去主编这个刊物。我又服从了。

我觉得一个人总会有自己的志向，这并不是什么错误，关键是当个人志向和革命需要相矛盾时采取什么态度。我都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工作的需要，我错在哪里呢？说我愿意搞文学就是想成名成家，也不是事实，当记者不是同样可以出名吗，而且可能出名更快。我不愿当记者愿意从事文学写作，和我学习的专业有关，也和我的性格的缺陷有关。当记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活动，而我的生活圈子比较狭窄，很多人我不愿接触，我当了多年记者，接触的面并不宽广。搞文学写作也需要广博的知识，但更需要深入某一个生活领域，熟悉这个领域的人和事，才能更深刻、更本质地展现这个领域的生活，写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

这可能更适合于我。我愿从事文学写作，主要出于个人兴趣，并未想到成名成家。我知道自己的水平，不过是文学战线的一名小兵，离成名成家还远得很。

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期间，我和文学系同学陈森都在大会秘书科工作，陈森当时是丁玲的秘书，他提议我把近几年写的战地通讯和短篇小说、散文收集起来，选择一下，由他拿给出版社出个选集。我说：“我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够不上出选集的水平，不必浪费纸张。”我并未想到出书扬名，而且想成名成家的也并不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名”和“家”本身并不具有阶级属性，并不是资产阶级所专有，关键是看你写作的出发点——为什么写、怎样写。如果你为人民群众写作，写得很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因而出了名，成了家，那是人民的作家，有什么不好呢？资产阶级有名人、名家，革命队伍里也有很多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军、政、文化、教育各界有很多声望卓著的名人，所以不能说想成名成家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我这些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我是“诡辩”，是“有意地混淆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说：你表面上服从了工作需要，服从了组织决定，可是内心顽固地坚持搞文学写作的愿望，其实质就是用服从工作的外衣，掩盖你搞文学写作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小王国。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自觉自愿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需要，党的意志就是个人的意志，绝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表里不一。党需要你搞新闻报道，搞编辑工作，而你坚持想搞文学写作，这种和党的需要相对立的志向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吗？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的思想无不打着阶级的烙印，和党的需要相对立的“志向”，是个人主义的志向，个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当时我非常苦恼，我知道的想到的问题全都交代了；很多我不同意的意见不容我申辩，会议持续了一个多月，总也过不了关。文化部的反右会议，几乎成了我这个“外来户”的专场。这是怎么回事儿，如何了结呢？

我很想找个熟悉的人谈谈我的苦恼，能给我一些点拨。可是几个要好的同学黎白、李兴华、徐光耀、陈森等都牵扯到丁、陈的问题，不能联系；北京军区的人我不熟悉；二十兵团轮换回国的一些人，因为我回国后一直没上班，不知他们分配在哪个单位；兵团宣传部的几个人正在批判我，无法和他们谈。想来想去，想到了参加会议的军区文化部的王科长。我初到文化部参加反右会议的时候，王科长是会议主持人。转入批判我以后，王仍是主持人。可能因为他对我的情况不了解，参加批判我的主要是原二十兵团宣传部的人，带领这些人的是张山，又有韩部长坐阵指挥，实际上批判我的会议是由张山主持。王科长很少说话，偶尔发表一些意见，也是以理服人，从不乱扣帽子，我觉得这个人看问题比较公正，对我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决定找他谈谈自己的苦恼，听听他的意见。

自从我挨批判以后，我的宿舍就由端王府夹道三号（黄副主任住宅）搬到大翔凤胡同5号（文化部干部宿舍）了，我住在后门东侧的平房里，王科长住在前门西侧的平房里，我们是同院。晚饭以后我去找王科长。王科长和他的爱人都很客气。他们住的那间平房面积不大，一张双人床，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余下的空间就不多了。王科长腾出一把椅子让我坐，他爱人忙着给我倒茶。在被批判期间，能有人这样对待我，我心里很感激，就把自己的苦恼向王科长说了一遍。

王科长静静地听我说完以后，说理解我的心情，但不了解我

的情况，很难提出具体的帮助意见。他建议我把思路放宽些，不仅要想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也想想内心里曾经想过些什么。人总是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更复杂些。对自己的前途、事业、家庭、个人生活等，都会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或不健康的，通过运动清除那些不对或不健康的思想，也是提高，可以避免以后犯错误。

王科长的话开阔了我的思路。回去以后我就回想自己曾经有的思想活动。我这个人思想比较简单，特别是长期处在战争环境里，很少想到理想、前途等比较遥远的东西。对家庭的事倒是想过，我爱人已转业到湖南工作，有了小孩，两人相距几千里，总不能长期过牛郎织女的生活。军区已同意把她调到北京，我希望尽快安个家，最好能分配给我两间房，一间住人，一间可以供我写作用。至于家具，我没有多少钱，也不懂得购置什么样的摆设，我想使用公家的床铺、桌子、凳子就行了。倒是我用于写作的那间房，能买个便于放置资料和手稿的写字台，再买个书架。我不喜色彩艳丽的东西，写字台和书架最好是米黄色的，陆续买一批名著，写作之余，欣赏一些文学名著，真是惬意的生活。

我把这些思想活动在批判会上做了检查。我并不认为我的这些想法都是错的，人活着，总要想到生活的安排，这些想法有的是正常的，有的是不对、不健康的，说出来供大家批评。

我说出这些，实在出于无奈，两个多月了，总也过不了关。交代不出大的问题，小的问题上尽力想些新情况，像王科长说的，把思路放宽些，把内心活动都摆出来，供大家更深刻更具体地了解自己。

我这次检查又遭到了迎头猛击。说我在“写小说”，把自己描写成置身世外的文人雅士。在阶级社会里从没有超阶级的人，

不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说我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关心得很，而且政治嗅觉敏锐得很，反右运动刚刚开始，我就到杨司令员那里钻了个空子，请了创作假，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我悠然地在海滨散步，心里高兴得很，我错估了人民的觉悟和力量。

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我找杨司令请创作假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反右这回事！可是不容我把情况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你不要诡辩，别人不是傻子，你心里想的什么，做了什么，你心里明白，我们也明白，你再别想蒙混过关”。

就连我想买米黄色的写字台和书架的事也成了讽刺、批判的资料，说了很多刺耳的话。

我越来越清楚了，不论我怎样检查也过不了关，因为我还没有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确实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给自己乱扣帽子。

正在我心情十分苦恼的时候，从家里又传来不幸的消息。大哥来信说，父亲病得很重，一个多月了，吃饭就吐，只能喝稀粥、菜汤，近几天有时连粥和汤也不能喝了，昏睡中常常叫我的名字。我是最小的儿子，父亲一生省吃俭用，竭尽家里的能力供我一个人上大学，把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可是我自1945年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后，只在解放后部队进驻天津时回过一次家，1949年和1953年曾在北京意外地见到父母，但时间都很短促，此外从未回家，看望父母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很少很少，所以父亲非常想念我。大哥在信上说，看来父亲活不了多久了，你无论如何要请假回来看看，尽尽做儿子的孝道。

我看着信，眼泪止不住往下流。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父亲！

父亲劳苦一生把我养大，我没有尽过儿子应尽的孝道，现在老人家人生的道路快走完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我怎么忍心违背父亲的心愿！可是我知道，我现在请假是不会批准的，因为我正在挨批判。我含着眼泪给大哥写了一封回信，谎称我回国不久，工作很忙，等忙过这阵子，一定请假回去看父亲。

人不能回去，只能从工资中紧出一些钱寄给父亲治病。当时父亲和大哥生活在一起，大哥8个孩子，收入不多，生活相当困难。我给爱人写信，说明父亲病重的情况，把每月寄给家里的钱减少二三十元；我原来在军官食堂吃饭，每月伙食费16元，改为到战士食堂吃饭，每月可省出6至7元；原来每月买些书，现在不买了，合起来，每月给父亲寄去60元。

1958年春节是我有生以来过的最烦闷、最痛苦的一个春节。满城张灯结彩，爆竹声声；家家欢声笑语，喜迎新春。我一个人闷在屋子里，无亲友可访，也没有心情看文工团的演出，只有看书，却又看不下去。烟卷成了我消烦解闷的唯一伙伴，吸了一支又一支，一天工夫差不多吸了两盒。

我的事情一直没有对父母讲。父亲在重病之中，即使没病也不能告诉他们，他们不懂革命队伍里的事情，我不愿他们为我担惊受怕。爱人那里也一直没有讲。她太年轻，她自己的条件很好，城市贫民出身，13岁参加革命，工作一直努力，是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如果把我的情况告诉她，怕她承受不住沉重的精神打击。我只能把痛苦锁在自己的心里，自己承受。

人人都在喜迎新的春天。新的春天带给我的将是什么呢？

八、不得不“低头认罪”

春节过后的批判会出现了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张山发言了。张山是批判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和在肃反运动中态度一样，每次开会只记录别人的发言，自己却从未发过言。现在他率先发言了。他笑着（别人是严肃甚至于是严厉的）对我说，大概你是担心把你打成右派吧，老是不敢大胆地交代问题。谁也没有说你是右派，你应该打消顾虑，敞开思想把自己的问题交代出来。接着他就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几个“可是”下边做的文章。他说和徐孔同志相处当中，发现徐孔同志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学习。徐孔同志在战争中很勇敢，可以说在枪林弹雨中从不畏缩。可是徐孔说过：朝鲜战争比国内战争更残酷、更激烈，也就有更丰富的创作素材。这是徐孔真实的思想，他参加朝鲜战争是为写出成名的作品，在他勇敢表现后面隐藏着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思想；还有，徐孔同志性格直爽，说话坦率，可是他说的话很多是对领导的不满，对工作的不满的，徐孔那些坦率的话正是他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观点的自然流露，说明他的立场、他的观点本质上和党的领导和革命工作的需要是对立的……“可是”，文章共有七八条，根据这七八条，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而且是善于伪装的深藏不露的右派分子。

我当时真是目瞪口呆。我没有想到张山这篇“可是”文章做得这么“精彩”。肃反以后的那回饮酒，他推心置腹坦露的心迹，言犹在耳。可是今天竟变成这个样子！我一向以为张山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有自己的独立思维，也有做人的良知，只不过注意观察形势，注意保护自己就是了。可是从今天这篇“可是”文章看，我对张山的理解太肤浅了。张山不但善于领会领导意图，而且善于掌握战机，挽弓待发，一箭中的。不但善于消灭敌人，而且善于在消灭敌人当中保存自己。在“可是”文章里，他引证的全是别人的话或者我和别人说的话，他和我在饮酒当中说的那些掏心窝的话，一句也没露。尽管那些话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但用反右中的技巧略加整理就可以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即使是我讲的，他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干脆不露，难道这才是真实的张山？

下一次批判会就直截了当地给我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一次韩部长亲自出阵了，他说，我们一直没有说你是右派分子，并不是你罪行不够右派分子，而是给你留有时间，叫你自己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可是你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拖延狡辩，始终不肯老实交代。韩部长警告道，定不定右派你自己说了不算，是由组织定性的。你的那些罪行，拿出哪一条都可以定你右派。我们的等待是有限度的，你必须端正态度，马上交代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再拖延只能罪上加罪。

会议限定了时间，只给一天时间写出书面交代材料，隔天在会议上作全面彻底的交代。至此，我的问题完全清楚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是铁定戴上了。

当初，韩部长带领二十兵团宣传部的人马参加批判会的时候

候，我已经预感到这一次我可能难逃厄运，但总还存在一些幻想。我的思想言行不能说没有错误，但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文化部批判会议拖了很长时间，也使我给自己的幻想找到一些依据。文化部是反右派斗争的重点单位，批了几个人，批了很长时间，但最后一个右派也没划，说明领导上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掌握是很严的。从批判会上人们的态度看，虽然这一次也是韩部长坐阵指挥，但和二十兵团宣传部肃反运动的情况不同。批判中也有“加温”现象，但没有打骂等暴力逼供行为，基本上是说理的。这说明在军区文化部开会，不能不考虑军区文化部对运动的态度，批判的时间拖得很长，可能是为了掌握充足的证据，否则不会轻易定性。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又错了。反右的政策，划右派的标准，全国都是一致的。但谁执行这个政策，主持批判，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划我右派，早已列入指标。批判的时间很长倒可能和在文化部开会有关，会议的主持者不愿在文化部显出自己粗暴的形象。

军区的反右运动到1957年底已基本结束，我可能属“补课”范围。会议已经明确限定明天做全面系统的交代，而且韩部长点明，不论写不写交代材料我都逃不脱右派分子这顶帽子，但是必须写，不但要承认，而且要白纸黑字写成书面材料，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承认这一点是痛苦的，落在书面上更加痛苦，我拿着笔的手直发抖，怎么也写不下去，我确实没有反党思想更没有反党行为啊！

回想过去，1945年我和几个同学从北平到解放区，要通过国民党（包括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几道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到解放区初期，我对革命的很多事情还不太理解，但经

过联大学生会和张家口市参议会的竞选、选举，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民主生活，使我欢欣鼓舞。以后又参加了涿鹿县、获鹿县和束鹿县的三次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后的喜悦和为了保田保家，父送子、妻送郎参军的热烈场景使我深受感动，对党的领导由衷地信服了。那以后，不要说中央的声音，就是上级党委的决定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总是坚决执行。部队入朝的时候，我很清楚朝鲜战争是两个力量集团一场实力悬殊的大搏击。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毫不怀疑，但为了胜利必将付出重大的生命代价。我也很清楚，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战胜敌人，另一个是牺牲在战场上，绝不能带着战败的耻辱回到祖国人民面前。所以，在那场残酷的战争里，我的心态始终很平静。不论是在战火纷飞，冒烟突火、向敌人冲击的时候，或者敌机带着刺耳的啸音飞临上空，炸弹落向身边的时候，确曾产生一霎时的恐惧，但仅仅是一霎时，炸弹爆炸以后，或者冲过封锁线以后，心态马上恢复平静，照常做战场上需要做的事情。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恢复建设时期，我对党始终是忠贞不二，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一个细胞，党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神经上又没出毛病，我为什么要反党，反对我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事业呢？

我从来不讲违心的话，可是这个罪是党组织定性的，不承认就是自绝于党，我不能自绝于党，只能低头向党认罪。我没有犯罪，这个交代材料怎么写？只能“要什么给什么”了，按大家在批判会上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丁、陈反党集团的走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思想等。

这一夜我几乎没睡，快天亮的时候迷糊了一小会儿，早饭只喝了半碗稀粥，昏昏沉沉地走进了会议室。这一次到会的人很

多，不仅有二十兵团宣传部参加批判的全部人马，还有文化部的很多人，从未参加会议的文化部部长刘佳今天也来了。

昨天写交代材料的时候写得很艰难，今天念交代材料的时候更加艰难，我看着自己写的那一条一条的罪行，怎么也念不下去，念不到一半就哭出来了。

我念完交代材料以后，会场上没有人讲话。过了一会儿，文化部长刘佳用沉重的声音说，人不伤心不落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毛主席说只有两种人——已死的或没有出生的人不会犯错误，犯错误改了就好。

我注意到了韩部长。他神采飞扬，脸上带着得意、讽刺的笑容注视着我，一字一板地说你现在哭已经晚了。肃反的时候我们就想挽救你，可是你态度嚣张，不但拒不交代你的问题，反而在肃反结束以后要求我们向你道歉。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今天终于使大家看清了你的反动本质。我们的政策是宽大的，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认罪，接受改造，仍然给你出路，我们仍然挽救你。

“挽救”这两个字像两根浸毒的钉子钉进我的心里。

韩部长是怎样挽救我的？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住在军区招待所，文化部的老人向我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反右时，文化部本是重点单位，但一个右派也没有打出来，文化部部长刘佳当然要承担责任，压力很大。当时政治部的部长们在一起吃自费小灶，吃饭说话中间谈到文化部的反右情况。韩部长就说他知道一个还没有批判的铁定右派，这个人一贯对领导不满，攻击肃反，还是陈、丁反党集团主将陈企霞的得意门生，和陈企霞关系密切；这个人轮换到宣传部的，可是一天也没有去宣传部上班，回国就请了创作假，借调到总政创作室写小说。他是军区的人，把他的组织关系从总政创作室调回来，到文化部批判正对

口。当时正在反右高潮当中，韩部长的建议马上被采纳。

会后不久，文化部党支部通知我，政治部要召开全体干部参加的批判大会，要我准备好在大会上的交代材料。

在我之前，政治部只召开过一次全体干部参加的批判大会，批判政治部的中尉助理员朱继经。我是第二个。我轮换回北京军区，只报个到，一天班没有上，军区的人并不了解我，可是我不但在军区被打成右派，而且成了反右派中两个重点人之一。

不过，在我，已经无所谓了。很多张“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徐孔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贴在政治部办公楼的东墙上，政治部的人已经都知道了“右派分子徐孔”的名字，开个大会，无非是叫大家“看清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彻底地“批倒批臭”，此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呢？

开大会以前有人好心嘱咐我：“在会上无论批判你什么，千万别反驳，会场外边有武装，你若是抗拒，就可能把你抓起来。”对此我并未经心，因为我根本不会反驳。到了会场，叫我上台，我就上台。有人推过一把椅子，叫我坐下，我就坐下，叫我看着台下，我就看着台下。台下坐的人当中有不少是兵团轮换回来的，来了哪些熟人我也没看清。好几个人来到前台发言，讲了些什么我也没听清。若干年以后我爱人来到北京，军区文工团一位好朋友告诉她：反右对徐孔处理那么重，是因为徐孔太骄傲，批判大会那天，他坐在台上，显得满不在乎。其实，这位同志是把我估计太高了。那时候我哪里还骄傲得起来，心里是一片迷茫，只听从摆布罢了。

我对自己的命运已经不作考虑，考虑也没用，听候处理就是了，可是家庭问题使我心里很矛盾。我当然不愿意离婚，不愿和爱人分开，而且我们已经有了孩子，如果离了婚，孩子就将失去

父亲。可是不离婚对我爱人的影响太大。她只有 21 岁，如果她的丈夫是右派，她将背上“划不清界限”的包袱，影响组织上对她的信任，影响她的前途，甚至影响终生。这对一个 21 岁的青年来说太可怕了，而且在经济上也会给她带来沉重的压力。以前主要靠我工资维持家里的生活，一旦我这边的经济来源断了，只靠她的微薄工资，要抚养孩子，又要赡养母亲和弟弟，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我反反复复地想了很久，最后下定决心——离婚。

我在信上如实地把我的情况和我的决定告诉了她，我已被划为右派分子，为了不影响她和孩子，不使家里的生活陷入困境，我们只能离婚。很快就接到她的回信，她说：得知你被划为右派，确实使我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我了解你，在你遭受挫折的时候，我会更关心你，更爱你。她不同意离婚。

看到她的来信，我的心里说不准是高兴还是难受。在我的印象里，她虽做了母亲，但她自己还是个大孩子。她很小就参加了部队文工团，是在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呵护下长大的，养成了无忧无虑的性格，特别爱笑，有时和小伙伴们碰到一件开心的事，笑得前仰后合，甚至坐到地上拍手打地地笑，笑得很长时间站不起来。政治部的人都知道文工团有个爱笑的小宝珍。这个爱笑爱乐的小演员，在艺术学习上却非常刻苦，文工团排演《打猪草》的时候，她扮演打猪草的小女孩，演出以前接连好几天，她一个人在房前的空地上一次又一次地演练拔草的动作，练一会儿，停下来想，想一会儿又练。到演出的时候，不但唱得好，拔草的动作也惟妙惟肖，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兵团的领导很喜欢她，丁莱夫每逢酒会总要把她带在身旁，帮助他应付别人的劝酒。贺龙到兵团慰问，开联欢会的时候，也叫她坐在身旁，和她说说笑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笑。1956年她从部队转业到湖南湘乡县，在县政府教育科工作。这样一个心地单纯、涉世未深的青年人，突然遭到如此沉重的政治打击，她竟然没有悲伤，没有抱怨，说明她的意志是坚强的，可是意志坚强敢于坚持良知的人，在逆境中容易遭受不幸啊。她不同意离婚使我感动，但也使我为她的前途可能受到的影响担忧。当时对右派的处理有一条政策，“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只有等我的处理定下来以后再考虑这件事了。

九、祸不单行，亲人连遭不幸

在为妻子、家庭的事担心的同时，我也为父亲的病重而心焦。我给大哥寄钱以后，大哥回过一封信，说：父亲还是常常念叨你，不过父亲说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是在党的人，身不由己，暂时不要回来了。父亲的病情虽没有多大起色，但坚持吃药，也没有恶化。你不要牵挂，我们会尽力给父亲治病的。

我怎么能不牵挂呢，从大哥讲的症状看，父亲患的不是一般的肠胃病，很可能是绝症，而且到了晚期，治好的可能性很小，还能活多久，我什么时候才能请假回去看看父亲呢！

我心牵两地：东北那边父亲的病和湖南那边妻子面临的困境，两边的问题我都无力解决，在心焦无奈之际，妹妹那边又出了问题。

批判大会之后，我被安排在图书馆做借阅登记的工作。一天，我正在替借阅的人找书，忽然接到妹妹李淑芬（我原名李致中）的电话，叫我抽时间去她家里，有要紧的事和我商量。我忙问：“是不是父亲的病加重了？”她说：“不是，见面再说吧！”听淑芬的语气，她要和我说的不是令人高兴的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淑芬是1949年我把她从她的家里带出来参加革命工作的。

1949年初，北平刚解放，我和兵团政治部的几个人进城参观，去看望城里一个乡亲的时候，意外地在乡亲的家里遇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是送淑芬到北平完婚的，淑芬还不到20岁。因为我们家里生活困难，而对方的家庭是民族资本家。父母想叫女儿早点结婚，能过上较好的生活，父母疼女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我觉得，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在资产阶级家庭里饱食终日，必将毁掉她的一生。我劝妹妹参加革命工作，妹妹性格很刚强，她同意我的意见。当时华北大学正在招生，招收青年知识分子，经过一段学习时间以后，分配到各地工作。华北大学的前身是华北联大，招生的人很多是我认识的，我带妹妹去报考，被录取了。她家里知道以后，非常恼火，整天看着她不准出门。入学那一天，她是设法从家里逃出来的。经过一段时间，她家里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了解，她丈夫也考入了华北大学。毕业以后，两个人都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警卫团任文化教员，住在中南海里。

我按着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赶到中南海的东门，淑芬已在门外等着我，告诉我，她丈夫王均山被划为右派，组织上找她谈过话，告诉她，王均山已不适于在中央警卫团工作，将分配到边远的内蒙地区。她有两种选择：如果能划清界限，和王均山离婚，可以继续留在警卫团工作；如果不离婚，只能和王均山一起到内蒙去。她心里很乱，很苦恼，想听听我的意见，该怎么办？

我听了以后很惊讶，就问：“王均山一向老老实实，他为什么被划成右派？”淑芬说她也不太清楚。她说，王均山这个人整天的只知道工作，除了教学还是教学，别的事情很少过问，领导上号召帮助党整风，他提不出什么意见。领导上再三号召，他觉得不提点意见会被认为不关心党整风，也不知道他是听报告还是从报纸上看到的谈当前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就提出一条意见，

说当前社会的阶级结构是金字塔式的，意思可能是说底层是工农大众，是最大多数，塔尖是地主资产阶级，是极少数。但却被批判为明目张胆地抬高资产阶级的地位，反动资产阶级的本质不改。他本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就被划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右派当然不能在中央警卫团工作，决定把他下放到内蒙。淑芬说：“可是这个家怎么办？我怎么办？是和他一起去内蒙，还是离婚？”

淑芬参加工作时间不长，没有经过多少政治风雨，突然受到如此重大的政治打击，心慌意乱，一时拿不定主意。我是她身边唯一的亲人，参加革命的时间也比她早一些，她想和我商量一下这件和她家庭命运攸关的事情。她还不知道她的哥哥也被划成右派，也面临着离婚还是不离婚的困惑。当然，我的事情暂时不能告诉她，否则，会使她的精神受到更大的打击。

我思考了一会儿，对她说：“这件事，归根到底要你自己拿主意。很重要的一点是，王均山这个人怎么样，你们结婚几年了，你最清楚。如果王均山是个坏人，干脆离婚，长痛不如短痛。如果王均山不是坏人，还是不离的好，你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离婚，孩子不是失去父亲，就是失去母亲。”

淑芬说：“王均山这个人老实得近乎窝囊，对人对事从来没有坏心眼。”

我说：“那就尽量维持这个家庭，家庭的破裂，往往给孩子造成终生的精神创伤。”

淑芬说：“我也是这么想。到内蒙就到内蒙，再艰苦的地方也得有人工作。”

淑芬的家靠近中南海东门，房间的墙壁可能是刚刚粉刷的，很光洁，家具也很新，中央警卫团宿舍的条件比军区的好多了。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淑芬有两个孩子，小的是男孩，叫小平，还不懂事；大的是女孩，叫小莉，已经会叫舅舅了，满屋里跑来跑去。这两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一点也不知道家庭将要发生的变故。

王均山没有在家。



反右中，妹夫王均山和我一样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内蒙，我去何处尚不知晓。分手前，我和他们一家合影。后立者为王均山，前排坐的是妹妹李淑芬和他们的儿子小平。

我进屋不大一会儿，淑芬单位的科长来了。我还佩戴着大尉肩章，他不会知道我是右派。见面以后，很热情，说了几句客气话，转入正题，说道：“王均山的问题，性质不是很严重，主要是年轻幼稚，说了错话，分配到内蒙去，还是做教学工作，到艰苦的地方锻炼一个时期。你妹妹李淑芬在警卫团的工作表现一直

很好。组织上已经和她谈过，她可以不受王均山的影响，继续留在警卫团工作，就看她个人的意见了。”我知道这位科长没有说明的话，就是“只要离婚”就可以继续留在警卫团工作。他不挑明，我也就含糊地应付一句：“那就多谢组织上的关心了。”

淑芬一家去内蒙以前，我和他们夫妇一起到西单照了一张合影。我已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去内蒙，我发配到哪里还不知道，一起照张像留个纪念吧。

淑芬一家什么时候去内蒙，没有告诉我，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右派发配，叫你走，你就走，不一定事先通知。即使通知了，临走时我也不能去送行，双方都是右派，去了就可能引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我心里一直很牵挂他们，主要是淑芬的男孩有哮喘病，内蒙那里的气候对哮喘病很不利，医疗条件又远不如北京。到了那里，孩子的病将给淑芬带来很大的麻烦，对一个母亲来说这可能是最揪心的了，但却是无可奈何的。

正在为淑芬一家的事忧心的时候，军区这里又发生了一件使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天早饭后，我去图书馆上班的时候，见政治部大楼的东墙上赫然贴着“批判右派分子史忠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大字报。

史忠怎么也被打成右派？

从回国以后，我一直没有见到他，总以为他不会出问题。史忠这个人，虽然有主见，但性情温和，从不和人发生公开的碰撞，工作一贯积极，领导对他印象好，在一般干部中人缘也不错。他回国时，整风已经开始，批判他的大字报没有鸣放期间向党进攻的“罪行”，都是在兵团期间的事情，有两条是和我有关的：“吹捧右派分子徐孔有写作才华”、“不满肃反运动，替右派

分子徐孔喊冤叫屈”。两条“罪行”都没有具体内容，但后一条明显地是指史忠在肃反运动中对我的态度。

史忠曾两次参加过对我的批斗会，向丁主任汇报开会的情况，丁主任批评了宣传部的粗暴做法，以后史忠又在生活上和我划不清界限，主动地和我同桌吃饭，坐在一起看文工团的演出，甚至买酒和我碰杯。韩部长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十分恼火，说史忠有意和领导对着干。但史忠是丁主任的秘书，丁主任没有批评史忠，韩部长也不好发作。我们轮换回国时，丁主任提升到志愿军政治部任副主任去了。如果丁主任回国，史忠不会有今天的下场。兵团政治部轮换回国的干部中，级别最高的是韩部长，我和韩部长在肃反中矛盾很深，反右中韩部长费尽心机在军区把我打成右派，并不出乎意料。但由于我而连累到史忠，我的罪孽可就更大了。

没过几天，我见到了史忠。

当时军区的干部分批轮流参加官厅水库的建设工程，我和史忠是同一批的。大家又恢复了战争时期的装束，自己背着背包，带着简单的洗漱用具和餐具，队列整齐地出发了。

军区机关的干部们长年坐在办公室，特别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反右运动，人们的精神处于紧张状态，现在有机会走进大自然参加体力劳动，精神上有一种解放感。出城以后，感到天更蓝、更加广阔了，看着无边的滚着绿浪的麦田，听着林荫下鸟的啼鸣，呼吸着混有草香和花香的空气，人们的精神非常振奋，一路上歌声、笑声不断。到了驻地等候分配住处的时间里，各单位像战争年代互相“点歌”那样，喊着口号，喊着单位的名称，鼓掌欢迎对方唱歌，应点唱歌单位的指挥者竟是史忠。站在队伍当中，两手打着拍子，唱得十分投入，歌名记不得了，有两句歌词是：唱

吧，唱吧，尽情地唱吧！大概史忠看见了我，唱的中间，指挥的手臂向我挥了一下，还含笑向我点点头挤挤眼，意思叫我和大家一起唱。

这就是史忠。看来，政治风暴并没有把他的精神摧垮。政治风暴也没有改变他对同志的信任和友谊，也可以看出，史忠虽被打成右派，周围的人并没有把他看做“敌人”，否则大家不会推选他指挥唱歌的。

安排好住处以后，第二天就参加劳动。我们这个单位的任务是向水库大坝上运送沙石料。没有先进的运输工具，只有三大件：土筐、扁担和铁锹。在劳动当中，人们的政治界限消除了，装的快装，挑的快跑，紧密配合，都想为本单位争个先进。

在这期间还看到了朱总司令和周总理在工地参加劳动的情景，人们备受鼓舞。

我从始至终是挑土筐，因为在机关干部中我的身体较好，而且有挑土筐的经验。在联大勤工俭学到辛集搞土方工程，我和二班同学鲁芝总是挑最大最重的土筐，被选为劳动模范、立过功。这里的土筐比那里的土筐小多了，我总是要求多装些。我多年在野战部队工作，腿脚上也有锻炼，所以跑得也比别人快些。政治部带队的严副秘书长，几次告诫我：少装点，慢跑点，年纪轻轻的，不要使过力，把身体搞垮了。

在工地这段时间，是几个月来我心情最平静的时期。一天下来，通身大汗，肩腿酸痛，可是饭量大增，晚上倒下就睡，什么也不想了。但这种平静的心情，回到军区以后，立即被打破了。

回军区一到图书馆上班，就看到了大哥的来信。信中说：父亲已经滴水不进，而且疼痛难忍，要靠打杜冷丁或吗啡止痛，时常昏过去，一醒来就叫我的名字，叫我无论如何要请假回去一

趟，叫父亲临终前能看我一眼，满足老人家最后一点心愿。

我看信以后心如刀绞，马上去找文化部党支部书记李冀。我被划为右派以后，一切事情都由支部管。李冀看过信以后，也有些难过，说：“应该尽尽人子的孝道啊，我马上给你请假。”

不料，李冀回来以后告诉我：不准假，叫你等候处理。

我听了以后非常愤怒，几乎要爆发。我又不要求十天半月的假，鞍山很近，只要两三天就行了。为什么两三天的时间也不给？

愤怒归愤怒，但组织决定还是得服从。怎么办？不能回去给父亲送终，总得尽一点心意呀。大哥家里困难，应寄些钱帮助大哥料理父亲丧事。可是我没有积蓄，考虑很久，决定把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给大哥。同时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请她谅解我的苦衷。并告诉她，我被处理以后，可能没有工资了，只能靠她自己承担家里的困难。

过了四五天，李冀陪我到直政部组织科去看结论。

结论在列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以后，将我定为“极端右派分子”。

我不解地问：批判时说划为右派分子，怎么又定成了极右分子。

回答是：因为你一贯反党，而且批判中认罪态度很不好。

我心里明白，结论已经做出来，争辩也没用，就在结论上签了字。

组织科长又拿出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的判决书叫我签字。

判决书上有开庭日期，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起诉人是李冀，被告当然是我，判决书在起诉人列举的罪状以后写道“被告对以上罪行供认不讳”，判决是“开除军籍，剥夺大尉军衔”，

“如被告不服本判决可在×日之内上诉”。我看判决书的日期，早过了上诉期。

我莫名其妙地问李冀：“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没有出过庭啊，你是起诉人，你是否出庭了？”李冀态度很坦然，说这是履行法律程序，对你的处理是党委决定的，但开除军籍和剥夺军衔需要经过军事法院的这道程序。

也许李冀的态度是对的，党委的决定是必须服从的，军事法院按党委决定履行法律程序，个人则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军事法院的判决。

组织科长郑重通知：领导指示，近几天不准请假，不要外出，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我问：“什么地方？”

回答是：“军区有一批人一起走，到时候有人送你们。”

至此，处理我的组织结论和军事判决都已完成，我的革命旅程告一段落，即将开始另一种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还不清楚，但从已处理的右派看，留在机关工作的极少，大部分是送到一个特定的地方从事体力劳动。

离开军队去参加体力劳动总得置备一些服装。我这个人在生活上一向不讲究，衣服从内衣到外衣都是军队发的，鞋也只有最近发的一双是胶底的，其余都是牛皮底的硬底鞋，参加劳动不方便，要买衣买鞋总需要些钱，可是我手头上只剩下十来元钱。向人借，我现在能向谁去借？再说借了也没法还。最后我把主意打在购买的那些书上。回国以后，每月都紧出一些钱买书。我最喜欢俄罗斯的文学名著，买的较多，还有我比较喜欢的法国的巴尔扎克、莫泊桑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辛克莱以及丹麦的安徒生等名家的作品，中国的四大名著和《聊斋志异》我也买了。这些

名著都是看过的，买来准备收藏，大部分翻也没翻，还是新的，今后不知去什么地方从事体力劳动，无法带走，不如卖了。

当天下着零星小雨，我把书用雨衣包好，背着到东安市场收购旧书的书店。一个年轻的店员过完秤以后，算出价钱，很少。我急了，说：“这都是新书啊，不能按废纸的价钱算。”店员说：“我们是收购旧书的，价钱都是按分量算。”在我们两个争执不下的时候，坐在屋里的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走过来。他很在行地翻了翻书说：“确是新书，大部分没有看过，买回去的时间不会太久，为什么要卖？”我说：“等钱用。”他看了看我。可能我的衣着使他想到了什么。我穿着军装，没佩戴军衔，头上也没戴军帽，光着头，脚上穿着军官的皮鞋，有点不伦不类。他说：“近一个时期有不少人和你一样来卖书，有很多是很有价值的书。您是遇到了意外情况了吧？”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说：“这些书你们可以卖的，按书价打点折扣可以吧。”他很痛快，说：“行，买书的人是因为爱书，没有特别困难谁也不会卖。”他亲自拿过算盘，一本一本本地算，折扣虽然较苛，但书多，算下来总有好几十元。我用这些钱买了一套卡叽布中山服，一顶蓝鸭舌帽，两双胶底鞋，两件背心，一套绒衣，还有几双袜子。

除了书，我没有什么家当，只有几身旧军装、被褥和洗脸用具，要随身带走的。有几双军队发的皮鞋，带走没用，丢了可惜，我只留下一双胶底的，把几双牛皮硬底的和在朝鲜发的短筒皮靴，擦干净了，装进一只网兜里，当晚送到鼓楼后街乡亲的家里。

这位乡亲是位老太太，我叫她大姑。娘家和我东北的老家是邻居，她出嫁后随丈夫来到了北平，丈夫升官以后娶了小老婆，遗弃了她，给她一处房产维持生活。房产共七间，隔成两个小

院，她带着一儿一女住里院的两间平房，外院五间出租，房租收入不多且不稳定，生活比较困难。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她的侄女陈绍贞从老家来信，请她在生活上照顾我。老人家非常善良，对我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每逢星期六我到她家去的时候，她虽然手头不宽裕，但总要拿出几角钱买些肉末，给我下碗荤汤面或者包顿饺子吃。1949年北平解放后，我进城参观，去看望这位离别多年的大姑，意外地见到了我的父母，他们送妹妹到北平结婚，因为打仗，一时回不了东北的家，就住在她的家里。我妹妹也是在她的家里和我相见的。我送妹妹报考华北大学。她儿子和女儿也考入了华北大学。毕业以后，儿子程远志分配到宣化铁矿工作，女儿分配到太原做青年团工作，老人家一个人住在北京。1950年我调到华北军区，时常去看她，1957年从朝鲜轮换回国以后，在去北戴河以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去看望过两次。可能儿女不在跟前，老人家一见到我特别亲热，虽不是我的亲姑姑，但比亲姑姑还亲。

我怕穿没有肩章的军装引起老人家的怀疑，特地换上新买的蓝卡叽布中山装。老人见到我非常高兴，说：“怎么这么多天没来？前两天我还梦见咱娘俩包饺子吃。”大概她看惯了我穿军装，今天我一身蓝中山服使她有些奇怪。问：“你每次来都是穿军衣，今天怎么换上了蓝衣裳，是不是部队有了新规定，下班以后不能穿军衣？”我说：“不是，穿便装办私事方便些。”我不想久留，怕老人家问这问那不好回答，就提过网兜说：“部队每年发两次皮鞋，我积下好几双，远志的脚和我差不多，他在矿上费鞋，送给远志穿吧。”

老人家的脸色变了，说：“你是不是出事了？部队上发给你的鞋，你都送给远志，你自己穿什么！”我说：“没什么事。我整

天坐机关，不费鞋，用不了那么多，部队发的皮鞋质量都挺好，丢了怪可惜的。”

老人家说：“你不用瞒我，今天一见你穿蓝衣裳，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我知道你自己从来不买衣裳，今天穿的怎么是自己买的衣裳？年前远志回来说，他们矿上打右派打得挺邪乎，有个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给领导提了两条意见被打成右派，派到井下劳动去了。他还问你，说李大哥也是大学生参加革命的，这么长时间没来，是不是出事了？我还说不会，你李大哥虽说念书多，可是人实在，心肠热，对谁都没有坏心眼儿。再说，十几岁就参加八路军，从国内打到国外，丢家舍命的，从朝鲜回来没有多少日子，怎么会出事呢。话虽这么说，可是你好几个月不来，我时常想起远志说的那些话。你别瞒大姑，是不是真的出事了？”

我不能再隐瞒，就说：“是，我也被划成右派。不过没什么，下去劳动一个时期。还会回来。”老人家问：“你爹你妈知道不知道？”

我说：“爹几天前去世了。”

“你回去送终了没有？”

我说：“没有请准假。”

老人家沉默了。

回来的路上我直骂自己是笨蛋，吝啬鬼，那几双皮鞋，一半是旧的，能值几个钱，就是舍不得丢，要送给老人家。结果，使老人家知道了我的事情，给她那善良的心灵带去了很大的伤害，这是何苦呢！

回到军区以后，李冀通知我，出发的日期定了。

出发前一天下班以后，我到文化部刘佳的家里辞别。刘佳和我住在一个院里。我们两个是同乡，都是海城县人，不过过去没

有接触过。文化部的人对他反映不错，特别是反右中，文化部一个右派也没划，部里干部称赞他能实事求是，爱护干部，在压力下敢于承担责任，是个刚正不阿的好领导。我们第一次接触是在批判我的小组会上，他的发言虽然不多，但可以感到他和其他的人不同，不是歧视，更不是仇视，而是同情的态度，这使我内心对他产生了亲切感。明天我就将走进另一种生活环境，在部队生活、战斗了十年，一旦要离开军队，真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和失落感，很想找个知心的人说上几句话。找谁说？我在军区熟人很少，二十兵团宣传部的几个人我很熟，但经过几个月的批斗会，我不想见他们，大概他们也不想在此时见到我。我是在文化部接受批斗的，刘佳是文化部部长，临行前应向他告个别。

我走进刘佳的家时，他正在外屋刮脸，满脸抹着肥皂，见到我忙不迭地招呼说：“你先到屋里坐，马上就完。”我到屋里坐了一小会儿，刘佳刮完脸，坐到我的旁边：“听说明天就要走。”

我说：“是，说心里话，我离开联大就到部队工作，整整十年，对部队感情很深，真不愿离开部队，可是走到今天这一步，不走也不行。”

刘佳沉默了一会儿，说大家过去不在一起工作，我对你的情况不了解，运动中不好讲话。他让我要想开点，还说军区领导很关心你，到农村锻炼一个时期，少则半年多则一年，还可以回军区工作。

我说：“那是以后的事情了，谁知中间会发生什么变化。从朝鲜回国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右派，可是不但被打成右派，还是极端右派。”

刘佳说，你还年轻，把眼光放远点，只要能接受教训，严格要求自己，总有一天会重新获得组织的信任，还可以做很多事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情。刘佳知道我喜欢文学，但让我这次下去不要带文学书籍，要带书，就带两本政治书。

这次谈话不过十分钟，毕竟我们不太熟，能听到几句真诚的安慰和鼓励的话，我也就感到满足了。

这一天是在部队度过的最后一天。

十、进入劳教农场

我们一行人是四月中旬离开军区的。

出发那天早晨，李冀招呼我提前吃了早饭，携带行李来到集合地点——政治部军官食堂前边的小院里，已经有七八个人等在那里，不到七点钟人都到齐了，有十七八个人。军区直属队只有我一个人，李冀带着我的档案同行，他是这批人总的带队的。余下那些人都是军区下属单位的，有三个和李冀一样也带着档案，是送人并办理组织手续的。

李冀向大家交代了行进途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然后招呼大家上了一辆卡车。

卡车出了北京城以后直奔天津方向。到了天津郊区，在一条有很多商店的街道上，李冀叫司机把车停下来，对大家说：“要去的地方是黄骅县大苏庄，过午才能到，在这里歇一会儿，那边买东西不大方便，要买生活用品的可以在这里买，肚子饿的可以买些东西吃。”又特地关照我说：“听说那地方伙食差，买些吃的带上吧！”他不知道，我兜里只有七八元钱了，总得留下这些钱应急用。再说我在野战部队十来年，西征绥远的时候吃山药蛋，刚入朝的时候，每人每天四两高粱米，没盐没菜，那种苦日子也过来了，现在伙食能比那时候还差吗？也就没有买。李冀自己却

买了很多，拿出一条比面袋略窄些的白布口袋，买了满满一口袋的面包和灌肠、肉肠。我闹不明白，他当天就要回去，买这么多吃的干什么？

司机问明去黄骅县的道路，继续赶路。离开天津郊区不远，上了一道长堤，沿堤顶的土公路一直向西，左边是一望无际的芦苇和水面，右边也是芦苇和洼地，间或有一片一片白花花的碱滩。长堤两边显得辽阔而荒凉。

卡车行了近两个小时，下了长堤，沿着一条引水干渠转向南，右前方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村庄。和一般村庄不同的是，这个村庄里里外外看不见一棵树，地势比周边的平滩高出很多，大概是为了防水防潮人工垫起来的。司机放慢车速，问车上的人：“有没有人知道，前边那个村子是不是大苏庄？”李冀说：“下车问问。”我自告奋勇跳下车，正好有两个背着鱼篓的中年人迎面走过来。李冀在身后喊：“要问清楚，我们要去的不是大苏庄，是大苏庄农场。”两个中年人看看车上人的装束，说：“你们也是往农场送人的吧，这阵子往农场送的人真不少。”回身指着引水干渠上的木桥说：“从那里过了桥就是农场，俺们庄子和农场隔着一条渠，是邻居。”

卡车按着村民的指引，左转，过了引水干渠的木桥，眼前是很宽的土路，土路是东西走向，南北两侧有很多土墙土顶的排房，唯独在路北靠近水渠的地方有一片用青砖墙围起来的青砖排房，李冀说这里是农场场部。卡车在场部的大门外停下来，李冀嘱咐大家不要下车，不要向过往的人打听事情。他和几个带队的携带档案进了大门。时间不长，李冀等几个人就出来了，招呼大家下车，带好自己的行李。李冀扛起我的行李卷，一只手提起装满面包的布袋子，我要自己扛行李，李冀不理。他是典型的山东

大汉，人高马大，我只好由他。场部一个穿旧军装的年轻人带着一行人沿着那条宽土路向西，过了一座土围墙的小院落，路北出现了铁丝网，铁丝网围的面积很大，冲南有两个木栅栏大门，门口都有岗亭和持枪士兵。铁丝网的大圈里又用铁丝网截成两个区域。西边有很多人正在集合，那显然是犯人，一律光头，穿着囚衣（蓝裤褂，后背有一块白布写着号码），列队以后，由两个武装士兵押着走出了铁丝网。

我一看这景象心里顿时凉了，问李冀：“这是什么地方？”

李冀说：“劳动教养所。”

我莫名其妙，问：“劳动教养所是什么地方？原来刘部长说到农村，你说到农场，怎么又到了劳动教养所？”

李冀说：“劳动教养所就是对犯错误的人实行劳动教养的地方。刘部长可能不了解情况，以为劳动就是去农村。我并没有骗你，这里对外就叫大苏庄农场。到这里以前，对你们几个都是说去农场，为的是减少顾虑。”他恳切地、小声地说，“老徐啊，到了这里就什么也别说了，刚才我去办手续的时候，管教干部说，昨天有一个人不认罪，顶撞政府工作人员，当时就被抓起来，至少要判三至五年。劳动教养虽说是比较重的处分，但是行政处分，不是判刑，一判刑，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这里不同于军区，管教干部态度比较生硬，你性子直，说话做事千万要注意，好好劳动就是了。”

我默然。李冀说的是肺腑之言。而我，已经到了这里，真的是无话可说了。

到了铁丝网东边的大门口，场部的年轻人向岗亭的士兵说了几句话，士兵点点头，我们一行人就进了铁丝网。从迎面土排房的几个门口出来不少人，指指画画地向我们这边看，一看服装和

神态就知道是先来这里的劳动教养人员。一个穿着士兵旧军装、矮个子、赤红脸的中年人大声喊道：“看什么，都回屋去继续学习。”一看就知道是个管教干部。他把大家喊进屋以后，大步地迎着我们走来，可能看到佩戴着大尉肩章的李冀扛着行李，挟着布袋子，而我只提个网兜，使他很不高兴，两眼盯着我，严厉地说：“行李叫他自己拿！”李冀愣了一下，放下行李，把装面包的布袋子交给我，说：“老徐，我不进去了，前几天军区派人来这里了解情况，知道这里伙食差，你肠胃不好，开头可能适应不了，这些面包和灌肠留给你，吃不下这里的饭，吃些面包，总可以支应几天，过些天，适应这里的伙食就好办了。”我这才明白，他在天津买了那么多面包，是特意给我买的。

我和李冀过去并不认识，在文化部批判我的时候他也没有参加。他是支部书记，有些事情需要找他，我们才有些接触。在“左”的思想走红，很多人失掉理智的时候，他能如此对待犯错误的人实属难得。

刚才不让李冀替我扛行李的红脸矮个子，人们都叫他金队长。金队长把我们带到土排房的前边，喊着名字，把我们分配到各个班。各个班都来人带领新来的人。我被分配到三班，在第三排房。带领我的两个年轻人全是军队上来的，穿着没有肩章的军官服。那个高个子、戴着没有军徽大盖帽的叫付平，是班长；一个更年轻、留着小平头的叫李义。李义很热情，话也多，他不但替我扛起行李，还拿过装面包的布袋子，叫付平替我提网兜，我倒成了空手了。他一边走着，问：“哪个单位来的？”我说：“北京军区。”“那可是我们的上级单位呀，在军区是什么军衔？”我说：“军籍都开除了，还谈什么军衔。”他说：“以后整天在一起，了解过去情况有好处。我是石家庄步校来的，中尉军衔，你呢？”

我觉得这个爱说话的年轻人挺有意思，就说：“我比你多两个花。不过到了这里，以后最好不要谈这些事情。”李义并不理会我的话，愉快地说：“你是来的这些人当中军衔最高的，你刚来，什么都不知道，以后在班里生活、劳动我给你安排。”又对班长付平说，“新来的大尉同志……”付平皱着眉头说：“金队长宣布过，教养所里不准叫同志，要叫同学。”李义说：“叫同学也行。新来的大尉同学身体弱，床铺挤，在当中一定睡不好，把他的铺安排在边上，挨着我。”付平没有说话。

进屋以后，李义把我的行李放在靠边的地方。

这是三间通连的大屋子，对面铺。可能正在学习，大部分人坐在床头，床头太挤，一部分人坐在床里的铺盖上。这些人绝大部分穿着旧军装，是军队上来的。付平站在两排铺中间，说道：“今天，三班又来了一个新同学，叫徐孔。我们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渣，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罪，政府宽大，送我们来劳动教养，我们要帮助新同学好好学习，靠拢政府，努力劳动，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

我听了非常刺耳，全是过去没听过的言语。

李义小声嘟囔说：“少尉小排杈子（排级），整天穷诈唬。”

付平刚说完，李义就站起来说：“我有个提议，新来的大尉同学又矮又瘦，是半个病号，在中间一定挤得睡不了觉，我的意见是把他的铺放在边上，大伙看咋样？”不知是李义的人缘好，还是我过去的大尉军衔在这些军队来的人当中起了作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行！”付平皱着眉，大概他对李义多管闲事很不高兴，但大家都同意，他也不好反对，就说：“那就叫徐孔同学睡在边上吧。”

李义跳上排铺，从边上起，扯着褥子，麻利地、准确地一个

铺位紧出五六厘米，原来一个铺位不到一块床板宽（23个人22块床板），紧到我这边，空出将近一块半床板，大家并无异议。李义又帮助我铺好被褥，放置好洗脸用具和装面包的布袋子。

吃晚饭的时候，李义带着我去打饭。食堂在宿舍前边第一排房里，炊事员都是劳教人员，打饭的人在食堂窗子外边排队，依次把盆或碗递进窗子里，里边一个打饭的一个打菜的，打好饭菜后递出来。

这一顿的主食是高粱面饼子，副食是煮萝卜块。这地方吃的是咸水，煮出的菜不但苦，而且带腥味。那高粱面饼子红得发黑，据说是囚粮——给犯人们吃的是库存多年的陈粮，而且做的时候没有经过发酵，又硬又涩。这主食和副食都难以下咽，吃了两口就发呕。多亏李冀给我留下一布袋面包。我拿出面包，让李义也吃，李义不吃，只掰了一小段灌肠，说：“刚来的时候我也咽不下这种高粱面饼子，多亏我带着几斤砂糖，沾糖吃，就好咽多了。经过几天，逐渐习惯了，加上活累，饿极了，没糖也能吃。”他从兜里抓出一把砂糖放到我的饭盆里，说：“你沾糖吃试试，总得能吃饼子，那些面包顶不了几天啊。”我把饼子沾上糖，是不那么涩了，但只吃了多半个，就再也咽不下去，煮萝卜块基本没下筷，这顿饭主要吃的是面包和灌肠。

晚饭后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教养所有纪律，自由活动时间不能出铁丝网，如果有事外出，在大门口必须喊“报告班长”，经卫兵允许才能出大门，但在铁丝网里的活动不限制。

李义领着我出去熟悉环境。先到了第二排房东头的小卖部。小卖部经营的主要是生活用品，两个营业员都是过去搞过商业的劳教人员，这里不用现金，用教养所自制的“小票”。劳教人员入所以后，都必须把现金兑成“小票”，自己不准留现金，据说

是为了防止逃跑。小卖部的隔壁是禁闭室，也叫“小号”，教养人员犯了错误就被关到禁闭室里反省，严重的还要带上手铐、脚镣。那是一间房，中间用铁栅栏隔成两半，里边关人，外边是修鞋组，其实只有一个人，当然也是劳教人员，他给大家修鞋（收小票），看管禁闭室。

李义还带我看了酱油厂，在大门西边，做酱油也做醋，原料是农场自己生产的粮食，产品也主要是自己用，少量销给附近的村民。

李义带我转了几个地方，在向我介绍教养所情况的同时，也注意了解我的情况。他问：“听口音，你也是东北人，东北啥地方？”我说：“海城，你呢？”他说：“吉林，咱们是老乡。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到这种地方，老乡之间得照应着点。你是为啥被打成右派的？”我说：“说起来心里不痛快，不想说。”他并不在意，说：“反正被打成右派的多半是直性子，说实话，没错不肯认错，这就忤犯了领导，成了反动派。我和吴影（也在教养所）就是这样，整风期间我们在步校提的那点意见，都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可是反右当中硬说我们对党不满，攻击领导，要开会批判我们，我们不接受批判，跑到天桥上不下来，就把我们打成右派送到这里来了。”

李义带着我把能转到的地方都转了，回到宿舍的时候，对相互的基本情况都有所了解了。这位老乡是典型的东北人的性格，心直口快，肚里没有“保密箱”。这种人很容易了解，也很好相处。

我所在的三班属于第八队，队长就是那个矮个子红脸的金队长，上边还有一个大队长叫张连荣，还没有见面。金队长通知，新来的人明天一律出工，任务是抬土修堤。

李义和付平说好，他和我一副筐。出工以前，李义领着我去拿工具。我一看那抬土的筐，吃了一惊。筐是用荆条编成的，又大又深，比在冀中搞土方时用的筐大多了。据李义说，这种筐，装平筐三百多斤，冒个尖就有四百多斤。我到这里以后，可能不服这里水土，夜里拉了两回肚子，而且有些发烧，浑身乏力，干这样的重活怕是支持不住。李义安慰我说：“你放心。我知道你身体不舒服，所以才要求和你一副筐，到时候听我的，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到了工地，装土的时候，李义大锹快装，对我说：“悠着点劲儿，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有我，咱们落不了后。”抬筐的时候，他把筐绳挪得几乎靠近他的肩膀，我抬着前边，重量很轻。我很过意不去，要把筐绳往前挪，他说：“告诉你别逞强，你就别逞强。你刚来，若是请假，准得说你逃避劳动改造，你要挺过这几天。不要担心我，这点活累不垮我。”这个22岁的小伙子，真是壮得像头牛，汗像雨水一样顺脸往下淌，可是劲头始终不减。

到了休息的时候，伙房送来开水，李义从军装兜里抓出一把砂糖放到我的茶缸里。有了糖，水就不感到咸了，我喝了满满一缸子，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体舒服多了。

在李义的帮助下，我总算挺过了头两个小时。可是有人却没有挺过去。带队班长喊休息，人们停止干活去打开水的时候，金队长站在堤上怒喝一声：“肖洪，你们不能休息！”

那个叫肖洪的是个瘦高个儿，30多岁，脸色灰暗。据说原是个工程师，有胃病，到了教养所水土不服，吃不下饭，身体更弱了，这么重的劳动当然支持不住。和他抬一副筐的年轻人倒是挺壮，但两个人配对的活，一个人“孤掌难鸣”，他们装得少，走得也慢，明显地落后于他人。这惹怒了金队长，不但不允许他

们休息，也不准他们喝水，叫来两个壮小伙子帮他们装筐，那筐土装得不但冒尖，而且装了拍，拍了又装，筐尖的土不少于筐里的土，总共有500多斤，扁担放到肖洪的肩上，他站都站不起来。金队长又喊那两个壮小伙子：“你们帮助他！”那两个小伙子拿过另一条扁担从肖洪抬筐那个肩膀的腋下穿过，和后边那个小伙子打了个招呼，三个人一声：走！猛地往上一抬，肖洪一声惨叫，整个人都瘫了。三个小伙子不理，连筐带人抬到堤上，筐里的土倒出来，肖洪却疼得在地上打着滚地惨叫。

这一幕惨剧看得我心里直发冷。设想一下，上边抬筐的扁担几百斤重量往下压，下边“帮助”的扁担几百斤的力气往上抬，上下两根扁担用几百斤力量挤当中瘦弱的肩膀，不知肖洪的肩膀骨头是否被挤断了。

休息过以后，我们继续抬土修堤，对肖洪是怎么处理的就不甚知道了。

我非常感谢李义，有他的帮助，头几天我总算挺过来了。我的体质原本不错，多年的野战生活，也使我易于适应各方的水土，过了一个星期，面包吃完的时候，我基本能吃食堂饭菜了，只不过吃饼子的时候还得沾些砂糖。修堤以后，修整稻田的灌、排水渠，活不累，我可以适应了。

大约过了半个月，一个下雨天，没有出工，大队长张连荣来到班里，据说他原来是河北省领导的警卫员，后来到劳改部门工作，曾当过政工科长，所以人们习惯叫他张科长。他很年轻，中等个儿，方方正正的脸庞，大眼睛，显得精明而干练，对劳教人员不像一般管教干部那样态度生硬，说话总是笑嘻嘻的。他一进门就喊我的名字，说：“今天下雨不出工，有时间，你是文化人，琢磨个歌词，叫吴咸宁配上曲，编首歌教大家唱好不好。”

写新闻报道、写小说我都不外行，但歌词却从未写过，不过我读过诗——古代的、现代的都读过一些，诗和歌词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这种配合任务的作品在艺术上要求不高，领导亲自到班里提出要求，不好拒绝，我答应试一试。根据劳动教养所常讲的“劳动改造思想”的意思，思考了不长时间，写出了两段歌词，当然是政治化、概念化的东西，谈不上艺术性。大意是：劳动改造世界，劳动改造人的灵魂，用汗水洗去资产阶级思想，重做新人。具体的词记不得了。

张科长看过以后，连声称赞好，说：“不愧是学文学的，不到30分钟写出歌词，又上口，政治意义又很强。”他马上叫人找来吴咸宁。吴原是军委装备部的，中尉军衔，并不是搞音乐工作的，但却有作曲才能，用了不长时间就把曲子配好了，试唱了两遍，挺动听，也很易学。

这时雨逐渐小了，张科长吩咐通知就近几个班爱唱歌的人到三班前边集合，由吴咸宁教，大家跟着唱，先一句一句教，然后连起唱，学过五六遍，大家居然能唱了。然后，吴咸宁站在前边指挥，正式唱了三遍，这个歌就算学会了，张科长很高兴，对我说：“马上就要插秧了，再写个插秧的歌好不好，劳动当中唱唱歌会活跃大家的情绪。”我按着东北流行的十二月小调的路子写了一首插秧小调，分育秧、拔秧、运秧、插秧四段。吴咸宁也是按着十二月小调的旋律，略加改动，配上了曲子。

插秧小调词短、好记，曲调又是很多人熟悉的，只教了三四遍，大家就能唱了。

第二天通知我，管教股决定把我调到文艺组。

十一、文艺组的生活

这文艺组是劳动教养单位特有的组织。它的任务是在管教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对劳教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各单位的情况不同，开展宣传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也有所不同。大苏庄教养所这里，文艺组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每周出两期八开版的油印小报《劳教生活》；二是，写标语、画宣传画，大跃进时期这项任务很重，几乎教养所里所有能写能画的墙壁都写了画了；三是，开大会时替领导写讲话材料。教养所里经常开全体大会，某一项生产任务的开始或结束；某一学习内容或改造计划的开始或结束，甚至有的劳教人员家属来了，也要开全体大会，请家属讲外边大跃进的情况，每个月要开十几次大会，开会之前由管教股告诉大会的内容，文艺组的人起草讲话稿，到时候由某一位领导到大会念。这也许是劳教部门特有的改造思想的方法。

我调到文艺组的时候，组里已经有了三个人。组长叫夏昊，原是河北省作协机关刊物《蜜蜂》的评论组长，写了不少杂文，被打成右派。夏昊也是东北人，方脸扁头，满脸连鬓胡子，貌似粗鲁，却多才多艺，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能演话剧，据说曾当过河北话剧团的导演，声乐也有一定的修养，是个不错的男低音。他兼任劳动教养所文工团的导演。另外两个人，一个叫王小

初，原是河北省美协的，年岁较大，总有40岁了，据说和名画家齐白石颇有些渊源。另一个叫魏秉锡，原是纺织厂的一名技术工人，二十刚出头，人很聪明，不但蜡版字刻得漂亮，还能画几笔工笔画，小报上的题头、尾花都是由他画的。我到文艺组以后，几个人的分工大体是：夏昊负责编稿、划版；我负责到各队采访、写稿；魏秉锡负责刻版、油印。王小初的事情不多，主要负责在场（所）部和各队的墙壁上写标语、画壁画，开大会时写写会标，也到各队转转，但写稿不多。

当时插秧已经开始，我白天到各队了解插秧的进度、质量和一些典型材料，回来后整理成稿件，交给夏昊。晚饭后，管教股的冯股长常常在文艺组召集各队的班长汇报情况或布置插秧的管教任务。

大约是我到文艺组的第六天或第七天，晚间开班长会的时候，冯股长喊出白石的名字，问白石来了没有？一个声音答：来了。接着在班长们当中站起一个人来。我大吃一惊，刚才听冯股长喊白石，我以为是重名，人站起来以后才看清，原来真是联大文学系同学白石，他怎么也被送到这种地方来了！大概他也看见了坐在灯下作记录的我，两个人相视点了点头，谁也没有说话，直到散会，他出门的时候，我跟出去，两个人紧紧握手。我问他在那个队哪个班，他告诉了我，两个人就分开了。初到劳教单位，对这里很多规矩包括禁忌不了解，当着众人的面讲话多了可能引来麻烦。

我利用到队里采访的机会找到白石，才知道他被送劳动教养前前后后的情况。

白石原是保定师范学院的学生，在学校时入党，做地下工作。1946年组织暴露，为了保护他，党组织送他到华北联大学

习。他虽然只有十八九岁，但老成持重，学习上踏踏实实，对人谦虚诚恳，不论老师、同学对他印象都不错。文学系选举学生会的时候，我们俩都当选，他担任学习委员，我担任学生会主席。文学系毕业以后，我们两个又都留在文艺学院，在文学戏剧创作组作研究生，关系一直很好，1948年5月，我和徐光耀调到部队做新闻工作，他仍留在学校。保定解放以后，他调到保定，先做公安工作，后调到青年团河北省委。

反右时他在团省委当科长，分管《河北青年报》的工作。反右时《河北青年报》打出一个“反党集团”，说白石是这个“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具体罪状是他在青年报召开了一次反党会议。但开会的时候白石正在下边检查工作，根本不知道开会的事，白石当然不承认这个“罪行”。攻不动白石就攻他爱人。他爱人是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学生，开始也如实说，开会时白石不在保定。同单位的人也证实，当时白石正在下边检查工作，确实没有参加青年报的会议。但这不碍事，决定给你定罪，自有办法。以后的会议不再问白石是否“参加”会议，而是是否“知道”这次会议，而且发挥连续作战的作风，连续批斗了两天两夜。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女孩子怎么能经受住如此持续的猛烈攻击，她招架不住了，大约脑子也糊涂了，只好承认白石“知道”。于是白石成了《河北青年报》“反党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奇怪的是，最后定性为反党集团成员的只有白石一个人，他组织领导的只是他自己。白石这个人，平素为人处事非常谦和，但在关键时刻，在原则问题上，观点非常鲜明，立场非常坚定，他拒不在凭空捏造罪状的结论上签字。但结论是党组织作的，不签字就是和党对抗。罪上加罪，结果给了他右派中最重的处分——劳动教养。

我听了白石的情况以后，心情非常沉重，为什么我们都有这样的遭遇！我们两个都是联大艺术学院文学戏剧创作组出来的，创作组共有7个人，其他几个人的命运如何呢？根据现在了解的情况，徐光耀和李兴华也已被打成右派，加上我和白石，共有4个人成了右派，鲁煤则在反右以前就被划成了胡风分子，只有陈森和闻功两个人尚不知情况如何。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想当初文学系前后共有108个学生，号称一百单八将。毕业以后，学校从中选出7个成绩优秀有培养前途的“尖子”学生留在创作组作研究生，继续深造，结束研究生的学业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几个人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至今已经十多年。徐光耀从抗日战争算起已20年，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和工作的锻炼，每个人都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政治上逐渐成熟，年纪都在30岁左右，精力旺盛，正是一生中可以有所作为的黄金时期，可是这7个人已经有5个人莫名其妙地被定为敌我矛盾，失去了工作机会。

尽管思想上感到困惑，但对未来，我并未丧失信心。临来时，刘部长曾当面对我说，军区领导很关心你，下去锻炼一个时期，多则一年少则半年还回军区工作。

1958年上半年，大跃进的狂热还没有波及大苏庄劳教农场这个特殊的角落，农场里的一切生产还是正常的。

这个农场主要是种植水稻，送到这里的人大都是北方人，不熟悉水稻的生产技术，从育秧、插秧到平整土地、打浆、灌水、排水，都需要学。不过这些简单的技术不难掌握，劳教人员又绝大部分肯卖力气，生产进度很快，没有耽误农时。进入6月，广阔的稻田里一片葱绿，施过头遍肥的秧苗眼见地往上长，一天一个样。

这期间，农场的生活环境也逐渐宽松，先是留在农场的那部

分犯人撤走，大院当中的铁丝网拆掉，原来犯人住的房子一部分成了劳教人员的宿舍，一部分做了职工家属宿舍。劳教人员的住房不再拥挤了。不久，大门口的卫兵撤掉，农场里还保留一个班的武警部队，但单独住一个小院，平常和劳教人员不接触，这个班可能是为了应付意外情况吧。劳教人员在农场内的活动管得不那么严了。

文艺组的几个人算得上农场里的“特殊人”，虽然也是劳教人员，但没有劳动任务，而且行动上不受限制，可以在任何时间到任何单位去采访去了解情况。文艺组是管教部门直接管理的单位，和管教干部接触多，而劳教人员的命运很大部分决定于管教部门，所以劳教人员大多愿意接近文艺组的人，劳动好或做了好事的人愿意接近文艺组的人，希望能写篇稿表扬他；一般的人，可能希望文艺组的人能在管教干部面前说他几句好话，也愿意接近文艺组的人。就是各队队长对文艺组的人也比较和气，希望文艺组能多报道他那个队的好人好事，这说明他的工作成绩，于他脸上有光。

文艺组的主要任务是每周出两期《劳教生活》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每期不过五六千字，对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来说，这个任务是比较轻松的。所以文艺组的人工作之余可以抽出不少时间看书，还可以利用能自由活动的便利条件设法改善生活。

这个农场濒临北大港，是新开发的农业区，自然环境的特点是水多、芦苇多、鱼多、蟹多。稻田的引水渠、排水渠里有鱼；修渠、修路的取土坑里也有鱼，而且很多，主要是鲫鱼，也有鲤鱼、黑鱼和梭鱼。逢上酷热天气，特别是中午燥热时分，大批的梭鱼，嘴露出水面，从大港顺水进入引水渠，遇上涵洞阻挡，梭鱼从水里跃起几米高，企图跃过涵洞。这时农场有经验的老职

工，手持长杆网兜，站在涵洞上边，一会儿工夫，就能接到几十条跃起的大梭鱼。

老职工捕鱼改善生活的做法启示了我们。伙房的菜少，油、肉更少，一周最多能见一次肉，文艺组的几个人商量，利用下队采访的机会，捉些鱼，补充“动物蛋白”。下队采访的主要是我，文艺组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自小喜欢玩水捉鱼，对水里摸鱼有些经验，就“慨然”接受了这项任务。我有好几套旧军装，从一件上衣上扯下一只袖子，缝了个布袋。下队采访的时候，回来的路上找个鱼多、水浅的水坑或渠道，摸上半个多小时，丢掉小的，只留一二两重的大些的，就能装满布袋。有时也到离场部较远、靠近北大港的六队，和扬水站的职工借个长杆网兜，站在涵洞上边接跃起的梭鱼。拿回文艺组以后，做鱼的任务归魏秉锡，魏秉锡是个“多面手”，做吃的很麻利，他用剪子刮鳞、开膛、去头、洗净，然后把鱼码到我那个大脸盆里，每回差不多都有一脸盆，做鱼的调料也很方便，酱油厂就在大院里边。文艺组有一把瓷壶、一个暖瓶，到酱油厂灌一壶醋一暖瓶酱油，倒进鱼盆里。白天各队都出工，大院里没几个人，我们在窗前摆三块砖头，座上鱼盆，拿出备好的干树枝和苇子，半个多钟头鱼就烧好了，因为醋多，烧出的鱼刺都是酥的。有一天中午，我们正在烧鱼，管教股的冯股长来了。

冯股长是分管文艺组的。别人出工，我们烧鱼吃，不说教养所纪律，对其他人的影响也不好。魏秉锡嘴巧，编话说：“上午三队有两条毛渠放水晒田，毛渠的水放干了，看水员在渠里捉到不少鱼，自己没法做，就送给老徐了。”冯股长乐了，说：“我知道你们弄鱼吃。只要不耽误工作，弄些鱼吃补充营养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十一、文艺组的生活

冯股长叫冯德新，年岁和我们差不多，30左右，矮胖子，天津口音，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劳改部门工作，文化水平不算高，他自己说是初中毕业，但思想很有条理，《劳教生活》的稿件都是由他审查签发的。他差不多每天都到文艺组来，文艺组的人有时在工作上也出差错，但他从未发过脾气，就是批评，也是以理服人，从不疾言厉色，空闲的时候喜欢和组里的人下象棋，不过棋艺不高，我这个刚学下棋的生手还赢过他好几盘。

十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中

到了1958年七八月份，大跃进的狂风终于吹进了农场，农业生产不断出现违反科学、违反农业常识的荒唐事。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个是放萝卜白菜卫星。我到五队——专种蔬菜的队采访，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种萝卜、白菜的菜地，有几个畦，每畦只挖了1个大坑，人们正在往大坑里倒人尿粪、马粪，又拌上化肥，然后在上边盖上一层土。我很奇怪，问这是干什么。干活的人说：“放卫星。每畦只种1棵菜，每个萝卜、每棵白菜都要过千斤。”

我出生在农村，上中学的时候学的是农科，懂得一些农业知识，任何一种农作物的单产都是有极限的，怎么可能有千斤以上的萝卜或白菜？五队这些种菜的都是右派，是有文化知识的，怎么能干这种荒唐事？我就问他们：“你们不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吗？”有人碰碰我，小声地说：“队长布置任务的时候我们提出意见了，可是受到严厉的批评，说我们右派分子本质不改，反对大跃进。”

结果是，下种、灌水以后，真的长出了萝卜白菜小苗，但没有几天地下的粪尿和化肥发热，把菜苗全烧死了，不但没有放萝

卜白菜卫星，连萝卜白菜苗也没有保住，好几亩地的“卫星田”全部荒废了。

一个是立秋以后直播水稻。这个农场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种的主要品种是“银坊”和“水源”，生长期都需要125天左右，所以清明就开始育秧，小满或芒种时节插秧，到夏至插秧就晚了。当时节气已过立秋，可是场里却布置搞水稻直播，就是不经过育秧，把稻种直接播到灌过水的田里。它的收获期当然要比插秧的水稻延缓很多，按生长期计算，收获该是第二年的1月份。这不是明显的荒唐之举吗？稻苗出水以后，场领导就命劳教人员用板车把场里最优质的化肥一麻袋一麻袋地从仓库里拉出来，组织几十个人端着脸盆大把大把地往直播稻田撒尿素，已经比正常用量多出几倍了，还是命令继续撒，要“以肥催长”。当时场里有个刑满就业的技术员叫孟晓梦，此人曾留学日本，学的是水稻专业，刑满以后留在农场搞水稻的技术指导。孟晓梦做事认真，甚至于固执。当初搞水稻直播的时候他就曾提出意见，说节气太晚了，场领导批评他思想顽固，他那个刑满就业的身份，当然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可是他非常心疼浪费的那些良种，现在往根本没有收获希望的直播稻田里撒大量的化肥，这个浪费比良种的浪费还大，而且大得多。他急了，在田埂上跑来跑去地喊：“别撒了，现在撒化肥是白白地浪费。”施肥的劳教人员不敢不执行场领导布置的任务，不听照撒。孟晓梦急了，跪到场领导面前说：“求您说句话，留下这些化肥吧，这都是进口的尿素，是最好的化肥，留到明年用，可以增产很多粮食；今年用，节气太晚了，只能催秧，不可能有收成。我搞了大半辈子水稻，请您相信我的意见吧。”场领导大怒，申斥孟晓梦说：“说你顽固，你真是顽固到底，处处和政府对抗。”当场宣布撤了他技术员的职。他

反对施化肥，就叫他端起盆和劳教人员一起往田里撒化肥。

大量化肥施下去以后，秧苗疯长，不多几天就蹿起一尺多高。场部在那里开过两次现场会，用疯长的稻苗证明孟晓梦的错误，说明只要破除迷信、大胆创新，并采取有力的措施，农业生产的一般规律是可以打破的。

可是到了秋后，却验证了孟晓梦的意见，除了稻草，一颗稻谷也没收到。

另一个，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放水稻高产卫星。正在全场忙于秋收准备的时候，场部发出动员令，号召全场奋战，放一颗亩产水稻6万斤的高产卫星。此时，报纸上几乎天天有各地放高产卫星的消息，而且卫星越放越大，从亩产5千斤、7千斤、1万斤，上升到2万斤、3万斤、5万斤，有的地方已经放出亩产水稻12万斤的特大卫星。

农场这里，几次“卫星试验”都失败了。在大跃进的高潮中，这当然脸上无光，于是经过周密计算、采取可靠的方法，决定放一颗亩产6万斤的中等卫星。做法是，选一亩最好的地，调集各队精兵强将，把这一亩地深挖一米，做成丰产坑，然后在坑里一层马粪一层化肥地往上填，最后在上边覆上一层熟土，在土上植稻，叫做“卫星田”。

在造“卫星田”的同时，从各队抽出的另一批精兵强将负责移水稻：在选定的长得最好、已经蜡黄。即将成熟的稻田里，整蔸的水稻从稻田里挖出来，不能伤根；一部分人择稻棵，把穗小的择出来，只留穗大杆壮的单株，不能伤杆伤叶伤穗。另有120个壮劳力抬着柳条筐用最快的速度把择出的稻棵运到“卫星田”。“卫星田”那里有20多个好手，把即将成熟的稻子一棵挨一棵地“挤”到“卫星田”里。移稻的进度很快，可是“挤”稻这边却

遇到了麻烦，丰产坑里填的马粪和化肥都是容易发热的东西，两者合到一起，将近一米厚，温度很高，“挤”稻的人一下去就烫得受不了，只好从场部取来十几条皮裤（打鱼穿的胶皮裤），“挤”稻的人穿上皮裤分成两批轮流下去，每批下去也只能坚持五六分钟。现场有一个姓徐的技术员（是技校毕业刚到场里来的），皱着眉头说：“田里温度这么高，作物根本不能成活。”自从孟晓梦被撤职以后，没有人敢对大跃进中的一些做法提意见，可能因为姓徐的技术员是国家干部，场领导没有当着劳教人员的面批判他，但也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一亩“卫星田”终于用即将成熟的大量的稻棵挤满了。可站在田边，田里的热气蒸腾，把手伸进稻子里，烫手。大概场领导也觉得情况不妙，马上调来12台吹风机，安在“卫星田”四周向田里吹风。可是稻子挤得吹不进风。场领导又下令在田四边打桩子，在相对的两根桩子之间穿过稻田拉铅丝，两根铅丝向相反的方向拉，在密挤的稻子当中拉出一条缝，然后两台吹风机相对向缝里吹风。效果仍不大，因为缝太窄，解决不了大面积的问题。场领导又下令用基建用的长竿围“卫星田”搭高架，在“卫星田”上边挂起几十片“雨档”（挂在窗上挡雨用），“雨档”的下角穿上铅丝，几十个人拉着铅丝，用“雨档”从上边给“卫星田”扇风。折腾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卫星田”上边仍然热气蒸腾，稻子已经焦了，颗粒无收。直到第二年这块地还是不能种庄稼。

这次造“卫星田”移植的这片水稻是全场长得最好的，有近百亩，估产每亩可产800斤至1000斤，总产近10万斤，场领导可能就是根据这片水稻的面积和产量拟订“卫星”计划的。将近10万斤产量的水稻择优去劣，挤到一亩地里，水稻已经蜡黄，

移过去后即使略有减产，总可以收获六七万斤。但这种“计划”缺乏起码的生产知识，“卫星田”下边是二尺多厚的马粪和化肥，发酵以后温度可达七八十度，上边的水稻怎么可能成活？即将成熟的水稻很难生出新的根系，移栽以后即使勉强活了，颗粒也不会饱满，何况丢掉大量穗小的稻子，减产是必然的。所以，即使“卫星田”搞成了，结果也是卫星上天产量下降。事实是卫星没有上天，白白损失十来万斤稻谷，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文艺组的工作也很紧张，主要任务是在场部和各队的墙壁上写标语画壁画，主力是王小初。标语的字很大，由王小初画出字框，我们几个在框里刷浆，壁画则主要由王小初画，有时魏秉锡打打下手，我的任务是提浆桶。此外，《劳教生活》还多次出专号，报道粮食高产和大炼钢铁的喜讯。

到了1959年，大跃进持续升温，人民公社化的势头也很迅猛。教养所为了使劳教人员亲眼看到外面的大好形势，多次组织外出参观，有几次参观至今记忆犹新。

一次是参观公社社员深翻土地的大兵团作战。滨海地区村庄稀疏，不像京、津地区和冀中那样人口密集。但这支深翻土地大军竟然有五六百人之多，而且有营、连、排、班的编制。我们去的时候，各连正在进行“拔河”比赛。据介绍，现在是休息时间，开展体育活动。一百多个社员分成两队，各执大绳的一头，连长站在当中，吹哨子发令，两队各有一个挥小旗的呼喊加油，旁边围观的也呐喊助威，呼声震天，煞是热烈。

“拔河”结束以后，社员们休息了一会，开始了深翻土地的战斗，仍然是以连为单位，各包一片，互相比赛。各连的社员们排成齐刷刷的横队，齐头并进，个个汗流如雨，挥锹猛挖，挖下一锹以后，向下再挖一锹，挖出第二锹，再挖第三锹，三锹的深

度总有二尺多。当时就有人小声地说：“这种深挖不是破坏土地吗，把下边含盐的土挖到上边来，这地还能长庄稼吗？”

其实这本是常识，海滨地区土地含盐量高，主要是种水田，靠淡水洗盐、压盐，如果种旱田必须采取两种办法，一个是填高，就是把要种的田填高二三尺，老乡们叫修台田，在台田四周筑埝，雨水下到田里流不出去，就可以向下压盐，经过几年，上边的土层含盐低，就可以种庄稼了。另一个是挖沟，就是田的四周挖排水沟，沟上的田也要四周筑埝，雨水降到田里往下压盐，田里渗出的含盐的水顺排水沟排出去，天长日久，上边土层含盐就低了。两种方法是一个道理，就是降低土壤的含盐量。这里的农民特别是年纪大的农民，在这里种了几十年的地不会不知道这里种地的起码知识，为什么他们要举着红旗，喊着口号，亲手毁掉赖以生存的田地呢？

一次是参观扩大种植面积、创小麦高产的典型。这个典型更是令我们这些参观者惊愕不已。只见原来平整的麦田变成了一座座的土堆，土堆高约一米，有的达到一米五。介绍者说：“平地改成土堆，在土堆坡上种麦，种麦的面积可以比平地扩大五倍以上，如果加强管理，小麦亩产可达五六千斤，比过去产量提高七八倍。”这个数字显然是有意地夸大了，这里小麦亩产四百斤就是大丰收，按大丰收产量提高七八倍，也不过三千斤左右。在我们参观的时候，土堆坡上真的长出了一行行一寸多高的麦苗。但这些麦苗在我们参观后的一个多月全部枯死了。当地农民说出了其中原因：在田里做土堆的时候，用的不光是表层的熟土，还混有大量含盐量很高的下层生土。头年秋后种麦的时候正是枯水期，水位下降，土里含的盐随水往下走，表层的含盐量不是很大，所以种下的麦子能出苗，可是开春以后下过两场雨，土堆坡

留不住水，全流到土堆底下，底下的水浸着土堆，春天阳气上升，土里含的盐随水分蒸发到表层，很多土堆表面结成白花花的盐皮，麦苗哪能不死？

据说当初多数社员不同意这种异想天开的“扩大种植面积”的做法，可是公社统一布置，大跃进是政治任务，社员不敢不干。

还有一次是参观公社办的农机修配厂和社员的公共食堂。这已是1959年的秋天了，自从人民公社化以来，报纸上有大量的报道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公共食堂的优越性，以及人民公社大办工业，消灭工农差别，等等。这些都是农村的新气象，能亲眼看一看，当然是令人兴奋的事。

接待我们参观的是公社的一位副主任，已在公社门口等我们。据说，为了不耽误参观的时间，不进公社办公室，直接领我们去农机修配厂。道上，这位副主任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这个公社有多少耕地、多少人口、多少壮劳力，他们计划购进几台拖拉机、几台收割机、几台脱粒机、几辆汽车、几辆三轮运输车，所有这些农机和机动车辆的维修工作都由即将参观的农机修理厂负责。他们还计划明年在农机修配厂的基础上，建一个农机制造厂，先造小型的胶轮拖拉机和三轮运输车，再造大型的履带拖拉机和大型的货车与客车，做到自己造农机，自己修农机，社员的笨重体力劳动全部由机器完成，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描绘的前景十分诱人。

可是一进农机修配厂的院子大家全糊涂了，难道这就是农机修配厂？

这是一个破旧的大院落。看样子原来是生产队的库房，有十

来间已经腾空的泥墙、茅草顶的旧房子，有的里边丢着破化肥袋子，有的地上有没扫净的玉米。靠大门口是破得上顶露天的牲口棚，牲口棚前边有一个旧汽车头，还有一辆破旧三轮拖车。

副主任站到旧汽车头的旁边，眉飞色舞地说：“这个汽车头改造一下就是农机修配厂的发电机。”又指着里边那些旧房子介绍，哪一间是安车床的，哪一间是安锻工设备的，哪一间是车体维修的，等等。

我心里非常惊讶，这位副主任把并不存在的农机修配厂介绍得如此具体、生动，而且敢于在这里接待参观，当着众人的面说得如此大胆而自然，这种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副主任大概看出大家对这个所谓农机修配厂和他的介绍不感兴趣，哈哈一笑，说：“现在设备还没来，没多少可看的，半个月后你们再来，这里可就是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了。”

接下来是就近参观一个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当时11点刚过，还不到农村吃午饭的时间，但一进农机修配厂后边的那道街，就见一个大院门口沿街坐着几十个社员，主要是老人、孩子，还有十来个妇女，大约壮劳力下田劳动去了，这是留在家里的社员，每人捧着一只大碗，碗上一张红枣贴面的白面蒸饼，枣饼大约四五两重，碗里的菜是熬白菜。这显然是摆样子给人看的，因为还不到吃午饭的时间，而且几十个人捧着菜碗和蒸饼却没有一个吃的，有的孩子可能等急了，用手指拨饼面上的红枣，旁边的大人马上打开孩子的手，显然是不准孩子吃。

副主任似乎对路旁社员们很不熟练的集体吃饭“展览”并不经意，没和任何人说话，一边走一边只管向我们介绍公共食堂的优越性，他说，有了公共食堂，可以把各家各户的妇女从灶房解放出来，增加工农生产的劳动力。妇女只有参加生产劳动才能真

正实现男女平等。另外，有了公共食堂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改善社员的生活。这里不出产小麦，社员常年口粮是玉米，公社就从附近的产麦区换来一些白面，调剂主食的品种。另外公社还请在城市饭馆当过厨师的人到公共食堂做菜，公社提出“公共食堂饭馆化”，社员们不光吃大锅饭、大锅菜，逢年过节或来了亲朋好友，还可吃炒菜，食堂里有鱼有肉，花样品种很多，保证社员们吃饱吃好。

说话工夫，副主任领着大家走进靠东头的一个院落。正房三间，是公共食堂。靠西的两间是做饭做菜的灶间，灶台是洋灰抹的，大约刚建不久，没有油渍，很干净，对面案板上边挂着两条肉，总共不过三四斤，案板下边的水桶里还有活鱼，大多是一二斤重的草鱼，三个炊事员都结着围裙，一个炊事员正在案板上切土豆片；灶间东边的一间房里摆着两张方桌，两个炊事员正在方桌上择芹菜。看样子这个饭馆化的食堂并不是社员们公用的大食堂。眼见晌午了，没有给社员做午饭，准备的那些菜显然不是给社员吃的，而且灶间的锅若是给百十个社员做饭那就太小了。

有人问：“饭菜还没有做好，为什么街上那些社员先吃上了？为什么不在食堂的院子里吃？却到街上吃？”

副主任一笑，说：“他们那里是另外一个食堂。”

“他们那里”的食堂没有领我们去看，我们看到的是并非社员们公共食堂的饭馆化的食堂。

几次组织参观是为了用活生生的大好形势鼓舞劳教人员改造的信心，然而参观的结果却在人们的心里打上了很多问号，宣传的情况和人们亲眼看到的实际差别太大了。

1959年的下半年，报纸上、广播里工农业生产持续大跃进，农业的高产喜讯频传，但农场里劳教人员的主食却开始加入代用

食物，主要是黄蓍。这是滨海地区特有的一种植物，能在含盐较高的土壤里生长，类似蒿子，其籽粒含油，可食用。农场将其籽粒及部分细茎秆烘干，粉碎，过筛成面，加入农场的主食——大米面里，蒸饼子吃。还试制稻草面，将稻草切成段，烘干后，粉碎、过筛成面后加入主食里。但人们吃了大便干燥，而且医务人员说稻草面没有什么营养，以后就只做饲料，不做人的主食了。

到了1960年，粮食供应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社会上风行“瓜菜代”，以瓜菜代粮食。农场这里是盐碱地，瓜菜生产不多，便在代用主食上做文章。医务所有个医生（医大毕业以后曾长期从事医务工作的劳教人员）提出，稻谷加工后的三个部分：大米、稻糠、稻壳，其中稻壳的营养最丰富，建议把过去丢弃的稻壳利用起来，制成稻壳粉，代替大米面，既可节约大米又能增加营养。场领导十分高兴地采纳了这项建议，在全场大搞稻壳粉。结果，不但没有给食用者增加营养，反而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甚至于灾难。

人们吃了稻壳粉以后，普遍大便干燥，很多人解不出大便。但提议的医生认为，并非稻壳粉的问题，应该多喝水，多喝汤，增加体内水的供给，可是并无效果。初春时节，每天都有不少人，多时几十人光屁股躺在向阳的墙根下，因为没有排大便的药、械，医务所的人还找些帮忙的，用手指往外抠大便。痛苦的呻吟声夹杂着骂声，解不下大便的人骂提建议的医生提出缺德的建议，如果稻壳比大米营养还高，为什么你家里不吃稻壳吃大米？

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副食又差，劳教人员中浮肿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由浮肿转干瘦，骨瘦如柴，凡是浮肿、干瘦的人都特别贪吃，解不下大便也要吃。在伙房打饭的时候，时常见到，有

的人身子一栽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死掉了。在饥荒严重时期，农场一共饿死多少人不知道，因为八个队分在四个地方住，哪个队死了多少人从来不公布，只听基建队木工组的人说，有一阵子他们钉棺材供不上死人用。农场有个规定，劳教人员死了，给一口薄木板的棺材，这种棺材算上两头共有六块木板，拢起来用钉子一钉就成了，一天至少可以钉出十几口。木工组钉棺材供不上用，说明死人是不少的。

这期间文艺组没有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一是我们不参加重体力劳动，而粮食供应和重体力劳动者一样；二是我们经常能弄到一些鱼吃，过去我们开玩笑把弄鱼吃叫“补充动物蛋白”，在饥荒时期，这些“动物蛋白”在抵抗死神时真起了大作用。

十三、右派分子当了人民教师

1960年8月，政工科郭股长找我谈话，调我到农场子弟学校作教师组长。

农场子弟学校紧靠引水干渠，在农场最东头，一个独门小院。原有二十来个学生，多数是干部子女，也有几个劳改队留下来的就业职工的子女，都是小学生，只有一个老师，复式教学，一个人教六个年级，教学质量当然难以保证，家长们不满意。现在学生增加到三十多个，有的小学生即将毕业，要上初中；大苏庄社员的孩子有十个即将小学毕业，要求来农场上初中。场部决定子弟学校增设初中班。农场劳教人员能当教师的人才多的是，政工科从中选了4个人，还调来一个干部家属，加上原来那个教师，共6个人，组成教师组，以我为组长，负责子弟学校全面工作。

这件事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说：“我还戴着右派帽子，怎么能当人民教师？更不能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再说我从来没当过教师，教不好学生。”

郭股长年岁较大，头发已经花白，据说他从前就是小学教师，后来调到劳改部门做政治工作。人很和气，和人说话还保持老教师那种循循善诱的风度。他说：“你不要有顾虑，调你到学校，场里经过多次研究，看了你的档案，也了解你两年多来的表

现。张科长和冯股长赞成，有的孩子家长也赞成。管文工团那个高队长，常去文艺组，了解你，他说你文化高，为人诚实正派，叫你去教孩子们他放心，他的孩子在小学三年级。挑明了说，教师组长就是校长，根据你们的情况，不能任命你当校长，所以叫教师组长，责任是一样的，只要对教学对学校工作有利，你就大胆地去做，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找我。”

我无法再推辞，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务，马上把行李搬到了学校。除那位干部家属外，调入的另外三个人也在我之后把行李搬到了学校。当天下午就召开了教师组会议，明确了分工。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实行带班和分科教学相结合的办法，每个教师都担任一至两个年级的班主任，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班实行分科教学。我担任初中班的班主任，教初中班的语文和政治，并负责教育行政工作。

我教政治课是政工科决定的，我曾向郭股长提出意见，由右派给学生讲政治课不合适，怕影响不好。

郭股长还是那句话：“领导相信你，难道你不相信自己。叫你讲，你就大胆地讲，不要有顾虑。”

不管怎么说，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可能是我政治生命的一个转机，心里还是高兴的。

我到校的时候，初中班还没有开课，我主要是准备教材，抽出一定时间到各班轮流听课。我没有教过书，而另外几个人过去都是中小学教师，我想取点经，听听他们是怎样讲课的。另外，我想看看各班的课堂秩序。这里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女，他（她）们是否对劳教的老师有一种政治优越感，不尊重老师，不守课堂纪律？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我担心的情况，可能因为几个老师都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课讲得好，孩子们都听得很专心，

对老师也很尊重。

我开始上课以后，语文课并不感到吃力，政治课却比较麻烦，没有课本，只能自己编写教材，我选定两个主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红与专的关系。根据学生的理解水平，我讲课的时候，少讲理论，多讲事实，用活生生的典型事例说明要讲的主题思想。我的生活经历给讲课提供了有用的材料。从土地改革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参加革命前一个旧社会的大学生怎样在革命理论的启迪下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我用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很多事例说明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什么叫红什么叫专，红与专不能偏废，必须在红的基础上致力于专，学好某种业务，才能更好地为革命服务。

孩子都爱听故事，通过讲故事说明某种理论，孩子们容易接受。我讲的政治课，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效果不错。

此外，还发挥宁野和王文泉老师的文体专长，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们排练了几个歌舞和说唱小节目，文工团给全场演出的时候，安排学生们也登台演出。当家长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台上表演的时候，高兴极了，学生们也很开心。

总的来说，学校的课堂教学和业余的文体活动都搞得比较好，得到了领导和学生家长的认可。但几个老师的吃饭问题却出现了危机。调来学校以前，我们几个人的粮食定量都是45斤，来到学校以后，据说是按全国教师的统一定量，改为26斤。但和社会上不同的是，农场这26斤定量并非成品粮，而是毛粮。农场这里供应的主要是自产的稻谷，稻谷的出米率为75%，最多不超过80%，26斤稻谷合净粮不到20斤。代食品稻壳粉可能因副作用太大，已停止食用，黄蓍粉数量有限，一个人一个月20斤大米，每天不到7两，三顿饭，每顿饭喝稀粥不过一碗；

吃蒸饼只有一个。我们几个整天地肚子空得难受，到了晚上饥肠辘辘难以入睡。我们开始都咬牙坚持上课，不久几个人相继浮肿，我肿得睁眼都困难。讲课的时候，头上直冒虚汗，腿发软，手不扶讲桌就站不住。我的体质并不差，虚弱到如此程度，别人也好不了多少。我当即和几个人商量，以后上课的时候一律坐着讲课，免得跌倒影响不好。

可是坐着讲课并不能解决营养不足的根本问题。农场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我们几个的浮肿，有的已经很严重，如果发展到干瘦，就离死不远了。下课以后，那位干部家属老师走了，我把几个劳教人员的老师找到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增加粮食定量是不可能的，只能设法寻些代食品，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捋稗籽。稗子是稻田里的一种杂草，生命力特别强，每季稻田里至少要除三次草，但稗子总是除不净，只要留下几小棵，很快就发展成一大片，所以稻田里稗子很多，而且稗子成熟期比稻谷早，眼下稗子已经成熟了，用稗籽磨面、烙饼、包馅，筋性比白面还要好。山东和东北有些农村利用新开的荒地专门种稗子磨面吃。学校的附近都是稻田，我提议，利用中午和下午放学后的课余时间到稻田捋稗籽。初中班和小学五六年级是分科教学，有的老师半天没有课，没有课的人也可以出去捋稗籽。

几个人都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可是又都有顾虑，说：“我们都没有解除劳教，不能自由行动。不像文艺组，文艺组可以自由行动，是经领导批准的。如果我们不请示领导就离校去捋稗籽，追查起来怎么办？”其实，这件事我早已考虑过了，我说：“如果领导查问，责任由我承担。我们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我们的身体状况已经难以正常教学，再发展下去，恐怕连命都保不住。其实我们的情况领导都知道，但没办法解决。我们自己想办法，

只要不耽误正常教学，领导会体谅。万一有人责怪，你们就说这事是我决定的，我去向领导说明情况。”

我是场领导决定的负责人，有我承担责任大家就没有顾虑了。饿肚子的滋味大家都有亲身体会，有条件出去弄吃的谁不积极？

捋稗籽的事进展很顺利。稻田的管理人员（农场叫看水员）都是劳教人员，这些人大部分是搭窝棚住在稻田边，他们都有办法弄到吃的，没有浮肿的，见学校的几个人肿成这副模样，都很同情，不但允许下稻田捋稗籽，还帮助捋，不多几天就积了两麻袋（麻袋是从粮库借来的）。我们托大苏庄的学生分批把稗籽带回家里帮助加工。学生对老师托付的事非常积极、尽心。当时稗籽还不太干，学生家里就用铁锅炒干，然后上磨、过筛，做成稗籽粉。我们用新稗籽粉烙的饼特别香。

在几个老师当中，宁野身体最壮，做事也利索，我们两个还轮流出去捉过几次鱼。

肚子吃饱了，除一个叫庞冷芳的年岁较大的女老师以外，几个人都消除了浮肿，身体逐渐康复了。

好事情常常要伴随一点麻烦。

一天，刚刚上完最后一节课，邻村——大苏庄小学的马校长和一位姓常的女教师来了。

农场子弟学校归太平桥人民公社教委管，公社教委规定，在行政上农场子弟学校隶属于大苏庄小学，公社教委的指示由大苏庄小学向农场子弟学校传达，农场子弟学校向上的请示、报告由大苏庄小学向公社教委转报。这当然和农场子弟学校教师的政治身份有关，否则，农场这里是戴帽（附初中班）完小，怎么会隶属普通小学？实际上两个学校互不联系，大苏庄小学从未向我们

传达过公社教委的指示，我们也从未请大苏庄小学转呈过什么报告，农场子弟学校的事情请示过场领导自己就办了。

今天，素无联系的大苏庄小学的马校长带着一个女教师来干什么呢？

马校长年岁较大，总有40多岁，四方脸，中等个头，右腿有点瘸，人显得憨厚、朴实。姓常的女教师又矮又胖，引人注目的是两只眼睛，和她的肚皮一样又大又圆，滴溜溜地打转，嘴皮很薄，一看就知是伶牙俐齿很厉害的女人。

我们把两个人让进办公室以后，马校长说道：“咱们两个学校本来是一家，应该常过来看看，可是学校教师少，有两个老师因为浮肿不能上课，坚持工作的人任务更重，抽不出时间一直没有过来。听村子里在这边上学的几个学生说，这边老师课讲得好，今天我和常老师特地抽点时间过来取经，请你们介绍教学的经验。”

听马校长的语气，看两个人的神态，这不过是几句开场的客套话，不知道真实的目的是什么。我也就回应了几句客套话，说：“这里的几个老师虽然过去都教过几年书，但到子弟学校讲课不过几个月，刚刚适应新的环境，还谈不出什么经验。至于我，过去从未教过书，我是一边给学生上课，一边向其他老师学习，更没有什么经验可谈了。”校长诚恳地说：“我们不是客套，大苏庄的几个学生确实反映你们的教学质量高，特别是徐老师，学生都爱听你的课，说徐老师的水平教高中都有余。”

矮胖的常老师快速地接过话说：“讲课好是优点，但不能走白专道路，你们要加强思想改造。”

这两句话非常刺耳，农场的几个老师脸色全变了。我很不客气地说：“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从未放松思想改造，

不知你们两位来有什么指教？”马校长连忙说：“别误会，千万别误会。我们来，确实想听听你们的教学经验，另外，想请你们给点帮助，解决那边老师的困难。”常老师满脸堆笑，说：“徐老师，刚才那两句话你可别介意，那不是我的话，是教委俞主任叫我转告他的希望，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加强政治学习，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民教师。听大苏庄的几个学生说你们这里教学搞得好，课余生产搞的也好，捋了很多稗籽，有好几麻袋，马校长想向你们借一点，给大苏庄的老师们解决点困难。村子里没有农场的条件，实在困难。”

原来如此。借稗籽才是来此的目的，但凭借自己的“政治优势”先打一下，然后伸手要东西，这种方法也太笨拙了。我略想了一下，不能借。我们出去捋稗籽，没有经领导批准，如果宣扬出去，我们捋的稗籽自己吃不了，还送给大苏庄小学，以我们几个特殊身份，有可能遭来严重的后果。而且，像常老师这种惯于使用“政治优势”的人，一旦翻脸，更可能遭到不可预测的后果。

我客客气气地说：“我们几个人的情况，马校长和常老师都知道，我们不能离校自由活动，那些稗籽是农场的看水员们捋的，没办法处理，求我们转托大苏庄的学生给磨成面，拿回来以后，分给我们一部分。稗籽不是我们的，所以无法帮助你们。”

常老师满脸的不高兴，马校长则是一副无奈的样子，走了。

我们捋稗籽、磨稗籽粉的事到底被政工科知道了。一天，我到政工科汇报学生支援秋收的情况，郭股长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听说你们不务正业，捋了两麻袋稗籽，还磨面烙饼吃，有这回事吧？我坦率地说：“有。”就把几个教员浮肿不能正常讲课，利用课余时间捋稗籽，求大苏庄学生磨面等情况如实作了汇报。我说：“我们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我们错了要处分就处分

我一个人，这事是我决定的。”

郭股长严肃地说，你们这样做替我解决了一个难题，怎么会处分你。郭股长知道我们定量低吃不饱，很着急，但没有解决办法，后来听孩子们说几个老师浮肿，有的肿得讲课站不住，得坐着讲，他心里更急。现在我们自己想出办法，利用课余时间弄点吃的，身体逐渐康复了，能保证正常教学，郭股长也就放心了。郭股长最后说，如果有人问起这件事，就说是经他同意的。

郭股长对子弟学校的工作始终很关注、很支持，即使有些事情我们做得不对，他也从不疾言厉色地申斥、责备，而是循循善诱地开导我们，说服我们。我到子弟学校几个月了，还没有挨过郭股长的批评。可是此后不久的一件事，郭股长着实把我批评了一顿。

那是十月下旬，大苏庄小学的马校长通知我和他一起到公社教委开会，是部署在教师当中开展“插红旗拔白旗”竞赛活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要填一张表，表上有一栏是“政治面目”。我该怎么填？填右派，一个学校的负责人是右派总不大好，可是不填右派填什么？我估计，大苏庄小学的马校长肯定知道真情，从那天晚上大苏庄常老师说的那几句刺耳的话判断，教委的俞主任一定也知道，既然如此，还是照实填写为好，我就填上“右派”两个字。表交上去以后，反应正常。教委的俞主任还个别和我谈了一会儿，说了不少客气的话，表扬农场子弟学校教学工作搞得好，征求我对公社教委工作的意见，还叫我谈谈在教师当中开展“插红旗拔白旗”竞赛活动的计划等等，散会时，俞主任还过来和我握手，希望以后和教委经常联系。回来的道上，大苏庄小学的马校长说：“这回你明白了吧，俞主任对农场子弟学校的工作很重视。”

不料，回到学校一杯水还没喝完，郭股长就派人来找我。

郭股长皱着眉头问我：“填表时，‘政治面目’那一栏你是怎么填的？”我说：“填的右派，我也觉得不大好，可是不填右派填什么？”郭股长说：“填‘群众’啊！”我说：“可是我还没有摘掉帽子。”郭股长生气地说：“你怎么不会灵活一点？右派是作内部矛盾处理，还有公民权，填‘群众’不是合情合理吗！”

我一想，可也是，填“群众”并未违反政策，对工作有利多了。真是不能头脑太简单，否则往往后果不好。郭股长叹了口气，说：“算了，这件事不能全怪你，我也有责任，去开会以前没有向你交代清楚。以后你只管教你的书，有些情况我向公社教委解释一下。”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到了12月底，管教股通知我参加右派集训班学习。冯股长向我交底说，参加集训的这些人都是准备摘掉帽子并解除劳教的。摘帽以前集中学习一个月。集训班设办公室，他说由我负责，任务是组织各组学习，了解学习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及时向领导汇报。

集训班的学习材料主要是中央关于右派问题的有关文件和1957年反右时中央各报刊的社论及评论文章，先是自己阅读，然后集体讨论，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写出思想改造总结。管教部门根据个人的总结，评价对所犯错误是否有了正确认识，结合几年来的实际表现，决定是否摘掉帽子。而实际上摘帽名单已经确定，集训不过是进一步促进思想改造的方法。

集训队结束后，召开了全场大会，宣布了摘掉右派帽子并解除劳动教养的名单，还有几个人只解除劳动教养不摘帽子，也在会上宣布了名单。我是属于前者。

十四、慈母的眼泪

这时子弟学校已经放寒假，我想在学校放假期间请假探亲。

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家里迫于生计，天南地北分散到好几处。我爱人原在湘乡县教育局工作，因为和右派丈夫划不清界限，被开除团籍，下放到农村当小学教员，当时大女儿玲玲一岁半，二女儿莉莉刚刚出生，加上她的母亲和正在上初中的弟弟，没有我的工资，只靠她40多元工资怎么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迫于无奈，一家人只好分散，她的母亲带着大女儿玲玲投奔远在贵州省贵定县的大儿子徐少涵那里。徐少涵在二野南下时参军，贵定解放以后，军里留下一部分人剿匪、建立地方政权。徐少涵所在那个连的指导员留在贵定县任县委书记，徐少涵当时是班长，留在县里当县联社主任，尚未结婚。他知道母亲和妹妹的困难以后，同意母亲带一个孩子到贵定去，由他照顾一老一小的生活。老人家变卖家里能卖的东西，凑了点路费抱着外孙女上路了。当时从湖南湘乡到贵州贵定没有直通的火车，交通十分不便，从湘乡分段乘汽车到长沙，从长沙乘火车到柳州，再从柳州分段乘汽车到贵定。老人家抱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路上颠簸了六七天才算到了贵定大儿子那里。

湘乡这里，我爱人被下放到农村当小学教员，不能带孩子，



1956年肃反结束后回湖南湘乡看望妻子与女儿。

只好把不到半岁的二女儿莉莉寄养在县城一户熟悉的人家，由在县城当小学教员的姐姐徐素君代为照顾着。这个孩子出生在困难时期，营养不良，姐妹两个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大部分的钱给孩子买营养品，贵的买不起，但奶粉、鸡蛋等总是按时给孩子送去。不料，这些营养品大部分被那家的老人吃了。徐素君去看孩子时，发现孩子解大便解出的是干菜叶子，而且解大便时脱肛很严重。孩子已经一岁多了，弱得抬不起脑袋，脖子细得像麻杆，要想改善孩子的营养状况，恢复孩子的健康，光靠她们姐妹俩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她们的工资收入，雇不起专门照顾孩子的保姆或奶妈，而寄养在别人家里，在人人饿肚子时期，给孩子买的营养品很难保证孩子都能吃到。为了使孩子能够活下来，而且逐步

恢复健康，也为了摆脱在当地受到的政治压力，我爱人只好向贵定的哥哥求助。好在贵定县委书记是徐少涵的老领导，而且知道我爱人自幼参军，政治条件不错，同意在贵定给安排工作。这样我爱人就在1960年调到了贵定。学期结束以后，她弟弟徐少林也转学到了贵定，我的一家人就由湖南湘乡移到了贵州省贵定县城。这个家庭生活的重担主要由我的大舅兄徐少涵承担，他为此推迟了婚期。

东北老家那边，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由大哥赡养，大哥8个孩子，收入又低，生活十分艰难。我妹妹李淑芬一向对父母孝顺，父亲去世以后，她更加牵挂母亲，调到通辽以后，便把母亲接到那里，一则减轻大哥的负担，更主要的是，她可以亲自照顾母亲的生活。但淑芬的丈夫王均山是被打成右派以后下放到通辽工作的。政治上的原因是否会给家庭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母亲在那里生活得怎么样？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没能回去送终，在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遗憾。母亲已是近70岁的人了，人到晚年，总是常牵挂不在身边的子女，特别是处境不好的子女。我没力量在物质上孝敬母亲，总得去通辽看看老人家，减轻老人家思念之苦。

南北两边的情况我都很牵挂，但两边的情况相比较，我决定先去通辽。母亲已是风烛残年，今年去能看到，明年去就可能见不到了，我不想再留下终生的遗憾。南边那里，宝珍调到贵定以后，和哥哥在一起，两个孩子有姥姥照看，家里的生活相对稳定下来，我比较放心了。

我决定先不去贵州也有经济上的原因，没有路费。刚到劳教所的时候，只管饭，不发钱。三个月以后，每月发22元生活费，我每月拿出10元，每两个月给家里寄去20元，钱虽少，但总算

是尽一点做父亲的责任。每月剩下的12元生活费，再紧出2至3元，积起来，以备意外急需。到解除教养时，身上总共有30多元，去贵定的路费显然是不够的。去通辽坐硬座车却够了，回来的路费，只有到妹妹家里再说。

通辽的气候干冷干冷，一迈出车厢，扑面寒风像无数的冰针刺到脸上、刺穿棉衣，透心的冷。其实，在战争年代，1948年冬天在绥远作战的时候，1951年到1952年冬天在朝鲜东线作战的时候，气温经常在零下30度甚至于零下40度，比这里冷多了，但那时20岁刚出头，身强体健，斗志昂扬，再冷也不觉得。而现在，虽说年岁并不大，不过三十多岁，但经过两年多半饥半饱的生活，体质下降，精神也大不如前，适应气候的能力也大大下降了。

出了车站，我一路打听去妹妹家的路。路面上积着冰雪、马粪，很脏很滑，马路两边都是平房，连二层的楼也没有。通辽是内蒙哲里木盟（专区）盟政府所在地，但从城市建设看，还不如冀中或华北的县城。看来这里经济比较落后，妹妹的一家在这里生活得怎么样呢？

车站离妹妹家不算远，沿站前大街走了一千多米，拐向左边的横街就到了。我到家时，妹妹和妹夫还没有下班，母亲正一个人在家里包饺子。我喊了一声：妈！母亲的手抖索了一下，一扭脸，见是我，手里的擀面杖掉到桌子上，怔怔地看着我，眼泪一滴一滴的掉下来，说：“你爹临死的时候，天天喊你的名字，到底没有见到你就走了。我今天总算看到了你！”我怕说起过去的事母亲难过，急忙放下提包，说：“妈，我有劲，我擀皮，你上炕坐着，你包。”母亲并没上炕，仍然站在炕沿边，定定地看着我：“怎么这么瘦，是不是吃不饱？怎么穿着破棉袄，是不是没

钱买新的？”我说：“在农场哪能吃不饱。这棉军装是部队上发的，穿惯了，到妹妹家里又不是去别家看亲戚，我就没换新衣服。”其实这件棉军衣是李义借给我的，我从部队带来那件早已穿破了，李义知道我要探亲，他有两套棉军装，有一件棉上衣比较完整，就借给我了，这件棉上衣基本完好，只在右襟下角补了一块颜色不大协调的绿布，被母亲发现了。母亲的眼泪又流下来，说：“你也不用瞒我，淑芬说过，你们那种地方挺受罪，衣裳破不破是小事，人活着就好，就是一家人的福气。”

说话工夫，淑芬和他丈夫王均山相继下班回来了。他们到底是经过一些政治风雨的，亲人相见，尽管心里都有苦涩，但都能自我克制，特别是在母亲面前，表现出来的主要是高兴，淑芬笑着对我说：“妈知道你要来，高兴得好几个晚上睡不好觉，总念叨你自小爱吃饺子，叫我们想法买点肉，好好给你包几顿饺子吃。今天包的饺子原准备冻起来给你留着，没想到正包着你就到了，你可真有口福。”

我自己也吃惊，我的饭量这样大，用二号铁锅蒸饺子，我一个人吃了大半筐子，总是吃不饱。母亲却没有吃几个，总是看我吃，像是笑，又掉眼泪，对淑芬说：“你三哥准是饿坏了，他自小念书，饭量不大，今几个吃的饺子从前三顿也吃不下。肚里没油水，饭又吃不饱，人哪能不瘦。”淑芬急忙转移话题说：“妈，现在全国肉蛋都是凭票供应，通辽这里有条件弄到肉和蛋，三哥在这里多住几天，好好给三哥解解馋。”

我在通辽妹妹家住了五天，了解到她那里的情况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好。首先，在政治环境方面，可能这里因为文化相对落后一些，对北京下放来的有文化的干部比较尊重，淑芬在盟（专区）工业局工作，局长对她很器重，王均山一向埋头业务，不问

世事，受处分来到通辽以后，继续当中学数学教员，对工作更加专注，课讲得好，学生欢迎，学校对他的评价也不错，他们在政治上都没有受到歧视。经济方面，淑芬原工资未动，王均山虽降了级，但两个人合起来仍有一百二三十元，通辽物价较低，一家生活并不困难，住房略显窄小，一间半房，外边半间是和邻居合用的灶间，里屋一间住人，是对面炕，当时淑芬有三个孩子，都小，母亲带三个孩子一条炕，他们夫妇一条炕，煤的供应很充足，两条炕都是火炕，屋里很暖和，也并不显挤。通辽还有一个优点——粮食和副食供应比较充足。哲里木盟是内蒙的产粮区，而且地广人稀，在全国闹饥荒的时候，这里没有饿死过人。因为这里有吃的，盲流特别多，通辽的人口不足十万，饥荒时期这里的盲流达到十四五万。听母亲说，那两年大哥家里最困难，半大孩子多，吃不饱肚子的问题更严重，淑芬除了支援一些粮票，还设法弄到一些做饲料用的干萝卜丝，整麻袋、整麻袋地运给大哥，使大哥家里没有饿死人。很多年以后，我回到东北时，大哥的孩子们还感念当年姑母的救命之恩。

我亲眼看到母亲在淑芬家里生活得不错。每天淑芬两口子上班，母亲在家里帮她照看三个孩子，做做饭，淑芬对家里放心，母亲做些轻微的家务劳动，对身体也有好处，而且跟前有三个孩子，也不感到寂寞。父亲死后，老人家没有孤独感，这是我最感到欣慰的。

我这个人一向不习惯在别人家里做客，见母亲精神上、物质生活上都还好，放心了，决定第五天就走，淑芬知道我的脾气，没有强留。

临走的前一天，淑芬两口子上班，三个孩子到邻家玩去了，母亲从贴身的衣兜里掏 20 元交给我，说：“回去扯点布，把棉

袄、棉裤换个面。”我知道这是淑芬给母亲的零用钱，母亲没有舍得用。我怎么能要这个钱？母亲生气了，说：“这钱，不是给你的，你那两个孩子我还没见过，这20元钱是我给孙女过年的压岁钱，你给我寄去。”我知道，母亲趁孩子们不在的时候给我钱，是不愿让孩子们知道，争执下去，如果孩子们回来听到了，母亲会更生气，只好收下了。母亲又把压被子的长绒毛毯折起来，叫我带走。我知道这条毛毯是淑芬从北京带来的，在当时是比较贵的毛毯，一条总要五六十元。淑芬怕母亲冷，自己没用，给母亲睡觉时压被子，这是专给母亲用的，我无论如何也不肯要。正在争执的时候，淑芬提着个包袱进来了，也是叫我带走，说：“这屋里暖和，给妈加条被子就行了。你们那里靠海，潮气重，毛毯能隔潮，你带去对身体有好处。若是你不出事，钱比我多，用不着我给你。可是现在你没钱买，我这里有，你拿去用，是用你自己妹妹的东西，推辞个什么？”说着，打开包袱，拿出一件黑色棉大衣，说：“你那件棉军装穿了好几年，棉花板结不保暖，外边加上这件棉大衣，过冬就不遭罪了。”

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一个30多岁的汉子，不能奉养老母，反而拿走老母积攒的零用钱；不能支援家遭变故的妹妹，反而拿走妹妹家里仅有的一条毛毯，还给我买棉大衣，这算什么事！可是不拿不行，不拿反而会伤害母亲和妹妹对我的一片亲情。

我走的那天正是星期天，我和淑芬商量好，不叫母亲送我，免得送的时候老人家伤心，由她在家里陪伴母亲，王均山一个人送我到车站。回程的车票当然是淑芬买的，还给了我几十元的零用钱。

回到农场以后，政工科通知我调离子弟学校。为什么调离没有说明原因。我也不想问。我这个人不能够为人师表，说话做事

缺乏自我约束能力，凡是我认为对的，就说就做，不看环境，不辨风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不想使自己不合时宜的思想作风影响天真的孩子们，离开学校最好。

管教股安排我到文工团担任学习组长，和我同时调到文工团的还有原文艺组长夏昊，他到文工团当导演。我在联大时的老同学白石则调到文艺组接替夏昊编《劳教生活》。

解除劳教的人员都搬出大院，我和白石住一间房。我除了参加文工团的活动，还和白石一起编一份不定期的油印小报《劳动快报》，是面向解除劳教后留场就业的职工的。

文工团和文艺组都归管教股管理，具体负责人还是冯股长。文工团人多，有30多人，排练和演出一般都是利用农活的空闲时间，他们有固定的生产任务，负责管理一个斗渠的稻田（约200亩），从整地、插秧、田间管理到秋收，都由文工团负责，单独计算产量。我这个学习组长只在晚间到文工团组织大家学习，白天大部分时间是在文艺组，从事《劳动快报》的采编工作。

工作任务并不重，合作的人关系也比较融洽，但我的心情并不轻松，主要是为将来的出路焦心。1958年离开军区时，刘佳部长曾说：多则一年少则半年还回军区工作。可是在劳教所一待就是四年。摘帽以前总盼早些摘掉帽子，重新回军区工作，可是摘掉帽子以后，我给军区写信，始终没有回音。从通辽回来以后，我向冯股长和张科长了解摘帽以后工作安排的有关政策，并把我来此以前军区文化部刘部长对我说的话告诉了他们。他们回答的口径大体是一致的。其一，教养所是改造单位，无力安排工作，解除劳教以后的工作由原送单位负责，如原送单位不管，只能留场就业；其二，劳动教养虽非刑事处分，没有前科，但却是

最重的行政处分，右派如果没有历史问题，很少送劳动教养的，像我和白石这样，既没有历史问题，反右前又没犯过什么错误，处理这么重的还不多见。我不但开除了党籍、军籍，还开除了公职，从组织上讲，和军区已经没有关系，军区不管也没有办法；其三，目前对摘帽右派的安排比较困难，在团泊洼“干部农场”改造的右派，摘帽后重新安排工作的也是少数，大部分还留在农场里。

张科长和冯股长讲的这些，我已经有所感觉，从1957年反右以后，政治气候越来越“左”，讲大话讲假话搞浮夸的走红，讲实话讲真话的受批判。1959年像彭德怀那样的开国元勋，不过是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很有分寸地提了些意见，竟把他和同意他意见的人打成反党集团。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想解决摘帽右派的工作安排问题，显然是困难的。像我这样已经开除公职的摘帽右派的安排会更加困难，看来，目前的出路只能是留场就业。

十五、女儿相见不相识

根据当时的多种信息分析，短期内我不可能离开这里重新工作，只能留场就业。在这种环境里，我必须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做人的良知。我无力改变环境，但绝不能受环境的影响，丧失做人的准则。我给自己确定了几条：第一，老老实实地做好分配给我的工作，不和干部发生矛盾；第二，我一直被视为积极分子，说话做事要实事求是，绝不做伤害无辜的事情；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利用自由支配时间较多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不能白白地消耗自己的生命。我首先想到了写作。我参加过多年战争，生活有一定的积累，反映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已经拟好提纲，开始动笔，不能因为政治上的挫折，放弃这部书的写作计划。困难的是，要写作，你的思想必须进入你要写的生活，特别是必须和你要写的人物有感情上的沟通，为他的欢乐而欢乐，为他的愤怒而愤怒，要有激情，才能写出活生生的人物。但在农场这种特殊的环境生活时间长了，人的思想情感在发生变化，很难调动起写作的激情，我决定先写故事。在涿鹿县参加土改的时候，曾听到青山寺的儿童团斗恶霸地主、以后又随大人进山打游击的故事。故事很曲折，很生动。我不熟悉那种环境的儿童生活，当然写不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但通过写故事也可

以使自己的思想逐渐集中到写作上，调动起写作的激情，再动笔写抗美援朝的小说就容易多了。

我的写作计划，白石全力支持，魏秉锡也不反对，还抽时间帮我誊清稿件。有一回，魏秉锡正在誊写，冯股长进来了。《劳动快报》的稿都很短，他看到桌子上放着十几张我写的草稿，魏秉锡一丝不苟地在抄写，有些奇怪地问：“你这是干什么？”魏秉锡说：“帮助老徐抄他的大作。”冯股长看了一会儿，说：“别看你的字工整，论写字的功底，你比老徐差多了。”冯股长的态度表明，管教股领导对我业余写作认可了。

我的空闲时间很多，写作速度也较快，不到20天，3万多字的儿童团的故事就写完了。白石看了以后，认为写得还可以，人物性格虽不鲜明，故事却比较吸引人。我自己觉得，思想已逐渐进入“状态”，就开始继续写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

除了写作，我和白石商量，尽可能地改善伙食，在这种特殊环境里，既要保持正常的精神状态，又要保持健康的身体，否则就没有未来了。改善伙食只能“就地取材”，“量力而为”。农场里养了很多羊，羊肉便宜，我们常常买些羊肉，做成丸子，余萝卜丝。买肉的钱多半是白石出，我们的工资都很低，但白石当时没有孩子，他爱人也被打成右派，在团泊洼干部农场，保留公职，收入比我们高，所以和我们相比，白石算是个“富户”，做饭主要也是白石动手。魏秉锡已在农场结婚，住在另一间房，不参加我们的“改善伙食计划”。我和白石，还有一个叫古禹的住一间房，我和古禹都是笨手笨脚，只会吃不会干。白石这个人心细，操刀剁肉、切萝卜丝，都是他动手，下佐料、掌握咸淡也由他负责。羊肉丸子余萝卜丝虽是一道普通的菜，但当时对我们来说，可称得上是美味佳肴了。

改善伙食的另一个办法是“傍水吃水”。秋天蟹肥时，我们常常捉蟹。晚饭以后，我和白石提着马灯，带上麻袋扁担，到北大港的进水渠的旁边，找个合适的地点放下马灯，过了一小会儿，渠里的蟹就排成队地冲着灯光爬，多年捉蟹吃蟹，我们对团脐（母的）、尖脐（公的）分得很清楚，专捉团脐大个的满黄的母蟹，不到半夜就能捉多半麻袋，抬回宿舍，第二天用小铁锅煮熟了，主要吃蟹黄，很少吃蟹肉，吃蟹肉挑肉去骨太麻烦，三个人吃不了，就分送夏昊、魏秉锡等邻居。由于我们对伙食调理得比较好，对身体大有好处，不但没患病，体重也没有下降。

这期间几次接到爱人的来信，告诉我家里的情况，她在贵定一个很大的烟草企业——贵定复烤厂幼儿园当教师，大女儿玲玲进了幼儿园的小班，二女儿莉莉在家由姥姥带着，大舅很关心两个孩子，想方设法给她们弄些有营养的食品，两个孩子的身体都很好。她在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在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的时候，黎白曾两次给她寄钱，每次都是100元，她叫我务必给黎白写信，谢谢人家。看到信以后，我心里很不平静。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好，反右时，他和徐光耀一样，受丁、陈的株连，在总政创作室被划为右派。创作室上报总政以后，一位负责定案的领导同志认为，黎白十几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历史清白，到部队以后多次立功，和陈企霞虽是师生，但并无特殊关系，定为右派证据不足，改为中右，没有戴帽子，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到昆明军区做宣传工作。黎白寄钱，是在他受了处分接受“察看”期间。反右以后，很多人患了恐右病，对右派避之犹恐不及，而黎白在自己的处境也很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心我这个右派朋友的妻子、女儿，不避嫌疑，解囊相助。这种战友的情谊确实是难得的，从中也体现出黎白的为人，正直而富有爱心，虽受政治风暴的冲击，

但他并未动摇做人的良知，并未见风使舵忘却真诚的友谊。

爱人的每次来信都引起我对家庭的思念。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家庭带来的压力我是知道的，两个女儿还小，对这种压力浑然不知，压力都落到我爱人身上。但她在信上多半是说亲戚对孩子的关心和朋友对家里的帮助，从来不说自己遭受的困难和痛苦，越是这样我心里越不安，在经济上我力不从心。解教以后，我定为五级农工，每月工资42元，只能给家里寄去20元，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但我至少应该回家看看，二女儿出生以后我还没有见过，作为一个父亲这也太说不过去了。解教以后，我已回东北看过母亲，今年无论如何要回贵州看看爱人和两个女儿。

1962年12月农场批准我回贵州探亲，场里给报销往返硬座火车票费。去贵州的旅途很麻烦，从农场坐汽车到天津，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在北京买去贵定的火车票，当时北京没有直达贵州的火车，要南下柳州，从柳州换乘去贵阳的火车，中途在贵定下车。如果中途换车不耽误，全程四天四夜。我到北京当天没有买到票，排了一天一夜的队才算买到一张硬座票。

在柳州换车的时候，要等六七个小时，我想，好几年没有回家，总得给老人和孩子买一点东西，可是我的钱不多，在火车站附近的副食商店和小摊转了好久，买了四个沙田柚，这种水果很有名，在当地却不贵，我可以买得起。

到贵定车站的时候，是午夜12点多，我爱人在出站口等我。两人相见真是百感交集，一时却不知说什么好。她拿过我的手提包，我问：“两个孩子好吗？”她说：“挺好。”我又问：“妈好吗？”她说：“也挺好。”我问：“少林（她弟弟）呢？”她说：“上高中了。”

从车站到城里的路上没有路灯，好在有月光，路又很宽很直，倒也不难辨认。一路走着，两个人几乎都没有讲话，和过去探亲两人相见后笑语连连的情形完全不同，可能是两个人的心里都积压很多的酸痛和苦涩，但都不愿告诉对方，而令人高兴的话题又想不出来，一时就无话可说了。

贵定县城坐落在山坡上，和车站之间隔着一条河，走过河上的水泥桥，上坡不远，她把我领进一家小旅馆。我奇怪地问：“为什么不回家？”她说：“太晚了，明天我来接你。”这显然不是实情。她到车站接我，说明我的电报她已收到，知道我到达时间，晚一些并不是不回家的理由。到底为什么，她不说我也不便多问。

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她来到小旅馆，两个人在街上吃了一些早点，然后回家。

这是一幢贵州常见的木结构建筑，临街是两层的木楼，木楼共三间，底层当中一间是大门。进得大门，正面是三间木壁青瓦盖顶的瓦房，宝珍哥哥的家（实际是我的一家，宝珍哥哥住办公室，不在家住）占用右边的两间。

我到家的時候，岳母正在堂屋里哄着两个孩子玩。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眼睛圆圆的有两道好看的黑眉毛和微翘的俏皮小嘴的是大女儿玲玲，我最后一次到湖南探家时，她已经一岁多了，她那调皮好动的形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那个略小些、红红的圆脸、扎着两条小辫子，嘴形很像宝珍的，必定是我还没见过的二女儿莉莉了。

老人家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说：“还是老样子。”推过两个女儿说：“看，你老子来了。”

两个孩子奇怪地望着我，退到姥姥身边，玲玲很勇敢，问姥

姥：“他是哪一个？”

孩子这稚气的一问，我的眼泪顿时涌上眼睛，不由想起唐代诗人贺知章暮年从朝廷辞官，告老返回故乡时写的那《回乡偶书》诗中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说的是乡里的儿童，可是我眼前的是亲生的女儿呀，居然不认得自己的父亲！

老人家嘟囔说：“没出息，自己的老子都不会喊。”顺手把两个孩子揽在怀里，看样子，两个孩子对姥姥很亲。

我由衷地感谢这位老人家。我沦为“黑五类”以后，两个孩子主要靠老人家抚养，我的家也是靠老人家才能维持。她先带着我的大女儿从湖南远赴贵州投奔儿子，后来宝珍带着二女儿也来到贵州。我的一家从湖南湘乡移到贵定，是她用母亲的爱维系着子女之间的相互帮助。老人家一生饱经风霜，宝珍的父亲是安徽宿松人，大学毕业以后在外地谋生。这个人生性耿直，在福建南平当税务局长的时候，本是个“肥差”，可是他拒不受贿，有送礼的，他把礼品丢到门外，还要骂人，这样做当然会得罪人。宝珍6岁的时候，他就被暗杀了，丢下远在他乡的孤儿寡母，其困苦可想而知。可是，就是这位老人家，以刚强不屈的毅力，奔波劳碌，独立抚养着几个孩子。直到解放军南下，她的大儿子徐少涵和女儿徐宝珍参加了解放军，她成了军属，政府安排她到食堂做饭，才算有了稳定的工作，但工资很少，她带着小儿子徐少林；生活仍然很困苦。1956年宝珍从部队转业到湖南湘乡县工作，她姐姐徐素君也在湘乡，当小学教员，她俩决定把母亲和弟弟接到湘乡，安了个家。由于我的工资较高，家里才算结束了缺吃少穿的苦日子。但刚刚过了两年多，我就被打成右派，家里的生活重新陷入了困境。可能老人家经历的艰难困苦太多了，在突

然降临的打击面前，她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竭尽所能帮助女儿渡过难关。

这次探亲之前和回来的路上，我心里一直有些不安，这几年我的问题，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家庭带来的打击太大了，和家人相见之后可能会遇到尴尬甚至难堪的事情。可是和老人家相见之后，她对我的态度就像在湖南我探亲时一样，没有一丝责备的意思，可能因为我处境不好，对我反而更关心了，不断嘘寒问暖。老人家对政治斗争的事情不懂，她关心的是家庭生活的实际问题，问我东北老家的情况，也说起这几年这边的一些情况，特别说到大儿子（宝珍哥哥）徐少涵的一些情况。在粮食最困难的时期，为了使一家老小能够活下来，他尽了最大努力。当时正在修贵阳到柳州的铁路，他被派到筑路工地上当大队长，筑路工人的粮食供应比较充足。他节省自己的粮票，在工地买馒头，连夜送回家里；他时常出差，见火车上卖豆豉辣酱，有营养又不要粮票，一买就是十几瓶、几十瓶。筑路结束以后，他回到县里，被任命为副食品公司经理，他又想方设法弄些营养食品给孩子吃。莉莉刚来的时候弱得头都抬不起来，经过两年的时间终于养好了。副食品公司经理，在当时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不少女孩子追他，他始终不结婚，为的是全力支持这个家。老人家也不无忧虑地告诉我，徐少涵对这个家，对弟弟妹妹以及两个孩子，可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就是脾气太暴，意思是暗示我如果见面说些过头的话叫我不要往心里去。这位未见面的大舅兄可能对我有意见，下车以后宝珍不直接把我带回家里可能和他有关，但我不便明问。

中午，宝珍的弟弟徐少林放学回来了，在湖南探亲时，他还是个结着红领巾的小学生，现在上高中，长得和大人一样，声音

也变了。在旧社会的孤苦生活，让他养成了孤僻、内向的性格，不喜欢和人交往，平日里寡言少语，但和我一直很亲。见了面，他说了声：“大哥来了！”只管嘻嘻地笑。

白天一整天，徐少涵始终未露面。晚饭后，快10点了，少林说我旅途劳顿，在里间支了张行军床，叫我先睡。里间原来有张大床，是老人家和宝珍带着孩子睡的，两个孩子早已睡下。外间堂屋有张小床，是少林的，徐少涵住办公室。

我躺下时间不久，很重的脚步声从外边走进堂屋。老人家压低声音：“人家几千里到这里看老婆孩子，你有话好好说。”脚步声来到里屋。我知道徐少涵回来了，忽身坐起来，就着灯光，看清了我这位舅兄，身材不算很高，大约1米70，但很健壮，眉毛很浓，眼睛又大又亮。他皱着眉，脸上带着怒气，见我坐起来，并未说话，在床前的桌子旁边坐下来，掏出笔，在纸上写了几句话：“你受过高等教育，不该骄傲犯错误，老婆孩子怎么办？”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不高兴，他在纸上写，可能不愿叫老人家听到我们的谈话。我也在纸上写：“我被打成右派并非由于我骄傲。政治运动的事几句话说不清。”他默然地看了一会儿，眉毛展开了，收起笔说：“那你休息吧。注意身体，你太瘦了。”看来我这位舅兄是霹雳火的脾气，没见面时脾气很大，见了面，只两句话，火就消了。

第二天，徐少涵在临街木楼的上层给我安排了一间房。可能他见家里住处太挤了。这间房里除了床铺，还有办公桌和茶具。这样我就有了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白天，宝珍和少林上班、上学去了，大女儿玲玲去幼儿园，二女儿莉莉总是依着姥姥，不肯跟我。我和老人家说说话，大部分时间无事可做，就继续写反映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少林对我写作的事情很热心，不但帮我买

稿纸，还找了两个要好的同学，三个人一起帮我誊清草稿。少林的字规范、工整，那两个同学的字写得也很好，他们把我从农场带来的草稿也给誊清了。

这期间，宝珍带我到她们厂去过两次，她的同事们都很热情，她的好朋友还有厂的党委书记还到家里来看望我。这对我的精神是一次解放，觉得我又是社会平等的一员了。在农场那种特殊环境里，由于人的政治地位不同，人际关系是不平等的，即使解除了劳教摘掉了帽子，和场里干部接触当中仍然不能称同志，在就业职工之间也没有互称同志的。干部对职工一般直呼其名，个别客气一点的叫“老王”、“小李”，使你不要忘记，你仍然属于“贱民”，不但在言行上要严格约束自己，在情感上也要封闭自己。人总是有爱和恨的，但如果你看到不合理的事就愤怒起来，很可能引罪上身。在那种环境生活久了，不管你情愿不情愿，会逐步形成忍受和服从的心态，逐步丧失独立的人格，个别的会成为精神麻木的奴才。这对于从事写作的人来说是最可怕的了。没有爱和恨，没有对生活的激情怎么能写出作品？我在农场的处境算是比较好的，但仍然属于“贱民”的行列。我通过写故事，逐步调整心态，使思想进入写作的环境，但始终不能完全摆脱压抑的心情。我觉得这次探家是个难得的机会，有个安静的写作环境，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得到了解脱，抓紧时间写，进展比较顺利。我在家20天，写了大约10万字。

临走的时候，徐少涵搞来两斤高粱白酒、两斤白糖、两条宝珍那个厂出产的“云雾山”高档香烟，还有一包点心，叫我路上用。在当时物资紧缺的情况下，这些都算“稀罕”的东西。

路过天津的时候，我决定去看望老朋友、老同事林呐。1948年华北野战军组建三兵团，兵团成立新华分社，杜导正是分社社

长，我和林呐都调到分社当记者。1950年林呐先我调到华北军区，任《华北解放军报》通联组长，我也调到军区，任新华社驻军区报道组记者，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办公桌紧挨着。林呐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比我年长，但我们关系很好。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到农场接受改造，林呐在此前已转业，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我在改造期间曾给他写过几封信，每次他都回信，鼓励我，安慰我，使我体会到，战争年代结下的友谊是纯真的。好几年不见了，我应该去看看他。

林呐见到我非常高兴，说：“四五年了，只见来信，不见人，不知成了什么样子，今天终于见到你了，不错，活得挺结实，这就好。”林呐的爱人李萍，在华北军区时，和我是一个党小组，也很熟。林呐对李萍说：“你不知道，我和徐孔的关系非同一般，徐孔是我的救命恩人。”又问我，“你还记得凉城遇险那一回吧！”说罢开心地大笑。我当然记得，那是1948年，三兵团西征绥远，凉城守敌不战而逃，部队继续西进。杜导正派林呐和我留在凉城，了解当地人民解放前的生活情况和对解放军的看法，然后追赶部队。当地尚未建立政权，只有一个工作组，派人带我们访问了几家市民和工商户。大约下午三四点钟，城里几处响起枪声。绥远流窜的土匪很多，有的地方兵匪合一，解放军来了他们就跑，解放军走了他们就回来。工作组很紧张，如果部队的记者在这儿出了事，他们负不起这个责任，催我们赶快离开凉城去追赶部队。在凉城以西不远，有一条沙河，沙的表层是硬的，可是人走在上边，脚步稍慢些就会陷下去，而且越陷越深，再拔脚很困难。林呐当时患有肺结核，身体弱，几次陷下脚去，行进很慢，而这时凉城方向枪声越来越紧，我急了，背起林呐，跑过了沙河。

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两个人都有无限的感慨。林呐说：“这几年能填饱肚子就不错，很少下饭馆。你在农场可能更苦，今天咱们一起到天津有名的狗不理包子铺好好吃一顿，解解馋。”可能那几年我的肚子真的太苦了，那一顿狗不理包子吃得特别香，直到重新工作以后，多次吃狗不理包子都没有一次吃得像那次一样的香，大概是人的生活条件不同，对吃的感受也不相同了吧。

晚上在灯下闲谈的时候，我说了写作的情况，林呐非常赞成。他说：“经过炮火锻炼的人应该更坚强，无论遭受什么样的打击，都不能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不能使精神倒下去。你现在不能恢复工作，能写一点东西也好，写写你亲自经历的战争，歌颂那些为革命前仆后继、无私无畏、英勇献身的战友们，也很有意义，你写好以后交给我。”

我回到农场不久，接到宝珍的来信，意想不到的，她提出要来农场和我一起生活。我马上给她回信，向她说明劳教农场这种特殊单位的特殊情况，希望她不要到农场来。不料，她的态度很坚决，她说：“你能忍受的我也能忍受，在困难的环境里，两个人更应在一起，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其实，我何尝不愿一家人团聚？我是替她和孩子着想啊！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和白石商量，白石一向慎重，他想了很久，倾向不来，主要也是替宝珍和孩子着想。我又向张科长谈了我爱人想来农场以及我的顾虑等情况。张科长是场的领导干部，政策水平较高，不像某些干部对就业职工总是居高临下甚至于怀有政治偏见。他通情达理，对我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我想听听他的意见。张科长对这件事倒是很赞成，积极支持。他说：“宝珍同志是国家干部，关系转过来，到农场还是国家干部，和一般职工家属不同。听郭股长说子弟学校缺教员，我和场里领导商量一下，宝珍同志来了以后就到子弟

学校当教员。你也不会总留在农场，国家建设需要你们。即使原单位不给安排，农场也可以想想办法。现在大港油田正在开发，也需要人。农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推荐一些。如果你重新工作，宝珍在这里，一块调出，比她在贵州方便多了。”过了两天，张科长拿来一封政工科的商调函，交给我发往贵定复烤厂，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

张科长非常热心，接到宝珍来农场的电报以后，特地安排一辆去天津送货的汽车把行李和人接回来，并叫我随车去天津迎接，还在职工宿舍区给安排了一间房。宝珍到农场以后，张科长又到家里来看望，嘱咐宝珍先休息几天，等候上班的通知。可是上班的通知迟迟没有接到。我白天上班，宝珍只好留在宿舍里看书，有时到场里的文工团帮助排练几个小歌舞节目。这种临时性的工作终非长计。我几次找张科长，打听宝珍上班的问题，张科长总是说再等等。过了半个多月，张科长终于说出了实情，表示很抱歉。他说他对干部调动的手续不熟悉，跨省调干要经过省里，农场自己不能解决，宝珍的事情要到省里补办手续，需要等候一段时间。他听冯股长说宝珍歌舞的功底不错，和我商量，是不是先到文工团当个导演，等省里批下来以后再到学校上班。

我一听心里就凉了。从国家干部莫名其妙地变成劳教农场就业职工，无论从政治上或工作、生活上考虑，都是不能接受的。在农场并非没有为此吃苦头的先例。文工团有个姓丁的职工，他爱人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丁某就业以后，他爱人带着组织关系来到农场，开头两个月还叫她参加党小组的生活，支部安排她做些职工家属的工作。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让她参加党小组会，她交党费也不收了。她问支部这是为什么，支部始终没有明确回答，但事实上是她的党籍没有了。在这种单位的就业职工和

职工家属，很多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我考虑再三，宝珍不能留在农场。白石等几个关系近的人也主张，如果不能作为干部调入，就一定不要留场，我留在这里，是迫于没有出路，不能把宝珍再拖到这里来。宝珍在场住过一段时间以后，对农场的特殊情况也有所了解，同意我的意见。但离开农场怎么办？想来想去，只能还在贵定那边想办法。贵定的县委书记是徐少涵的老领导，那边的干部也相对的缺少，安排要容易一些。征得宝珍同意以后，我马上给徐少涵发了一封电报：“跨省调干，手续不全，不能安排，希望仍回贵定工作，可否，速告。”徐少涵这个火暴脾气的人，办事还真是痛快，第四天我就接到回电：“同意安排，速回。”我心里这才算踏实了。

宝珍带着孩子和行李，路上换车比较麻烦，我请了几天假，把娘儿俩送到北京，宝珍想去看望徐逸人。宝珍从54军调到兵团，是徐逸人看过各军文工团会演以后提出来的，到兵团以后，关系一直不错，分别几年，看望一下熟悉的老领导是应该的。但我不想去，我被打成右派，其根源是由徐逸人问题引起的，这些情况徐逸人不会不知道，见面后免不了要谈这件事，而我最不愿和徐逸人谈这件事，和他谈什么，不如不见面的好。

我办完换乘手续回到旅馆不久，宝珍也回来了，她说，徐部长一定要和你见面，如果你不去他那里，他就到旅馆来看你。战争年代多年的老朋友，既然来到北京，为什么“避而不见”？

我在军队工作多年，脑子总有些等级观念，徐逸人是老领导，不该叫老领导来看望自己，午饭以后我就和宝珍一起到了徐逸人家里。

徐逸人和他的夫人李佗都很热情，特地叫大女儿出去买了一

个西瓜和一兜水果。不出所料，说话一开始，徐逸人就说起了肃反和反右问题。他说，你的情况，好几个人向我说过，说的人都替你打抱不平，其实，你是代我受罪。1954年，如果我不调离兵团，肃反中挨整是我，不会是你；如果1954年兵团放你，和我一起调离，肃反中你就不会为我的事和韩福贤发生矛盾，也就不会发生反右的事情。他最后说，我因为他在政治上受了这么大的打击，心里总觉得不安。我说：“已经过去的事情，说也无用，只能给自己添堵。”徐逸人说，你不愿说有你的道理，可是你挨整起因在我，而且这件事明显的不合理，我不能不讲话。在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军区政治部张副主任，我问他，听说军区批判徐孔的时候提到了我，不知提到我什么问题，我愿意接受教育。张副主任说，没有的事，怎么会提到你呢，根本没有提到你。我说：“我的两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恶毒攻击肃反运动。指的就是在你的问题上我对韩部长提出意见，反右运动中怎么会不提到你？张副主任是政治部的领导，可能不了解下边的情况。”

我知道徐逸人的脾气，这个话题不能再谈下去了，李佗显然更了解丈夫的脾气，截断徐逸人的话说：“好几年不见了，说些高兴的事，不翻这些陈年老账了。”她让大家吃西瓜，顺便问起宝珍贵州的土特产、风俗人情和孩子上幼儿园的情况，尽量找些轻松的话题。但刚才谈的那些沉重的往事，我心里总是轻松不起来，坐了不长时间就告辞了。

回到农场不长的时间就接到宝珍的来信，她已到新的工作单位——县税务局上班了。宝珍有了新的工作，我心里也就踏实了。可是，不久又传来伤脑筋的消息，宝珍怀孕了。多一个孩子本是应该高兴的事，但我每月只有42元的工资，政治上又是这么一种处境，现在的两个孩子还要靠亲戚帮助抚养，再多一个不

是困难更大吗？我在几千里之外，主要压力都在宝珍身上，压力实在太重了。我考虑很久，给宝珍写信，说出我的顾虑，到底怎么办，由她做决定。她也考虑很久，最后决定要这个孩子。她说，把孩子生下来，总是多一个亲人，困难再大，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1963年，宝珍的哥哥徐少涵已经结婚，另外组织了家庭；岳母带着我的二女儿莉莉到福建小女儿徐素琴家去了；弟弟徐少林考上贵州省农学院，在贵阳读书；家里只有宝珍和大女儿玲玲。6月份是她的产期。5月份我向冯股长请假，说明家里的困难，希望假期长一些，回去照顾她产期的生活。冯股长说：“请假照顾爱人生孩子，在农场没有先例，不大好办。你请个创作假吧，写东西场里应该支持。给你三个月的假够了吧。”

劳教农场批准就业职工休假搞创作，这是破例的。

宝珍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好。大女儿玲玲已经上小学，学校离家不远，上学放学不用接送，比较省心。

我刚回去的时候，宝珍仍坚持上班，她的意见是产前尽量少休息，把假期留在产后。

白天，家里没有什么事情要我做，我就继续写朝鲜战争的长篇小说。宝珍下班以后帮助我抄写。

孩子生得很顺利，住院的当天就生下来了。前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都不在跟前，这一次我一直守在产房外边。守了四五个小时，产房里传来婴儿的哭声，声音很洪亮，护士告诉我，是个男孩。过了一会儿，医生允许我进产房。宝珍虽然显得虚弱，疲惫，但脸带笑容。旁边的孩子不像一般初生婴儿闭着眼，脸色赤红。这小家伙脸很干净，额头宽大，是个发育很好的男孩。我很高兴，从宝珍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出，她也很高兴。我们有了两个

女儿，很希望这次能生个男孩，真是天从人愿。新生下的儿子取名“明明”。

1964年我探家的时候，岳母带着莉莉回贵定了，明明也已经满周岁了。小家伙长得很结实，也很聪明。据说9个月就会叫妈妈，有一天老母鸡跑进屋里，他指着喊：鸡、鸡！令全家人惊讶不已。10个月就能推着小车迈步。他每天要按时吃东西。到了喝奶时间，如果牛奶还没送来，他就指着奶瓶喊：奶、奶！

不幸的是，二女儿莉莉染上了肺结核。这个孩子出生于困难时期，身体很弱，到贵州以后经过补养，逐渐好转，但体质总是较差，抗病的能力总是较弱，她比老大玲玲只小一岁，玲玲却比她高出一个头。玲玲体质壮，好奇好动，莉莉因为身体弱，自小不爱活动，性格内向，但很聪明，而且做事认真。大舅最喜欢她的认真劲儿。他告诉我，若是叫玲玲看家，外边有点动静她就跑出去看热闹，能把看家的事忘了；莉莉却不会，你叫她看家，她就坐在门口的石墩上，看着门，不许别人进家里，直到大人回来。有一回，大舅为了“考验”她的耐心，交代她好好看家，就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大舅悄悄从大门往里望，她还坐在石墩上聚精会神地看着家门，大舅从旁边绕到她的身后，故意加重脚步，她马上大喊一声：哪一个？

肺结核很容易传染，特别是小孩子，抵抗力弱。如果不把她（他）们分开，整天在一起吃饭、玩耍，更容易传染。但在一个家里，小孩子又不懂事，怎么分得开呢！

正在家里人为孩子的病伤脑筋的时候，宝珍的妹妹徐素琴从福建来到了贵定。她是为解决家里困难而来的。这个人性格刚强，对家里人的事情很关心。她小的时候，因为家庭困难，读书不多，但刻苦自学，参加工作以后仍自学不辍，现在福建三明钢

铁厂医院任药剂师。她丈夫是钢铁厂共青团干部，后来在一个行政部门当处长，他们的生活条件较好，没有孩子。

徐素琴以她做医务工作的经验向家里人说明，有病和没病的孩子一定要分开。怎样分法，她的意见是：老人家带着玲玲和明明到福建三明她的家里；莉莉留在贵定由宝珍亲自照顾。大人是这样想的，孩子是怎样想的呢？明明太小，什么也不懂；两个大孩子却懂事了，如果她们不愿意，在以后的生活里哭哭闹闹也不好办，还得听听孩子的想法。

玲玲听说要去三明，去一个新地方，很兴奋。莉莉却有准主意，几次问她，她都是一句话：“我跟妈妈！”小姨逗她：“你去过三明，小姨家比这里房子大，三明比贵定好玩，你跟小姨去三明好不好？”她还是那句话：“我跟妈妈。”

这样，大人和孩子的想法就算一致了。

我有假期的限制，在老人家带着两个孩子去三明以前，先离开了贵定。临走的时候，我看着嬉戏玩耍的孩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被打成右派以后，迫于生计，家人分离。一家人费了很多周折，才在贵定团聚，不过两年，两个孩子又要远去福建。我知道，宝珍的心里比我还难过，哪个母亲愿意孩子远离自己呢。我走以前，宝珍曾两次和我说：“若不，玲玲和明明不去三明了，难是难，可是我总能想办法养活几个孩子。”难办的是莉莉这种病，为了玲玲和明明不被传染，必须分开。如果家里条件好，另找一处房，有专人照顾莉莉也可以，但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啊。

一路上，我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我给家庭带来的打击太大了，无论如何要想法找个出路。我这个人死爱面子，从不低头向人乞求什么，但目前这种情况，哪里也不会主动给我安排工作，我必须去找，去求人。

十六、工作问题受挫，写出小说不能出版

到北京以后，我住在二十兵团时的同事王宇的家里。

王宇参加革命前是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生，1946年到冀东参加革命，在部队从事美术工作，文学水平也较高。1952年调到兵团政治部，编辑政治部的机关刊物《工作通讯》。我们工作接触较多，关系一直很好。这个人很正直，心地善良，待人谦和。有人批评他在运动中斗争性不强。事实上，他有自己的良知，对人对事，实事求是，从不见风使舵，更不落井下石，他对我问题始终持同情的态度。

我和王宇商量找军区解决工作的问题。困难的是，我在军区熟悉的人很少，而且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1957年轮换回国的时候，对口单位是宣传部，但我没有上班就请准了创作假，到北戴河写东西去了，没有正式进入宣传部编制，不能算宣传部的人。从北戴河回来以后，到文化部参加反右，但我并不是文化部的人，那是韩部长策划的，在文化部“借鸡下蛋”，由我顶替文化部一个反右指标，找文化部也没有理由。在军区政治部找不到了解我的情况又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我想来想去，决定去找韩部长。王宇提不出肯定的意见，他只是担心说：“韩部长整了你，现在你去求他解决工作问题，效果会怎么样？”我这人头脑简单，

我说：“正因为韩部长整了我，我才去找他。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和韩部长并无个人恩怨，肃反运动中，因为徐逸人的问题和他发生了冲突，他没有整倒我，反而被迫向我道了歉，憋了一肚子火。反右中，他费尽心机，终于把我打成极右分子，达到了目的。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他肚里的火总该消了吧。现在我落到这一步天地，连累一家老小，衣食艰难，他总该有点责任感吧。这个人心地是不够宽宏，但毕竟是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即使在工作问题上他不肯帮忙，但至少不会为一己私愤落井下石，做反面的工作，除了他，我确实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找。”王宇说：“韩部长的为人我不了解，你愿去找也行，但一定要管住你自己的脾气，千万不要把话说僵了，否则，以后事情更难办。”

我到王宇家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六，估计韩部长会在家，早饭后我就去找韩部长。我进门的时候，韩部长正穿着背带裤（因为肚子大，结裤带困难，总是用背带）整理柜橱里的东西。相见之后，他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冷淡。我向他问好，他并未停止手里的活儿，用冷冷的声音说：“你怎么找我来了？坐下吧。”我在方桌旁的木椅子上坐下来，说：“我到贵定探亲回来，路过北京，顺便看看韩部长。”他关好柜橱，在裤子上擦擦手，在方桌的另一边坐下来，说：“没有事你不会到我这里来，想干什么，说吧。”这异乎寻常的冷漠态度，使我心里凉了半截，预感到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可是既然来了，还是应该把事情说出来。我把这几年家里遇到的困难简单说了一下，我说：“按政策规定，解除劳教以后，由原送单位安排工作，可是我给军区政治部写过两封信，都没有回信。我刚回军区就被打成右派，政治部没有熟人，韩部长是老领导，希望能关心一下，和有关部门说说，给我安排个工作。”在我述说家里困难的时候，韩部长的表情没有任

何变化，仍然是冷冷的，我说完以后，他才转过脸，说道：“安排工作的事好办。得先看看你对错误的态度。你说，你在肃反运动中的态度是正确的吗？”我一听这话，心底的火忽地蹿上来。这不是乘人之危吗？反右中你把我打成右派，还没有解恨。肃反中你明明是错了，被迫道歉，丢了面子，现在趁我有求于你的时候，想压我屈服，向你承认错误，挽回你丢掉的面子。一个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怎么心胸狭隘到这种程度。我压制心中的火气，用和他同样的声音说道：“我认为我在肃反中的态度是正确的。”他追问一句：“你现在还这样认识？”我说：“是的，从肃反到现在我一直这样认识。”他提高声音问：“难道你没有一点错？”我说：“不能说一点错也没有，批斗过火时，我的态度也不够冷静，但在主要问题上，我的态度没有错。若不，韩部长为什么在小组会上向我道歉呢？”他腾地跳起来，脸憋成紫红色，吼着说：“放肆！你的工作问题我管不着，你爱找谁找谁去！”他一暴怒，我倒平静下来了，冲他淡淡笑了笑，说声：“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转身就走了。

回到王宇的家里，王宇埋怨我不能控制自己，不该把关系弄僵，更不该提他道歉的那块伤疤，激怒他。其实，事后我自己也很懊悔，为什么当时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明知他心胸狭窄，为什么还要和他针锋相对！

但事情已经发生，懊悔或埋怨都无济于事了。王宇提出：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找一个地位比韩部长高，而且了解你，肯为你讲话的人出面，或许还有点希望。我想来想去，想到了杨成武，从前我和杨成武接触较多，他了解我，也关心我。现在杨虽离开了军区，到总参任常务副总长，但军区领导大多是他的老部下，如果他能说句话，解决一个普通干部的工作问题不会有太大困

难。

当时杨成武的住宅在李广桥大街甲十号。我向门卫通报了姓名，对他说：“我是9号（杨当时代号）的老部下，这次路过北京，想看看老首长。”我心里却没底，不知杨肯不肯见我。

卫兵打进去电话不久，杨的秘书张忠庆就跑出来了。这个人身材健壮，性格开朗，我们过去很熟悉。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好几年不见了，你这是从哪儿来？”我把这几年的遭遇简单地向他说了一下。我说：“摘掉帽子两年多了，工作一直没有安排，我给军区写信，没有回信；想直接找军区，又没有熟人。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9号。不知像我这样一般干部的困难问题9号会不会管。”张忠庆说：“我估计会管。9号一向爱才，对你印象很深。1957年文化部整你的时候，他不知道，后来在政治部反右总结上看到了你的名字，问我是怎么回事，他已批准你去北戴河写小说，怎么又被弄回文化部打成右派？我也说不清楚。他是军区司令员，不便过问政治部干部的事情，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可是他不会忘记你，你现在这么困难，他不会不管。”

张忠庆把我引进里院的会客室，叫我稍等一会儿，自己进了里间。一小会儿，杨成武随着张忠庆出来了，一见到我就问：“徐孔啊，你怎么成了右派，到底怎么回事嘛！”我说：“运动当中的事一时说不清楚，我今天来，是想请9号和军区领导说句话，给我安排个工作。”张忠庆说：“徐孔同志这些年吃了很多苦。”把我刚才对他讲的情况，对杨说了一遍以后，接着说道：“按政策，解除处分以后，应该由军区安排工作，可是军区一直没有给安排工作，现在他一家老小天南地北分散在三处，吃饭都困难，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9号。”杨成武静静地听着，张忠庆说完，他对我说道：“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找杨勇（军区司

令员)。”我说：“我和杨司令员不熟，不好讲话。”他问：“张南生你熟不熟？”我说：“和张政委比较熟（张政委原是兵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回国后任军区副政委）。”杨转身对张忠庆说：“用我的名义给张南生写个条子：徐孔犯右派错误，帽子已经摘掉了。这个人跟我工作多年，是可以工作的，请军区给予安排。”

张忠庆写字一向龙飞凤舞，字很大，很潇洒，写得也快。杨口述完了，他把信也写好了，装进一个大信封，交给我，说：“张副政委的家你知道，你现在就过去，我马上给张副政委的秘书打个电话。”我接过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大信封，心里有点发虚。在劳教农场当了6年“贱民”，思想上离高级领导机关很遥远，现在我手里拿的却是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大信封，总觉得自己的身份和这个信封不相称，甚至于有点战战兢兢的感觉。我细心地把信封装进了衣兜里。

可能张庆忠的电话已经打过来了，我到张政委家，一按门铃，张副政委的秘书——也姓张，亲自开门把我迎进客厅，张副政委很快从里间出来了，说道：“我的家你不是不认识，到了北京怎么不到我这里来呀！”我心里苦笑：如果没有这封信，我能随便到你这里来吗？张副政委是个和善的长者，但不大主事，所以下边的干部有事情一般不找张副政委，我不知道他对解决我的工作问题是什么态度。但这一回，他的态度很明确，看过信以后，说道：“杨总长有指示，军区照办。你把通信地址留下来，事情定下来通知你。”我把通信地址留给张秘书以后站起来告辞。张副政委问：“你住在什么地方。”我说：“王宇家里。”张副政委说：“如果王宇那里不方便，你就到我这里住。”我说：“很方便。”我当然不会到军区副政委的家里住。张副政委是老红军，从二十兵团到北京军区，张一直是杨的下级，对杨很尊重。

回农场路过天津的时候，按过去的约定，我把自己已经完稿的反映朝鲜战争的长篇小说的上半部《亚东风云》送到林呐那里，顺便告诉他此次在京找杨解决工作问题的情况。林呐说：“杨成武身居高位对落难的老部下如此关心，很难得。如果你的工作问题能解决，对小说的出版也有利。小说放在我这里，编辑看过以后，结果如何我写信告诉你。”

回到农场以后，冯股长通知我，场领导要我筹建图书馆，图书馆的馆址在新建成的红砖瓦房里。1963年天津地区闹大水，农场的房屋全部被淹，大水过后，原有的土壁房有的倒塌，没有倒塌的也成了危房。省劳改局给调来一支由犯人组成的基建队，帮助农场改建红砖瓦房，首先在原劳教大院的对面建成一座四合院。图书馆就在新院落大门左边，临街的两间瓦房里。图书一部分由场部提供，据说是原来这里的劳改队留下的，多半是政治、时事类图书，数量不多。场部派我到黄骅和天津购买一批新图书，书目和书款没有限制。我除了购买政治、历史、科普等图书外，还买了很多中外文学名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订了《人民日报》、《天津日报》、《红旗》、《中国青年》、《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等多种报刊。不到两个月时间，两间房子里的书架和报架就摆满了。借阅时间主要是中午和晚饭后，白天和夜间除了整理借阅卡以外没什么事情，我就坐在图书馆里阅读一些文学名著，经过较长时间的写作以后，重读这些名著，对创作上很多问题有了新的体会，这对续写抗美援朝长篇小说的下部是有益的。这期间，我心里始终惦记着北京军区给我安排工作的事情，可是一直没有消息。

大约是12月初，接到林呐来信，要我有时间到天津去一趟，谈谈我的小说问题。我以购买图书的理由，向冯股长请准假，就

到天津去了。老朋友见面，实话实说，不绕弯子。林呐说：“我把你的作品交给编辑部的时候，没有说明你的身份，为的是使编辑们不带政治偏见。编辑部很快地三审通过，认为在反映朝鲜战争的长篇中是写得比较好的，稍加修改即可出版。但我把你的实际情况说明以后，编辑部认为，根据上边的精神，对这部作品只能割爱，不能出版。现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如果出这部书，会给出版社带来麻烦。”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事先不是毫无预感，当时的政治气候对我出书不利。但当林呐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这种结局时心里仍感到失落而压抑。我问：“是不是和我没有工作有关？”林呐说：“主要是右派问题，你虽然摘掉了帽子，但摘帽后是摘帽右派，仍然没有离开‘右’。这就很麻烦。”他问我：“北京军区那边有信息没有？”我说：“我写信问过张副政委，没有回答。”林呐说：“你要有思想准备，根据目前的形势，你的工作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以杨成武的地位加上他对你的了解，在他看来，给你安排个工作不是问题，但到了下边执行单位情况就不同了。人们都懂得‘左保险，右危险’，有总参领导和军区张副政委的批示，他们不会说不办，但可以找种种理由拖，这你就毫无办法。”他又鼓励我说：“我讲这些不利条件，是叫你有思想准备，迎接更长时间的考验，你不是个意志脆弱的人，一定要有信心，事情总有弄清楚的一天。如果有条件，继续把下部写出来，只要作品有价值，事情弄清楚以后就可以出版。”

看来，林呐对形势的了解比我清楚。过了整整一年，军区始终没有给我安排工作。1965年我探亲回来路过北京，找张忠庆了解情况，张忠庆谈的和林呐分析的差不多。他说：“9号（杨成武代号）的信，张政委已批给政治部，要求按9号的指示办理，可是迟迟没有落实。张副政委查问的时候，回答说，已经联

十六、工作问题受挫，写出小说不能出版

系过几个单位，都说，因为徐孔没有恢复党籍，不好安排，政治部还在联系新的单位。张副政委对此也没有办法。如果9号（杨成武）不离开军区，这件事可能不会费这么多周折，他是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他批示哪个单位办，下边不会不办，军队干部并非都是党员，军区的范围那么大，安排一个普通的工作并不困难，可是9号已不在军区，讲话的分量就不同了。现在只能等机会了。”

可是等到1966年，我不需要再等了，因为不可能有安排的机会了。

十七、无权参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一切旧的秩序，在“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下，革命的小将们几乎冲垮了一切党政领导机关，有的领导被批斗，有的靠边站，再找原单位的老领导，已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有的连人也找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解决工作安排问题！

这场风暴虽然来势凶猛，但对我们这些已沦为“贱民”的人却影响不大。因为“贱民”们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大革命”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贱民”们无权参加对走资派的斗争，却也不是斗争的对象。我们这些“贱民”成了置身“文化大革命”之外的特殊人物。但对我们并不是毫无影响。受影响的首先是图书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冯股长通知我，认真清理图书，凡是内容涉及封、资、修的书，一律撤掉销毁。第一次清理以后，场部派了几个人来检查，认为清理得很不彻底，明确提出，不但内容是封、资、修的不行，作者是封、资、修的也不行，譬如反动学术权威、文艺黑线人物、修正主义分子等等的著述都要清理。《甲申三百年祭》是毛主席作为全党教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年必读的作品，也不许保留。有一本时事读物小册子，里边有一篇彭真在北

京市委会上的讲话，我没检查出来。检查组严厉地批评我政治嗅觉不灵敏，为什么有黑帮分子讲话的书还保留在书架上？冯股长向我个别交代，清理一定要彻底，不怕留下的书少，要保证留下的书没问题。本着这个精神我又作了一次清理，对内容和作者把握不准的，一律先撤下来，结果只剩下毛主席和鲁迅的著作，还有一些农业科技的小册子。单本摆放，1个书架还没有摆满。当时毛主席著作出的不是很多，《语录》还没出，单行本只有《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几本书，毛选图书馆没有，鲁迅全集图书馆也没有，只有几本小说和杂文、书信集。一个书架只摆了三格，实在不像样子，我就选了一些农业科技小册子，字数不多，都是生产科技知识，作者我一个也不知道，但书的学术水平不高，估计不会是反动学术权威，而且检查组对这类小册子也不大注意，我就摆到书架上。

清理完毕，看着那些空下来的书架和堆满地上的清理下来的图书，我从心里感到很悲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概冯股长对第二次的清理工作有些不放心，下班以后又来到图书馆，问我：“清理完了没有？”我说：“完了，就剩下那么几本书。”冯股长看看书架上平摆单放那百十来本书，摇摇头，没有说什么。我在冯股长领导下工作多年，彼此熟悉，说话没有什么顾虑，我说：“像这样清理是不是过头了？特别是新购进那些书，很多是中外名著。如果现在就业职工不能看，最好装箱送到场部去，等解除禁令再拉回来，若是全部烧掉太可惜了。”冯股长说：“你先不要装箱，等我的回话。”过了一会儿，传达室找我接电话。图书馆在传达室的隔壁，电话是冯股长打来的，冯股长通知说：“书不要往场部送了，全部烧掉。”并提醒我说：“不要心疼那些书，不要算经济账，要懂得算政治账。烧掉的书，如果以后需要，可以

再购买；但政治上出问题，以后是难以弥补的。”

我明白冯股长的意思，大局已定，只能销毁。我把清理出来的书分成四堆，从文工团借来一辆板车，准备分四次拉出去烧。大院里住的都是摘帽右派，是知识分子，如果叫他们看见烧书，影响一定不好，直到熄灯以后，院里没人了，我才往车上装书，拉到院西墙外边，点火烧书。小册子好烧，扯开抖散，投进火里，很快就烧完了。大部头却很麻烦，费很大的劲扯开，投进火里，还是散不开，压火，烧得很慢。烧书的火光惊动了西边马号的人，夜间喂马的老杨跑过来问：“半夜三更的，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烧书。”老杨是劳改队留下来的就业职工，没有文化，对烧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说：“这么多书堆在一起，书压书怎么能起火？”他跑回马号，拿来一柄大铁杈，用铁杈把书挑松，火果然烧得旺了。我觉得老杨对烧书的事不会有特殊感觉，靠得住，就让他代为看着火，我返回图书馆把剩下的书都拉到院西墙外，堆到一起烧，在老杨的帮助下，整整烧了5个多小时。老杨又回到马号拿来一把大平锹，一把扫帚，帮我把烧书的灰扫到一起，用平锹装到板车上，推到附近的排水渠倒掉，等这一切忙活完，天已快亮了。

我以为，图书馆绝大部分图书已经烧掉，不会有人来借阅了。想不到，第二天中午我打饭回来，已经有十几个人在门口等候，主要是大院里边的人。这些摘帽右派，还有几个以前的地、市级领导干部，这些人在劳教农场这种特殊环境里，特别需要“精神食粮”，他们每天在干活、吃饭、睡觉之外，在精神上总需要充实一点东西。图书馆里书虽少，总还有百十来本，特别是这里有几种报纸和刊物，都是党报党刊，从中可以知道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政策，而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形势的发展令人迷惑不解。这些人都是经过反右的，其中不少人因为给党的领导提意见，有的只是对支部书记甚至某个党员提出意见，就被认为是反党，划成右派。而现在彻底翻了个过儿，各级党的领导却成了造反的对象，“革命小将”们冲击党政机关、批斗领导干部成了“革命行动”，而且层次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大。为什么这许许多多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了几十年的老革命家今天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人，有的被批斗，有的被打倒。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革命”做法也令人难以理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可是现在把传统文化一律视为“四旧”，很多文化典籍被焚毁，很多珍贵的文物被破坏。连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化工作也被全盘否定，都成了封、资、修的东西，文艺界成了“黑线”专政，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几乎所有的文学家、艺术家——多数是党培养出来的，都成了黑线人物，专家、学者，包括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有些是世界知名专家学者，除少数被中央保护的以外，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被关进牛棚，有的受到残酷的批斗，有的自杀身亡，以死抗争。农场这个特殊环境，消息比较闭塞，但从报刊杂志和各种渠道流到农场的名目繁多的红卫兵小报，探亲人员在外边的耳闻目睹，还有农场的学生们响应伟大的领袖号召，到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大串连归来后眉飞色舞地讲述他们到各地的“革命”行动，方方面面汇集的零星的信息已经够使人惊心的了。

经常到图书馆看书看报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原国家工作人员。形势的发展和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可是当前形势是如此混乱，只有一点十分明确，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越来越紧，特别是对待知识分子越来越严厉，知识分子已经沦为“臭老九”，

在“贱民”当中也处于最底层。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感到前途迷茫，对形势的激烈变化困惑不解。但彼此都不敢讲出自己的心里话，以免招来新的灾难，只能到图书馆看看党报党刊，从中了解一些信息。

当时图书馆的事情不多，我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个是在大院迎门的宣传牌上每天写一条最高指示，用彩色粉笔写美术体的大字；一个是参加“红海洋”的工作：在场部和各队面积比较大的墙壁上，用红漆漆成红色，再在红底上用黄漆书写“最高指示”，因为各处墙壁都漆成红色，所以叫“红海洋”。可能当时各地都在搞“红海洋”，红色油漆奇缺，有一位队长通过关系买到一批红漆，被作为热爱伟大领袖的具体表现受到表扬。当时就业人员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最高指示，除了天天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以外，打饭的时候也要学习“最高指示”，方法是：负责分饭分菜的炊事员先说出一条毛主席语录的上半句，打饭打菜的人接着说出下半句。对了，打饭打菜；错了，或者说不出来，到一边“学习”，学会了再打。一个队百十多人，只有两个窗口打饭打菜，这样一“提”一“接”，要费很长的时间，而且有时炊事员提的那条语录，打饭的人不知道，答得谬误百出，令人哭笑不得。后来，大家想出了一个办法，选择一条字数最少的语录“斗私批修”，分饭分菜的炊事员说：“斗私”，打饭打菜的人接：“批修”。这样，几乎不耽误操作时间，速度大大加快了。此外，早晨和晚上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一般人是起床以后朗读几段“最高指示”；熄灯以前集体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犯过错误或者被领导认为“思想反动”的人，还要早晚两次向毛主席“认罪”。那时候每个班都挂着毛主席像，“认罪”的人站在毛主席像前，先朗诵“最高指示”：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然后承认自己的“罪恶”，向伟大领袖表示决心：深挖反动思想根源，靠拢政府，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当时，没有人敢于对这些做法提出异议，即使流露出一些怀疑的情绪也要受到严厉处罚。但是，人们嘴上不敢讲，不等于心里没有想法。

一天，我刚在迎大门的宣传牌上写完“最高指示”，经常来图书馆看报的武某约我出去，说他写了份材料，叫我看看。我很奇怪，看材料在图书馆里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到野地去？他说：“图书馆里时常有人来，还是出去的好。我有些想法也想和你单独谈谈。”

这个武某是高干家庭的子弟，人们都说他是“自找的右派”。因为他出身好，工作努力，又很有才华，单位的一把手很器重他，他们是新闻单位，反右期间一直叫他值勤，没有参加反右斗争。到了后期的整改阶段，发动大家提整改意见。经过反右，人们说话都很谨慎，而且主要都是歌颂成绩，少谈甚至于不谈缺点。而武某却敞开胸怀，直抒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甚至引用日记上某些记载说明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本来他讲的和日记上记的并没有什么大事情，但却引起某些有心人的注意，要求看他的日记，他坦然地拿出自己的日记。有心人摘录他的日记写成大字报批判，他干脆公开自己的日记进行辩论。在新闻单位当然不乏文字加工的高手，终于把他加工成右派，他思想想不通，送他劳动教养的时候曾服用安眠药自杀，未成。当时我在文艺组，他是先被送到文艺组的，神志不清，满嘴胡言乱语，是农场的医生把他救过来的。

他在农场改造几年，始终没有学会包装和掩饰自己，说话做

事总是直来直去。我真担心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他有什么不合时宜的举动。不出所料，到了场部北边，我们在引水渠的堤埝下边坐下来，他掏出一份材料，有五六千字，内容竟是当时最忌讳的批判个人专制的材料。我看过以后，着实吃了一惊，很严肃地对他说：“你这个材料要马上烧掉，不要再给任何人看，也不要和任何人说，你不会看不清当前的形势，你的材料送出去，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遭来杀身之祸。”大概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黯然地收回材料，没有再说什么。我还是不放心，临分手时再一次对他说：“你一定要把材料销毁，一个字也不要留下。”他点了点头。

此后不久，农场分批举办就业职工骨干学习班。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报刊社论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然后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挖黑心，树红心，对伟大领袖无限忠诚”。每个人都要写出书面材料，由场里干部主持，在全班通过。大概听到别人的检查，武某沉不住气了。我也参加了学习班，但行动比较自由，每天晚饭以后要回图书馆办理借阅手续。一天，武某到图书馆来了，别人都离开以后，他心神不定地问我：“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当时回答他，叫他帮我整理好书报，等他心情稍微平静以后对他说：“你的思想问题只有你自己清楚，别人怎么会知道，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明显的暗示他当然明白，安心地回去了。可是我还是不放心，这个人自幼生活在革命家庭，思想单纯，对党忠贞不二，正因为真心真意地热爱党，对党内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感到焦虑甚至于愤慨。他又从来不会说假话，在外部的压力下，很可能说出他的真实想法，而这，在当时，铁定无疑地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毁掉他的一生。应该想办法减轻他的压力，稳定他的思想。我就向主持学习班的

秦大队长建议：学习班每次学习之前都要读文件，可是读文件的人有的文化不高，不能理解文件的精神；有的人文化不低，但没有读文件的技巧，读起来磕磕巴巴，平平板板，使听的人难以了解文件的重点和精神实质，效果不大好。武某在电台工作多年，又做过播音工作，不如发挥他一技之长，固定叫他读文件。秦大队长采纳了我的建议。武某读文件的水平当然与众不同，他根据文件的内容，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声音朗朗，效果很好。学习班的人认为，领导专指定他读文件，说明领导信任他，就不在他身上找毛病，他自己也觉得得到领导信任，心里踏实多了，总算平安地过了学习班这一关。

事隔三十多年，当年同在农场改造过的白石，已经成了河北省的领导干部，武某也在河北省工作。一次，白石到北京来，我向他打听武某的情况，白石说，武某回电台工作以后，仍然主持一个节目，工作不错，并且结了婚，有了孩子，现在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我说起武某“文化大革命”期间写材料的那件事，至今仍替他感到后怕。白石说，当时武某也曾给他看过那份材料。我们两个是谁先看到的？因为都信守诺言，不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当时不知道，现在更说不清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白石看过材料以后和我的态度一样，叫他马上销毁，不要再给任何人看。这位老弟总算还有点理智，接受我们的意见，除了我们两个再没给别人看。如果这件事当时被人捅出去，他早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可能再回电台工作，也不能有他的家庭和子女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算得上是就业职工当中的逍遥派，没有遭受批斗，也没有感受过什么压力，但我的内心同样是灰暗的，眼前迷雾茫茫。在这种运动的形势下，我的出路和我的家庭该怎么办呢？

一天，和我住一间宿舍的管澡堂子的老孙下班回来，对我说：“我今天看见一件怪事，李队长叫我帮他家修灶炕，路过场部的时候，场部大院正在开大会斗场长，人们喊：‘打倒刘少奇的黑爪牙。’学校的学生们还摇着小旗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刘少奇不是国家主席吗，还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怎么这老哥俩也打起来了？”

老孙是泥瓦匠出身，没读过几天书，从不看报，也不关心国家大事，每天吃饭、干活、睡觉，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但刘少奇他还是知道的。刘少奇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听到有人公开喊打倒刘少奇感到很惊讶。

我也很惊讶。虽然从《炮打司令部》到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派”和《黑修养》，我已经明确地知道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但毕竟没有公开点名，而且批判是在上层和舆论界，这么快就在基层单位甚至在小学生中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是意想不到的。劳教农场这种特殊单位的基层领导和刘少奇根本沾不上边儿，居然成了刘少奇的黑爪牙。刘少奇从1956年八大以后就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央各部委、各省、市的领导都和刘少奇有工作联系，更不知有多少人要受到刘少奇的株连而被打倒了。

由于我在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不多，经常派我干一些临时性杂活儿。一天，冯股长分配我和白石一起去丈量六队的耕地面积。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心里郁积着很多迷惑和苦恼，但不能和任何人说。白石是老同学，彼此了解，可以坦诚地谈出自己的思想。丈量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在大堤下面坐下来，谈起“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说起场部开大会批判“刘少奇黑爪牙”的情况。刘少奇是毛主席亲自确定的接班人，现在竟喊出“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

这是什么道理呢？白石说：“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也令人不可思议，我们这些普通党员入党以前，对历史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必须历史清楚才能入党，刘少奇是党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他的历史怎么会不经过严格的审查？”

我们谈了很多，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是把很多郁积于心的想法说出来，心情感到松快一些而已。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没有像往常一样一年探亲一次。1966年红卫兵大串连，交通拥挤，秩序也乱，我没有去贵州探亲。到了1967年，大串连的浪潮已经过去，有些职工探亲回来说，火车、汽车已不太拥挤。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发出的“最高指示”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外边是怎样的好法，我想走出农场这个特殊的角落亲眼看看，因为形势连着我的命运啊，另外，两年多没有回去了，家里人怎么样了？我是摘帽右派，当时造反派当中流行一句口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宝珍和孩子是否受到了株连？我实在放心不下。8月份我请准了探亲假。

一到天津，就感到气氛和往昔很不一样，临街很多楼房挂着造反组织的“司令部”、“指挥部”，还有外地造反组织的“驻津联络站”、“驻津办事组”等大招牌，有的门前还站着身着军装、佩戴红袖标的年轻人，耀武扬威，一副傲视一切的气概，不知是门卫还是造反派的接待人员。街上行人不多，有些商店关门停业，市面显得很萧条。天津原是个繁华的商业城市，往昔的繁华景象已经不见了。

车站和火车上的秩序都比较乱。特别是北京站，因为北京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东西南北在这里换乘的人很多，买不到车票的

人就在站里站外席地而卧，吃完东西废弃的饭盒、包装纸、果皮、果壳丢得满地都是。买票大厅的秩序更乱，虽然各售票窗口前买票的人按惯例都排队，但一些年轻体壮的人毫不客气地把靠近窗口的老人和妇女挤到旁边，自己抢先买票，人们呼吼斥责，毫不济事，谁力气大谁就先买，始终没有路警和车站工作人员维持购票秩序。我排了一夜的队也没买上票。幸亏遇上了一个转业军人。他排在我的后边，二十多岁，比我高出半个头，身体健壮。大概他看我穿着旧军装，就和我聊起天来，当他知道过去我曾参加抗美援朝，是前线记者，立刻对我亲热起来，说他哥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机炮连长，还立过两大功。他原是广西军区的，在警卫部队当排长，刚转业不久，他这次是到北京出差的，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贵定探亲。他立刻急起来，对他身后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说：“这位记者同志已经排了一夜了，这趟车再买不上票，还得等一天，记者同志太‘守纪律’，咱们得帮帮他。”他叫我继续排队，他和后边那个穿军装的站到旁边维持起排队的秩序来。凡是有前边“加塞”的，两个小伙子就毫不客气地把他扯出来，叫他们后边排队去，“加塞”的人虽不满意，但看两个小伙子都穿着军装，而且年轻体壮，倒也没敢发作。这样，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到了窗口，我们三个人都买上了车票。到上车的时候也是两个小伙子打先锋，检票以后，他们一路冲刺，远远在我之前上了火车。车厢里非常挤，我挤进车厢的时候，过道里和车厢的连接处都已挤满人，连衣架上也躺着人，可是先上来的两个小伙子居然找到一个座位，一定要让给我坐，说：“从北京到柳州要两天两夜，你到柳州还要转车，没个座位，不打个盹，是支持不住的。我们到了柳州离南宁就不远了，不用转车，在部队你是老前辈，就不要客气了。”

车厢里不供应开水，因为人太挤，想上厕所都困难，却不见列车员维持秩序。两个小伙子又主动地担当起列车的服务工作，他们居然从列车长那里借到一个暖瓶，加上他们两个自带的军用水壶，到餐车灌满了开水提回车厢，先给我倒了一茶缸开水，自己留下一个军用水壶，其余的分给了几位老人和带孩子的妇女。有一个小姑娘扶着老太太想上厕所，怎么也挤不过去，小姑娘急哭了，还是挤不动。两个小伙子用力分开过道的人，把老太太送进厕所，之后又把老太太送回原来的座位，座位已经被人占了，小伙子礼貌地请占座位的让出来，扶老太太坐下才离开，老太太不断地夸解放军好。

一路上，不但我喝开水由两个小伙子包了，连吃饭也包了。他们的挎包里带着很多面包和香肠、面肠。我要到站台买吃的，他们说，他们带的东西很多，足够三个人吃了，每顿都是和我一起吃。

到了柳州，我该转车了，他们和我交换了通信地址，把我送到车下，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再说，如果以后有机会到南宁，一定告诉他们，他们对南宁熟，带我好好玩两天。

我在部队战斗、生活了十年，对部队怀有特殊的感情，一路上部队的两个年轻人对我的热心照顾使我倍感亲切。

从柳州到贵阳的火车并不挤，每个人都有座位，车厢里有开水供应，车上的秩序很好。车开动以后，列车员还带领大家读了一段“最高指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要求旅客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在旅途中团结互助。

不料，天黑以后却遇到了惊险。列车快到独山的时候，忽听前方不远的地方响起激烈的枪声。车上的人们惊慌地说：“铁路

上的造反派又在武斗了。”

列车到了独山车站，离武斗的地方已经近了，就在右前方不到1000米靠近铁道的地方，就着铁道旁的灯光和枪口喷出的火光依稀辨认出那里有一座水塔，水塔下有一座砖房，一方在向水塔和砖房进攻；一方在据守水塔和砖房。车站的扩音喇叭震耳欲聋：“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据守方也在喊着“最高指示”，但他们没有扩音设备，好像是用喇叭筒对着枪眼向外喊的，声音盖不过枪声，断断续续，但可以听到，也有“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等最高指示。

过去，我听人说过打语录仗的事，我以为不过是用自己引用的语录反驳对方引用的语录，在口头上交锋。现在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嘴里喊着“最高指示”，手里却用杀人武器，要把对方置于死地，都说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上是打着“最高指示”的牌子，干着争夺权力的勾当。

列车停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开动，人们都有些急起来，在武斗的地方停久了，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在双方交火的子弹没有打到站台上，有些胆大的人就下车去打探消息，一会儿，下去打探消息的人急慌慌地跑回来说：“坏事儿了，这次列车的司机是守水塔那一派的，刚才被车站掌权的一派——就是攻水塔那一派查出来，五花大绑装进麻袋里，要扔进山沟喂野狗。”列车里的人全慌了，如果列车窝在这里可怎么办，各个车厢的人都在想办法，不久，有人回来说：“四车厢有两个乘客认识掌权这一派的，一个还认识他们的头头，大家已经委托他们两个人交涉去

了。”很幸运，两个人说服了掌权派的头头，装进麻袋的司机被放回来，列车又继续启动了。

这次列车短程旅客很多，到了后半夜，车上的人就不多了，大部分人可以躺在座位上睡觉。途中也没有再遇上武斗的事。第二天下午一时许，火车平安地到达了贵定。

家里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家已经搬到税务局的院子里，在二层楼下层的一个单元，一大间一小间，后边还有一间厨房。宝珍和孩子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比较平静地在家里住了 20 多天。

回来的路上，列车到天津已是深夜 11 点多，找不到旅馆，我只好到大舅兄徐少涵的岳父家去住。那是一座三重大院落，他家在最后一重院子。一进大门，就见头重院的正厅灯光辉煌，大厅的正中摆着一张乒乓球桌，球桌上堆满酒瓶、烧鸡、熏肉、糕点和香烟，很多青年男女都穿着军装，戴着红袖标，有的坐在球桌上，有的围站在周围，又吃又喝又抽，狂呼乱叫，还有的男女搂在一起，嘴对着嘴抢吃鸡腿，旁边的人拼命地拍巴掌，丑话脏话不堪入耳，屋子里烟气腾腾，烟气和酒气直冲到院子里。大厅里几乎闹翻了天，其他房间里都黑着灯，寂静无声，大概这院里的住户没人敢惹这帮“革命小将”。

到了后院亲戚家里，我问：“前边院子里那些青年是干什么的，深更半夜的还在那里胡闹腾？”大舅兄的岳父是个老工人，无可奈何地说：“都是中学的学生，参加了造反派，整天的到处批走资派、破四旧，见了好东西就拿。到布店，说绸缎是腐朽文化；到了烤鸭店、饭店和糕点店，又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拿走人家的好东西，还砸人家的店铺，连对面那家茶庄的茶叶也给抢光了，吓得很多商家不敢开门。都是刚十几岁的孩子，不好好

上学，整天地出去打砸抢，晚上聚到一起，胡吃海喝，什么坏事丑事都做。总这么闹下去，不是把孩子们毁了吗！”

我的心情也很沉重。

回到农场不久，管教股通知我，撤销图书馆，分派我和老孙管理澡堂子。我和老孙的任务是，干部洗完澡后我们淋浴池，打扫房间，干部们洗澡的时候还要做服务工作，侍候洗澡的干部。当时来洗澡的没有场里领导干部，可能他们正在挨批斗，没有行动自由，来洗澡的主要是斗人的年轻人、造反派，他们在澡堂子里也摆出造反派的架式——霸气十足，脱光衣服，用手一指：把拖鞋拿过来！就得把拖鞋送到他跟前，不合脚还得给他换。我看不惯这种作风，所以干部洗澡那天，我大多不去，由老孙支应，有时老孙有其他工作，我就得去。如果指挥我拿拖鞋，我就客客气气地说：“那么多拖鞋，不知道哪双合你的脚，你还是自己拿吧。”农场的干部绝大多数都认得我，虽不高兴，但一般的都没有发作。也碰上过脾气大的，横眉瞪眼地喊：“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叫你干什么你就得老老实实地干什么。”逢上这种情况，我并不争论，推门出去，靠着南墙晒太阳，倒也没有把我怎么样。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我的服务态度问题被反映到管教股了，一天早饭以后，冯股长来到宿舍，一见我就笑了，说：“怎么样，你对现在的工作有些不适应吧。”我没有说话。

冯股长说：“我们没有批评你的意思，给你换个地方。从明天起你去六队，劳动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到时候再说。”

六队紧挨着北大港，那里的熟人较多，白石、李义、吴咸宁还有和我一起的子弟学校当过教师的宁野等。不过这些人分散在各个班，平时接触的机会不多。只有李义例外，他常帮队长办一

些事情，和各班的接触比较多。我被分配在三班，他来三班的次数格外多。我来六队那天，是他推着小板车到场部把我的行李拉过来的。到了班里，他又嘱咐三班班长张孝直把我的铺安排到边上，免得夜里睡觉两边挤睡不安生。

我在文艺组时多次到六队来，认识张孝直。这人曾是美国留学生，当过国民党的空军驾驶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中学当教师，性格爽直。他笑着对李义说：“你别唠叨了，老徐的情况我了解，我会安排好他在班里的生活。”

当时秋收已经结束，转入冬季劳动，主要任务是送粪，两个人一辆带斗的胶轮板车，把马厩和羊圈积下的有机肥拉到田里，送完队里的积肥以后，转到大港里拉肥。大港里是一望无际的苇塘，多年割苇子留下的苇茬、零碎苇杆、苇叶和腐烂的苇根积成10至30公分厚厚的腐植层。据场里农科人员化验，这层腐殖质的含氮量高达50%以上，不管化验结果是否准确，这种腐殖质肯定是很好的有机肥，特别对农场这种碱性土地，不但有肥效，还能改良土质。当时土地已经封冻，但腐植层很松软，用平锹切成一块一块；贴冰冻的地面一铲就铲起一大块，装车直接拉到田里。

几十辆板车进大港，引起附近居民的注意，有的老乡找到队干部提意见说：“你们铲去这一层，明年就长不出苇子，大片的苇塘就毁了。”可是当时人们没有环保意识，队干部对老乡的意见不予理睬。我们当然执行队里的决定，照铲照拉不误。

进入12月份，场部通知各队，利用业余时间排练节目，参加新年联欢晚会。经过破四旧，反封、资、修，可排练的文艺节目很少很少了。听说文工团在排练沙家浜，六队决定唱语录歌。教唱和指挥由吴咸宁担任，参加唱歌的人由各班推荐，是否入选

由吴咸宁决定。三班提出三个人，其中有我。我忙对张孝直说：“我自幼不喜欢唱歌，也不会唱歌，你可以问问吴咸宁和宁野，到农场十年听到我唱过歌没有？”张孝直是直爽人，听过我的解释，没有再勉强。可是当时唱语录歌是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忠和爱，很多人以能参加歌唱队为光荣。有人向队长反映，徐孔到农场不久就写过劳动改造思想的歌词，传唱全场，他会写歌，怎么能不会唱歌？歌唱队缺谁也不能缺徐孔。收工以后李义陪于大队长还找我谈过话，于大队长说：“听张孝直讲，你不想参加歌唱队。”我说：“不是不想，是我不会唱歌。”于说：“你能写歌词，怎么能不会唱歌。”我说：“写歌词和唱歌是两回事，我五音不全，如果我参加歌唱队，出来杂音怪调非把歌唱砸了不可。”于大队长乐了，说：“那也不要紧，反正是齐唱，你声音小一点，或者只张嘴不出声也行，农场的人都知道你在文艺组文工团好多年，你不参加不好。你再考虑一下吧。”这一下，我倒为难了，如果把这件事和对伟大领袖的感情扯到一起可就麻烦了。我理解，提议我参加歌唱队的人，是出于好意。可是他们哪里理解我的情感！我当时的情感是唱不出那种歌曲的。

正在我为难之际，一项临时的任务给我解了围。六队在冬天除了农田劳动之外，还有一项副业生产——做豆腐，用队里自产的黄豆磨豆腐，除少量供给伙房外，大都做成冻豆腐，供给外队和附近农村，可以有些现金收入。做豆腐的关键技术是点卤。豆腐老或嫩，出豆腐率高低，全在点卤。不知什么原因，会点卤的人调离了六队，一时找不到代替的人，豆腐房只能歇业。队里很着急。有人向队里推荐了我，说东北出大豆，家家会做豆腐，徐孔准会点卤。于大队长就找到我，问我是否会点卤？我说：“家里做豆腐的时候，我见过母亲点卤，自己也试着点过卤，但没有

把握。”于大队长说：“自己点过就好办，再试试。”其实，点卤的技术并不复杂，有些科学知识的人学起来更容易。我试着点了两次，效果很不错，出豆腐率和豆腐的质量都超过以前。这样，就把豆腐房交给我管理，重新开张。因为做出的豆腐大部分要冻起来，出豆腐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下午5点多钟开始，10点来钟结束，这时候队里的排练工作也结束了，我不参加排练理所当然，再没有人提意见了。

在豆腐坊干了几天，我发现这里的工作很乱，没有分工，什么事都是大家一起上，效率不高，时间拖得很长，从早到晚没有休息时间，很累。我就和大家商量，把7个人分成两组，一组3个人负责择豆、泡豆、上磨；二组4个人负责摇包出浆、点卤、出豆腐。这样可以轮班休息，责任分明，效率也大为提高，8点多钟工作就全部结束了。

豆腐坊离队部有2里多路，每天夜里留两个人值班，其余的人都回队部睡觉。

收工以后，在漆黑的夜色里，沿着引水渠的堤埝走回队部的时候，可以听到远远的前方排练语录歌的歌声，歌声在空旷的田野上传得很远很远。这漆黑的夜色、远方的歌声引起我一段遥远的回忆：抗美援朝初期，作战条件非常困难，我们没有空军，天空完全是敌人当家，部队都是夜间行动，部队的后勤供应全在战士干部的肩膀上，每个战士背负五六十斤的粮食和武器弹药；我们这些机关干部也要背三四十斤。我们是在东线作战，朝鲜的东线山势陡峭，爬坡的时候，后边人的头几乎要碰到前边人的脚后跟。漆黑的夜色、陡峭的山坡、沉重的背负，使行进非常困难，特别是到了后半夜，浑身的力气好像用尽，背包带紧紧勒住脖颈儿两侧的血管，喘不过气来，迈不动腿，好像再一步也难以迈动

了。可是就在这时，漆黑的夜色里，突然从上边文工团鼓动站那里传来响亮的歌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歌声使我们的心里突然亮堂起来，好像毛主席就在上边召唤我们前进，背负东西似乎不那么重了，夜不那么黑、坡也不那么陡了。很多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奋力地向上攀去。

那时候，毛泽东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里就是一盏明灯，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毛泽东号召什么，即使牺牲性命也勇往直前绝不犹豫。记得1947年，傅作义派出大部队携带大量炸药企图偷袭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当时华北主力部队都在外省作战，中央留的警卫部队很少。华北六纵队接到电令火速回师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但他们相距几百里，很多战士干部急得哭起来，他们彻底轻装，日夜兼程往回赶，有的战士实在跑不动，就奋力往前爬，誓死也要截住敌人，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春节过后不久，豆腐坊歇业，全队转入农田劳动，撒完粪，土地解冻了，开始修整引水渠和排水渠道。这种土方活，分段、有定额，劳动强度比较大。我凭着不肯认输的劲头坚持过来了，成绩在全队还比较靠前。

8月份，我请准了探亲假，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二次回家探亲。

这一次在旅途中没有遇上武斗，也没有遇到其他麻烦，列车上的秩序好多了。可是到了贵州，社会秩序却比较混乱。贵定县城的两派斗得很激烈。税务局有个股长，去年和我爱人一起被选为革委会委员，不久前被对立的一派揪出来。我到贵定的那天，他正被押在汽车上游街。税务局还有一个叫马文才的，是转业军人，为人质朴随和，和谁都谈得来，想不到也被揪斗。理由很荒唐，马文才的父亲叫马宝常，“宝常”和“保长”的音相近，从

前人们开玩笑，叫他父亲“马保长”。想不到武斗当中，对立的一派竟把玩笑当成真事，说他是反革命“保长”的狗崽子，给他挂上大牌子，戴上高帽子，押着他游街，游斗当中，还叫他自己敲着锣喊“我是反革命保长的狗崽子，我罪该万死”等口号，生生把个人斗傻了。马文才整天浑浑噩噩，害得他爱人既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他的生活，苦不堪言。

听说省城贵阳那里造反派之间斗得也很激烈，还发生一起“反革命”事件。一位女记者贴反对江青的大字报，被处死。这位女记者知道反对江青必死无疑，事前把两个孩子送到乡下的父母家里，回来才贴大字报，果然，马上就被抓起来。女记者喊口号，被用铁丝把嘴勒起来，使她喊不出声，然后押上汽车，游街示众，处死的手段很残忍。

因为社会秩序不好，生活不安定，假期未满我就动身回农场了。上一次探亲回农场是夜间到达天津，找不到住宿旅馆，给亲戚家添了不少麻烦。这一次到北京站后没有立时转车，在候车室坐了一夜，第二天早车到天津，一出车站就看到了站前广场上“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大标语。我着实吃了一惊，余立金和傅崇碧我只知其名，不熟悉。可是杨成武我太熟悉了。我在他的部下工作好几年，多次随他下部队、参加重要会议，还帮他写过回忆文章，对他的历史情况也知道一些。这个人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长征时是红一方面军主力之一——红四团政委，在飞夺泸定桥、抢占腊子口以及率先头部队最先通过草地为后续部队探路等事情上，立下显赫战功。抗日战争时期，杨成武支队是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解放区的主力部队，黄土岗之战击毙了日本侵略军的“名将之花”阿部中将，日本朝野震惊。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华北野战军政委、三兵团司令员，曾参与指挥歼灭国民

党暂三军的清风店战斗、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的战斗。他是解放军年轻的高级将领，任华北野战军政委时只有32岁，年轻有为，好学敏思，英勇善战，很受中央领导器重，不久前还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怎么突然之间就成了反革命呢？

回到农场不久，在一次职工大会上，张股长点到了我，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阶级斗争很复杂。最近中央揪出了杨、余、傅反党集团，咱们队就有人和杨成武的关系很密切，常有来往。他摘帽以后，杨成武还给北京军区写信，要军区给他安排工作，可见对他很关心，他知道杨成武什么罪行，应该主动地交代清楚，不要企图蒙混过关。”我知道张股长点的就是我，但我实在不知道杨成武有什么罪行，就假装听不懂，什么也没说。这位张股长按级别应该大队长，不知什么原因，他不是大队长。大队长姓于，部队转业干部，年轻务实，做事比较稳重。于大队长没有找我谈这件事，他也没再找我，这事就算过去了。

秋收以后，传说这个农场要改成五七干校。队里开始找人谈话，根据个人的情况安排出路，可以回家，可以自谋生计，无处可去的由农场统一处理。我问白石打算怎么办？他说准备回农村老家，他爱人孩子也回去。白石这个人一向做事冷静、慎重，他决定的事情很少改变的。他回农村有一定的条件，农村里总还有个家，他爱人虽被划为右派，但还保留着公职，回去有可能安排工作，有些工资。而我，七岁就离开了农村老家，三十多年没有联系，父母均已去世，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都在城市工作，农村没有家，回不了。爱人那里也去不了；只有等农场统一处理了。

十八、劳改盐场

1969年年初，仍留在农场的就业职工统一调到唐山地区南堡劳改盐场。据说这个盐场有犯人和刑满就业职工4万多人，盐场的面积和盐的产量都是亚洲第一。

劳改盐场的管理比大苏庄那边要严格得多。盐场周围筑有很高的土墙，因为面积太大，围场土墙至少有几十公里长，土墙上等距离地筑有警戒岗亭，以防犯人外逃。刑满就业人员出围墙也有严格规定。

盐场的生产管理系统不是分队，而是分工区和工段，我被分在六工段，工段宿舍紧挨着运盐干渠。六工段有40多人，多数是从大苏庄农场调来的，另有几个懂产盐技术的刑满就业职工。

我们调来的时候正是冬季，不能晒盐，是盐业生产的淡季。我们受领的第一次任务是修堤，这可是超强度的劳动。10年前大苏庄农场曾抽一批人到这里参加过修堤，肖洪就是因为承受不了这种超强度的劳动，累得胃大出血，没有抢救过来死掉了。

修堤就是把原来的大堤加高，两个人一副筐、一段堤，分段负责，互相比赛。取土坑离大堤不过十多米，抬起筐就爬坡。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抬筐的时候，两个人不是一前一后，而是对着脸抬对肩横着走，倒筐的时候不是放下筐再倒，而是到了

倒筐的地方，两个人同时扯着筐绳的一侧，用力一抖，在行进中用肩和手的力量把土倒出，这需要技术，更需要体力。

我被分配和原大苏庄农场卫生所的俞士钧用一副筐。我在农场的生产队劳动过一年，也干过土方活，但像这样重的土方活还没有干过。俞士钧则一直在卫生所，更没干过重体力劳动。我们两个一起商量，这是到劳改盐场的第一次任务，无论如何要坚持住，不能半路退下来。劳改队干部习惯于对犯人的管理方法。十年前我随农场的人到这里参加修堤，曾见过盐场犯人和就业职工修堤的情况。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强制劳动改造，又常年干这种活，既有技巧，也有体力，有些犯人、职工头发都白了，可是在修堤当中，装筐、抬筐、倒土动作异常快捷，效率很高。我和俞士钧都正当壮年，如果完不成任务，很可能被认为是消极怠工，抗拒改造，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我们找到工段一个姓刘的老就业职工向他请教修堤当中装筐、抬筐、爬坡、倒土的技术要领，领到土筐、扁担和铁锹以后，又请他给做了示范。

但实际干起来，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到那些要领。特别是头三天，肩压肿了，一挨扁担就痛得头上冒汗，特别是两腿的膝关节，一迈步好像骨头磨着骨头疼得钻心。我问俞士钧，能不能坚持？他说：“男子汉的骨头是硬的，干！”

我们咬着牙坚持下来了，逐步掌握了操作要领，进度加快了。干了半个月，我们分的那一段完工，还帮助落后的工段抬了一些土。

回到工段以后，到伙房打了一盆热水，好好地擦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中午到伙房打饭的时候，看见大苏庄农场六队的高队长站在段长的门前。

高队长是从部队转业到农场的。我到六队的时候，他也是刚

到六队，分管管教工作，二十多岁，矮个子，南方口音，性格很直爽，可能因为我从前也是部队的，他在我面前从来不摆队长的架子，说话很随便，我们接触较多。

在劳改队这地方见到原来农场的人感到很亲切，我高喊一声：“高队长！”他转脸看见了我，也快步迎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常和张科长、冯股长念叨你们这些笔杆子可能干不了这里的重活，想不到你们表现得还不错，我把你的情况都向工段的张段长介绍了，张段长对你这一段的劳动表现很满意。你的事情，以后张段长会找你谈。”

晚饭以后，张段长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这人总有40多岁了，中等个儿，连鬓胡子，态度严肃，平素很少说话。在劳改队里，国家干部和犯人、就业职工之间的界限非常森严，特别是这位段长，工段的老职工都怕他，常常有意躲避他。可是今天他对我却比较客气，叫我坐下来，还给我倒了一杯水，对我说：“你的情况高队长都向我介绍了。从今天起，你就担任工段的大组长。”

这个工段分两个组，每组一个组长，两个组长之上有个大组长，协助段长管理全段职工的劳动、生活、学习。

我们刚来的时候，和工段的老职工总有些疙疙瘩瘩合不来，是什么原因，我一直也不明白。可能是，大苏庄来的这些人从前大多是国家干部，有一定文化，虽在农场改造多年，但劳教是行政处分，和劳改队的管理方法有所不同，所以这些人生活作风、生活习惯和服刑多年的工段老职工不大一样。而在干活方面，特别是干盐场的活，大苏庄来的人一窍不通，当然远不如工段的老职工，有些老职工就看不起新来的人，甚至在生活和劳动上找碴儿、刁难。我就曾受过两次刁难。但这些老职工有个共同的特

点，政府干部对他们具有绝对权威。段长决定我当工段的大组长时，他们对我以至大苏庄来的这些人就显得客气多了。

盐业生产季节性强，各个时期的任务也明确，我根据任务的需要，每天安排各工种的劳力，利用这点便利条件，尽量安排大苏庄来的几个身体弱的或手脚笨的干些轻活或简单的活，使大家都能各尽所能、完成任务，在新的环境里不至于遇到太多的困难。

1970年8月初，我意外地接到内弟徐少林的电报，说我爱人徐宝珍病重，持续高烧不退，已从贵定医院转到省城贵阳人民医院。我真是心急如焚，我们这个家，特别是三个孩子的抚养主要靠我爱人，三个孩子可以没有我这个爸爸，但是绝不能失去母亲。我马上向张段长请了假，当晚赶到北京，买票的时候，车站告诉我，原来走的那条路线，从柳州到贵阳那一段已经中断；要去贵阳只能从郑州转陇海线，绕道四川。我管不了那么多，只要能去贵阳就行。天不亮就登上了去郑州的列车，第三天中午到了重庆。据说重庆是长江沿线三大火炉之一，而那一年又是重庆气温几年来最高的一年，一下火车就感到热气逼人，好像置身于蒸笼之中，我在北方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高温，加上两天多来在硬座火车上没有得到好好的休息，几乎要晕倒在站台上。我艰难地走进一家冷食店，店里座位也是热的，好在冰镇酸梅汤是凉的，喝了两杯，心里凉爽多了。

第二天下午到了贵阳，我赶到人民医院。护士指给我宝珍住的病房，是一间五六张病床的大病房。宝珍躺在靠门口的一张病床上，合着眼，正在输液。坐在旁边陪床的内弟徐少林一转脸看见了我，急忙站起来，低声问：“刚到？”我点点头，看着宝珍，小声问：“退烧了没有？”少林摇摇头，说：“可算把你盼来了，

这几天快把我急死了，一直查不出是什么病，医院里的消炎药全用过了，就是不退烧，老是40来度，有时达到40.5度，不能吃东西，光靠输液。”大概宝珍并没有睡，听到我们说话声，睁开了眼睛，有些惊奇地看着我，问：“你怎么来了？”我说：“接到了少林的电报。”她问：“见到莉莉没有？”她是挂念留在家里的二女儿莉莉，可能她以为我还像以往那样经柳州过来的，走那条线路就要先到贵定的家里。我说：“柳州到贵阳的线路断了，我是从陇海路绕四川过来的，还没有回家。”她又合上眼不说话了，大概她很虚弱，没有说话的力气。

病房里每张病床都有陪床的，人多，说话不方便。少林拉我到病房外边，把宝珍得病、治疗、转院的详细情况向我说了一遍，他说：“大夫们也很着急，查不出是什么病，就确定不了治疗方案，老这么拖下去怎么得了？”我到这里人地生疏，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我说：“现在只能求助于有经验的老大夫，这个医院谁的医术最高。”他说：“内科杨大夫在贵阳医学界声望很高，医德也好，是医学院的兼职教授。”当天晚上我和少林就到杨教授家里求助。杨教授40多岁，瘦高个儿，东北口音很浓。我一问，果然，他是沈阳人，我们是同乡，又是同龄人，说话就方便多了，我请他无论如何给予帮助。杨教授满口答应，他说：“多亏宝珍同志年轻、身体素质好，否则，高烧这么多天，是难以支持的。现在关键是尽快查明是什么病，才能对症下药或者进行手术。会诊时我做检查，也看过她的病历，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她的症状很可能是胆的毛病，我想用一种民间处方做一次检查，这种方法医院很少用，但检查胆症却很有效，就是给病人吃油煎荷包蛋。”这个方法果然有效，确诊为急性胆囊炎，但当时医院的药品供应状况不是很好，急需的药品都没有，确诊以

后仍然退不了高烧。

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正在我们万分焦急的时刻，从病友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当时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蓝亦农原是54军政委，他的秘书是从54军带去的，宝珍原是54军文工团团员，认识这位秘书（很遗憾，姓名忘记了）。我们向这位秘书求援。这位秘书很热情，知道老战友病重，急需某种药品，马上从军队医院找来一种进口特效药，宝珍的高烧很快就退下来了。宝珍原没有其他的病，体温恢复正常以后，可以进一些流食，也可以下床做一些活动了。我原想在医院多照顾她几天，可是她挂念留在贵定的二女儿莉莉，虽然转院以前大舅答应照顾莉莉，但当妈妈的不在自己女儿身边总是不放心。她叫我马上回贵定看看莉莉，由少林留在医院照顾她。

我回到贵定以后才知道，莉莉并没有按妈妈的嘱咐住在大舅家里，而是一个人住在自己的家里。自己下河挑水，自己做饭，白天上学，晚上做作业。那年莉莉12岁，身体比较瘦弱，寡言少语，但生活自理能力强，对事情有自己的主见。困苦的家庭生活锻炼了她独立生活的能力。

我回来的第二天，宝珍的大姐徐素君从福建赶来了，她的这位大姐因年龄大她好几岁，她幼年的生活多半是由这位大姐照顾的。宝珍6岁那年父亲客死福建南平，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徐素君当时已经结婚，随丈夫回湖南婆家时，把宝珍也带到了湖南。1949年宝珍13岁时，四野大军南下，她带着宝珍一起去参军，想参军后照顾小妹妹，可是当时部队不收已婚的女青年，只把宝珍留下了。她一直挂念在部队的小妹妹，宝珍也非常想念像母亲一样关心爱护自己的大姐姐。1956年宝珍从部队转业便要求转到湖南，我们两个家合成一个家，姐妹俩生活在一起，想不到

1958年4月我被打成了右派，不久姐妹俩又被迫分开了。

徐素君非常关心宝珍的病情，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问我宝珍住院后的情况，我告诉她：病情已得到控制，体温恢复了正常，正在康复之中。我叫她不要着急，也不必去贵阳，过两天宝珍就回来了。可是她急于亲眼看到自己的妹妹，亲自接妹妹出院，在家里没有多停，当天下午就赶去了贵阳。

第三天，姐妹俩一起回来了。宝珍出院以后，少林回到工作单位，没有一起回来。

宝珍病后的饮食都是由这位大姐亲自调理的。大姐很会做家务，饭菜做得也好吃，这当然对宝珍的身体康复很有好处。她关心妹妹，当然也关心我的情况，可能她怕有些事情宝珍听了心烦，约我出去，单独向我了解这几年在改造单位的情况，特别是我的前途、未来的工作问题。我向她述说以后，她沉默了好一会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真想不到，你改造了十几年，路却越走越黑，如今竟到了劳改队，那是个墨黑墨黑的地方，你在那里，老婆孩子在人前都抬不起头来。”我无话可说，确实，在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如果一个人的丈夫或父亲在劳改队里，这个政治包袱太沉重了。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清楚，可是不在劳改队怎么办？现在三个孩子只有二女儿莉莉跟着宝珍，大女儿玲玲和儿子明明都跟着姥姥在小姨家里。宝珍的工资收入只能维持她和莉莉的生活，我一个月43元的工资，每月给福建寄去20元，补贴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如果我离开了劳改队，只能去农村。妹妹淑芬来信说，大哥下放回老家农村了，我可以去大哥那里。但农村年终才分配一次，我们老家农村的工分值很低，一年分不了几个钱，如果回农村，我连每月的20元也不能寄了，总不能把两个孩子的抚养全部推给亲戚，这笔良心债我欠不起

啊。政治账和经济账该怎么算？我该选择哪一边？宝珍的病刚刚好，不能和她商量这些事，商量只能使她心烦。

想不到的是，形势的变化使我终于离开了劳改盐场。

宝珍身体基本康复以后，我回到了南堡劳改盐场。大苏庄农场来的一些人告诉我，工段正在找人个别谈话，办理遣送回乡的事情。听说上边有新的规定：“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不能吃商品粮，一律遣送农村；摘帽的右派仍按右派处理。家在农村的回家；农村有亲友的投奔亲友；没有亲友的由盐场到原籍农村联系。按照这个规定，不想离开劳改盐场也不行了。1970年12月，工段通知我，已经办好遣送手续了。

十九、阔别三十三年之后重返家乡

我的故乡在辽宁省海城县西汤河村，当地农民习惯叫李家堡子。族谱记载，我们的祖上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当初是兄弟两个，在此落脚开荒。老大李玉柱娶妻生子，世代繁衍，形成了一个村落，因为村子里的人都姓李，所以叫李家堡子。老二终生不娶，在树木葱郁的李家老坟最西头有一座孤坟，就是老二的坟墓。李玉柱的后人传到我是第九代。我在这个村子生活的时间并不长，7岁那年家里搬到东汤河（马家堡子），8岁又搬到海城县和辽阳县交界的集镇——腾鳌堡，父亲在那里一个商店当店员。我在腾鳌堡读完小学，考入海城县伪满国高（中学），以后又到北平读书，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在我的记忆里，从7岁离开故乡西汤河以后，再也没回去过。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我回国探亲，当时父母和大哥都住在鞍山。父亲和大哥说，西汤河很多人打听我，希望我能回老家看看。我是西汤河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参加革命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期间我发表的那些战地通讯，有的家乡人看到了，互相传播，他们认为我给家乡人增添了光彩。可是现在我却以“贱民”的身份回到他们面前，我将如何面对曾以我为荣的家乡父老，家乡父老又将如何看待我呢？

可是生活的现实是无法回避的啊！

大哥见到我也很激动，他看着我一身旧布衣衫，眼里涌满泪水，只说：“回来好，能回家就好！”大嫂也说：“三兄弟（我排行老三），叶落归根，你十几岁离家，在部队上打打杀杀，家里人整天为你提心吊胆。好人好报，眼下你平平安安地回来了，这比什么都好！”大嫂的朴素感情我是理解的，可是她哪里知道我心里的苦涩。

稍稍平静下来以后，大哥问我：“你在军区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一个多月以前从北京军区来了两个人，说你在工作中犯了错误，要你回农村锻炼一个时期，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是我亲兄弟我怎么会不同意。我问他们你犯了什么错误，他们说是认识问题，让家里不要担心，只是回来锻炼一个时期。”我很奇怪，问大哥：“来的人说他们是北京军区的？”大哥说：“是啊。两个人都穿着军装。”我忽然明白了，这是劳改部门做遣送工作的一种方法。我被打成右派前的工作单位确实是北京军区，用军区的名义遣送可以减少农村接受的阻力，也可以减轻我回农村遭受的压力，我把这些年的经历简要地和大哥说了，告诉大哥，遣送的单位并非北京军区，是南堡劳改盐场。大哥说：“不管是哪个单位，反正是把你送回农村了。”

吃过午饭，大哥陪我到大队会计那里报了户口，大队会计写了一张纸条，叫我到公社粮站去办粮食指标。公社在甘泉铺，离西汤河只有三里地。我到了粮站，把纸条交给一个40多岁的管理人员。那人马上给大队会计打电话：“你介绍来的这个徐孔有没有什么身份？”“身份”这两个字使我觉得新鲜，可是马上体会到“身份”者“帽子”也，大概有“帽子”的人和没“帽子”的人粮食指标是不同的。我听到大队会计回答：“没有什么身份。”

那人又问：“真的什么身份都没有吗？”大队会计回答：“真的什么身份都没有。”那人说：“好吧，那就定每月45斤吧。”

据大哥说，45斤是生产队一等劳力的供应指标。

农村的习惯，出工收工不是按钟点，仍然沿袭老规矩，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太阳快压山的时候收工，吃罢晚饭天就麻麻黑了，在睡觉以前是农村的空闲时间。

我到家的当天，刚吃完晚饭，就有人陆续到大哥家看望我，主要是“近支”的人。农村很重视血缘关系，同一个祖宗的子孙，在五代以内的各家算是“近支”。旧社会，每年春节“近支”的人都要相互到各家供奉的家谱前给祖宗烧香磕头。新中国成立后，多数人家不供家谱了，但“近支”的人还是要到长辈的家里给长辈磕头拜年。这些人家在同族中关系更密切，一家有困难，大家出手帮助。第一个来的是我伯父的孙子李荫兴，他是我伯父单传的孙子，是鞍钢的工人，但住在农村的家里，每天坐火车上下班。今天下班以后听说我回家的消息，他放下饭碗就赶到大哥家来了。第二个来的是李厚德，他是我的同辈人，我原名李允德。德字辈是这个村李氏家族最高的辈分，李厚德大我十多岁，因为他辈分高，年岁又较大，性格随和，人缘好，在村里很有威望。接着来的还有李荫生和东边邻居李宝德等人。刚和这些人接触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不自在，若没有大哥在旁介绍，我一个也认不得。我离开这个村子时，有的人——像李荫生、李荫兴还没有出生；年岁大的——像李厚德和李宝德，当时只有十几、二十几岁，而今已是满脸皱纹、弓腰曲背了。我对这些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对家乡的情况也知之甚少，而我又是以这样一种身份回到家乡，在“近支”族人的面前能讲些什么呢。可是见面之后，在谈话当中，不自在的感觉逐渐消失了。没有一个人谈及和我犯

错误有关的问题，年轻晚辈的人——像李荫兴和李荫生主要问婶婶（我爱人）和弟妹们的情况，还有就是首都北京的情况（以为我是从北京回来的）。

李厚德的话最多，因为当年李厚德是这个村的男孩子们的“大首领”，我常和他一起玩。我们两家是邻居，我家租住的三间西厢房，打开后窗就是他家的院子。年轻的李厚德好玩好乐，每天喂牲口的时候也唱着小曲儿。我常常打开后窗喊他“点歌”，他是有求必应，点什么唱什么，唱完了还问听够了没有，没听够再点。到了冬季农闲的时候，我们这些十岁上下的男孩子，常常玩“扔坑”——在冰冻的地上凿出拳头大的洞，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往洞里扔铅砣，扔进洞里者算赢；或者划“冰车”——在长方形的木板上钉两根纵向木条，木条下边钉上粗铁丝，算是“冰车”，坐在“冰车”上，两手拄着头上有钉子的木棍在冰上滑行，谁滑得快算谁赢。这些本是小孩子们的游戏，当时李厚德已二十多岁，且已娶妻，但他不仅经常参与，而且多半由他组织，并担任裁判。玩到兴奋时，他和小孩子们一起大声呼喊大声笑。在我的印象里，李厚德是个永远玩不够、乐不够的大孩子。这次相见我完全认不出他了，背驼得厉害，两颊深陷，颧骨突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和当年那个高挑个儿的帅小伙真是天壤之别。可是他的爱说、爱笑、爱逗乐的性格却没有改变。

拉了几句家常以后，他就说起我小时候淘气的事情。一次是到他家的后园子“偷杏”，他家后园子有一棵没有嫁接的大杏树，杏熟以后很甜，没熟的青杏却又酸又涩，没法吃。可是我在杏刚有指甲大的时候，就偷偷爬到树上摘青杏，摘得正起劲，忽听后园的角门吱呀一声响，知道有人到后园来了，一慌神儿，下树动作不利落，从树上跌下来，后脑壳跌了个大包，还把装杏的兜肚

带跌断了，青杏撒了一地。回家以后，我母亲知道我到人家后园子偷杏，把我狠狠打了一顿。

另一次是我从他家狗嘴里夺兔子。家乡冬天常下大雪，一次大雪过后，李厚德唤上我们这帮男孩子，还有几个和他一般年龄的小伙子，拿着铁叉，带上狗到北山捉兔子。北山不是很高，海拔不过三百多公尺，南坡较缓。李厚德派一部分人到山顶，另一部分人散在南坡下的大沟里。大沟里的人先行动，敲铜盆、吹喇叭，大声呼叫，山鸣谷应，山沟里的兔子吓得竖起耳朵往山上狂奔，因为山上寂静无声。可是快到山顶的时候，山顶上的人又敲起铜盆、大声呼喊，吓得兔子回身往寂静无声的山下跑。这下兔子可惨了，兔子这种小动物在一尺多深的积雪里奔跑本就十分困难，在山坡的雪地里奔跑还有个致命的弱点：兔子后腿长前腿短，往上坡跑的时候，后腿用力一蹬，能蹿出几尺远，狗都追不上它；可是往下坡跑的时候，短小的前腿支不住身子，不断地摔跟头，摔得筋疲力尽，跌进雪窝就爬不出来了。有一只大灰兔就跌进离我五六尺的雪窝里，我奋力跑过去想抓住兔子，却不料李厚德家的大黑狗动作更快，嗖地一声蹿进雪窝叼住了兔子。我自然不甘心，追过去想从狗嘴里夺过兔子，大黑狗急了，扭头就咬了我一口，可能因为是熟人，咬得不狠，但也把棉裤扯了个大口子。

这一次围猎收获颇丰，那时候北山的野生动物很多，小半天的工夫大家就捉到十来只兔子还有六七只山鸡。山鸡翅膀短，初冬又是正肥的时候，续飞的能力很差，雪后满山坡的雪光耀眼，很不易隐藏，在围猎圈里飞来飞去，很快就飞不动了，遇到岩缝和枯树洞就一头扎进去，尾巴却露在外边。到处追逐猎物的狗和拿铁叉的人们很容易就可以把它逮住。

李厚德收获最多，他家那只大黑狗叼住两只兔子，他用铁叉叉住一只山鸡。我自然是一无所获，我人小，动作没有别人快，手里又没有应手的家伙，只拿了一根山材棍。回家的路上李厚德安慰我：“三兄弟，不能叫你白来。见了面分一半，晚上准能叫你解馋。”大概他怕我棉裤破了回家挨打，先把我带到他家里，叫他媳妇把我的棉裤补好了，晚饭真的送来一碗兔子肉，算是给我压惊吧。说完这段往事，李厚德哈哈大笑，对大哥说：“咱们这个三弟当时比方桌高不了多少，可是论淘气你和二弟全比不上他，耗子（老鼠）洞里他能掏三把。三十几年过去了，当时那个小淘气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爹，成了能在报上发表文章的文化人了。”

这些充满乡情亲情的谈话，特别是关于童年往事的回忆，很自然地把我们之间的感情距离拉近了，同族近支的人们并没有和我划清界限。

到队里出工以后，和几十户社员均有接触，我发现，远房的族人以至后来进入本村的外姓社员都没有把我当成“异类”。北方的农村冬季没有大宗的田间劳动，都是些分散的农活，譬如起牲口圈、铡饲草、刨粪、送粪、到各家收集人粪尿以至到北山打石头、往车站送石头等。我第一天出工，队长分配我和邻家的李荫斗一起到各家去收集人尿粪。乍一接到这个活儿，我心里着实有些别扭，干这个活儿各家各户都要去，我第一次和村里人相见，担着粪桶、拿着粪锹，巡回在各家“展出”，实在难堪。可是走过几户以后，别扭的心情也就消退了。我们走进第一家，一进大门口，李荫斗就喊：“收粪尿来了！”目的是向这家人打个招呼。立刻屋里走出个60来岁的老年人，见了我，愣了一下，问李荫斗：“这是刚回来的西头（大哥家在村西头）的三叔吧？”李

荫斗说：“是啊，前天刚到家。”那人对我说：“您老怎么不多歇几天，先进屋喝碗水吧。”我们有任务，当然没有进屋喝水。以后到几家，多数都有人出来。有的人没问李荫斗就直呼我：三叔，三爷，有的甚至叫我：三太爷。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得。可能我回家的消息，在这个几十户的小村子立马传遍了，当我这个生面孔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时候，他们立刻就知道我是谁了，都很热情。有两家让我们进屋烤火喝水，见我们没进屋，就把暖水瓶和碗提到外边放到台阶上。

我回村以后，“近支”的族人没有歧视我，我不感到意外，可是远房的族人以至后来迁进本村的外姓人对我也都很和善，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要知道那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之又紧，时时事事都讲阶级立场，连生孩子都要作阶级分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我是犯了错误被发配回村的，村里的人要和我划清界限，至少保持一定的距离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可能和家庭成分有关，农村重视的是阶级成分，如果是地主、富农成分，几代人都翻不了身，我们那个村里没有地主，只有一家富农，到了第三代，几个男孩子还娶不上媳妇，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们。我们家的成分是中农，不是斗争对象；我被遣送回村的身份是“摘帽右派”，办理遣送手续的人说我是“认识上的错误”，村子里有的人不知道“右派”是怎么回事，有的人知道一些，但他们对“右派”或“认识上的错误”并不十分在意。农村人注重为人的品德和“门风”或者叫“家风”。春节的时候，很多人家门口贴的对联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很能代表农村的道德取向和人生向往。我幼年的时候家道贫寒，但我父母对老人的孝顺是全村有名的，与邻里和睦相处，从不伤害别人。1963

年我大哥下放回乡以后，继承父母的遗风，和村里人相处很融洽，我又是村里第一个上过大学的人，所以我回到村里以后，村里人对我不但和善而且比较尊重，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他们很希望知道外面的世界。我在外边几十年，算是见过世面的人，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和外国军队打过仗。劳动休息时间，他们常常要我讲朝鲜战争的事情：美国军队是什么样的，穿什么样的军装，用的什么枪，白人和黑人长的什么样；听说美国的飞机、大炮很多很厉害，志愿军是怎么把他们打败的；听说朝鲜城市都被炸平了，死的人多不多，剩下的老百姓怎么生活；朝鲜的农村什么样，农民穿的衣服、住的房子是不是和在中国的朝鲜人一个样；等等。还有，关内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什么样；听说北京的大学特别多，那些大学是什么样，大学生里边农村去的有多少，一个大学生一年要花多少钱？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很多，我说的时候，他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彼此的感情很自然地拉近了。我已被村里的人们接受，心情也就踏实了下来。

人往往是这样，在生活里跌了跤，几经挣扎，终于跌到最底层的时候，心情反倒踏实了。在农村凭自己的两只手挣工分吃饭，只要不犯法，条件不会再恶化。我开始安排在农村的生活，第一件事是给家里和代我抚养两个孩子的妻妹徐素琴写信，告诉她们，我已被遣送回故乡农村，目前住在大哥家里，农村的劳动我能够适应，但却不能给孩子寄生活补贴了。宝珍的回信很简单，嘱咐我照料好自己的生活；妻妹徐素琴的回信叫我放心，她的经济条件可以抚养两个孩子，有姥姥在那里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都很好。出乎我意料的是刚上初中的大女儿玲玲也写来一封信，告诉我她当上了“红小兵”，嘱咐我在农村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我真是哭笑不得。看

来，“文化大革命”真的触及了孩子们的灵魂，学校的教育对孩子们来说是神圣的，老师讲的话就是真理。实际上她们并不知道要向贫下中农学习什么，更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

第二件事就是尽可能地帮助大哥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这也是改善我自己的生存条件。我回来以后才发现，农村生活比我原来想象的要苦得多，除了一年一次的年终分配，平时根本没有现金收入。大哥家里养六只母鸡，下的蛋舍不得吃，都攒起来，拿到集上卖钱，家里买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儿，或者有病买几片药，用的都是卖鸡蛋的钱。平日不要说吃肉了，就连油也很少用，除非年、节或来亲戚，从不炒菜，都是煮菜和蒸菜。粮食也很困难，每人多少定量我没问过，反正吃饭的时候，家里只有大哥、我和在队里做出纳的七侄荫平每人一碗（较大的碗）干饭；大嫂和两个侄女每人只有一小碗干饭，吃不饱就用蒸土豆、萝卜、白菜补充。用土豆、萝卜、白菜顶饭吃，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叫“瓜菜代”，想不到生产粮食的农民至今仍在“瓜菜代”。据大哥说，家里的口粮很大一部分要靠自留地。解决家里的困难，首先要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要种好自留地。俗话说：“庄稼一枝花，种地粪当家。”要想收成好，上足粪上好粪是首要的。当时正值冬季，干不了其他农活，我每天天麻麻亮就起来，背粪筐出村捡粪。几天下来，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村外的几条大车道上马粪、牛粪很多，可是没见到一个和我同样早起捡粪的，我每天早晨都能捡满满的一筐。这和我幼年在村里时的情况大不一样。那时候，不论种自家地或者租种地的人家，家家大门口有一堆粪，很多人赶早贪晚地捡粪，有的人串亲戚、赶集也背着粪筐。现在的庄稼人为什么不重视积肥呢？我和厚德大哥说起这件事，厚德大哥摇摇头说：“合作化以后，大家吃大锅饭吃懒了，

不但不早起，白天出工也没有几个用心下力的，眼下的年轻人没有几个农活的好把式，犁地不像犁地，耩地不像耩地，出工就是混工分。”厚德大哥是出名的农活老把式，他的话不会是假的。

第三件事就是合理利用晚上的时间。冬天天黑得早，晚饭也早，吃完晚饭还不到下午7点钟，农村为了省电省灯油，一般都早早睡下。可是我多年养成习惯，10点、11点以前很难入睡，我决定用晚间这几个小时的时间继续写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大哥家的住房虽然破旧，但还算宽敞，四间正房，堂屋的西边一间，是七侄荫平居住。堂屋的东边两间，大哥、大嫂和两个侄女住外间，我一个人住里间，里外间的隔壁上有一个方洞，方洞里悬一只25瓦的电灯，灯光虽然较暗，但比战争年代用的小油灯亮多了。我每晚把饭桌放在灯下，伏桌写作，因为回农村以后心情踏实了，精神专注，写作进展顺利，每晚都能写两三千字。这样，我在农村的生活开始有了规律：早起捡粪，白天出工，晚上写作。

眨眼之间到了春节，这是我回农村后过的第一个春节，热闹是热闹，但我对农村的风俗很不习惯。因为家里经济不宽裕，节前没有买什么年货，做豆腐、蒸黏食、请灶君，到杀猪人家割几斤肉，这些事大哥、大嫂都办了，我只给自家和邻居写了几副春联。到了年初一，“近支”的族人开始拜年。我和大哥辈分大，按老习惯，晚辈是要磕头的。我和大哥说，无论如何要破这个老习惯，千万别磕头，大哥很赞成我的意见。年纪大的妇女不出门拜年，年纪大的男人作个揖，拜个年，也就完了。可是年轻妇女和半大孩子，一进门，跪到地上就磕头，你说你的他磕他的，弄得我坐在炕沿上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初一整整一天接待拜年的，初二一大早，我伯父的孙子李荫兴过来请我和大哥过去吃

饭。他是工人，经济条件好一些，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他喜欢喝酒，我年轻时的酒量可以，但十几年不喝了，乍端酒盅，喝过两盅就觉得有些头晕。可是他不住地劝，我只好喝，只喝得头重脚轻，晃晃悠悠地回到家里，心里非常难受。第二天厚德大哥又请吃饭。为了躲避家里的应酬，初三在李厚德家里吃过饭，下午就坐火车到县城六姑家里去了。我和六姑已几十年不见，六姑一定要我多住几天。我正想避开农村春节期间那些应酬，六姑家人口少，住处也清静，在这里可以安下心来写些东西。

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农村的春节算是过完了，社员开始出工。我在正月十六回到家里。出工不多几天，我就开始帮助大哥张罗翻盖住房的事情。大哥家原住房的房顶前坡后坡都出现塌腰，堂屋的北坡还断了一根房梁，用立柱顶住断处，仍有裂缝，夏天漏雨，冬天进雪，成了危房。大哥在外工作的几个儿子过年回家，一致主张翻盖新房。原来的房子是“里生外熟”的砖瓦房，即墙的里面是坯，外面是砖房顶盖瓦。旧房的砖、瓦都可以再用，再添购一些就行了，主要是要买几根结实的房梁。农村盖房都是大家帮工，主人只管饭，翻盖要不了多少钱，几个孩子每人凑一些，家里再借一些，经济上虽然有困难，但无论如何不能住在危险的风子里。

盖房子是累死人的活，特别是翻盖，要拆除旧的再盖新的，劳动更为繁重。大哥体弱多病，干不了重活，七侄荫平是生产队干部，不能误了队里的工作，所以翻盖住房这一摊子事主要靠我。随着工程的进展，我不但要帮助大哥安排请来的帮工，还要自己参加劳动，自己家里盖房子，总不能光靠别人干，自己不动手啊。自土地化冻起，我就挤时间推土选秫秸，先盖了一大间临时住人的棚子，搬进棚子以后，就着手拆旧房子、清理场地、挖

地沟、垫地基、打夯、砌墙、上梁、盖顶，以后又抹墙里、盘炕、安门窗。在参加盖房的同时，我还挤时间清理出原来堆料的园田，种植早茬儿蔬菜，实行菜、粮套种，先套种早熟的菠菜和土豆，收完菠菜抢种玉米，玉米长到一筷子高的时候收土豆，再给玉米起垅追肥。这样就可以收获三茬儿菜和粮，家里的口粮原来就不足，盖房请帮工又需要吃掉很多粮，如果不种好园田和自留地，今年的口粮缺得更多。吃菜也不是小事情，那么多帮工的，顿顿得有菜，农村没有菜市场，没处买；和别人要，哪家也没有那么多菜，除了少量的细菜，主要靠自家解决。好在我冬天捡了很多粪，粪足，菠菜、土豆和玉米长得都很好。

从拆旧房子算起，我有3个多月没有出工，从早到晚和泥水打交道。我原来安排的作息时间完全打破，晚上根本没有条件写作，甚至连想想写作的精力也没有了，每天吃过晚饭以后，草草地洗把脸，倒头便睡。不过，通过几个月艰苦劳累的生活也使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农村求生存很不容易。

6月底，一家人搬进了新房。新房是五间，中间一间是堂屋，堂屋两边各两间住房，我还是和大哥住东边的两间，为了省电费，两间中间的隔壁上仍然留个方洞，方洞里有盏两屋共用的25瓦电灯，可能因为墙壁和顶棚是新裱糊的，灯光显得比以前亮多了。休息两天以后，我又恢复了原定的工作休息时间，坚持每天晚上写一点东西。

我回村的时候是冬季，干的都是杂活，没有正经的农田劳动，所以队里只给我记工，没有给我评定工分等级。盖完房出工不几天，就评定了，出乎我的意料，竟评定为一等工，一个工12分，比众多的二等工高2分。据说，评定会上有人说：“别看人家三老爷子（村里人习惯称长辈为老爷子）是文化人，可是什

么累活脏活都能干。”李厚德的儿子说：“有文化的人干什么都出彩。你看人家三老爷子种的菜，比哪家的菜长得都好。”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在农村的劳动得到了社员的认可。

7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和社员们在村东锄地，五侄女李英跑来告诉我：“刚才公社派出所给队里来电话，说三婶来了，不认得道儿，找到公社派出所，叫你马上到公社去接。”我把锄头交给李英，急忙向公社所在地——甘泉铺赶去。

甘泉铺在西汤河村南三里。我沿着田间小道迎出一里多地，就见宝珍背着孩子吃力地一步一步地向北走来。我紧跑几步，到跟前才看清，背的是儿子明明，宝珍放下明明，生气地说：“看看你这儿子，自己就是不肯走，从汤岗子下车到甘泉铺，从甘泉铺到这儿总是要我背。”明明长高了，站在妈妈旁边，头已抵到妈妈的肩膀。从汤岗子车站到甘泉铺是八里，从甘泉铺再到这里共十来里地，背这么大孩子走十来里地其吃力是可以想象的。宝珍满头大汗，脸黑了，也显瘦了，看到宝珍消瘦的面容，我心里很难过，这些年她可是吃了大苦啊。

宝珍把明明推到我跟前，说：“爸爸来了，叫爸爸背吧。”我牵过明明的手，说：“男子汉不要人背，自己走。”明明去福建的时候，刚满周岁，还不记事。他5岁的时候，我探亲回过一次贵定，在家里一起生活过20多天。他长这么大，我们基本上不在一起。可能是血缘的关系，这次相见，他一点也不显生，拉着我的手，蹦蹦跳跳地往前走，一会儿用脚往高粱地里踢土疙瘩，一会儿又踢路边的马兰，惊起蚂蚱四处乱跳，他极度兴奋，大喊：“捉住它！”我笑着说：“蚂蚱不好玩，咱们先回家，明天爸爸给你捉个会唱歌的蝈蝈。”

大嫂早得到了宝珍到来的消息。宝珍是第一次来家里，按农

村的习惯，应该好好招待。可是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的，想买也没地方买。大嫂就杀了一只母鸡，包了一些鸡肉馅的饺子。大哥嘱咐我：“宝珍带着孩子几千里来看你不容易，你不要出工了，陪着娘儿俩在乡下玩几天。”可是宝珍却没有玩的兴致，除了明明拉她，很少出屋，大部分时间躺在炕上看书。明明却对农村的一切感到新鲜。我到园子摘黄瓜，他也跟着摘，把顶着花的黄瓜刺也摘下来；我摘茄子他也摘，把鸡蛋大的小茄包也给撈下来。园边有一畦胡萝卜，还没有长出根茎，他却拔出一大把，甚至又苦又涩的毛桃，他也摘一裤兜。好在都是自家园子里的东西，他觉得新鲜，愿意摘就摘，没人制止他。大哥家里有一副象棋，他看见了，一定要我和他下象棋。我在农场的时候曾和他人下过象棋，棋艺虽不算高，但也有胜有负。却不料和他一交手，几招过去就被他杀得落花流水。正好李荫兴来了，李荫兴喜欢下象棋，坐下来和他下了一盘，和我一样，不过十几招就被杀败了。李荫兴和明明是同辈，年龄却比明明大三十来岁，大概他没有想到被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杀得这样惨，不住地挠脑袋，第二盘李荫兴就慎重多了，每一步都要经过认真考虑。明明却很有大将风度，两手拿着棋子轻轻地撞击着，从容地注视着棋盘，李荫兴一落子，他很快就应招落子。二十几招过后，李荫兴又败了。李荫兴服气地说：“我不是小明兄弟的对手，我还没见过七八岁的孩子棋下得这样好。”据宝珍说，明明五岁的时候跟她从三明回贵定，在火车上和大人下象棋，也是赢的多，输的少。火车上的人很惊奇，说他是小神童。

十几天过去了，宝珍准备回去了。一天午饭以后，明明午睡的时候，她约我到村外去转转。我已经意识到她要谈什么问题了。她这次来带着明明，开始我很奇怪。明明在福建三明，她要

绕几千里先到三明，再带上明明到东北；回去的时候也要绕几千里，先把明明送回三明，然后再回贵定。按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可能买卧铺票，只能坐硬座，旅途很辛苦，而且绕这么远又多一个人的车票钱，在经济上的负担也不轻。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后来我想明白了，也许这是她的一片苦心。在我们三个孩子当中，明明是最小的，又是唯一的男孩，我自然更疼爱明明些，但明明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是最少的，而且在传统观念里，儿子是接续香火、传宗接代的，更受父母关注。在处理家庭的问题以前，叫明明和我见上一面，也叫明明认认自己的祖籍，这对我至少在精神上会有些安慰。

我们结婚以后的十几年里经受了很多人难以想象的打击、屈辱和困苦，从中使我对她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她虽然年轻，但比我原先想象的更坚强。宝珍在政治风浪中，从不见风使舵，人云亦云；更不趋炎附势，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他人。反右时，她曾是积极分子，我被划为右派以后，她成了审查批判的对象。她坚持实事求是，始终没有检举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为此她被开除团籍，从县教育局下放农村当小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初期，她两度被选为革委会委员，并未和我这个“摘帽右派”划清界限，甚至在家庭经济陷入极度困境，两个孩子不得不委托她的妹妹代为抚养的时候，她也没有说过一句抱怨我的话，以坚强的毅力在困苦中维系着这个家庭。但人的承受力是有限度的。漫长的13年过去了，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差。三个孩子逐渐长大，都已上学，供三个孩子上学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而且不能让孩子总背着政治包袱影响他们的前途。面对这些现实的问题，她不能不考虑我们的关系了。

我虽然明白她的意思，但没有勇气也不愿说出来，想先听听

她的意见，大概她心里也很矛盾，也一直没有说话。

我们沿着村南的田间小道向南走着，两旁大豆地里豆花飘出温馨的芳香，可是两个人心里的感受却是苦涩的。从田间小道走到通甘泉铺的红土马路，我们沿着马路又走了好一会儿，她终于停下来，说道：“我考虑了很久，我们不能不离开了。”我说：“这次你带明明回来，我就明白了你的意思，我知道我的问题对你和孩子的影响，我并不愿意拖累你和孩子。所以我被打成右派以后，马上向你提出离婚。可是你不同意，现在已经熬过了十几年，孩子都已懂事了。如果离，在政治上会卸掉包袱，但在家庭生活上，三个孩子不是失去父亲，就是失去母亲，在他们心灵上不能不留下终生的遗憾。”宝珍说：“这些我不是没有考虑过，可是现实的问题摆在那里，不离有什么办法呢？”我说：“我回农村半年多了，农村重视的是阶级成分，我在农村并未受到歧视，实在没有别的出路，一家人都回农村也可以。”宝珍说：“现在农村的教育条件和城市比差得很多，回农村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再说，我从小参军，转业后一直在政府机关工作，回农村，我在生活上也不习惯。”我无话可说，她说的是实情。过了一会儿，我问：“你把离婚协议写好了吗？”她说：“我想和你商量，由你来写。”我说：“我实在提不起笔写这份离婚协议书。我总想，事情终有弄清楚的一天，不会一辈子冤沉海底。你再好好想一想，如果一定要离，你把协议书寄来，我会马上签字。”她没有说话，大概她心里也很矛盾。

宝珍临走的时候，我向大哥借了120元钱。她带来多少路费我没有问，但她的收入我是清楚的，不能叫她背着债回到贵定。宝珍回去不久就来了信，告诉我，已把明明送回三明，她也平安地回到了贵定。她没有提离婚的事。

秋收以后，我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到辽河参加修堤。

为了防止辽河水泛滥，每年秋后冬前辽河两岸的大堤都要整修加固，限期完成。因劳动强度大，参加筑堤的工分很高，如能按期完成任务，比在生产队劳动的工分要高出四五倍。但因为活太累，家庭成分好的人还是不愿去，所以有的队就选派地、富家小伙子，这些人不敢偷懒，也不敢捣乱，肯下力，也好管理。我们这个队只有一家富农，家里一个壮劳力，还在队里赶大车，不能去。到工地不过四五天，大队带队的民兵连长就给我们队队长捎来话，说我们队的进度落后了，要求增派劳力。队长决定派我和李荫贵去，对我说：“你老爷子干活肯出力，工地的几个人也肯听你的话，你去了准能叫齐套，把大伙的劲鼓起来，咱们队千万不能落后。”论年龄，我去是不合适的，派出修堤的人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而我已经40多岁，是修堤大军中少见的“老头兵”，但队长分派的事不好推辞。另外，我也有个人的考虑，帮大哥翻盖房子，3个月没出工，一个工分没挣，宝珍走我借了120元的债，如果不多挣些工分，年底分配的时候，我可能连债也还不上。参加修堤能多挣几倍的工分，再累也得去。在农村除了干活挣工分，没有别的收入。

到了工地以后，先来的几个小伙子都很高兴，他们照顾我年纪大，没有叫我推车，给了我一条背带，叫我在前边拉车。其实，前几天进度落后，主要是我们队来的人少，分工不好搭配，被别的队落下以后，有些泄气，进度更慢了。增加两个人以后，重新调配了装车、推车、拉车的分工，大家的心气起来了，装车的出锹快一些，每车多拍几锹土，推车、拉车的多跑几趟，几天下来，进度就赶上了。

因为劳动强度大，每天午饭以后都休息一会儿，缓解一下疲

劳。一天中午，大家正躺在炕上休息，大队带队的民兵连长老宋神情激动地走进来，对大家说：“出了大事了，林彪在外蒙古摔死了！”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忙问：“谁在外蒙古摔死了？”老宋说：“林彪。”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事情说清楚。”老宋说：“刚才公社干部传达的，林彪要搞政变暗杀毛主席，他儿子林立果搞个行动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想在毛主席南巡期间下手，阴谋败露了，林彪一家坐飞机外逃，在外蒙古的温都什么汗摔死了。”对于这桩重大事件，屋里几个人反应很平淡。可是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实在太大了。

这次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九·一三事件”，在辽河的工地上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完工以后回到队里，也没听到什么反应，没有人谈论这件事，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年终分配问题。根据地里的收成和副业收入，人们在估算今年的出工（10分）能分多少钱，年终分配能不能拿到现金？大家最关心的是切身的生计问题。

回到队里以后，我帮助大哥忙活家里的事情，抓紧午休和下午收工以后天黑以前的时间，挖菜窖，编囤底，储藏过冬的蔬菜和分到的粮食。因为底粪足、管理经心，今年自留地和园子里的玉米、白菜、土豆、萝卜、胡萝卜等收成都很好，虽然翻盖房子吃了不少粮食，但明年的口粮够用了。

入冬以后，我被分派到打石组，去北山石场打石头。打石组共4个人，主要任务是用炸药炸下山体的石头，选出直径一尺左右的石块，用大车拉到汤岗子车站出卖，这是队里的一项主要副业，除了夏锄、秋收大忙的一个多月，打石组一年到头都上山。队里的另一项副业是拉沙料，一辆大车两个人，天不亮就出车，到采沙场装上沙料送到鞍山的建筑工地，验收合格、开出票以后

往回赶，往返近 100 里，天黑以后才能回到队里，这个活儿很累，工分也高，比农田劳动高一倍多，我也参加过很多次。

我回村近两年，各种农田的活和几项副业的活都干过，和村里的人都有过接触。经常一起干活，彼此的共同语言就多些，大家把我看成他们当中的一员，什么话都和我讲，使我对农村、农民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1972 年冬天，贫协组组长对我说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天下大雪，不能出工，我在家里写东西，傍晚的时候，写累了，到生产队队部想找人聊聊天，放松一下。在队里值班的是贫协组组长李荫钟，按辈分，他叫我叔叔。炕烧得很热，两个人坐在热炕头，村里村外地说了些闲话。他说庄稼人不懂得国家大事，想的就是吃饭穿衣、居家过日子的事情。国民党在的时候，这个屯就一个屯长、一个跑腿的，屯里养活的只有两个人。可是现在，这个屯分成两个生产队，每个队五六个干部，生产队上边还有大队，二十多个干部，总共要养活三十多个干部。开会的时候总是讲为贫下中农服务，报纸上也是那么说。可是有什么好事都是干部占了，像参军、招工，都是干部子弟或干部亲属，根本没有贫下中农的份儿，贫下中农只有出力出钱的份儿。什么事都是干部说了算，若是得罪了干部，你在屯子里的日子就没法过。他举出大队支书给儿子娶媳妇的事情。这件事在屯子里反应很大，支书的儿子还在上中学，可能 16 岁，记不准了，反正按公社计划生育晚婚年龄的规定，还差好几岁，支书叫管户籍的人把他儿子的年龄改了，决定当年操办婚事。结婚那一天，屯子里一户不少都去送礼，农民手里大多没有现钱，为了送礼，有的人出去借钱，有的把家里母鸡、鸡蛋或土豆卖了凑礼钱。对于送礼的人，支书决定分几等，5 元以下的招待吃饭；5 元以上的，在院子里摆几张方桌，吃的是高

梁米饭豆腐汤；10元以上的才在屋里摆席招待。总共收了多少礼钱，没人知道，除了礼钱，还收到二十多床绸缎被面和大床单，十几座挂钟和座钟，这些在当时农村都是贵重东西。为什么人们在手头拮据、甚至借钱、卖东西的情况下也要去送礼，而且一户都不缺，并不是支书在屯子里人缘好，是没有人敢得罪支书。

李荫钟还讲了一个公社书记的事情。这位公社书记一到任，公社马上给划出一块最好的房基地，动工盖房子。砖瓦是公社砖厂出的，木料是从公社的山林里砍来的，用工是从各大队抽调的泥瓦匠和壮劳力。给别人帮工，房主得管饭，给公社书记盖房子自带干粮。五间大瓦房盖成了，公社书记一分钱没掏。不到两年，这位书记又调到另一个公社，那边又给他盖房子，他就把这边的房子卖了，一万多元装进腰包。一次调动就成了万元户，若是调三四次，他就成了大财主了。李荫钟很气愤。

李荫钟讲的这些基层干部的问题，我从别处也听到不少，有些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对一些基层干部的作风、特别是利用权力搜刮群众的做法也很不满意。但听到有人用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比讲共产党的不光彩的事情，心里总是不舒服。我说：“你讲的这些事情确实有，但个别地方的情况不能代表共产党，共产党始终是关心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利益，如果共产党不打倒国民党，农村就不可能搞土地改革，贫下中农就不可能分到土地。”

我这话让李荫钟信服，而且提起土地改革，这位老贫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长长出了一口气，点点头说：“那时候共产党的政策好啊，干部对老百姓的态度也好。土地改革是国家给咱贫雇农分地，一分钱不要给咱们分地，而且事事和贫雇农商量，按人头哪家该分多少，肥瘦远近该怎样搭配，田块该怎样划分，全找

大伙商量，大伙都同意了，才张榜公布，带领户主到地里钉界桩。咱们这个屯三成当中有一成是地无一垄的贫雇农，你老爷子知道，在旧社会若是家里没有地，不但活人吃饭难，老人死了都没地方埋，只能埋在乱坟岗，现在分到了地，活着的人有饭吃，九泉之下的先人也有个安身之处了，人们怎么能不高兴！很多人家不供灶王爷，供起毛主席的像。土地就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啊。”

李荫钟讲起贫雇农分到土地以后的生产热情：东头的老四媳妇是寡妇，带着七八岁的两个孩子，分到了六七亩地，有一亩来地是碱地，她带着孩子用脸盆和洗米盆把地里的碱土端出去，再从河滩把好土端到地里，硬是把碱地改成了好地，到了第二年，除了种地、耩地、打场用牲口的活儿雇几个工，剩下的她带着两个孩子没早没晚地在地里忙活，亲戚朋友有时候也帮帮她们。一年下来，地里收成挺好，娘儿三个再也不愁吃穿了。分了地的人家都和老四媳妇一样，心气都挺高，男女老少齐上阵，地里的活做得细，粪也上得足，庄稼长得好，粮食多了，又养猪又养鸡，不少人家还买进了大牲口。人们都说，共产党来了，咱贫雇农的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那时候大人孩子都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说到这儿，李荫钟叹了口气，说：“没曾想，没过几年成立了高级社，分到的土地都收归社里，连过去有地的中农也变成了没地的，大家都成了打工的。”

我说：“这话可不对，现在虽然不许单干，但从前打工不同，现在农村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生产的东西由生产队核算后再分配给本队社员，这是集体合作，并不是给人打工。”李荫钟反驳说，地不是社员的，社员们什么事儿也做不了主，这和打工有什么不一样？春天种地的时候，种什么庄稼，什么品种，哪样种多少都是上边

下指示，别说社员，连生产队说了也不算。他举我亲眼见的去年种 B 高粱那回事为例，地里的玉米已经长出一筷子高，上边要求推广高产品种 B 高粱。这地方从来没种过这种高粱，不知能长不能长，再说种高粱节气已晚了。社员们不愿种，队里也主张明年再推广。可是上边一定叫种，到底毁了五亩玉米，种上了 B 高粱，到了秋后，只收了一些青高粱秆，一粒粮食也没收。上边下的指示，社员不种不行，可是种了没收成，上边就不管了。再说秋后分配，你的粮食定量是多少就领多少，粮食不够吃，想花钱多买点也不行。若不是这两年恢复了自留地，十家有八家会饿肚子。在农村当个社员，就是干活挣工分，别的没有你说话的份儿。这和从前替人打工有什么不一样？

李荫钟对农村一些“左”的做法，譬如“堵资本主义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等，很有意见。他说，农村里的人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大伙不明白，凭自己力气挣几个钱怎么就是资本主义呢。搞家庭副业不行，跑小买卖不行，办个小厂更不行，都是资本主义道路，要堵死。人民公社化那阵子更邪乎，要求“一大二公”，连养猪养鸡、房前屋后园子里种点菜也算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生产军事化，成班成排拉出去干活；生活集体化，连做饭的锅都砸了，支援“大炼钢铁”。各家各户排着队到大食堂领饭吃，那时候有个口号，叫“脱了裤子割尾巴”。社员们的“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干干净净，可也穷得精光光。从那以后放松了些，允许搞家庭副业，允许种点自留地，也允许办小厂，人们的日子好过一些了。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人人要学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兴无灭资”，要“斗私批修”，把放给社员那点“小自由”又给灭掉了，批没了，就这样一阵紧一阵松，反复地折腾。这两年又有些放松了，恢复了自留地，允许

养猪养鸡。可现时人们的口粮都犯愁，哪有粮食喂猪喂鸡鸭？养猪不喂粮不上膘，养成了老头猪；鸡鸭光靠打野食，下不了多少蛋。

李荫钟的情绪很不平静，很明显，他说的是气话反话，可是实实在在，一时很难找到理由说服他。

我回农村几年，有几件事感触很深。一个是农民生活问题。新中国建立 23 年了，可是农民生活并无多大改善。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首先看农民的住房。大多数的农民省吃俭用攒下钱先盖房子，一方面房子是可以几代相传的不动产，更主要的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传宗接代。我们那一带有个习俗，姑娘找婆家，男方家里必须有房子——专给新媳妇住的房子，否则不嫁。所以男孩子刚几岁，父母就给儿子攒盖房子的钱。1970 年我被遣送回乡的时候，发现时隔 30 多年，屯子里的人多了，房子也多了，一条街变成了前后两条街，但住房比起 30 年前并无多大改观，像样的住房不过四五处，多是干部家，还有一家贩运香烟的。吃的、穿的、住的也很紧巴，很多人家还没有脱离贫困状态。

另一个是集体和个体两种生产积极性的明显反差。在我们那个队，无故不出工的很少，但出工不卖力的却相当普遍，锄地的时候，除少数老年社员以外，年轻人都是在垄帮两侧拉锄，苗间过锄马马虎虎，挨着苗的草，老乡们叫“护脖草”，基本不锄，图的是省时省力。锄过三遍地正好是雨季，几场大雨过后，草和苗差不多一样高。自留地和队里的地相挨的地方，一眼就能分辨出哪块是自留地，哪块是队里的地。自留地苗齐苗壮地里没有草。而队里的地，苗和草“和平共处”，即使高秆庄稼玉米和高粱，艰难地从杂草中挣扎出来，高出一截，也显得瘦弱。东北无霜期短，我们那地方都是春种秋收，一年一茬庄稼。但自留地一

一般是收两茬，土豆和玉米套种，收了土豆给玉米追肥定苗。勤快人家可以收三茬，先是土豆和菠菜套种，垄上种土豆垄间种菠菜，菠菜生长期短，收了菠菜种玉米，收了土豆再给玉米起垄追肥，虽是两茬三茬，但因为粪上得足，管理经心及时，哪茬也不少收。一般的自留地收成要比生产队地里的收成高出一倍，甚至更多。有的老社员叹息说：“给队里干活若拿出给家里干活一半的劲儿就好了。”一些社员，特别是年轻社员糟蹋队里庄稼的现象令我吃惊。不是一回，至少有四五回，锄三遍地的时候，工间在地头休息，几个小伙子互相打闹，追逐到地里，踏折了很多高粱，还有两回在地里摔跤，压折了一大片。高粱玉米已经拔节，折断以后就不可能有收成，人们好像没看见，没人制止。有一回，李宝德说了一句：“糟蹋那么多庄稼，你们就不心疼？”打闹的小伙子回了一句：“又不是你家的，你管得着吗？”没有人接话，小伙子们照样打闹。到了秋天，有的人家把猪放到庄稼地里“吃秋”。“护秋”的人，有的看见装作没看见，置之不理；有的把猪赶出庄稼地也就完了，过一会儿，吃馋嘴的猪又跑回来了。即使队长知道谁家的猪，也不过是批评几句。对生产队的庄稼如此不爱护，而对自留地的庄稼，人们的态度截然不同。如果你损害了谁家自留地的庄稼，那怕只有一两棵，自留地的主人也要找你理论。推己及人，屯子里似乎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不损坏任何人自留地的庄稼。人们对公私的态度可谓天壤之别。

还有一个是生态破坏。我刚回来的时候，几乎认不出这个屯，周围的面貌全变了。这个屯背山面水，北边三里是北山，南边紧挨村边是汤河。原来北山上树木苍郁，常有野兽出没，我小的时候，没有大人带着，不敢走山旁的小道，害怕碰上狼。如今北山北坡——罗家堡子管的那边稀稀落落的还有些松树和杨树，

南坡——我们屯管的这一边已经剃了光头，一棵大树也不剩，只好炸石头卖。汤河的两岸原来是清一色的白杨林，屯南的李家老坟原来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松树，粗的合搂都抱不拢。如今也都不见了，汤河发源于东山，西流注入辽河，河里鱼虾很多，我小的时候常跟大人在河边钓鱼，或者会上几个小伙伴用筐捞鱼，在河窄的地方打坝捉鱼。现时，汤河已经干涸，只有下大雨河沟里才有流水，雨过一两天河沟就干了。生态的破坏，不但影响了农田的水土保持，也影响了农民的副业收入。像我们这个屯，收入的来源主要靠平均每人2亩多的旱田，收下的粮食，交完公粮再扣除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各种提留就所剩无几了。听说东边山区有的生产队，社员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分配的时候还要倒赔钱，但社员都不敢不出工，不出工就领不到口粮。

自从合作化以后，农村政策越来越“左”，不适当地剥夺了农民生产甚至生活的自主权，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当然，对于这些重大的政策问题，我这个已被打入“另册”的人是没有发言权的，只能遵循“沉默是金”的格言，不说话。

我最关心的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政治形势的变化。

离西汤河八里有一所“五七干校”，在那里劳动的主要是鞍山市的干部。1972年秋天以后，有几个负责干部陆续回到了鞍山，说明“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有的获得了解放。1973年秋天，宝珍第二次从贵州到东北老家来看我，带来一个好消息。她说，路过北京的时候，曾去看望刚解放回到北京的原二十兵团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丁主任向她打听我的情况。她说过我这些年的遭遇以后，丁很惊讶也很生气，说：“徐孔怎么会是右派，二十兵团的领导谁不知道徐孔！如果他不轮换回军

区仍在兵团，不可能把他打成右派，现在原二十兵团的领导有的已回到北京，你叫他到北京来，我们帮他说话。”

宝珍主张我进京上访，大哥也主张我去北京。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当然不会放弃努力。但不能很快就去，需要做好准备。第一个是准备钱，我深知解决问题的艰难。在运动中，整倒一个人很容易，往往是当权者一句话就可以定性；但要甄别平反，即使是明显的冤、假、错案，要平反可就难了。经过多次政治运动，人们总结出一条经验：“左”保险，“右”危险。人们为了自保往往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面对要求甄别的积案，有的不明确表态，有的在部门之间推来推去，层层审批，久拖不决。所以我此次上访必须做“持久战”的准备，长时间滞留京城，就必须筹措必要的生活费用。第二是准备好申诉材料。现在全国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到北京上访的人一定很多，材料写得太具体、太长，接待上访的人可能没有时间看；过于简单又可能引不起注意，所以必须反复琢磨，简单、明确、抓住要害。

直到1974年4月我才离家去北京上访。

二十、托钵上访

到北京以后，在赵家楼招待所安排好住处，马上去找原二十兵团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丁莱夫在1957年我回国以后，提升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1958年随志愿军总部最后轮换回国。回国后，中央军委任命他为66军政治委员，接到任命尚未到任，周总理找他谈话，为了加强广播事业局党的领导工作，中央在省、军级干部中选定他出任广播事业局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在广播事业局党委书记的位子上被打倒的，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解放回京以后，临时住在广播事业局的外国专家楼里。我按号码敲响丁莱夫住房的门，一个中年妇女打开门问：“你找谁？”我说：“找丁主任。”屋里传来丁莱夫的声音：“是徐孔吧，一听这东北口音，我就知道是你。”

丁莱夫穿着一身旧蓝布中山装，脸色红里透黑，可能几年干校劳动使他的身体更健壮了。离别多年，经过诸多磨难之后重新见到战争年代的老领导，心里很激动，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丁主任，你的关怀，宝珍到东北以后都对我说了。想不到分开这么多年，你仍然还牵挂我这个被打成‘黑五类’的老部下。”看来，这次劫后重逢，丁莱夫的心里也很不平静，他用有力的手按到我的肩膀上，说：“同志啊，你不要自卑。我了解你，二十

兵团的老领导、老同志都了解你，你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情。受了这么重的打击、这么多年苦，你仍然找党澄清事实，说明你仍然信赖党，愿意为党工作，这就好！”

我们在客厅里说话的工夫，丁莱夫的爱人盖志良从里间的卧室出来了。盖志良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部队的时候我们都叫她盖大姐，她原来是广播事业局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丁莱夫被打倒以后，多次批斗她，要她揭发丁莱夫的问题，她没有揭发。丁莱夫被发配到干校以后，她和孩子被赶出原来的住房，搬到广播大楼旁边的两间平房里。盖志良和丁莱夫一样，为人朴实热情。她从橱柜里拿出很多点心、糖果让我吃，一边看着我的脸，说：“1956年我们在朝鲜西海指见面的时候，你刚戴上大尉军衔，朝气蓬勃，是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可是现在你的头发已经见白了。”我苦笑着说：“风雨无情，岁月不饶人啊。”盖志良问韩福贤是怎么整我的。我本不想翻这些陈年旧账，可是盖大姐问到了，我就简要地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

丁莱夫问：“听说史忠被打成右派也和韩福贤有关？”我说：“史忠和我都是5月轮换回国的，整风期间并没有参加鸣放。从大字报揭发的‘罪行’来看，都是兵团时的事情。例如：攻击肃反运动，替右派分子徐孔喊冤叫屈；吹捧右派分子徐孔有写作才华等。这些在兵团时的‘罪行’的定性，不可能不经过韩部长，有人讽刺韩部长，说他刚回国就为军区‘立了大功’，完成两个右派指标。”丁莱夫显然动了感情，沉默了好一会儿，说道你们两个都是我熟悉的年轻干部。史忠做过我的秘书；你，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我们都在一起，对你的了解更深些。听到你被打成右派，我想了很多。记得我们初次相识是在1948年，华北三兵团刚刚组成，你从六纵队调到兵团新华

分社当记者，当时你才 21 岁，你们这些平津出来的大学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因为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投奔共产党，经过多年锻炼，到了 1957 年，正是你们人生中最好的年华，精力充沛，有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正可以大展身手为国家作贡献的时候，却把你们打成了右派，这不仅对你们个人是灾难，对国家也是损失。这几年在干校的时候，我们这些不在官位的老干部经常在一起反思：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以后，我们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党从农村到城市，从战争到建设，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这个大转变，对于新形势、新任务，我们知识不足，缺少经验，出现过不少失误，其中，不说最大，也是严重失误，是不爱护人才，甚至摧残人才，首当其冲的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划入了资产阶级。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很多有成就的专家、学者成了“反动权威”，戴高帽、蹲牛棚、挨批斗，有的被折磨致死，一些国际知名的科学家被罚去扫厕所做苦役。一位中央领导曾痛心地说：“这是‘糟蹋圣人’。”我们搞建设需要“圣人”，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原子弹和氢弹不是靠阶级斗争斗出来的，是很多科学家用他们的心血和智慧造出来的，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干校和我一起反思的那些人也大多不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也是知识，也是宝贵的财富。可是他们却被定为“走资派”，和知识分子一样被划入了资产阶级，一个个被打倒。我们要搞现代化，要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既不用知识分子，也不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干部，靠的是什么呢？我们真是想不懂。

停了好一会儿，他坚定地说，要有信心，这种是非颠倒的混

乱局面不会持续太久。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党是摧不垮的，一定可以打破现在的怪圈。从干校回来以后，一些熟悉的老同志到一起总要说一些忧国忧民的事情，这些年的感触太深了。这种大题目一时也说不清楚，还是先说说你的问题吧，这次你到北京准备怎么办？我向他说明，我在农村好几年，对上边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来找丁主任就是想了解些有关政策，商量一下我这次上访该怎么办，从哪儿入手，找哪些人。

丁莱夫对有关政策也不甚了解，他尚未恢复工作，和现在的中央领导人没有直接接触，也没有看过关于甄别、平反方面的中央文件。从北京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少被打倒的领导人陆续回来了，但都是“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以前的积案还没有平反。他的意见，第一步还是去找原处理单位北京军区。军区原来的主要领导人全换了，不认识我，找他们，肯定不见。我可以先通过信访部门提出申诉，看看北京军区的态度。然后去找找原兵团宣传部长沈图同志和魏泽南同志，他们两个对我的情况是了解的，现在都解放回京了，甄别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讲话。还可以找一些原二十兵团的老人，这些人大都还在军区，多几个人讲话总有好处。丁莱夫又嘱咐我说：“一定要有思想准备，要有耐心，还要有信心。‘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有的已经平反，解决以前的积案也就有希望。只要不屈不挠的努力，又有这么多人替你讲话，而且你的问题并不复杂，终归是可以解决的。”

谈话谈到11点钟，快吃午饭了，我起身要走，丁莱夫半开玩笑地说：“怎么，怕我收你的粮票？咱们都算是死里逃生，劫后重逢总该吃顿团圆饭吧。”饭菜当然比我在农村吃的丰盛多了，有鸡有肉还有葡萄酒，丁莱夫举起酒杯，说：“来，为我们分别

17年后在首都重逢干一杯！”丁莱夫的兴致不错，喝酒当中，回忆起在朝鲜时一些人的生活逸事。

谈话当中我向他打听杨成武的情况。杨成武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南征北战几十年，战功显赫，是毛主席很器重的高级将领，怎么忽然间就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成员？还有丁莱夫自己，一向勤勤恳恳，是总理亲自选定到广播事业局做党的领导工作的，怎么也被打倒了？丁莱夫摇摇头说，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人，不必问原因，也说不清原因。“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成立各种造反派的组织，折腾得厉害，从学校折腾到社会上，造成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店停业，形势大乱。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为了恢复正常秩序，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特地委托小平同志坐飞机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叫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并未作其他指示。工作组派出以后，在恢复学校秩序的过程中，少数造反派和工作组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的竟把工作组赶出学校，毛主席回京以后，也严厉地批评刘少奇和小平同志。广播事业局也派人参加了工作组，于是就大会小会地批斗丁莱夫，叫他检查交代为什么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他没有什么可以检查交代的。第一，他是执行中央的决定，当时刘少奇和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他们部署的任务丁莱夫当然要执行；第二，派工作组是共产党的老传统，这不是第一次，不久前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为什么毛主席派工作组是革命行动，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就是镇压革命行动呢？丁莱夫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对他的批斗不断升级，后来江青说了一句话“丁莱夫不是个东西”就算给他定了性，把他打倒，送到干校去劳

动。

我去丁莱夫家里是星期六，第二天是星期天，军区信访部门肯定不上班，我就按丁莱夫的嘱咐先找魏泽南和沈图。

1948年5月，华北三兵团刚刚成立的时候，魏泽南先我几天由冀中军区调到兵团政治部任宣传部副部长；1950年我调到华北军区报道组不久，他也调到军区任宣传部副部长；1951年二十兵团（原三兵团）入朝作战，他又任兵团宣传部长。虽经几次调动，他一直是我的直接领导。魏泽南也是老资格，抗战前当小学教师时参加了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抗战以后调到部队做宣传工作。在下级面前，他是一位和善的兄长，低声慢语，很少疾言厉色地斥责人，但工作上却一丝不苟，特别是看文章，字斟句酌，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错了也要改过来。他也有生气的时候，爱带骂人的口头语。1952年夏天，魏泽南调回国内，到解放军政治学院任副教育长。时间不久，国务院各部委建立政治部，他调到文化部政治部任副主任。按说他在杨成武部下工作的时间不长，工作上和杨成武接触也不多，但杨成武被打倒以后，他却被定为杨成武的“黑爪牙黑干将”，屡遭批斗，据丁莱夫说，他在被批斗当中吃了很多苦头。

魏泽南的住处在朝内大街文化部干部宿舍，离军区赵家楼招待所很近。我按丁莱夫说的地址找到了文化部宿舍大院，进得大门向左走出不远，就见一幢灰楼前的小平场上有一个人在打太极拳，凝神静气，一招一式曲伸自如，很有点像电影画面上出现的太极大师的样子，我看那身形那动作很像魏泽南，走近一看，果然是他。我们从1952年在朝鲜分开，已经22年了，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沧桑，他竟然没显老，脸色红润，看不到皱纹，从练功的神态来看，精神也很好。魏泽南练得十分专注，毫不注意来往

路过的行人，当然也没有注意到我。我不懂中国功夫，听人说练功的时候忌人打扰，就在小平场东边的墙角处等待着。直到他练完了，我才走过去，喊了声：“魏部长！”魏泽南愣了一下，这才认出是我：“徐孔啊，你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笑容、语言仍然那么和善、亲切。我说：“前天刚到，昨天去看丁主任，才知道您的地址，今天来看您，再看看沈部长。”魏泽南拉着我的手说：“好，好！咱们见一次面真是不容易，到家里说。”

魏泽南的住处，原是法国官员的住房，建筑很讲究，但他的卧室和客厅里却都是木制的旧家具，“老夫子”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

魏泽南的爱人张志民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因为身体不好，多年来一直在家休养。这个人和魏泽南的性格相反，魏泽南性格温和，寡言少语；张志民却是快人快语，急性子，热心肠。在家里，她是名副其实的“总理”，不但总管家务，魏泽南的吃喝穿戴一切生活上的事情都由她安排，在兵团的时候她像大姐姐对小弟弟一样地关爱我们这些年轻的干部，我们都叫她张大姐。魏泽南带我进屋的时候，她也愣了一下，以后就拉着我的手说：“这么多年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连个音信也没有？”我把从劳教农场到遣送农村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她一边忙不迭地给我沏茶、拿糖果，生气地说：“‘文化大革命’，老魏也挨整、关进牛棚里，整天挨批斗，不许送饭，不许见家人。我就偏去送饭，偏要见他，守卫不许进，我就和他们吵，我一个半大老婆子，无官无职，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到底叫我把饭送进去了。”张志民对整人的非常气愤，她和盖志良一样也用“红得发紫”形容韩福贤，说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可是出尽了风头，上天安门、大会小会讲话作报告，说什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最懂得爱

什么人恨什么人，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恨谁。好人好报，恶人恶报。他恨人家，人家也恨他。他得病住院的时候，没人去看他。

在谈话中我才知道，魏泽南“解放”以后并未回文化部、政治部，而是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当顾问，上班下班都是自己走，没有工作用车。为什么这么老的领导干部，分配到级别比较低的单位担任了个闲差？张志民说出个中原委，这和转业时魏泽南自己的谦虚态度有关。从解放军政治学院转业的时候，中央组织部门找他谈话，准备分配他到文化部政治部当主任。魏泽南觉得自己从未在地方上做过政治工作，特别是文化部管着很多文化单位，政治工作更复杂，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难以胜任。他建议，先担任副职，叫一位熟悉文化工作的副部长兼任主任，过一段时间，自己熟悉情况以后再接任主任。上级组织部门认为他的意见有道理，对工作有利，就任命他当了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文化部是造反的“重灾区”，他也被打成了黑帮，当然就不可能调整职务了。他“解放”的时候，按当时的规定，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官复原职，政治部主任是副部长级，他是副主任，不够这个线，不能复原职。他的级别比司局长高，分配当司局长也不合适。后来决定分配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人民出版社当顾问。这顾问的职务，级别可高可低，没有明确的责任，也没有实际的权力，工作可干可不干，是个闲差。张志民对这次分配很不满意，可是魏泽南处之泰然。他把闲差当实差，每天按时上班，对编辑部送来的稿件一丝不苟地认真审读，遇有编辑潦草的稿件，他找到责任编辑，严格地逐字逐句地指出讹误之处，要求修正。这就是魏泽南，对个人的权和利从不计较，而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则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我看到墙上有他亲自写的一副对联“四壁有书大富贵，三天无事小神仙”，很能体现经过动乱之

后他的心境和处世态度。他希望能有个平静的环境，多读些书，充实自己。当然并非老庄的出世思想，他坚持锻炼身体，充实自己的知识，深层的意思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结束之后，可以更好更多地为国家工作。张志民和盖志良在谈话中都提到了韩福贤，我很想了解他的情况，但魏部长和丁主任一样，回工作单位以后，和外部接触不多，知之不详，只听北京卫戍区的人说过，林彪一号令下达以后，很多老干部离开了北京，韩福贤也在1970年离开卫戍区副政委的岗位，被安排到山西一个干休所，因身边无人照顾，把他女儿也调到山西，以后的情况就不了解了。

对于我这次上访，魏部长同意丁莱夫的意见，先找原处理单位——北京军区。他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如果需要他讲话，他一定会讲话。不但自己讲话，还要找几个了解情况的人，一起为我讲话。

张志民的老母亲正在包饺子，张志民一定留我吃了饺子再走，我看时间尚早，想抓紧时间去找沈图。魏泽南给沈图打了个电话，告诉我，沈部长在家，正好今天上午没事。

沈图原是华北二纵队宣传部长，1947年我参加华北联大组成的前方记者团到二纵队体验生活，初识沈图。1948年我调到三兵团新华分社当记者，二纵队是三兵团的主力部队，我经常到二纵队采访，我俩逐渐熟悉。1949年太原解放以后，兵团部移驻天津，沈图从67军（原来的二纵队）调到兵团任宣传部长（副部长是魏泽南），成了我的直接领导。1949年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沈图是大会副秘书长，他知道我是联大文艺学院出来的，喜爱文学，可能为了使我有机会接触文艺界的人，带着我一起去北京参加大会的工作。可巧，大会秘书长是

我的老师陈企霞，和秘书科长陈森是同班同学，陈森提议我担任记录股长，负责大会的记录工作。这样，我和沈图就全过程地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会后回到天津不久，经周总理提名，沈图被调到中国民航总局任副局长，我们就分开了。在我见过的几个领导当中，我和沈图分开的时间最长，从1949年算起已经25年了。沈图在同级领导干部当中是比较年轻的，头脑清楚，思维敏捷，说话做事果断利落，对人坦诚热情，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干部很爱护，敢于重用。

沈图的住宅离魏泽南家很近，在北小街南口的酒糟胡同1号，是一座老北京的传统民居四合院，大门口的左侧是车库，司机正在擦车。看来沈图已恢复了工作，有了专车。

见面以后，沈图很热情，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们可是很多年不见了！”见到久别的老领导，又这么热情，我心里很激动，说：“若是丁主任和魏部长不说，我真不好意思来找您，我们分开这么久，我一直没有来看望过您。”沈图说：“什么话，你是我的老部下，一起打过仗，分开多久，战斗的友谊也是断不了的。”

沈图家的客厅比魏泽南家的考究多了，沙发、茶几、茶具以至高脚几上的盆花摆放得整齐有致，一看就知道主人很会安排生活。但我也知道，安排家里生活的并不是沈图，而是沈图的夫人王钰，那是个非常精明干练的家庭主妇，是抗日战争早期就参加妇救会工作的有开创精神的妇女干部。

沈图说话一向爽快，不绕弯子，他问过我这些年来的情况以后，说起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三反”分子，被秘密送到一个小的空军基地，对他实施一种很奇特的惩罚。批斗之后，就叫他坐在木椅上，把两手反铐在椅背后边，不能动，更不能看书看

报，渴了想喝水也不能，成了活僵尸，那滋味比棍棒拷打还难受。家里那边，王钰到处打听找不到沈图，直到“九·一三事件”以后，对“黑帮”家属的看管有些松动，王钰给周总理写信，恳求总理查找沈图的下落，民航局是受空军党委领导的，周总理责成空军党委立即查明回报。沈图那边根本不知道“九·一三事件”。有一天，给他送饭，吃完饭以后，没有给他铐椅背，给他一堆文件叫他看，他这才知道，林彪反革命罪行败露，乘机外逃，于9月13日摔死在外蒙的温都尔汗。过不几天，王钰根据周总理告诉的地址找到机场来了。机场已经接到上级电话，周总理指名要人，他们不敢不放。这样，王钰就把沈图接回了北京。

可能由于有亲身的体验，沈图对于被错整的人很同情，答应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我，但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他说：“‘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些老同志陆续回到了原单位，但是政治形势并未根本改变，大量的冤、假、错案的甄别工作尚未提上中央正式日程。我同意丁莱夫同志的意见，要做长期的思想准备，现在不可能甄别‘文革’以前的积案，特别是右派问题，是老人家‘钦定’的‘铁案’，他老人家不讲话，没人敢甄别右派的案子。”沈图的意见，我这次上访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要求军区给安排个工作。他说，北京军区是全国最大的军区，下属单位很多，只要军区领导点个头，安排个一般工作是可能的。解决工作问题以后，再解决第二步——甄别平反的问题，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并非不可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已经乱了七八年，再这样乱下去，国家承受不了，人民承受不了，该是快乱到头了。只要政治形势好转，政策有松动就好办，军区总还有了解你的人，你自己要讲，他也可以找熟悉的军区领导人讲话。

我觉得沈图的意见符合实际，决定按他的意见办。

军区领导机关司、政两部已迁至城外西山八大处。我到信访接待室把申诉材料交给值班人员，并提出，我从东北远道而来，希望能和原工作单位——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当面谈谈。当年我从朝鲜轮换回国时，工作单位是宣传部，由于特殊原因，在文化部把我打成了右派，但我的编制在宣传部，而且我在招待所得知，文化部已和宣传部合并，我只能向宣传部申诉。值班员很负责任，没有叫我“放下材料等候通知”一推了事，而是马上给宣传部办公室打电话，过了一会儿，来了个细高个儿年轻干部，值班人员向我介绍说，这是宣传部郑秘书。郑秘书叫郑荣泉。按他的年龄，反右时他大约还是个小学生，不大可能了解反右时的真实情况，而报刊上揭发的右派“罪行”，一个个都是面目狰狞甚至是疯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现在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我担心他听不进我的申诉。出乎意料，他听得很认真，我说完事实的经过、起因、几条罪状的真实情况和多年来我和家庭的遭遇以后，他恳切地说：“你的遭遇和你的意见我能理解，宣传部一定会认真对待你的问题。不过，落实政策的工作，政治部门之间有分工，但不论哪个部门管，你过去是宣传部干部，在解决你的问题当中，宣传部都会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他把办公室的电话留给我，叫我有什么事情可随时和他联系，看得出来，他是持同情态度的。

我当然急于想知道哪个部门负责办理我的事情，只隔了一天，就给郑荣泉打电话询问此事。他回答说已经定了，团以下干部的落实政策工作由政治部直政处负责，已把申诉材料转给直政处，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要求，让我以后有什么意见可以找直政处的王干事联系。当天我又一次去了军区政治部信访接待室。值

班员打进电话不久，果然郑荣泉陪着一个矮个儿微胖的中年干部来到接待室，他向我介绍说：“这就是直政处的王干事。”可能王干事接待信访的人多了，态度很和气，但说话不多，完全程式化。他告诉我：申诉材料已经看过，我的意见和要求也知道了，政治处一定会采取负责的态度对待我的问题。但我这个案件时间太长了，如何处理此类案件，还没有明确的政策，所以我的工作和甄别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叫我等待一段时间，如有进展，马上通知我。

问题不可能马上解决我有思想准备，从王干事的谈话态度来看，多说无益，我要了王干事的联系电话就告辞了。

那以后，每隔三五天我就给王干事打一次电话，答复不是说：你的问题还没有研究；就是说：还没有新的精神，还要等一等。这原在我的意料之中。我住在招待所无事可做，就陆续看望了一些战争年代的老朋友。当然，我第一个去看望的是黎白。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十几年间，从渤海之滨的劳教农场、劳改盐场到东北的原籍农村，始终和我保持通信关系的只有黎白。黎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发配到山西农村的“五七干校”，不久前才回到原工作单位八一电影制片厂。

八一厂在莲花池，当时那里还是郊区，我从赵家楼招待所换了两次车才到达八一厂。两个人相见之后百感交集，在过去的十六七年里，彼此都经历了太多的雨雪风霜，所幸的是，身体都还结实，精神也没有崩溃。我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彼此倾诉了这些年来种种非同寻常的遭遇。我这才知道，他在干校也经受了超常的“锻炼”，在一次重劳动中还差点丢了性命，可能阎王爷不欢迎硬汉子，他还是完整地留在了这个世界上。谈到我此次上访，他表示坚定的支持，他这个人的性格一贯如此，绝不向压力

屈服，从不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他认为，如果自己错了，就老老实实地做检查；如果是强加的罪名，不论有多大阻力、拖多长时间，也要弄清是非，讨还公道。

他对上层接触较多，同意丁莱夫和沈图的看法，要我做“持久战”的准备，并提出在等待期间不要白白浪费时光，最好继续写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我觉得这很困难，一是当时的情况下，我静不下心来，调动不起写作的激情；二是没有写作的环境，招待所一间房住三四个人，你来我往，没法静下心来写作。他提议换个招待所。临走的时候，黎白给了我一些钱，补助我上访期间的生活费，多少钱记不清了。因我们的关系不同一般，我没说一个谢字就收下了。此后，我又相继看望了原二十兵团的王宇、高焰，曹振峰、刘文林等几个老朋友。

王宇，1964年我探亲回场，路过北京的时候曾经找过他，商量解决我的工作问题。他对我多年的遭遇有所了解，想不到的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深深地“触及了灵魂”，并和解放军报社的很多编辑记者一起被送到河南“五七干校”，当了一名炊事员。直到周总理了解报社的情况以后，下达指示：解放军报社的团以上干部一律回报社，有什么问题在工作当中解决，王宇这才回到了北京。王宇的爱人刘萍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未能幸免。1953年年初，刘萍从朝鲜轮换回到国内，同年考入人民大学，毕业后分到冶金部做人事工作。这种工作在“史无前例”中最容易和“黑帮”、“黑线”挂钩。她一个年轻的女干部被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为了防止逃跑，窗上还钉上木板，在里边过的是名副其实的“暗无天日”的生活。战争年代刘萍是部队中不多见的漂亮姑娘，但身体比较瘦弱，造反派就抓住体弱这点威吓她：看你这胳膊比麻杆还细，不老实交代就扭断你

的胳膊！刘萍体弱意志不弱，没有给自己抹黑，也没有揭发丈夫王宇的“罪行”。

夫妻两个“出事”以后，他们的两个孩子就成了“黑帮的狗崽子”。两个都只有十多岁，生活上没人照顾，在院里、街头常常受其他孩子的欺侮。孤苦无靠的两个孩子为了不受侮辱只能自己奋起抵抗，有时甚至操铁锹等家什和欺侮他们的孩子拼命。这种受歧视受侮辱的生活，在孩子的心灵上留下很深的伤痕。他们的二儿子原本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很有绘画天赋，但却形成扭曲的反抗性格，对周围的人以至父母，遇有不如意的事情，往往采取充满敌意的反抗态度，破坏了充满亲情的家庭生活。直到几年以后，环境变了，孩子也渐渐长大，才恢复了心理的常态。有类似的遭遇并非王宇一家。

我俩彼此都经历了诸多磨难，又加深了相互了解，王宇不仅支持我上访，而且对怎样争取解决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以后我们又谈了不少自己所知道的熟人这些年的遭遇。不知不觉之中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们在食堂吃过饭以后，我就按照王宇说的地址去看望住在同院里的老朋友曹振峰。

曹振峰和王宇先后调到解放军报社，都在美术组从事美编工作。但他和王宇不同，没有上过美术学校，是农村的穷家孩子，自小参加了八路军，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刻苦自学绘画，出版过一本很有影响的连环画，成为专业的美术工作者。抗美援朝以后，他由67军调到兵团宣传部，仍然从事美术工作。我们入朝时，正是第五次战役后期，敌军向北推进，我军则兼程南进，双方的先头部队在金城以南轿岩山一线遭遇，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前方炮火的轰鸣声使兵团机关的人们心情激动，我们入朝的第一仗已经打响了。宣传部长魏泽南把我们几个召集到山根朝

鲜农民丢下的空草屋里，布置到前线部队了解情况和采访的任务。当时二十兵团有两个军——67军和68军，分配曹振峰到68军，我和一位青年作家到67军。不料，魏部长刚刚布置完，那位青年作家就痛哭流涕，说他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他得了一种病，行动无力，不能到前线去了。魏泽南气得直咳嗽。我要去的67军是主要方向，战斗更激烈，可能魏泽南担心我一个人去，如果出意外不好办，决定曹振峰不去68军，和我一起去67军。我们背起背包直奔67军先头部队596团的作战地区，还没到团指挥所，就遇到敌人炮火的猛烈袭击，敌人的炮火从前沿一直打到师指挥所，炮弹不断在附近爆炸，敌机配合地面炮火，不停地在低空盘旋，投弹扫射，从天空到地面组成立体火网，拦阻我军的后继部队。山上山下浓烟滚滚，炮弹和炸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在山谷里发出巨大的回响，给人的精神造成沉重的压力。我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参加过多次战斗，随突击队登城，随先头部队突过敌人宽大火网拦阻地带，经历过多次凶险；曹振峰从抗日战争起，经历过的凶险更多。但我们从未经历像今天这样凶险的局面。人往往是这样，身入险境，反而忘掉恐惧，我们凭经验，根据炮弹破空的啸音判断弹着点，抓紧间隙往前跑。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我们躲进弹坑里，爆炸声刚落，我们马上跳起向前跑；又一颗炮弹爆炸，我们又跳进另一个弹坑里。躲躲跑跑，经过很长距离才到达团指挥所。指挥所是在山坡下边临时挖成的方形土坑，上边覆盖着薄薄的土石物，附近也是不断有炮弹爆炸，震得细碎土石沙沙地往下掉。通往前沿的电话线已被炸断，得不到前沿的消息，指挥所很着急。过了一会儿，指挥前沿战斗的团参谋长刘毅回来了。这个瘦高个参谋长满脸满头烟尘，他说，炮火打得抬不起头，烟尘迷得睁不开眼，开始上去的时候，部队有点慌

乱，可是老战士很快适应了情况，打得很坚决，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当天夜里我和曹振峰分开，各自到了一个前沿营。

曹振峰的兴趣很广泛，他致力于美术创作，对文学也很有兴趣，我们常在一起谈写作问题。此次战后我写的几篇稿件《英雄洞》、《红山五壮士》和《小炮手胡先明》等题材都是我们一起商量的。在两年多的朝鲜战争期间，我们多次一起下部队采访，彼此很了解，关系也很好。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大苏庄以后，我们仍然保持着通信，我在农场完成长篇小说《朝鲜战事》的上部以后，特地寄给他，请他提意见。他当然知道我的身份，当时根本不可能发表，但他鼓励我把这部小说写完。

相见之后，我们回忆起战争年代那些难忘的生活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遭遇，抚今忆昔，感慨万端，他告诉我一些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情况：一个是，军区宣传部和文化部合并，原文化部长刘佳到了宣传部，仍然是部长；另一个是，我们的熟人——抗美援朝时兵团宣传部的青年干事续桂峰现在是宣传部的副部长，而且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这些，对解决我的问题当然会有些益处。

他还告诉我联大的老同学、后来又同在兵团宣传部工作过的一位女同志高焰的情况。高焰早于我一年——1944年抗日战争末期到解放区华北联大学习。1945年华北联大迁到张家口，我由北平地下党介绍，到张家口入华北联大艺术学院文学系。高焰在美术系，我俩同在艺术学院，宿舍又都在东山坡那片日本人留下的红砖房里，打饭、上课经常见面，但因不在一个系，很少直接接触。1948年华北野战军组成三兵团，我们先后调到兵团宣传部，接触的机会就多了。特别是到朝鲜战场以后，住的掩蔽部相距很近，业务联系也较多，互相接触就更多了。高焰很有些特点，虽说是女同志，但作风上像男人，甚至比男人还粗心，从不

修饰，邈邈邈邈。当然，部队上条件受到限制，衣帽袜鞋都是统一发的，不可能不千篇一律。但姑娘们出于爱美的天性，还是找到了展示美的狭小空间。一位诗人感慨地说：“部队上的姑娘们把她们爱美之心全都展现在辫梢上。”她们用各色的绒线、塑料绳、绸子条在辫梢上打成各种花结，独出心裁，各有千秋。而高焰把这点展示美的空间从根本上消除，不要辫子留短发。身穿男同志一样的军装，头戴男同志一样的军官大盖帽，背着背包和男同志一起下部队。不但着装上和男同志一样，作风上也和男同志一样泼辣，有时一个人深入部队采访，有时出入硝烟弥漫的战场，真个是巾帼不让须眉。还有一点，高焰虽学的是美术专业，但似乎对文学的兴趣更浓些，我还没见过她创作的美术作品，但她在深入部队当中却积累了大量的文学创作素材，还写过不少有一定水平的散文，我们一起谈得最多的是写作问题，彼此有很多相同的看法。高焰从朝鲜回国较早，1955年我回国休假，曾和曹振峰一起到她家里看过她，她已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时隔19年，这次相见的时候，她的大女儿已经工作，二女儿也上中学了。高焰一向不大爱讲话，但很有正义感，对朋友的困难总是尽力帮助，我被打成右派的起因和经过她大体上知道，她同样支持我上访。在我长达4年多的上访期间，她在钱和粮票等方面多次给过资助。

这期间，我还看望过原兵团文工团戏剧队长刘文林，我们是1948年兵团刚组建时前后脚调到兵团政治部的。在我看望过的几个人当中，和刘文林在一个单位的工作时间最长，接触也较多。特别是朝鲜停战以后，我由记者改作编辑，主编政治部机关刊物《工作通讯》，不下部队，光坐机关。《工作通讯》编辑部离文工队不远，我和文工队的几个领导都比较熟，交往很多。战地

生活单调，主要娱乐就是业余时间打扑克，我到文工队打扑克主要的牌友就是刘文林，他也常到《工作通讯》编辑部来参加“战斗”。这人是典型的燕赵汉子——性情直爽，敢说敢做，也敢于坚持不同的意见，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了问题。1970年我回贵州探亲时路过北京，曾去他家里看望，家里只有他爱人陈铮。陈铮的情绪很不好，告诉我说，文林出事了。我很惊讶，问出了什么事？陈铮说：“就是抗日期间他在农村工作被捕那一段，有自首变节的行为。”我说：“那一段历史经过几次运动不是已经弄清了吗？当时被捕的又不是他一个人，是有证人的呀。”陈铮说：“可是，是他自己交代的，还向毛主席请罪。他自己交代出自己的问题，别人能够说什么？”这事真把我闹糊涂了。若说刘文林从前隐瞒了那一段的历史问题，我不信，同时被捕的好几个人还健在，想瞒也瞒不住。在批斗的压力下“屈打成招”，给自己编造罪状？刘文林并不是软骨头，再说到毛主席像前请罪，那是出自内心的忏悔，并非外界的压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想找刘文林当面问个明白。

刘文林的家在海淀区八一中学教职员宿舍。陈铮是八一中学的教务主任，他们家住的是八一中学的房子。

刘文林已从干校回来一段时间，见面之后，情绪显得有些低沉，不像往日那样，大声说话，大声笑。我问他，“文化大革命”初期主动交代自己的变节行为，还主动到毛主席像前请罪，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坦率地说，这两件事都是真的。他确实主动交代过自首变节行为，而且怀着忏悔的心情到毛主席像前请过罪。但他交代的自首行为都是假的。

为什么真心实意却交代出假的问题？他说，主要是长时间的苦想，产生了错觉，把假的想成了真的。开始批斗他的时候，他

心里很坦然，如实地说出自己被捕后的情况，和他同时被捕的人还在，那一段的历史是清楚的。但造反派揪住不放，一定要他交代叛变行为，声称已经掌握确凿的人证和物证，拒不交代，只能自绝于党和人民。他的思想开始混乱。他对党是绝对信赖的，他认为批斗者是代表党在审查他，既然审查者已经掌握了证据，说明自己确实有问题，他按照批斗者提出的问题，认真地回忆、思索，开始什么也想不出来，渐渐有了一些模糊印象，最后这些模糊的印象变成了事实，他“确实”有叛变行为。他觉得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居然长时间地对党隐瞒了历史上的罪行，所以才痛心地到毛主席的像前去请罪。

这件事听起来有些荒唐，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干部，智力上并无缺陷，可是在批斗的压力下，竟失掉对自己信任，自己明明没有问题，却按逼供者的追问，冥思苦想，硬是凭空想出自己的“罪行”。

我要求到军区大院招待所住宿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之后我又找到原工作单位——宣传部的两位部长，刘佳和续桂峰。

我和刘佳自1958年分手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这期间，他在1959年“反右倾”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当中都曾受过冲击，坎坷的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白头发多了，脸上失去了昔日的光泽，而且刻上了很深的皱纹，不过身体依然壮实，精神状态也还好。刘佳对人一向宽厚坦诚，1957年反右中就对我持同情态度，经过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自己挨了两次整，对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同情。他对我说：“你的申诉材料我已看过，很明显，1958年给你定的那几条罪状，没有一条能够成立，丁莱夫和沈图的意见很对，你要有决

心，而且要有信心。我是当时文化部的领导，我要讲话，很多熟悉你的老同志也会讲话，你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的。”他嘱咐我，利用住招待所的时间多读点书，充实自己。我告诉他，想利用这段时间继续写长篇小说《朝鲜战事》，他很支持。

续桂峰的住处和刘佳的住处相邻，刘佳住 19 号楼，续桂峰住 16 号楼，这是政治部的两幢部长宿舍楼，按当时条件，算是高档宿舍了，房间较多，室内的装修和设施也较好。想当初我们一起在朝鲜的时候，住的是掩蔽部、坑道或者朝鲜老乡丢弃的山间草房，今昔对比天壤之别。生活条件变了，人的样子也有了很大变化。续桂峰年纪和我差不多，在朝鲜的时候不过二十多岁，中等身材，面目清秀，性情很温和，话语不多，但歌儿唱得不错，宣传部年轻人聚到一起的时候，常常欢迎他唱歌，唱得很动听，用现在流行的词，他算宣传部的一个“帅哥儿”。而今，年逾不惑，身体开始发胖，显得块头大了，自然也就多了几分领导干部的派头。在朝鲜的时候，我和续桂峰交往不多，我是记者，大部分时间在前线采访，回到部里以后，因为不在一个科，工作上联系并不多，彼此了解不深，只算是一般的同志关系。续桂峰回国较早，他回国后我们一直没有联系。这次见面以前，我并未抱太大希望，离别二十多年了，彼此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成了军队的高干，我则是摘帽右派，属“黑五类”之列，过去并无深交，现在政治上的反差这样大，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回避我，不打官腔，就算不错了。想不到，见面之后和我预想的很不相同。他见到我这个衣衫不整、阔别多年的老战友，没有一丝轻视的意思，态度很恳切，说话也很实在。他没有问我案件的情况，可能我的案情他已知道了，而且他比我更清楚，现在谈甄别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他以老战友关切的态度

了解我这些年的遭遇，特别是家庭、爱人和孩子的情况，通过这些谈话，很自然地拉近了彼此的感情。他同意我近期的打算和对时间的安排，对我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找郑秘书，宣传部能解决的，尽力解决。他是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他说话当然是算数的。但我没有为生活上的困难——钱和粮票等问题找过宣传部，我不能用这些琐事给关心我的人找麻烦。

找过几个主要的有关领导以后，我开始着手《朝鲜战事》的写作。

招待所比较安静，写作时间没人干扰。早晨我和警卫部队同时起床，在招待所附近散步，早饭后写作，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下午2时继续写作，晚饭以后到大院外边散步，有时去看望住在大院里的原二十兵团轮换回国的熟人。交往比较多的是董玉秀和朱梅两家。董玉秀和朱梅是原兵团文工队的两个漂亮姑娘，也是队里的尖子演员，两个人都轮换回军区文工团，可能年龄的关系，现在两个人都改了行，朱梅在文工团做政治工作，董玉秀则当了政治部俱乐部的副主任。这两个人在兵团文工队的时候，和我爱人的关系较好，我和她们也很熟。董玉秀为人随和，心地善良，对人很热情。我住进大院里的招待所以后，只要俱乐部有文艺活动，她一定通知我，如果是凭票入场的，就事先把票送过来。她在俱乐部工作，接触的人多，招待所、卫生所、食堂等单位都有熟人，而且人缘不错，只要提董玉秀副主任，事情就好办些。有她的关照，我在招待所，生活上方便多了，这对我的写作无疑是有益的。

在写作当中，我的思想又回到了当年的朝鲜战场，随着笔下战争情况的进展，我的心时而为部队遇到的意想不到的困难而焦急，苦思对策；时而为部队战胜困难，取得的辉煌战绩而振奋而

自豪。写作过程，使我的思想净化，消除了杂念，集中到战争和战争中那些英勇无畏的人物身上，精神常常处于兴奋状态，写作进度较快。

到了1975年，形势的发展令人振奋。小平同志再次复出，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对饱受动乱之苦的全国人民是巨大的鼓舞。邓小平也不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对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各项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整顿从铁路运输开始，相继对钢铁和其他工业企业、军队、科研、教育等部门各行各业都进行了整顿。久乱思治，整顿深得人心，成效也非常显著，“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一直停滞、下降的国民经济迅速回升，工业生产大幅提高，物资供应、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明显好转。报刊上、广播里，经常可以看到、听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之类的讲话和文章，使人精神振奋，看到了结束动乱的希望。

但这次整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四人帮”握有重权，他们对整顿工作设置种种障碍，进行干扰和破坏。到了11月份，形势急剧逆转，11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党、政、军领导机关负责干部1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审查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自此，对邓小平进行了点名的批判，骤然在全国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受批判，整顿工作受批判，在整顿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万里、胡耀邦、周荣鑫等也受到了批判。整顿工作被迫全面停止，生产重又下降。

人们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感到困惑、无奈和愤怒。正在这个时候，又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周总理的病情加重了！周总理在历史上——不论是革命战争时期或解放后国家建设时

期，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卓越领导才能和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赢得人们由衷的爱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党内外大批干部，忍辱负重，做了最大的努力。晚间电视台常常播放周总理的病情。军区老干部活动站有一台电视机，很多老干部每晚都守在电视机前，他们关心总理的病情啊！当屏幕上出现总理衰弱的形象时，人们止不住地流眼泪，有的人甚至哭出了声，人们日夜为总理的病情而担忧。记得12月16日也可能是17日早晨，天还没亮，大院的播音器突然响起哀乐的声音，住在招待所的人多数都起来了，有的人走到过道里，不幸的预感袭上人们的心头，大家提着心听着哀乐。哀乐过后，广播讣告，原来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文革”顾问康生死死了。人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有人大声说：“早该死！”大家放心地又回到床上睡觉了。

人们不但没有觉得悲痛，反而产生出一种快感，

康生死后20多天，1976年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全国陷入巨大悲痛之中，电视播出总理逝世消息以后，从招待所到大院里的司政机关，很多很多的人在流泪，在哭泣。人们不可能参加总理遗体的告别仪式，但都希望能最后看总理一眼，都守在电视机前。电视里播放的是在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的情形。很多复出的老干部，站在总理的遗体前悲痛欲绝，余秋里等几个人生生哭瘫了。特别是11日总理灵车从北京医院驶向八宝山的时候，北京上百万市民扶老携幼，在寒风中，伫立在十里长街的两侧洒泪相送，看电视的人也跟着流泪。人们巨大的悲痛，一则是为失去总理而悲伤；二则是为国家的命运而

担忧。这个动乱的国家主要靠总理在支撑，现在总理走了，总理病重期间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的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这个国家将要由谁来管理？人们忧心忡忡。我虽被划入另册，但国家的前途和我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没有心思写东西，整天地看报纸，听广播，有时还到最熟悉的几个人——黎白、刘文林、王宇、高焰等的家里，无非是想了解些情况。他们也在为国家的命运而担忧。

情况终于清楚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由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任命副总理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文化大革命”中由湖南调到中央，并进入政治局，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后被授予代总理大权。人们对他不熟悉。还有一个问题，人们也感到莫名其妙，中共中央的通知中说“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北京军区和叶帅办公室经常有联系，叶帅身体很好，并未生病，为什么要造一个并不存在的理由剥夺叶帅主持军队工作的权力呢？人们议论，可能是为批邓扫除障碍，企图彻底打倒邓小平和大批重新工作的老干部，为江青一伙阴谋家篡党夺权准备有利条件。因为叶帅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是健康力量的代表，邓小平复出和大刀阔斧地整顿，都得到了叶帅的大力支持，如果叶帅掌握军权，江青一伙的阴谋就很难得逞。

形势的发展确实很严峻，总理逝世以后，从2月上旬到3月上旬，分批召集各省、市、区和大军区领导人，继续“打招呼”，传达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讲话。江青大骂邓小平是“汉奸”、是“国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翻案、复辟的总根子、总代表”，批判的文章铺天盖地；很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被诬蔑为“还乡团”进行残酷的批斗，教育部长周荣鑫被折磨致死，全国又陷入动乱之中。

二十一、沉痛悼念人民的好总理

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郁积于人们胸中的愤怒终于在悼念周总理的问题上爆发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在天安门前镇压悼念总理的广大群众的“四·五事件”。

周总理逝世以后，全国人民怀着悲痛的心情，自发地组织各种悼念活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与人民为敌，不但禁止群众的悼念活动，而且控制舆论，不准报道群众的哀悼活动。从1月8日总理逝世到15日的7天中，只发了两条向总理遗体告别的消息。11日，周总理遗体火化那天，首都百万群众泪洒长街送灵车，新华社记者含泪写成的长篇报道，姚文元竟下令不准发表。更有甚者，有的报纸刊登怀念总理的文章，竟将之列为“反动文章”，追查背景。人们冲破限制，从3月下旬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从军区大院到城里，有定时班车，去天安门并不困难，我曾去过几次，第一次是会同刘文林一起去的。那天，天阴得很沉，还下着毛毛细雨，可是从长安街到新华门，偌大的广场，到处都是悼念的人群。大大小小的花圈，有的用钢管焊成，有两层楼那么高，小的只有脸盆大小。千千万万的大小花圈很好地组合在一

起，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一排一排地向四周延伸，东西两侧已接近广场边缘，仍不断有人抬着花圈，还有汽车载着大花圈驶向广场，广场南侧人民英雄纪念碑到新华门之间那片松树和纪念碑周围的柏墙上结满了白色的纸花，苍翠的松柏变成了一片雪白。碑身四周树立着高大的总理遗像，遗像两侧悬挂着条幅：“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

整个广场的气氛庄严肃穆。悼念的人们有如春潮，不断涌向广场，但广场上秩序井然，人聚得最多的地方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和四周的石柱上贴着很多诗词，怀念和歌颂总理，但更多的是声讨“王、张、江、姚”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表达人民消灭鬼魅的决心和豪情，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看的人抄写的人特别多，很多人挤不到跟前，站在跟前的人就大声诵读给大家听，抄写的人大多是把纸铺在前边人的背上写，这种互为工具互相服务的办法全都心甘情愿，没有反对的。我利用别人的后背抄写了好多首诗词，我的后背也被别人利用了好多次。回到刘文林家里，我们交换了各自抄写的诗词，重新抄录在笔记本上。当天我没有回军区招待所，住在刘文林家，第二天我们一起又去了天安门广场。

4月4日是农历清明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军区大院里也有很多人参加，我和招待所几个人是坐最早的一趟班车进城的，8点刚过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人已经满了。花圈，广场上没有地方摆，摆到了金水河边的观礼台上。从花圈上的署名看，来参加悼念的不仅是市内的，还有很多是外地的，包括各郊区县和天津、唐山、秦皇岛、石家庄以至南京、上海、西安、成都甚至有南宁和乌鲁木齐的。那天，悼念的诗词不仅贴在纪念碑座的石柱上，很多花圈和广场南边的松

树、纪念碑周围的柏墙上也有。很多地方有朗诵诗词和抄写诗词的人群，在广场演说的人比往日多，特别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有好几处，每一处都黑压压地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演说者都很激愤，有的声泪俱下，他们虽然没有叫出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名字，但人们都知道他们喊出的“魔鬼”、“妖婆”、“丑类”指的是谁。广场的悼念活动成了除妖打鬼的动员誓师大会，人们的情绪激愤而昂扬，但没有任何越轨行动。

这一天，在广场上到处游动却不参加悼念活动的年轻人增多了，他们虽然穿着和市民一样的便装，但很多人认得，他们是公安部门派出的便衣。参加悼念活动的人并未因出现公安人员而改变自己的活动，朗诵诗词、抄诗词，登高演说、听演说，参加各种活动照常进行，并未受到影响，而那些巡游的公安人员也未进行任何干预。直到下午3时，我离开广场，未发生异常的情况。各种媒体——报纸和电台、电视台对这次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盛况，照例不作报道，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可是第二天——4月5日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悼念群众的事件。

4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央的两个决议，都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一致通过”的。一个决议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另一个决议是：中央研究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的最近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变为对抗性的矛盾，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广播中央两个决议的同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开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由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发表旗帜鲜明的讲话，牢牢掌握批邓的大方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

大斗争进行到底。北京军区也召开了大会，军区领导号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争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完全胜利。”据说市内有的单位还组织了群众游行。报纸和广播里宣传的声势很大。

但群众的反应却很淡漠，甚至很反感、愤怒，把几百万群众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调集几万工人民兵和军警进行镇压逮捕，人们思想上无法接受。把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上悼念的群众硬和邓小平连在一起，说是邓小平的阴谋策划就更加荒唐。谁都知道，从1975年11月点名批判邓小平，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邓小平实际上已又一次被打倒，手中已经没有实权，他坐在家里怎么能动员几百万人到天安门去？“文化大革命”已进行10年，人们已从初期的狂热迷信状态中醒悟过来，江青一伙所干的种种祸国殃民的勾当，自己撕破了所披的革命外衣，使广大群众越来越看清楚他们的丑恶面目。人们积在心里的怒火终于在悼念总理的活动中爆发了。这是群众的觉醒，而非某个人的策动。

北京军区按中央要求开过大会之后，招待所里开始清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的人和事，要求参加过悼念活动的要写出书面交代材料，抄写“反动诗词”的一律要交出来。招待所里住的人流动性很大，经常变化。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写交代材料的，没有一个交出抄写的“反动诗词”，也没有一个检举别人的。大概招待所的领导对这件事也不积极，毫无“战果”地结束了。但招待所对住宿的管理却明显地严格了。首先是清理上访人员，不论受理或不受理的，一律限期离开招待所。军区大院里的招待所不能住了，马锡朋重又把我安排到城里的赵家楼招待所。

赵家楼招待所也在清理上访人员。我虽然登记的是出差，但

我到军区上访快两年了，大部分时间住在招待所，这事很快就会查清的。果然，住了不到一个星期，马锡朋就到我住的房间来了，后边跟着赵家楼招待所的所长。马锡朋向所长介绍说：“徐孔同志是我的老战友，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我们都在一起，这次到北京出差办一些事情，在生活上你们要尽量多照顾一些。”所长当然连连答应。所长走后，马锡朋把我约到屋外的走道上，很郑重地对我说：“招待所已经提出清理你的意见。你尽快地另找个住处。”看来，马锡朋是根据招待所的意见特地到这里来的。他向所长交代那番话，无非是叫所长知道我和他这个总政委的关系，在清理时不要逼得太急，能给我留点面子，留些缓冲时间，从中可以看出，马锡朋这个人很细心，很会做工作。可是我到哪里“另外找个住处”呢？机关在清理上访人员，住家也会清查来京人员，像我这种身份，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住在谁家都不合适。正在为难的时候，忽然想起了王达平。一个月以前，我进城去看王宇，王宇说起王达平曾打听过我，说徐孔到北京这么长时间，怎么不到我家去，我那里宽敞，他没地方住，可以到我那里住。

这王达平和王宇原来都是67军的。1949年王达平在604团当宣教股长，我到团里采访，相识，交谈中知道，我们是同乡，都是辽宁人，而且是华北联大前后同学。伪满时期，王达平曾被征兵入伍，1944年逃离伪满军，爬长城豁口进入华北解放区，入华北联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工作。抗美援朝以后，王达平提升为199师文化科长，我到师里采访，常常同吃同住，有时一起行军，跋山涉水。这个人是典型的东北人的性格，豁达豪爽，很重友情。他总像大哥一样照顾我，我们的关系一直很亲密。可是从朝鲜轮换回国以后，失掉了联系，我被打成右派以

后，就彻底地音信断绝了。

我从王宇家给他打电话，他非常热情，叫我马上就过去。

我和王达平分别 20 多年了，可是他的样子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丝毫不见老相，对战友也还像原来那样热情。我向他说明我目前的处境和来意以后，他爽快地说：“不管你打成什么派，我了解你不是反革命，你就安心地在我这里住着，这里没人查户口。”他的住处是景山后街总参的宿舍大院，王达平是师级干部，派出所当然不会到他家里查户口，家里的住房也宽敞，王达平的爱人重病，长期住院，家里只有他和女儿两个人，三室一厅，他和女儿各住一间。我住在北面的一间里，如果写作，这里条件很好，可是我没有心思写东西。“四·五事件”以后，形势越来越严峻。王达平的一个老战友的儿子叫贺延光，是个很有思想很有见地的年轻人，就因为参加天安门悼念活动被捕了。

王达平见我闲着没事做，就出个主意，叫我教他女儿学日语。我原来会些日语，能看书报能做一般的日语对话，但丢下多年已快忘光了，教了几次，很吃力，效果并不好。我觉得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很难受，问题短期内肯定解决不了，住在朋友家里做不了事情白吃闲饭，实在没意思。我想换个环境，到我妹妹家住一段时间。这不是放弃解决问题的努力，是等待机会。王达平知道我的急脾气，光吃饭不做事的日子是过不下去的，就没有深留我，嘱咐我和他保持联系。北京有什么新情况，及时通知我。我又把我妹妹的通信地址留给刘文林，刘文林原是军区文工团歌舞团的政委，和军区联系多，军区对积案的甄别处理如有新动向及时告诉我。

到了妹妹家里，我尽力不去想北京的事情，通辽是个小城市，从妹妹家里往北走不远就是农田和成片的树林。每天早起，

我骑自行车到田野和林间转上一圈，回来以后，看看书，想继续《朝鲜战事》的写作，思想总是进入不了状态，只能随时把想到的情节或人物有特色的语言、动作记下来。

1976年可谓多事的一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人们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7月6日又发生一件大事，德高望重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开国元勋朱总司令逝世了。在人们哀悼期间，7月28日，河北省有百万人口的唐山市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7.8级的大地震，震灾波及到京津地区，人员伤亡很大，虽不知准确数字，但从抢运到外地的伤员数量判断，人数肯定少不了。通辽这么个小地方就来了好几百，几个医院全住满了伤员。离通辽较近的沈阳、长春、四平大城市，据说接收的伤员更多。

地震的前两天，我接到刘文林的来信，说宝珍带着二女儿莉莉到北京来了，住在他家里。地震波及北京，她们的情况怎么样？我心里很着急，可是回北京必须经过唐山，那一段的铁路不通。过了五六天，我绕道赤峰回到了北京。北京的震灾不算严重，倒塌了不少旧民房，但没有大的人员伤亡。宝珍和莉莉在刘文林家里，大家一起住了几天防震棚，有惊无险。刘文林家住房紧张，我又回到王达平家里。

当时全国的中心任务是抗震救灾。媒体报道，灾难发生后，中央很快组成慰问团，华国锋亲自担任慰问总团团长，赶往灾区慰问，组织救灾工作；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火速组成抢救队、医疗队和建筑队，星夜赶往灾区，抢救伤员，安顿灾民的生活。我认识的好几个新闻记者也随着抢救队去了灾区。全国人民在关注着灾区。

1976年中国人民经受了巨大的困难，天灾加上人祸，在形

势十分严峻的时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逝世了。

记得是9月9日晚上，晚饭以后，我和王达平正坐在我住的房间里聊天，信访处（王达平是副处长）一个干部来了，把王达平叫到客厅里，说了很长时间。王达平又回到我住的房间里，神情凝重地对我说：“老人家走了！”我心里猛地一沉，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王达平也没有说话，我们黯然相对，沉默了很长时间。

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自己也说不清楚当时的感情，无法用话表达出来。大概王达平的心情和我差不多。

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热烈欢呼，奔走相告。北京的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鸣放鞭炮，高唱“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的歌曲，游行庆祝。全国29个省、市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举行了庆祝的集会和游行，全国人民都为粉碎“四人帮”而欢欣鼓舞，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

到了年底，出乎意料，我的大女儿玲玲来到北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喜讯，她被重点大学——东北重机学院录取了，到学校报到，路过北京。这个消息使我高兴，又深感愧疚。孩子刚刚一岁多，我就被打成右派，一直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由于家里生活艰难，她8岁那年就和弟弟明明一起，跟着姥姥寄养在福建三明的小姨家里。15岁她就进了工厂做学徒工，每月工资30多元，要交给小姨20元，生活之苦可想而知。但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自学，利用工余时间，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当年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是由组织推荐、分区考试的办法录取，工厂推荐了她，她以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可能因为她是重工业工厂推荐的，被分配到东北重机学院。

齐齐哈尔在北方，冬天天气很冷，而玲玲自小生活在南方，

对北方严寒的气候不了解。她身上穿的包括带来的那点棉衣是无法在齐齐哈尔过冬的，要买过冬的棉衣，我兜里没钱，全靠大家的帮助。玲玲到北京以后，住在刘佳的家里，我爱人来北京也曾在他家住过。刘佳的爱人陈群是著名的女高音，人称“铁嗓子”，为人非常热情。玲玲能上大学，她很高兴，她知道我的困难，找出她出国演出时公家发的一件羊皮大衣给了玲玲，邻近的著名演员胡朋给了一双大头棉皮鞋，是部队男同志穿的，玲玲只要御寒，并不在乎好不好看。在大家的帮助下总算备齐了主要的防寒衣物，我把她送上了北去的列车。

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我的二女儿莉莉考取了贵州工学院。

1979年冬天，我的最小的孩子——儿子明明也来到北京，他考取了沈阳的航空工业学院，到学校报到，路过北京。明明的小学 and 中学都是在福建读的，福建实行的是五五制，即小学5年中学5年，明明上学早，6岁就上小学，所以他考入大学时只有16岁。在本科生里，他的年龄算是小的。

至此，我的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这当然令我十分高兴。像我这样家庭的孩子，前途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黑五类”的狗崽子，政治上受歧视，生活当中受欺侮，处处低人一等，由自卑到自贱，甚至走向堕落、犯罪。另一种是在逆境中自励自强，用自己的勤奋，改变生存环境。

我自1958年4月被打成右派，到1978年11月改正，近21年对三个孩子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我带给孩子的，在经济上是困苦，在政治上是压力和被歧视。对孩子的抚养教育，全靠我爱人。1958年我出事的时候，我爱人只有21岁，作为“黑五类”分子的家属，不论政治上或者经济上都遭受了沉重的压力，是她那21岁的稚嫩肩膀难以承受的。然而，她挺住了。被开除

团籍，下放农村，在接连的打击下她没有泯灭良知给亲人捏造罪状，以求自保，也没有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一蹶不振，而是正正派派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以自己的行为赢得了同志们的尊重和好评。在经济上，我被开除了军籍和公职，没有工资，体力劳动的收入很有限，主要靠她 40 多元的工资抚养孩子，其困难可想而知。在贵定那些年，为了增加一点收入，家里养猪，她白天上班，早起天不亮就到酒厂挑糟，做猪饲料，下班后又常常到野地里打猪草。贵定的主要燃料是煤，为了节省运费，她和男同志一起走十几里的山路到煤厂去挑煤。她的正直刚强的性格和勤奋的作风，深深地影响着孩子，她们很小的时候，生活上就能自理，学习上很勤奋，加上天资比较聪明，学习成绩总是班里的前列。二女儿莉莉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受到影响也最深。我回贵定探亲的时候，有几次夜间一觉醒来，已经快 12 点了，她还伏在床前的小方桌上做作业。那时候，小学高年级留的作业很多，她每晚一定要做完作业才睡，从不“欠账”，从不要妈妈督促。在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男孩明明比较贪玩，学习上不大用功，成绩常常居于中游，但他非常聪明，高中的最后一年，大姐玲玲给他请了两位辅导老师，他“冲刺”了一年，也考上了重点大学。

1979 年，对我说来是值得庆幸的一年，三个孩子都已考取了大学；我自己多年来争取解决的问题，也都得到了解决。

二十二、右派问题得到改正， 工作问题困难重重

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人们期盼着能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更正过来，彻底改变“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误国害民的极“左”政策。然而，形势的发展和人们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按“两个凡是”的准则，不可能得到拨乱反正。政治形势有些宽松，但并未根本改观。全国人民强烈反对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仍在继续，“文化大革命”中包括邓小平抓整顿期间被打倒的许许多多老干部尚未获得解放，像我们这些历史的积案更提不上议程了。直到1978年，中央下发了一个55号文件，文件规定，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掉帽子，给出路。但除了个别确实搞错了的，不平反。关于全部摘帽子一项，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划右派是20多年前的事，绝大多数人的帽子早已摘掉了，他们要求的不是摘帽，是甄别平反，他们有痛苦的亲身经历，只摘帽不平反，仍然属于另册的“摘帽右派”。这个文件虽然没有说右派绝对不能平反，但指明是“个别的确实搞错了”的，有了“个别

的”和“确实”这两个限制词，可以肯定大部分人不会是“搞错了”的。

我当时努力争取的，还是尽快地给安排个工作。55号文件又一次提出“给出路”，这虽然并非新的提法，处理右派当时就曾提出，对右派“给出路”，给“饭票”给“选票”，但并未落实。现在又一次提出“给出路”，也许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内容，对解决工作问题会有些积极作用。我根据文件精神，又一次找政治部直政处和宣传部，并找了一直关心我的几位老领导。在几位老领导中，为我的工作问题付出心力最多的是沈图，沈图已提升民航总局局长。他有个特殊条件：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军区的新任政委傅崇碧是他的老朋友，傅是北京军区的最高领导，只要他点头，解决工作问题不会太困难。可是沈图和傅崇碧讲了几次也没有解决。沈图急了，把傅崇碧请到家里，拉到客厅隔壁的花房里单独谈，抱怨说：“你堂堂的大军区政委，给一个普通干部安排个吃饭的地方，真就那么难吗？”傅崇碧无可奈何地说：“你托我的事我真是尽力了。批给了政治部，又几次叫秘书催办，可是总说没有联系好接收单位，我也没办法。”我从政治部秘书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傅崇碧讲的是实情。一般的军区领导给下边的批示多是“酌办”、“研究处理”等商量口气，留有活动余地。而在我那封请求军区安排工作的信上的批示是“政治部办理”明确的肯定的语气，而且傅的秘书确曾几次给政治部有关领导打电话，催问这件事，政治部也确曾联系过六七家单位，回答都是：徐孔没有恢复党籍，不好安排。傅崇碧又明确指示政治部，安排到军区新组建的石家庄步兵学校。这个步校的政委是原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科长，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可能傅崇碧以为熟悉的人好办事，可是石家庄步校的答复仍然是：“不是党员，不好安

排。”这事就拖下来了。

经手这件事的政治部的秘书说：“徐孔这件事，难就难在，不但开除了党籍、军籍，而且开除了公职。如果有军籍、是干部，政治部可以下命令，下边不能不接受。可是徐孔什么也没有了，要安排，只能和下边商量。现在‘两个凡是’当家，谁也害怕沾上‘右’字，傅政委也没有办法。”

军区的最高领导人傅崇碧解决不了的问题，下边的单位，像政治部直政处和宣传部，想依靠他们解决我工作安排问题更是难上加难。并非他们不努力，而是上边没有政策。这时续桂峰已提升为宣传部长，这个人很重老战友的情谊，他知道我的困难，想尽办法解决我的工作问题，在部队上解决有困难，就在地方上打主意。他派郑荣泉秘书携带我的档案远赴我爱人工作的贵州省贵定县去联系我的工作问题，虽说没有办成，但可以看出宣传部的良苦用心。我已经在北京上访了四年，锻炼了耐心，一次一次的失败，并未使我灰心、退缩，我用等待的时间，继续写我的长篇小说《朝鲜战事》，在写作中继续等待。

这期间，粉碎“四人帮”以后，来北京上访的人日益增多，北京军区这里也不例外，招待所新住进不少上访的人，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问题，要求复查右派问题的在军区遇到一个原战友报社的黎莹。黎莹的处分比我轻，保留了公职，在天津附近的团泊洼干部农场改造，农场离北京不远，来去比较方便，所以他没有长住招待所。还有一个被划右派后发配到宁夏的老同学李兴华也来到北京。李兴华和黎白，是我在联大文学系时的两个最好的朋友，文学系毕业以后，我和李兴华都留在了文艺学院的文学戏剧创作组做研究生。1948年我调到野战军做随军记者，他调到中央警卫团当秘书，从此分手。进城以后，他调到韦君宜

二十二、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工作问题困难重重

主编的《文艺学习》做编辑工作，当选作家协会机关党支部书记。反右中，丁玲、陈企霞是作家协会批斗的重点，李兴华是陈企霞的“得意门生”，理所当然地成为群众注视的对象，开批斗大会的时候指名要他作重点发言，他以肚子不适要上厕所为由离开了会场。因为他了解陈企霞，不肯违背良知，给老师捏造罪名。于是，他成了“丁陈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宁夏。他爱人曲凤苞也随他调到宁夏。他先是在宁夏作家协会。后有人提出，右派分子不宜在作家协会工作。他又被分到一个几十人的小火柴厂作宣传工作。工作很轻闲，但精神却极度苦闷，终于积郁成疾，1977年经医院检查，确诊为癌症，请假来北京治疗。他爱人和宁夏出生的女儿李彤陪同他来到北京，曾两次变换地址，后来在普惠寺租了一间民房，算是有了稳定的住处。李兴华这人心胸豁达，对自己的病，是“尽人事，听天命”，积极治疗，并无悲观情绪。对右派问题，他给作协党组写了申诉信，但并未到处找人。他很赞成我利用等待时间继续写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朝鲜战事》。当初拟定这部小说提纲的时候，他曾提出不少意见，所以他对这部小说的写作情况很关心。我把已经完成的部分拿给他看，他读得很认真，帮助改正错别字，还提出几处修改的意见。我改过以后，他找人重新抄清，他和曲凤苞都保留公职，有工资，经济条件比我好，抄写的费用都是他出的。因为写作上的事情，我去那里的次数较多。他有一手不错的炒菜技术，我每次去，谈完写作，还能吃一顿可口的饭菜。

这期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已经展开，解放思想的浪潮冲击着“两个凡是”的禁区，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亲自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关于右派的甄别工作也有一些好的传闻。据说胡耀邦看到55号文件

对“右派不予平反”的内容以后很不高兴，认为不符合中央确定的“有错必纠”的原则，只要是错案，不论什么时间、什么问题、也不论是谁批准的，都应当平反，右派为什么例外？中组部等五部又开会研究出补充措施，右派也有平反的希望。这些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透信的人是了解情况的。

11月下旬的一天，哪一天记不清了，刚刚起床，接到宣传部副部长韩循的电话，要我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我很奇怪，大清早去他的办公室干什么？

韩循满脸倦容，他的办公桌上堆着好几袋厚厚的档案袋。见到我，他用手拍着档案袋，说：“你看，这全是你的档案，足有两颗迫击炮弹重。肃反以后，有明文规定，对那些不实的检举和检查材料一律销毁，而且要经本人过目。可是你的档案里，大量乌七八糟、生拉硬扯的所谓检举材料都原封不动地装在里边。我整整翻了一夜，却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不得不找你，到底为什么把你打成了右派？”我真是哭笑不得，20多年前的问题不能记在现任宣传部领导的账上。我就把问题的来龙去脉扼要地说了一遍。韩循沉思了一会儿，说道：“今天，政治部要讨论第一批右派改正的名单，你这个右派肯定是划错了，但作结论已经来不及。我准备在会上提出，先宣布改正，后作结论。”这一个白天，我心里七上八下，总是安定不下来。下班以后，我跑到续桂峰家里，他是宣传部长，肯定知道讨论的结果。

续桂峰显得很高兴，一见面就说：“你的问题解决了。政治部主任批准了韩循的建议，先宣布改正，后作结论。”并告诉我，宣传部已责成郑荣泉同志起草我的结论，很快地就可以和我见面。说起我那份没有整理的档案，他说：“翻看你的档案材料才发现，反右的时候，批判你和处理你的材料居然都是张山同志写的。”听

语气，他是感到有些意外。我说：“这早在我意料之中。韩部长会整人，但文字能力却不强。他依靠的笔杆子，头一个就是张山。张山我们是前后同学，又在一起相处了几年，这个人我了解，他不是成心害人，主要是为了自保。”续桂峰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张山已经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成了他的副手、同事。他对反右时的情况不了解，和张山又是这种关系，自然不便说什么。我临走时他告诉我，明天上午宣布改正名单。

续桂峰的办公室在楼道靠里的地方，从他的办公室到楼梯，要经过副部长的办公室。不知张山是否有意在等我，他的办公室的门开着，我路过门口的时候，他疾步迎出来，在过道里紧紧握住我的手：“徐孔同志，祝贺你，问题终于解决了！在你的问题上我是有罪的！”我说：“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不必再说了，我想，当年你也是奉命行事。”他说：“是，是，可是你受了20多年的苦，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话说得很恳切，而且眼睛里涌出泪水。他拉着我，一定要我到办公室里坐坐，有事想和我聊聊。我知道他想聊什么，他自己挨过几年整，可能对这运动中整人的事情有了新的感受，今天他的真诚愧悔的几句话与此不无关系。但现在再谈从前整我的事情还有什么意义？我推说有两件急需办理的事情，以后另找时间好好谈谈，就下楼回到了招待所。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提前到了政治部门前。不料，有人来得比我还早，有4个人已经等在那里。我老远就看到有一个人满头白发，怎么会有老人到这里来？到了跟前才看清，那白发的人原来是宋文茂。1950年我由二十兵团调到华北军区新华社报道组当记者，宋文茂是《华北解放军报》编辑，我们在一个大房子里办公，我们两个是同龄，被打成右派的时候都刚届而立之年，20年的风刀霜剑，使他俨然变成了老翁了。

宣布名单的会议名副其实，只宣读结论宣布名单，我的结论尚未作出，只宣布了名单。军区政治部第一批改正的只有5个人，会议用了不到10分钟。会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立马给我爱人发信，告诉她，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了。20多年来，她和孩子为我的问题背的政治包袱太沉、太久了，现在终于卸掉，应该尽快地让她知道这个消息。我做的第二件事找宣传部借了500元钱，寄给了宝珍的大姐徐素君。5天以前接到宝珍的来信，说她大姐徐素君得了癌症，要到上海做手术。她了解我的情况，没有提钱的问题。但我知道，到外地做手术，要人陪伴，除了公家报销的以外，个人也需要不小的开支，宝珍的大姐是小学教师，无力支付这笔开支。宝珍对这位大姐的感情特别深，她6岁丧父，幼年的生活是由大姐照顾的；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又是这位大姐，以她微薄的工资，全力帮助宝珍抚养我们年幼的孩子。我欠她的情太多了，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候，无论如何应该尽一点心意。我把钱寄出去不多天，宝珍就从贵州来到北京。莉莉已经上了大学，家里没牵挂，所以接到我的信以后，马上请假赶来了。她到北京来，主要是商量改正后我的工作去向问题。

右派改正以后在工作安排方面存在很多不利因素，一个是年龄问题，右派的改正拖了20多年，反右派是1957年，20多岁被划右派的，改正时已40多岁；40岁被划右派的，已60多岁，过了退休年龄；年龄大对安排工作肯定是不利的。从政策上看，和历次运动也不一样。对其他运动的冤、假、错案都叫平反昭雪，或简称平反，唯独对右派叫“改正”。改正后的待遇也不一样，其他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后都是官复原职，或由原单位安排待遇相似的工作。而右派，特别是军队上的右派，改正时虽宣布恢复党籍、军籍，但实际上一律不回军队，要求就地安置。

二十二、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工作问题困难重重

自从宣布第一批右派改正名单以后，上访的右派大量增加，军区大院的招待所里就住进十几个，和我同时在大苏庄农场改造过的难友李义和吴影也来了。来的这些人，有的是接到改正通知，到军区来等候落实政策的，有的是尚未改正，找军区保卫部，要求予以改正的。凡是改正的人，虽不回军队，但都发给新军装。这些人住的时间都比较长，这是因为右派改正以后，落实政策的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很难办，譬如工作安排、经济补贴等。

我的工作问题也定不下来，好在宣传部的态度一直是实事求是的，积极的。这得感谢续桂峰。我的问题改正以后，宣传部研究我的出路问题，他提出：“像老徐这种情况，叫他回农村，怎么安排他！先把他的党的关系转到宣传部，在宣传部等待机会。”这样我才得以在招待所住下来，有充足的时间去联系工作问题。

按我的专业，最好能在文艺或者新闻单位找个工作。经了解，原在文艺单位工作和我关系较近的老师 and 同学，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几乎全军覆没，个别幸免的也调离了北京。至于新闻单位，我调离联大以后，一直在部队做随军记者，对地方新闻单位不熟悉。打听很多人以后了解到，我从事新闻工作的领路人杜导正已从新华社广东分社调回北京总社，任国内部主任。他是我在新闻界唯一熟悉的负责干部，决定去找杜导正。

我和杜导正初识于1947年。那年7月，联大艺术学院组成一个前方记者团，由文学系和美术系毕业的研究生组成，到前线部队体验生活。我们去的部队是华北野战军二纵队，即将发起大清河北战役。我们在农村一个院落里找到了政治部，接待我们的是宣传部长沈图。他向我们介绍了即将开始的战役计划和二纵队的作战任务，并建议我们到此次作战的尖刀部队5旅13团去。说话当中进来一个人，沈图向我们介绍说：“这是纵队新华支社

社长杜导正，你们到下边部队采访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和他联系。”杜导正中等身材，略显清瘦，说的是山西的普通话。他向我们介绍了我们要去的13团的战斗作风、几个团营干部的特点和采访作战行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和杜导正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最鲜明印象是他那清瘦的脸上黑森森的浓密的连鬓胡。1948年我调到野战部队，到新组建的华北三兵团新华分社当记者，分社的社长就是杜导正，他成了我的直接领导。在几年相处当中，彼此有了较深的了解。杜导正这个人，思维敏捷，做事果断，心地宽厚善良。那时我刚出校门，不知天多高地多厚，骄傲幼稚，有时说话做事对他不够尊重。他从不计较，一笑了之，对我始终那么宽容、真诚。终于，我被他的工作魄力和人格力量所折服，对他产生了由衷的信赖，即使他交给我的任务是有生命危险的，我也毫不犹豫地去执行。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杜导正虽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但是个年轻的“老革命”。我们都无家无眷，部队就是家，周边同志就是兄弟姐妹，同志之间的关系，真诚而纯洁，有时可能因为意见不同而争吵，但事过之后仍然是好同志，战争年代形成的友谊是很难淡忘的。我和杜导正分开二十六七年，但这次相见，一点也不感到陌生。我毫无掩饰地讲了这几年到北京上访的狼狈处境，改正后工作安排遇到的难题，请他帮忙。他认真地帮我分析了目前情况：我当随军记者那些年，虽然业务上一直受新华社领导，但编制一直在军队，现在总社有大量被错误处理的干部要回来工作，像我这样组织关系从来不在总社的干部，不可能来总社工作。他建议我到地方分社去。当时我已51岁了，到外省去作个跑来跑去的记者已经过时了，我希望能在北京找个业务对口的单位作室内工作。他觉得我的意见有道理，先在北京多方面想想办法。

二十三、重操旧业、离休和发挥余热

我从杜导正处回来不久，黎莹到军区招待所来找我，说是新恢复的国家农委创办了一份《中国农民报》，经人介绍，他已到报社工作，创办报纸的领导人之一曦影是原华北军区直政部青年股长，认识我。他向曦影介绍过我的情况以后，曦影欢迎我去报社工作，并约我见面谈谈。我按约定时间到了曦影办公室。曦影和我同龄，身材高大，略显发胖，说话总是笑嘻嘻的慢条斯理，像是个慢性子，但办事很干脆。我们谈话不超过十分钟，主要是他向我介绍《中国农民报》的办报宗旨和目前的筹备情况。谈完以后叫我填了一份简历表，当即决定我第二天到报社上班，并明确我是总编室的负责人，不但管业务，还要管编辑部的人事。这个安排出乎我的意料，我20多年不工作了，一工作就担任重要部门的负责人，这个担子怕是挑不起来。我说出自己的顾虑，希望先做些具体的业务工作。曦影乐了，说：总编室只给你配一个助手，你不是当官，是干具体工作的。目前报社总共只有十六七个人，先把工作干起来再说。当时报社的十几个人忙的是编样报。我离开本行业务20多年了，重新回到新闻业务岗位，有一种归宿感，所以精神一直很振奋。在报纸正式创刊后不到一个月，一天，曦影把我叫去，要我以报社的名义给中央组织部写个

报告，请中组部特批我在北京就地转业。原来，“文化大革命”后期，曦影到石景山区支左，任区委书记。石景山区有个农场，中央机关不少领导干部在那里劳动改造，曦影曾给予这些老干部很多生活上的照顾。在当时，这是十分难得的，那些老干部很感激他，恢复工作以后，仍然念着曦影的好处，其中就有中组部的一位常务副部长。我这个问题属于落实政策范围，请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批这么一件并不困难的落实政策的事情，自然是可以办到的。

根据中组部的批示，北京军区很快地按正团职给我办理了转业手续，发给了转业证书。右派改正以后，按在职军官给办理正式转业手续的，在军队中我可能是唯一一个。

在办理转业手续的过程中，续桂峰又想方设法给予我很多照顾。一件事是经济上的补助。在右派当中，我受的处分是属于最重的，开除公职，没有保留工资；而且夫妻两个，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天各一方，三个孩子有两个由亲戚帮助抚养，生活困窘可想而知。办理转业手续以后，接下来就要在北京安家，总需要一些钱。按规定，改正后最多补助 1000 元，还我在宣传部的欠款都不够，如何解决我安家费用？续桂峰找有关领导商量，敌工部过去安置起义部队还有些余款，从中可拿出一部分补贴我。补贴的理由是：我在劳教农场时是 5 级农工，每月工资 40 多元，“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回农村，靠挣工分吃饭没有了工资，从 1970 年我被遣送到农村算起，到办理转业手续将近 11 年，按 5 级农工的工资补发，共 5000 多元，加上按政策规定补助的 1000 元，扣还在宣传部的借款后，还有 4700 多元。这对我这个困顿了 20 多年的人来说，实在是个很大的数字，以至在取款时，我不敢一个人去银行，生怕道上被抢劫，特地邀上组里的卢小滔和

科技组的莫廷良作“保镖”，在他们护卫下取出了那笔款。另一件事是给我高套了一级。按当时部队级别转换地方级别的规定，我应该是17级，但续桂峰在政治部会议提出，给我高套一级，定为16级，这不仅工资提高了，对在新闻单位的工作安排也有影响。

1980年，报社由王府井的临时社址搬到复兴路新址，还在附近分给我一套家属宿舍。1980年的10月份，报社派我去贵州搞发行。行前，曦影同志找我谈话，叫我此行“公私兼顾”，在开展发行工作当中，抽时间回家一趟，好好商量一下宝珍的调动和搬家、安家问题。1981年春节过后不久，宝珍的工作调到北京，安排在报社行政处分管基建工作。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上大学，户口均未迁入北京，只有宝珍母亲的户口随宝珍迁入了北京。在我出事后的困苦岁月里，我的三个幼小的孩子都是老人家一手抚养的。现在我的情况有所改善，应该也有条件对老人家尽些孝道了。

至此，我这一生后半段的生活安排大体定型了，在北京安了家，从事我的老本行——新闻工作。右派问题改正以后，我争取实现的也就是这些。

1984年我调离《中国农民报》，出任刚刚创办的《中国食品报》总编辑。《中国食品报》是新组建的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机关报。新组建的食品工业协会会长是杜子端。杜此前是农业部副部长兼乡镇企业管理总局局长，为振兴中国的乡镇企业，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现在他出任新的职务，很需要得力的舆论工具。他决定办一张报纸，筹办工作依然委托黎莹。黎莹在右派问题改正以后，很想干一番事业，这个人敢想敢干也能干，活动能力很强，协助杜子端办《乡镇企业报》的时候，办得很出色。受

命创办《中国食品报》以后又很快办成了，但他不满足，建议再办一家出版社，杜子端同意了，他又投入了筹办出版社的工作。这样，他在工作上就出现了矛盾，顾东顾不了西，于是想到了我，调我抓报纸工作。他集中力量抓出版社的筹备工作。



1996年春作者和社长杜导正（右1）、副社长方实（右2）在《炎黄春秋》杂志社办公室前合影。

按规定，1987年12月我就到了离休年龄，和主办单位——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领导王文哲同志多次商量，确定我离休后，由副总编辑陈崇保同志接任总编辑。食品协会领导认为，总编辑是负责报社全面工作的，既抓业务，又抓经营管理，既管人，又管钱，陈崇保一时难以适应，要求我再工作一个时期，带陈崇保一程。1989年的下半年，报社

的法人代表换成了新领导，编前会也由新来的领导主持。轻工业部人事司找我谈了一次话，主要意思是说：食品报一创办，我就是主要负责人，业务熟，人也熟，在报社有一定威信，希望我继

续发挥重要作用，报社新的领导很快会对我进行反聘。我的意见是：我尚未办理离休手续，每天仍然上班，自然会尽我的力量做一些业务工作。至于反聘，已经给我发下高级编辑的聘书，这就够了，不必要另行反聘。人事司没有坚持反聘的意见。1990年，我的工作很轻松，没有固定的任务，不参加报社的会议（党的会议除外）有时帮助看一些重点稿件，更多的时间是自己看书。

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工作轻松了，但心情并不轻松，这才感觉到，有一点工作压力，生活更充实。1991年春天，我去看望老领导杜导正。1989年年底，他报请离休，中央很快批准，先免去他国家新闻出版署党组书记的职务，不久又免去署长的职务。相见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位老领导是离而不休，正在筹办一份刊物《炎黄春秋》。他详细地向我介绍了《炎黄春秋》的办刊宗旨和筹办情况。杜导正亲自挂帅，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法人代表。《炎黄春秋》是名副其实的同仁刊物，是文化界、主要是新闻界退下来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筹办的。他们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没要一个编制，实实在在地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我见老杜的时候，他们在景山后边的少年宫租了几间平房，办公的桌椅，从《炎黄子孙》那边带过来一些，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杜导正的老朋友冯征同志原工作单位总参政治部那里支援了一些。有的办公桌“文化大革命”期间贴大字报，在桌面刷糨糊留下的干糊疤足有一公分厚。他们就是要在简陋、困难的条件下办出一本高质量的刊物。作为几十年相互了解的老战友，杜导正希望我到杂志社来，和他一起办刊物，我当然愿意。

《炎黄春秋》计划于1991年7月1日创刊，我5月上旬到杂志社参加创刊的准备工作。杜导正任社长，杜导正叫我任总经理，负责杂志社的经营管理工作。这恰恰是我的弱项。我一再申

明，我长期作业务工作，而且头脑简单，既不会经营，也不会管钱，怎么能管得好杂志社的经营工作？杜导正有他的考虑，没有作过多的解释，他说：“作杂志社的总经理必须懂编辑业务，才能作好保证、配合工作，你的任务是抓总，有些具体业务不熟悉，你可以聘人。”经杜导正批准，我请来了在农民报时的老搭档洪卓民作副总经理。这个人作风正派，又具有上海人头脑灵活作事精细的特点，搞经营工作比我强多了。

我离休之后能到《炎黄春秋》工作，是个难得的机遇。从1991年5月到现在，我在《炎黄春秋》已工作了12年。在《炎黄春秋》期间，我在尽力做好杂志社工作的同时，还完成了对我个人说来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出版了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百万字长篇小说《朝鲜战事》。这部小说，从积累素材、拟定提纲到动笔写作、修改定稿，经过了27年。写作和修改主要是在劳教农场、原籍农村和上访期间的招待所等不宜创作的环境里完成的，困难可想而知。右派问题改正以后，1982年黎白把这部小说推荐给文联出版社。责任编辑找我谈话，说：“按水平，小说可以出版，但目前这类严肃题材的长篇作品销路不好。考虑到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作者需要出一些钱或包销一些书。”我没有接受这个条件。又过了15年，1997年，一次，我向杜导正同志谈起我这部小说的写作和出版的曲折经过，他愿意给予支持，向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守文推荐了这部作品。胡守文很痛快地答应出版，不附加任何条件。1999年这部经过近半个世纪“苦难历程”的小说终于和读者见面了。销路不错，2000年出版社又第二次印刷。好几个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朋友给我来信祝贺，还有不少远在黑龙江和西南边疆的老志愿军来信，自报当年所在志愿军部队的番号、自己的职务、姓名和现在的地址，说在当地买不到

这本书，希望我能替他们购买。一位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老朋友对我说：“你这部小说和其他几本反映朝鲜战争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几本小说是作家到朝鲜体验一段时期的生活以后写出来的，而你是战争的亲自参加者，所以你笔下的战地生活和战争的参加者——从高级指挥员到战士，都使人感到很真实，也就增加了感人的力量。”这部作品能够和读者见面，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几十年的心血没有白费，而我，也就满足了。

二十四、暮年的反思

常言说，人生七旬古来稀。我今年已经 76 岁，人在走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常常会回忆往昔岁月的事情。

我是个很普通的人，但我的遭遇却很不普通，从 1958 年 4 月被定性为“极端右派分子”，沦为“黑五类”，长达 20 年有余，直到 1978 年 11 月才得到改正。为什么我的生活会出现如此大的波折，个中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不能不经常思索的问题。

我出身在农村一个普通的家庭，中农成分，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家庭出身是清楚、清白的。父母望子成龙，节衣缩食供我读书。上大学的时候，我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同班同学中有两个中共地下党员，和我关系较好，我受他们和进步书籍的影响，投奔革命，到解放区以后，继续读书。在华北联大毕业以后，作为研究生又留校一年，1948 年调华北野战部队作随军记者，在国内和朝鲜战场上，经常随战斗部队深入火线采访，无畏勤奋，发的报道较多，曾获得朝鲜内阁的解放奖章。我和其他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有理想，有追求，读大学和作研究生期间学的是文学专业，我希望通过自己对生活素材的积累，能写出一些像样的作品，但我对权力和名利一向淡泊。1950 年解放战争结束以后，兵团部队进驻天津，兵团宣传部长沈图曾找我谈过一次话。他

说，我们部队的政工干部大多文化较低，以后部队要搞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亟须充实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政工干部。他说，他和他的原工作单位 67 军组织部钟部长商量过，我做了几年随军记者，对部队情况较为熟悉。如果我愿意，可以先到 67 军一个营担任一个时期的教导员，熟悉一下实际工作，然后到团里做政治工作，这样，发展会很快。我知道沈部长的好意，想提拔我。但我向沈部长表示，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我这个人的弱点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我希望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工作。我不追逐权力和名利，对上，我执行领导分配的任务是坚定的，但从不看上级的脸色，逢迎阿谀。我对上对下或同级之间都保持正常的关系。我认为，作为一名年轻的普通新闻工作者，我一向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自己的职守，但 1958 年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不但开除了党籍、军籍，而且被开除公职，为什么我会遭受如此惨重的打击？

摘掉帽子以后回家探亲，路过北京的时候，见到两个分别 20 多年的老朋友，他们对我的遭遇都很同情，但都没有感到意外。他们说，你这个人吃亏就吃在性子过直，爱管“闲事”。在一定政治气候下，讲真话是要倒大霉的。细想想，老朋友这几句普普通通的话倒真说到了点子上。

回忆过去 20 年的艰难，从劳教农场到劳改盐场到被遣送回原籍农村，以致 4 年多的托钵上访，其间所经历的困苦和屈辱，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特别是家庭和子女，受到我的株连，20 多年啊，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都受到沉重的压力和痛苦，每想到这些，心里非常沉重。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对过去的所为感到后悔。我想，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该有自己做人

的准则。我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注重气节，有自己的良知，有独立的人格。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纵使身处逆境，仍不失做人本色。当然这样，很可能要付出代价，甚至是沉重的代价，因为个人的命运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行为，常常受客观的形势、特别是政治形势所左右。

在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在政治运动中，人们难以掌握自身的命运，但可以掌握自己行为的准则和对运动所持的态度。每个人的人生理念和价值取向不同，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就知识分子来说，由于所处的政治地位特殊，他们的选择更为艰难。“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必须，也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规规矩矩地遵命行事，独立思维的空间很小，即使有独立的思维也不能表达出来，否则就要大难临头，甚至遭来杀身之祸。多数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有的人脊梁骨被压弯了，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那个特殊年代，除了少数“文痞”、“恶棍”和别有用心投机分子以外，对多数文化人包括一些名人方家的软弱表现不应苛求，他们无力改变大环境，为了自己和家人子女的生存，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事情。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国家的悲剧。说到底，人类历史的发展，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源于知识的创新。一个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民族和国家是注定要落后的。

但在那种不正常的年代，也有一些知识分子铁骨铮铮。有的在最高层的巨大压力下，在四面围攻的困境中，匹马单枪向不以理服人、以势压人的粗暴行为进行战斗，有的为了坚持真理，维护人格的尊严，以死抗争。这样的人不是很多，但他们高尚的品

格，得到人们由衷的崇敬，历史也终于给他们作出公正的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是求知若渴。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各条战线各个行业迫切需要学有专长的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对于知识分子，应该说，现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比较好的时期，生存环境和工作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不能忘记历史的沉痛教训。逆境是考验，顺境也有考验。何况，历史的进程是不能一刀两断的，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延续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经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要丰富，都要完备，它的历史积淀也特别厚重。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以“阶级斗争为纲”，斗争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到底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很多人并不清楚，简单地把一切坏东西都纳入资产阶级思想，却忽视了反封建这个繁重的任务。

历史是公正的，对上述两种人的是非功过，将来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回顾我的一生，经历过顺境，也遭遇过多次挫折；曾经是人民功臣、最可爱的人；也曾被打入“黑五类”，经历了20年的艰难生涯。尝遍人生百味，我懂得了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准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自己的良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作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像皮鞭抽打下的陀螺。要正视历史，面对现实，正正派派做人，踏踏实实工作，对人对事，都要无愧于心。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名副其实的“小人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总归主要是由亿万“小人物”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书写的。只要每一个“小人物”都能坚持做人的良知，为人做事都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国家的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不容易，甚至会遭到打击，以致残酷的打击。但这样做的人，他们心里是坦荡的，在众人面前他的腰是挺直的。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候，心态也会是平静的，对国家对人民对朋友不会有负罪感，他的家人和子女也不会为他而蒙羞。

2003年于北京



直言無悔

我的“右派”经历



徐孔◎著



新华出版社

风暴来临之前

直言激怒当权领导

我成了肃反的审查重点

半年的隔离生活

一句话的小组会

回国后埋头写小说

反右的利剑悬到头上

不得不“低头认罪”

祸不单行 亲人连遭不幸

进入劳教农场

文艺组的生活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中

右派分子当了人民教师

慈母的眼泪

女儿相见不相识

工作问题受挫，写出小说不能出版

无权参加“文化大革命”

盐场

三十三年之后重返家乡

上访

沉痛悼念人民的好总理

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工作问题困难重重

重操旧业、离休和发挥余热

直言无悔

我的“右派”经历

徐孔◎著 ◎

新华出版社

直言就是有一说一。作者这一代人，用青春和生命证明：有一说一不容易。我过去说过一句话，读过《直言无悔》，我想再说一遍：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

—— 刘震云

作者为直言付出的代价是：二十一年右派，其中十年劳教，工资四去其三；十年返乡务农，工资全无。如此而无悔，良心价值几何？——读这本书，可以算出良心的底价。

—— 吴 思

直言无悔

我的“右派”经历

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该有自己做人的准则。我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注重气节，有自己的良知，有独立的人格。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纵使身处逆境，仍不失做人本色。当然这样，很可能要付出代价，甚至是沉重的代价，因为个人的命运并不完全决定于自身的行为，常常受客观的形势、特别是政治形势所左右。

尝遍人生百味，我懂得了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准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自己的良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像皮鞭抽打下的陀螺。要正视历史，面对现实，正正派派做人，踏踏实实工作，对人对事，都要无愧于心。

ISBN 978-7-5011-9350-9



9 787501 193509 >

定价：29.8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徐孔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011—9350—9

I. ①直… II. ①徐…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0184 号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作 者：徐 孔

责任编辑：张 程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a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7.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350—9

定 价：29.80 元

温馨提示：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13651277005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3969
